

中文摘要

中国古典说部名著《西游记》于明朝中后期(约16世纪)横空出世,同时也开启了一部波澜壮阔的《西游记》学术史的序幕。自万历二十年(1592)世本陈元之《刊西游记序》和稍后的李评本袁于令《题辞》两篇原始文献之后,经过长达四百年的层递累积,特别是明清时期评点式批评的兴盛,“五四”以来现代性学术研究的形成,以及新时期《西游记》论坛的空前繁荣,其曲折逶迤的发展过程和丰硕富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一部完整的《西游记》学术史,并积淀为一个宝贵的中国学术范式,创立了丰富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文化,耸立于中国和世界学术之林。

本论文作为第一部《西游记》学术史著作,试图对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进行全面审视和通盘考察,将明清时期、五四时期和新时期三大主要发展阶段纵向贯通,将作者论、成书(源流)论、版本论、思想与艺术论等相对独立的研究条块作横向融合,并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整合中总结治学经验,把握演进脉络,揭示发展规律,初步构筑起一个蒐汇、熔铸全部《西游记》学术成果,纵横交织,多层复合,而且不断向时空两维开放的立体网络结构,一个在中国学术中具有范式意义、充满丰厚历史蕴藉和现代意义的学术史体系。

论文在方法上力图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流行之文学批评方法相互借鉴,文学研究与文化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相互参照、印证,注重史论为本,兼涉考辨,以客观评述为主,也适当予以引申开发,总之是将以研究学术、解决问题为目的。在对四百年《西游记》进行宏观、整体观照的前提下,对于世本作为最早的评点本的理论价值、《西游真诠》的“谈禅”意蕴、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意义、鲁迅与胡适的学术差异、唐僧取经目的地灵山

究在何处、当下《西游记》文化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弊端)等为学界关注的具体理论问题,作者进行了较为仔细、深入的辨析和考论。

关键词:说部名著《西游记》,学术史,中国学术范式

Abstract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classic works, was written in the late of Ming Dynasty (about A. D. 16), meanwhile, it opened the prologue to the magnificent academic history which is worth being summarized and studied. It was begun with two primeval documents: "Preface" by Chen Yuanzhi and "Forward" by Yuan Yuling in the twentieth yea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1592). After more than 400 years' accumulation, especially three period's work: the flourishing annotation criticism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form of modernist learning study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and the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tribune in the new time, it has formed a completed academic history with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abundant achievements.

This article tries to make an overall observation of four-hundred-year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uprightly thread together the three perio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and the new time. At the same time, crosswise link up the relative independent study of author, origin, thought and art, etc in order to construct an academic system which includes all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s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By the study means, the author tries to unite macroscopic and micro-cosmic methods, combin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cholarly research way and western popula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ntegrate literary study and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culture, sociology and other relative subjects. All in all,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be the truth and to solve problems. During the discussion procedure, the author insists on basing on the reality

and true materials, believing the truth, suspecting the doubtful points, praising the advantages and denouncing the shortcomings. The author tries to make a just commentary on the relative learning phenomenon and theory as possible.

Keywords: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canonical form of China

目 录

序	齐森华	1
中文摘要		1
Abstract		1
导论		1
一、面对“学术史时代”		1
二、《西游记》学术史对象的确认与主体自觉		6
三、也说“真理与方法”		14

第一编 明清《西游记》学术史轨迹

第一章 明清《西游记》学术史概述	20
一、明清之际社会剧变与《西游记》学术背景	20
二、明清《西游记》学术史鸟瞰	29
第二章 明代《西游记》评点	38
一、冰泮发蛰、百草权舆：作为《西游记》评点发轫的世本	38
二、李评本与《西游记》评点的成熟	52
第三章 清代《西游记》评点	65
一、《西游证道书》：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的主潮	65
二、《西游真诠》与“谈禅”说	79
三、儒学别体——《新说西游记》	92

第二编 现代《西游记》学术史进程

第四章 现代《西游记》学术史概述	106
一、五四新文化与现代《西游记》研究开端	106
二、现代《西游记》研究的辉煌历程	110
三、现代学术范式:一个历史的总结	117
第五章 鲁迅与胡适	130
一、鲁迅、胡适与《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	130
二、胡适对现代《西游记》学术史的一个特殊贡献	142
三、同含异体、和而不同:鲁迅、胡适的学术差异	152
第六章 郑振铎、孙楷第和刘修业	162
一、《〈西游记〉的演化》:现代小说研究的世纪“杰构”	162
二、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孙楷第的《西游记》版本目录学研究	174
三、刘修业:吴承恩研究的奠基者与集大成者	186

第三编 当代《西游记》学术史流向

第七章 当代《西游记》学术史概述	204
一、当代《西游记》研究历史回眸	204
二、《〈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建国以来(十七年间)《西游记》 研究的精华	210
三、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新时期《西游记》研究的 振兴	217
第八章 《西游记》成书(源流)论	227
一、关于《西游记》成书阶段的划分	227
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的“祖宗”?	233
三、《西游记》杂剧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作用与影响	246
四、对《西游记》平话的再认识	258
第九章 《西游记》作者与版本论	266
一、旷日持久的《西游记》作者之争	266

二、异军突起的《西游记》版本研究	275
第十章 《西游记》文本解读	286
一、新时期《西游记》主题观的变迁	286
二、《西游记》的文化阐释	298
三、《西游记》八十一难与《还源篇》未必侔合——对李安纲 《西游记》文化研究的一点批评	312
余论 关于构建“《西游》学”的一点感想	324
主要征引和参考书目	328
附录 现代《西游记》研究论文要目索引	337
后记	422
补记	424

序

齐森华

竺洪波同志的博士论文《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有幸入选“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并安排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对于洪波来说，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因为复旦大学恰是他的母校，他在这所百年名校本硕连读，学习长达七年之久，曾获得多位名师的教诲，他的良好的专业基础和学术素养，应当说都是在复旦奠定的。现在他的博士论文能在复旦出版，正是他向母校老师汇报的极好机会，自然觉得分外荣幸，我作为他的师友，亦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洪波同志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教学和研究，学术上颇有建树。近年来，他深感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中，浮躁学风盛行，低层次高密度重复现象则愈演愈烈。有鉴于此，他决心从学术史研究入手。《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正是他的第一部学术史论著，并以此作为起点，拟逐步完成明代“四大奇书”的学术史研究。我以为洪波同志的这种学术构想是颇具识见的。

在新的世纪里，古代小说的研究要真正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怪圈，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有所突破，开展小说学术史研究，特别是大力加强近现代小说学术史的研究，或许是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学术史的研究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对象，可以说是研究之研究。其基本方式，既是一种学术的淘汰，又是一种学术的积累，它总是以不间断的“减法”来弃置那些陈旧的一般化的材料，保留那些有价值的应当传承的学术资源。而后人的研究工作，便是凭借着前人的这些学术资源来进行的，力求在前人已经构建的学术道路上再往前延伸一步。要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一旦离开了前人的学术积累，突破就失去了方向，创新也就没有了基础。尽管时下的学术评论中，创新与突破已成为出现频率很

高的两个词,但说实在的,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突而不破,似新实旧,往往它们的构架是新的,使用的名词也是新的,但基本观点与主要材料都是在前人论著中早已出现过的。这种现象的频频出现,你说是“暗与理合”也罢,是“学术的回归”也罢,是事物的“螺旋式发展”也罢,反正总是一种重复劳动,于学术的发展都是无助或是功效甚微的。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同志来关注学术史的研究,都能认真摸一摸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学术家底,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更好地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真正站在学术的前沿,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的起点都有所提高,使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能成为整个学术接力跑中的一棒,而不再是一切重起炉灶,更不会重跑前人已经跑过的路程。这样,学术工作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自然就会有所减少。

加强学术史的研究,对于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纠正当前学术工作中的失范现象,也能起到正本清源、引导学术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学术规范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为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原则,有一整套属于技术性层面的研究程序与基本范式,也包含着道德性、守则性要求。其中虽无多少艰深的学问可言,但要切实做到也并非易事。我们与其为此讲许多道理,还不如从切实加强学术史研究,提倡向学术前辈学习做起。因为前辈们的许多具有经典意义的论著,都积淀着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也渗透着时代的学术传统与规范,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可宝贵的财富。诚如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辅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未来以轨则也。”我们今天提倡学术史的研究,正是为了借“大师巨子”的业绩,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未来以轨则也。

从事学术史的研究,特别是进行个案的学术史研究,对于有志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年轻同志来说,更是提高自身研究素养的有效途径,也是进入学术殿堂的必不可少的入门阶梯。打开我们的学术史,特别是近现代学术史,我们不难看到前辈们的身上总有一种共同的、值得我们探讨和珍视的东西,时时启示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比如他们那种既关注于学术研究,又能保持一种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间情

怀的人生态度;他们那种甘于清贫,甘于寂寞,不趋时、不媚俗的治学精神;他们那种学贯中西、淹博古今的知识结构;他们那种无证不立论、孤证不定论的治学原则;以及他们那种不囿成说、锐意创新的学术追求。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通向治学最高境界的必备条件。对于每一位立志攀登学术高峰的年轻学者来说,学术史确是一部最具示范意义、也最具有感召力的生动教材。所以,我非常认同洪波同志的一段话:他撰写一部长跨四百年历程的《西游记》学术史,决不是任何个人的随意选择,“这是一个时代赋予的惠赐,也是历史的要求,对于一个身逢其时的《西游记》研究者,无非视其为学术使命,努力抓住其契机,顺应学界潮流,尽一份绵力而已”。

洪波同志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作为国内第一部《西游记》学术史专著,我以为有其鲜明的特色。在论文通讯评议和答辩过程中,曾因此得到过国内多位著名专家的高度肯定。这不仅对洪波同志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与鞭策,就我个人来说亦深受教益。只是限于篇幅,不能把专家们的意见一一详作介绍。下面仅就本书的特色谈一点个人初读书稿后的不很成熟的想法。

开阔的多元视野 我们的学术格局,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思想模式的束缚,每每只有主流,缺少支流与旁脉;强调对立,忽视交流与融合;学术视野显得比较单一化和绝对化。洪波同志的论著一个突出的长处,便是能成功运用多元互补的学术眼光,为四百年的《西游记》学术史勾勒出了多元并存、多元交流、多元融合的丰富而又生动的格局。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见。特别是《西游记》更是三教合一,九流驳杂,其思想文化内涵在明代“四大奇书”中尤其显得复杂,历代对《西游记》的解读也就各执一词,难以一概。作者充分注意到了这种复杂性,所以对各种学术见解都能抱理解之同情,放在多元视野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述,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即以现代《西游记》研究为例,作者认为鲁迅与胡适自然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开创者,但如从学术史上进行还原探溯,那么现代《西游记》研究尚有更早的线索可寻:在梁启超、蒋瑞藻、钱静方、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学术研究中已有关于《西游记》的内容,同样应给予必要的关注。作者又认为尽管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在思想倾向与历史

地位上,都是胡适难以企及的;但论著并没有把鲁迅定于一尊,认为在《西游记》的研究中,鲁迅与胡适“同含异体,和而不同”,都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第一代拓荒者与奠基人,他们都为学术发展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而且他们之间既有相互论争与辩难,又是互通信息、互相支持。作者还认为,在《西游记》的现代学术史上,如果说鲁迅和胡适为先驱,那么郑振铎、孙楷第便是殿军。但以往的研究中,因郑振铎较多地沿着鲁迅、胡适开拓的道路,继往而开来,为现代《西游记》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学界相对关注较多;而孙楷第则因与新文化存在较多隔膜,没有像鲁迅、胡适他们那样站在“五四”新思潮的前沿,因而在《西游记》学术史上,常常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但本书作者却能独具只眼,认为孙楷第的《西游记》版本目录学研究,乃是“独树一帜,另辟异流”,与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他们难分轩轻,各有千秋。正因为论著作者比较彻底地摒弃了一元化的思维模式,尽可能为读者展示多元并存、多元互补的学术生态,使学术史的描述更公正、更客观、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

鲜明的反思意识 由于偏爱自己的研究对象,以至任意夸大其学术成就,拔高其历史地位,而无视研究者的局限与不足,这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是一种常见的弊病。洪波同志论著的另一个突出长处,我以为正是他的鲜明的反思意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比如,对明清两代《西游记》研究的评价,作者认为,《西游记》自明万历二十年(1592)世本问世,特别是清季以降约三百年间,朝野震动,妇孺皆知,评论蜂起,版本繁夥,各派评点不一而足。作者对明清两代《西游记》研究的这种繁荣景象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他同时又清醒地指出,在中国古代五大小说名著中,就其研究和学术的品位而言,《西游记》一开始便呈现出相对落后的态势,始终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一直没有出现像金圣叹批《水浒》、毛宗岗批《三国》、张竹坡批《金瓶梅》和脂砚斋批《石头记》这样成熟、优质的文本批评。成就和不足一分为二,态度显得客观。又比如,论著在高度评价鲁迅、胡适《西游记》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卓越贡献的同时,又充分揭示他们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指出“囿于时代条件的局限,而且作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奠基者,筚路蓝缕,首创难工,疏漏错失在所难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其时他们掌握的版本

不全,且看到的多是清本,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吴承恩《西游记》(明本)全貌的认识,因而对版本流变的梳理、考辨做得还显薄弱”。作者的立论也显得颇为切实、公允。再比如,对当代《西游记》研究现状的评估,既肯定了学术向纵深、多元和强势发展的态势,又指出了论题分散无序、研究对象冷热失衡以及学风浮躁不实等三大不足,其分析也言而有据,深中肯綮。正是由于作者能站在当代理论的高度,在论著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自觉的反思意识,所以就有可能准确认识和把握学术历史,辨别其良莠,评判其高下,从而展示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的真相。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传统的精义,激活传统的生命力,寻求历史与现代的契合点,把还原历史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把学术的承传与学术的发展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的学术史研究,越出清理历史遗产的层面,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学术传统,更好地确立自己的学术路向,能真正为现代学术创新提供丰富的思想和文化资源。

科学的实证精神 对于学术史研究而言,文献资料是最重要的基础,无论是学术进程的描述,还是学术成就的评判与学术传统的总结,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凭空而为,而必须实际地占有史实,从第一手文献出发。诚如作者所说:“任何历史研究说到底都是后人对史实的追思和还原,其真理性和价值源于史料的确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洪波同志在自己的论著中十分注重文献的实证。其在文献资料的用力之勤,搜罗之广,征引之富,在《西游记》的研究中,不说已是“竭泽而渔”,至少亦是绝无仅有的。而详备的文献资料便是作者构建《西游记》学术史殿堂最重要的基石。当然,文献资料还只是基础,学术史的撰写还有赖于作者对史料의精审考订、深度消化以及独具识见的阐释。在这些方面,更显示了洪波同志深厚的学养。无论是对有关《西游记》的种种伪证的考辨,或是对世本作为《西游记》最早刻本和评点本的论定,还是对李评本在《西游记》演化史和学术史上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地位的阐释,以及对胡适《西游记》第八十一难的改作的发掘,都充分表现了作者过人的学术识见。作者面对人们熟知的《西游记》的研究,若不能开掘出大量新的材料,论著便可能失之陈旧;如对这些丰富的史料,没有作者独到的阐释和宏观的把握,则又可能失之琐碎。洪波同志的论著把这两个方面的通病都避免了,从而把理论的思辨和

文献的实证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既给人以新意,又使人觉得切实可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洪波同志独到的学术功力。

当然,洪波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也还涉及了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比如,港台地区以及欧洲、美洲、亚洲等国都有不少研究《西游记》的学者与论著,是否也应纳入《西游记》学术史之中。又比如,《西游记》研究尽管已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层递累积,具有相当充实的学术基础,但是否要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形态的“《西游》学”来构建。再比如,当代(新时期)举办了《西游记》的若干次学术讨论会,要不要在学术史中详加介绍,由此想到当代的《西游记》研究,尚未经过历史的积淀,能否作为独立的阶段,进入学术史之中。这些问题学界向来有不同意见,似可进一步讨论。

洪波是我的同事、同乡,又是朋友,承他不弃,于不惑之年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又执意要我为他的新著作序。我自知才疏学浅,对中国古代小说又素无深入研究,岂敢言序,只能把初读他的论著的点滴感想写出来,以求教于各位专家与读者。

2006年10月8日

一、面对“学术史时代”

撰写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怀有欣喜与持重的复杂情感,缘于现实与历史的多重性、多层面的机遇。

古典说部名著《西游记》于明朝中后期(约16世纪)横空出世,同时也开启了一部波澜壮阔的《西游记》学术史的序幕。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所载陈元之《刊西游记序》和稍后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评本)所载署名幔亭过客(袁于令)的《西游记题辞》,是两篇最原始的《西游记》研究文献^①,除了保留弥足珍贵的史料,其中还直接发表了许多对《西游记》的看法,显现着一个时期(明人)关于作品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成果与水准,不仅开《西游记》评点批评的先河,也理所当然成为学术史的嚆矢。究其时间的上限几乎与小说本身的问世同步。先贤们这种敏感、早慧的批评意识至今令人感佩不已^②。受它们的推介之力^③,《西游记》不仅传布迅猛,研究也很热烈,且持续发展、延伸。经过长达四百年之层递累积,特别是明清时代评点式批评的兴盛,“五四”以来现代性学术研究的形成,建国以后特别是新时期《西游记》论

① 清初刊行的汪澹漪笺评本《西游证道书》前有一篇《西游记原序》,尾署“天历己巳(1329年)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这篇虞《序》仅从题署时间上看远早于陈《序》,然学界公认为后人伪托。

② 这种情况在明清几部古典小说名著研究中带有普遍性。如据《石头记》第一回脂评:“壬午(1762年)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可知脂批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同步。又如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附有弘治甲寅年(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文,嘉靖壬午年(1522)修髯子(张尚德)所作引文,作为批评的发生,亦与文本问世接近。

③ 李评本《题辞》就倡导:“日见闻之,厌饫不起,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也!故闲居之士,不可一日无此君。”

坛的空前繁荣,其过程是那样曲折逶迤,其内容是那样丰硕富赡,无疑已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并积淀为一个蕴含丰富的学术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耸立于中国学术之林。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辉煌璀璨的小说名著中,在古代小说研究的整体格局中,《西游记》的地位并不突出。众所周知,《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并称明四大奇书^①,清季《红楼梦》问世、风行后,又并举为中国五大古典名著,然就研究和学术品位而言,《西游记》一开始便呈现了相对后进的态势:自明万历二十年世本问世,特别是清季以降约三百年间,朝野震动,妇孺皆知,评论蜂起,版本繁夥,各派评点不一而足,但始终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一直没有出现像金圣叹批《水浒》、毛宗岗批《三国》、张竹坡批《金瓶梅》和脂砚斋批《石头记》(《红楼梦》)这样成熟、优质的文本批评,从而来推动《西游记》文本的健康发展。小说评点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主体样式,其特点是重阐释、重解读、重感悟,具有极强的批评主体意识和读者介入趋向;另一方面,它的主观随意性和读者介入趋向又极易使批评脱离文本实际,它“紧贴”于文本的特点,则易将一己之私见强加于作品之上,如果这种“一己之见”一旦过于膨胀,批评者陷于“走火入魔”的痴狂状态,其批评不免会谬以千里,流于虚妄。由于《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笼罩着一层炫目迷心的外衣,其间儒释道三教合一,神仙妖魔鬼魅九流驳杂,思想极为深奥玄妙,向有“天书”之誉,故而为评点者提供了随心所欲的余地,加之批评者热情过分高涨,其释儒证道谈禅不幸正同此类。各派评点儒说道说,你说我说,谬误渐多,其时就引起相互诤击^②。五四时期,鲁迅、胡适等新文学大师筚路蓝缕,奋力开拓,一举突破这些评本机械评点的藩篱,实现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新时期以来,借中华民族复兴盛世之雄风,《西游记》研究水涨船高,破浪前进,呈现出纵深、多元和强势发展的态势——可以说业已从根本

① “四大奇书”之名最早见于清李渔《古本三国志序》:“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

② 如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指出汪澹漪、陈士斌“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此类批评“则有负此书也多矣”。又刘一明《西游原旨序》批评汪澹漪《西游证道书》:“澹漪道人汪象旭,未达此义,妄议私猜,仅取一叶半简,以心猿意马,毕其全旨,且注脚每多戏谑之语,狂妄之词。”又,刘廷玑《在园杂志》云《西游证道书》“其批注大半摸索皮毛,即通书之太极、无极,何能一语道破耶?”

上改变了这种后进局面。

但美中不足,令人遗憾的是,《西游记》学术史著作长期阙如,从学术史视角来研究《西游记》的论文也不多见。这种学术史和学术史意识的阙如不仅在学科形态上使其尚处在稚嫩状态,无法与《红楼梦》研究比肩,相对于同类学科也有所逊色^①,而且还造成了争取自身进一步发展和突破的障碍。即从目前《西游记》研究现状而言,成绩有目共睹,然而存在问题亦多。其主要特征为:一、论题广泛、众多却显分散、无序:苏兴、刘怀玉^②的吴承恩研究,陈新、吴圣昔的版本研究,张锦池、李时人的源流(成书)研究,蔡铁鹰的人物原型研究,萧兵、杨义的神话和人类学研究,李安纲的宗教文化研究,以及徐朔方、黄永年的文本校勘,朱一玄、刘荫柏的文献研究都比较突出,影响亦大,但之间缺少系统整体联系,只在各自的狭隘层面上孤立展开,宏观、形而上的学科品性尚不够明显,有的甚或存在较多的错失。二、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小说研究分支学科,研究对象尚不平衡,主题、人物、版本、作者的研究持续走热,出版了大量论著、论文,论争此起彼伏,但对五四时期,尤其是较为远久的明清之际的《西游记》研究缺乏完整、准确的认识,历史感的缺失、学术线索的模糊直接导致某些片面、抽象发展和低层次高密度重复的现象。三、某些浮躁、僭薄学风的侵蚀,使得有些学者热衷于作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或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摸索皮毛,或主观臆断、游说无根,或务反旧说、故作新论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存在着割断历史、脱离文本实际的倾向,并业已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③。这使我们在欣喜之余,不得不又以持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历史与现状。而学术史研究注重综合性、宏观性,追求历史感和逻辑性,尤长于史料的累积和事实的确证,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史学品位可以为《西游记》具体问题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学术背景。有些问题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有定论,究其原因,除了学术本身的复杂性之外,即在于缺少一个历史的尺度,没有建立一个理论的共同逻

① 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红楼梦》研究学术史,出版于1980年。二十年来,又有韩进廉《红学史稿》等若干部《红楼梦》或古典文学学术史著作问世。

② 为了行文简略,本论文中出现的当代学者,一律直以姓名指称,非不敬也。

③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宋谋场《是奥义发明,还是老调重弹》(《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陈大康《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文汇报》2004年2月29日)等文章。

辑支点,过多地依赖于主观臆断和演绎:历史的逻辑顺序模糊不清,实证链条的薄弱、缺失,理论思维便难以畅通,学术水平也难以攀升,学科形态的构筑更是空谈。显而易见,撰写《西游记》学术史已是刻不容缓。

正是这两方面的理解,并且不断交融互动,冲突演进,使我逐渐凝结起一种强烈的感性冲动和理论追求,鼓起勇气,不揣浅陋,撰写一部涵括横跨四百年历程的《西游记》学术史。

特别应予指出的是,这绝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选择,这是一个时代赋予的契机。个体的感性冲动和理论追求固然对自身的学术意向起决定作用,但相对于整个《西游记》研究只是次要的因素。近年来,由于学术背景和大势走向的特点,学术史研究如火如荼,进入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术史时代”^①。它直接催发、导致《西游记》研究学术史意识的苏醒,并向深层次学术理性的方向回归。这无疑才是撰写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的根本动因。

回眸历史蕴藉,审察现实的动向,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出现过两次学术史高潮。第一次在“五四”之际以及稍后的30年代,由梁启超抱“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之宗旨,连续著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发轫,王国维、章太炎、罗振玉、胡适、钱穆、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学术大师蜂起响应,学术史著作一时纷呈,遂成蔚观。受时代学风影响,《西游记》研究在40年代也曾出现过带有学术史性质的著述,有汪浚者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1949年8月)发表长文《吴承恩与〈西游记〉》,其内容不仅涉及作者、成书、版本等学科基础层面的基本问题,而且对鲁迅、胡适、董作宾、郑振铎、赵景深的《西游记》研究作了初步评价,并以此为中心向前辐射,对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初步梳理和总结。但是,由于紧接着的社会变动,《西游记》研究的热度渐次回落,终于几近荒凉^②,因而这一

① [日]伊藤虎丸《学术史的时代》,《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② 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见诸报刊的《西游记》论文仅四篇,另三篇为台静农《关于〈西游记〉江流本事》(《文史杂志》1947年1卷6期),袁圣时《〈西游记〉研究》(《台湾文化》第3卷1、2期,1948年1、2月),冯汉镛《孙悟空与猪八戒的来源》(《东南日报》1948年4月21日)。

工作没有得到有效的持续,同时也因为汪著本身的谄陋粗略,它在后世的影响也很有限,至今已成鸿爪之影。

第二次“学术史时代”的到来在间隔半个世纪之后的 90 年代。从 1991 年《学人》杂志创刊号开启学术史讨论,到 90 年代后期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撰有长篇《总序》),其间还有《读书》等多家著名刊物鼎力支持,纷纷参与,学术史研究成为学术界继 80 年代“文化寻根”之后又一个核心问题,许多学人的共同兴趣,迅速在文史哲各领域全面展开,并逐渐成为各级学科的共同参照和全新的视角,一时间学术史著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学界的一大景观。《学人》主编、讨论发起者之一的陈平原对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作出如下概括:“通过‘分源别流’(即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引者注),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鼓励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①冯天瑜等人编纂《中国学术流变》也倡导学术史研究,开篇即以题记的形式标出:“对学术史的把握,往往是通过对于历代学术经典的重读得以实现的。”^②至刘梦溪,认识又有进一步深化,他在《〈红楼梦〉与中国百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二十一世纪》1994 年第 12 月号)、《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学人》第 10 辑)、《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等系列论文中,全面总结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揭示出学术史研究“反思固有学术,寻求现代新解”,再造中国现代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化,推进精神文明的宏大意义。《西游记》论坛对这一至今方兴未艾的学术流向也有必然的反应,渐次发表了一些以学术史视角切入论题的文章,从对“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影响下庸俗社会学研究倾向的反思,到对鲁迅、胡适等现代《西游记》研究先驱者的重新评价,学术史意识开始凸现出来,对明清时期小说评点的“元批评”研究也开展起来,世本、李评本以及《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等各家评本先后得到重视。近年来,《西游记》学术史研究已有了向宏观性整体性学科形态的平台挺进的趋向,构建

① 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学人》第 1 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年。

② 冯天瑜等编《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一部《西游记》学术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和呼声。据笔者所知,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正在关注并着手撰写《西游记》学术史。笔者以此为课题,不过是适应了这一学术趋势,有感于《西游记》研究的现实发展,试图对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进行全面审视和通盘考察,特别是将明清时期、五四时期和新时期三大主要的发展阶段纵向贯通,将作者论、成书(源流)论、版本论、思想与艺术论等相对独立的研究条块作横向融合,并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整合中总结治学经验、把握演进脉络、揭示学术史的发展轨迹,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一方面可以串联起四百年学术史的发展线索,将丰富浩瀚的《西游记》研究成果蒐汇、熔铸于一体,另一方面也能改变《西游记》研究中某些领域片面发展、某些领域滞后或缺失的不平衡局面,从而向科学的学科形态回归,获得全新的突破和发展。这是一个时代的惠赐,也是历史的要求,对于一个身逢其时的《西游记》研究者,无非视其为学术使命,努力抓住其契机,顺应学界潮流,尽一份绵力而已。

在这样的“学术史时代”,一部完整的《西游记》学术史理应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二、《西游记》学术史对象的确认与主体自觉

建构《西游记》学术史是历史的必然,但作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将由某些学者参与其间,成为建设者甚或完成者则表现为纯粹的偶然;时代精神和学术大势对这一学术史要求是具有丰富历史积淀的群体意识,而任何一个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表现为独立的“精神个体性形式”^①,透露出各自的学术兴趣和追求。马克思说:“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的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

^① 借用马克思的术语。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形式。”

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①这样,在整个论题展开之前,必须确立起学术主体对《西游记》学术史的整体性理解和宏观掌握,由自身立场出发,选定最为基本的逻辑规定作为全部理论展开的起点,并以此来划定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它既能保证学术史固有的品格,同时尽可能体现自身学术精神的自由和独立,并使这种研究从形态上与别的同类型著作相区别。我以为这一切都蕴含于学术史对象与主体意识这一基本关系之中。

以小说巨著《西游记》作为《西游记》学术史发生、发展的母体,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从陈元之《序》、幔亭过客(袁于令)《题辞》到当下任何一篇《西游记》研究论文,都或多或少、或明或隐地与这一母体相关,这是确凿的事实。所以,一部《西游记》学术史的对象指向的是围绕《西游记》展开的全部学术活动及其历史性整体性成果。

但问题并非可以“一言以蔽之”这般简单。一方面,什么是“围绕《西游记》”?又怎样掌握与《西游记》母体相关的维度?比如1985年前后,学界曾连续刊出关于吴承恩在河阴知县任内事迹的考评文章以及对此的商榷文章^②,在学术史意义上则明显存在诸多疑问:吴承恩作为《西游记》作者(对此也有学者持异议,这里姑且不论)当然是与《西游记》相关,然河阴知县与淮安儒生吴承恩实系两人,与《西游记》风马牛不相及,唯同名而已。又如1985年1月18日《兰州晚报》刊出《榆中农民李学存献出珍贵藏书〈西游原旨〉》一文,称这部“珍贵藏书”为“早于我国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又一珍贵版本。该书为线装书,全套共48卷,是元朝初年一个叫丘处机(道号长春真人)的道士所著,后在清朝乾隆年间被兴隆山著名道士刘一明刻板重印”云云,一时引起舆论哗然。这正是奇乎怪哉。《原旨》是清刻本,有嘉庆十三年(1808)原刊本,现藏上海图书馆,鲁迅早就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过。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西游记》(人文本)以世本为底本,曾校以六种明清版本,其中就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护国庵本《西

①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

② 见靳今《吴承恩曾当过河阴知县——河南荥阳县发现吴承恩撰写的碑文》、欧阳健《河阴知县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分别载《许昌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1986年第1期。

游原旨》。所以正如有论者所说,该文“完全是不符实际情况的谬说”^①。因此,这一类文章其实很难纳入《西游记》学术史,否则将无限膨胀,以致妍媸互见,良莠糅杂。至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蓄意造假、伪注篡改、故作新论而欺世盗名等有失学术规范的现象则更是等而下之,亦理应与学术史无关,予以厘剔^②。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问题,什么是学术呢?学术一词至今已耳熟能详,然而人人口中同,人人心中异,理解多有偏差,即或现代学术史大家如梁启超诸人也未曾留有规范化解释^③。现在一般视其为人类高级的认知活动。《辞海》定义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就其释例《旧唐书·杜暹传》:“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来看,尚有精粹之义,故知学术者,系指人类认识活动的高级形态,学问中专门、系统而精粹者。中国具有绵长的学术传统,其精华在经学与史学,号为“国学”,远播西域,风靡海外,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开宗明义,即将“国学”析为中国学术,并例证说:“章太炎师称这(国学)为‘国故’,他的《国故论衡》,便是谈中国学术的专著。”^④

结合《西游记》学术史,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与《西游记》母体相关的现象和文字也还不一定属于学术史范畴。自《西游记》问世,特别是陈元之、袁于令两序以后,其流变、传布,以及历代读者的认识极其繁复,留下的文字汗牛充栋,学术史关注、撷取的是其中“专门、有系统、精粹”的具有学术形态的内容。当然,落实到某些具体、单个的现象,或许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特殊性,一时很难确定它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但在一般意义上则是完全应该对学术史对象作基本的界定的。

其一,学术史与传播史的关系。

现代传播学理论指出,文学传播是指运用一定的媒介和方式,将作品(情感、思想和事件的诸多信息)传递给消费者的过程,其目的是

① 参见王守泉《〈西游原旨〉成书年代及版本源流考》,《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韦航《〈原旨〉并非新发现》,《书林》1986年第3期。

② 清初康熙年间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原序》显系伪作,但其中表达了对《西游记》的诸多看法,只是托名作伪,故不在此列。

③ 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对“学”与“术”作过解释:“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而至于用者也。”然而并未形成对“学术”的规范化界定。又,其时严复、傅斯年等人也有类似的解释。

④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3页。

指向社会对作品的共享。传播与学术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传播的媒介和方式或有学术的因素,消费者的消费目的也不排除出乎学术的可能。正如爱德华·萨皮尔所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包括学术——引者注)和每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则明晰或则含糊地涉及传播。”^①但传播本身并不构成学术,因为其信息传递、精神共享都不是纯粹的学术思维和治学活动,更没有产生实际的学术形态(成果)。试以一例说明之:

莫后光三伏时,每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尝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②

据记述这则材料的李延是《南吴旧话录》介绍,莫后光是松江儒生,柳敬亭的老师,江南著名说书大师。这一则材料描写了莫后光高超的演技,也说明了《西游记》在明清之际传播的盛况,在《西游记》研究中是极其珍贵的史料。但从中看不到任何对《西游记》本身的看法,从说书者到听众都未能进入理性状态,并且这一如醉如痴的场面还与《水浒传》夹缠在一起,其与学术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还有当今文坛走红流行的《大话西游》、《水煮西游》、《悟空日记》一类著作,虽有利于《西游记》的传播,但与学术完全无关,也理应从学术史剔除出去。

其二,学术史与接受史的关系。

文学接受是指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欣赏与再创造的精神审美活动,与学术活动存在着更多的共同性,也发生更密切的关系。尚学锋等著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注意到两者分野交叉、重叠的特征:“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接受与研究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接受是研究的前提,研究是接受的延伸和深化。接受可分为一般性接受和研究性接受,后者是以过渡到研究层次为目的的。”^③事实上,接受心境随时可能向学术状态转移,神话和宗教知识是“接受”神魔小说《西游记》(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心理预备,但很容易指向学术层面,因而接受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术的基础,甚或开端。

但是,两者毕竟存在本质的区别。接受更多地体现为鉴赏、品味,

① 转引自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4页。

② 李延是《南吴旧话录》卷二十一。

③ 尚学锋等《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页。

其中也带有理性的因子,但在接受心境没有转化为学术状态,心理预备情绪没有进入学术思维层面,主体没有确立学术目的之前,接受不等同于学术。《西游记》充分表现出两者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自明代后期开始,由于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特点,几乎全体中国人都是《西游记》的接受者(直接或间接),特别是在影视、卡通、戏曲、曲艺等多种艺术以及网络游戏风行的今天,似乎没有人会不知道孙悟空、猪八戒。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与学术无关,如历代广大的小读者皆以为一个美妙的童话,他们的整个接受过程是充满激情、惊喜和乐此不疲的精神漫游的旅程。

作这样界定,并非是刻意胶柱鼓瑟,画地为牢^①,而是鉴于对象性对于学术史的决定性制约作用而作出的判断,借用当代人类学术语,这是一个“定向的概念”^②,影响着整个学术史的方向和形态。而从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实际看,对象不断地遭遇着非对象性因素的侵入、挤压,也确实有许多非学术的东西渐次渗透进来,它们既表现出丰富、充实学术史的意向,也损害着学术史的纯正和完整。所以,撰写学术史,首先是要向学术史本体回归,鉴别、建构自身独立的学科对象。这一观点不仅是先在的,而且是持续性的,因为学术史对象并不是通过几条原则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相反,这种将非对象性因素鉴别出来,并剔除出去的工作将贯穿终始。这是一种积极而理性的态度,一个爬罗剔抉、去芜存菁而又繁难艰辛的工作。

与对象性相关的另一侧面是主体自觉,也即学术自主性问题。

《西游记》学术史是对迄今为止全部关于《西游记》学术活动的集合和总结,重在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和再现,以期继往开来,为后来者获得学术智慧和灵感的再生。但这一目的在一开始就面临深刻的矛盾:我们为了探寻未来而走向历史,但历史指向遥远的彼岸,将真实(如规律)隐藏在云遮雾障的背影和远去的黄尘硝烟之中。解决这一矛盾的

① 我以为学术史与研究史、批评史一类概念大抵近似,它们都以理性思维和科学活动为特征,使用哪一个概念实际上无关理论的宏旨。考虑到所谓“学术史时代”的宏观背景,以及自身爱好,这里采用“学术史”这一概念。

② 参阅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97页。

有效办法,除了尽可能深入波谲云诡的学术史流程,掌握、占有有关史实(史料),构筑完善的对象体系,重要的在于学术主体性的介入,凭借自主性的能动发挥,从观照对象的本体论层次上升到认识论层次,赋予其客观实录与主体评价的双重权利,从而打破历史与现实的疏远性,实现主体性与对象性的融合。反映在史学传统上,这就是对历史本真的“相对合理性”追求,借用史学大师黄宗羲的话叫“以火济水”^①。中国传统学术主张“和而不同,同而不和”,“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其精神相通。

从现代学术的宏观背景来看,认同主体自觉是主流。克罗齐的历史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说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史家恪守的律。缺失自主性,过分拘泥资料加以罗列、编排历史著作的方法被讥诮为“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甚至“它实际根本就不是历史学”^②。著名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就明确指出历史著作的精髓不在于记载,而在于评价,历史在说话就是历史学家在说话,因为“只有历史学家让事实说话,它们才能说”^③。历史的价值就在于由后人评说,也即清人阮元所说的那样:“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欤。”

比较而言,《西游记》学术史的自由性更充分、更开阔些。因为所谓《西游记》学术史的母体是一部被称为“神魔小说”的文艺作品,本身就寓有真实与虚拟的双重品性。不仅如此,其学术史的内容又在漫长的岁月里滚动累积,每一个基本要素又经历了无数次的分蘖、蔓延,提供后人评价的余地(西方接受美学特称为空白)实际上是按几何级数递增的。对于艺术批评史的这种特性,黑格尔早就提出过疑虑,并最终解答了这一疑虑。他认为艺术是自由自觉的对象,就必须依靠主体的心灵去掌握,“心灵能观照自己,能具有意识,而且所具有的是一种思考的意识,能意识到心灵本身,也能意识到心灵产生出来的东西。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可知其正面主张“以火济水”。

② 参见柯林伍德《历史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92页。

③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页。

构成心灵的最内在的本质的东西正是思考。”^①这里的“心灵”作用与我所说的学术自主性完全吻合,指的正是对艺术史的主体评价精神。《西游记》文本存在是凝固的事实(姑且不论它自身的文本流变),但学术史上任何一项成果都出乎“心灵”,也即打刻着学术自主性的烙印。四百年间,对《西游记》的评论众说纷纭,所见蜂拥,其一源于博大精深的作品本身的“空白”结构,其二则源于历代众多评价主体独立的主观意识。当今学人感叹“说不尽的《西游记》”、“说不尽的吴承恩”,其内在的精神内涵也可作如是观。

进一步说,在《西游记》学术史上的某一些事实(史实),即使其客观性不容怀疑,但仍然是学术主体不断观照、甚至重新认识(阐释)的对象,仍然可以纳入到不同的评价体系,产生完全不同的史料价值,或得出各自的结论。因为学术注重实证,但不止于实证,还必须分析和阐释,就像当你透过窗户看到地上潮湿(事实),但还有天空下雨,或是洒水车驶过等多种信息内含存在。有史料(吴承恩《禹鼎志序》)记载: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傍求曲致,几贮满胸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②

有人将此认定为吴承恩著《西游记》的铁证,因为《西游记》与《禹鼎志》(《玄怪录》、《酉阳杂俎》一类传奇著作,今佚)有着太多的内在契合,作《西游记》也离不开“好奇闻,喜鬼神”的创作心理。这是学术主体根据自主性立场(吴著说)所作的合乎逻辑的评价。然而,对于其中的信息蕴含,也可以有另一种大相径庭的选择流向,甚至将它作为非吴著说的旁证:一生喜爱野言稗史,痴迷牛僧孺、段成式的吴承恩“没有接触过玄门释宗,没有学过佛、修过道”,怎么可能创作出具有丰厚的佛学和道教内容的《西游记》呢^③!同样,刘修业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清初黄虞稷所撰《千顷堂书目》中发现“吴承恩《西游记》”的记

① 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页。

② 吴承恩《禹鼎志序》,《吴承恩诗文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页。

③ 参见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录,即以为吴承恩著《西游记》的新证据。然而事隔近半个世纪之后,章培恒就这条材料将《西游记》归入舆地类的情况作出了新的解读:“倘若《千顷堂书目》的著录不误,那么,吴承恩的《西游记》乃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游记,与唐、沈二人的著作(即游记作品《南游记》、《四明山游记》——引者注)属于同一性质,换言之,它确实是与小说《西游记》同名的另一部著作。”^①结论更是截然不同。又如,1975年1月在淮安出土的吴承恩墓有写有“荆府纪善”四个字(或曰“荆府纪善射阳吴公之柩”十字)的半截棺材挡板,印证了吴承恩曾任职王府的“事实”,这立时被持吴著说的学者认为新证据,因为它与世德堂本陈元之《序》中所言《西游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其作者与明代藩王府有关相印合。但是非吴著说论者则认为:这则新史料只能进一步说明吴承恩确实写过一部游记类作品《西游记》而已,因为假设吴承恩由家乡淮安出发去湖北荆王府任职,其行进路线正是“西游”。结论依然是南辕北辙。应该说,这样的现象在《西游记》学术史上俯拾即是,所在多有,时时印证着学术主体介入的功能与时效。

在今天撰写《西游记》学术史,肯定主体自觉是必要的前提。面对如此漫长的学术进程,如此浩瀚的学术成果,如此人异其说的研究局面,主体性介入是必然的选择。我们不可能作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简单复制,或是“剪刀加糨糊”的机械拼接,而是要下一番爬罗剔抉、鉴真辨伪或是排云破雾、磨光刮垢的工夫,运用自己的逻辑尺度进行淘洗、选择和评价,从而来完成建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的“合理性预设”。这种“合理性”既指向《西游记》研究的历史,是一种实践合理性,同时也指向《西游记》研究的现实以及未来之展望,是一种理论的合理性,以此来保证它成为真正的理论思维和学术认知的产物。我们记得马克思的名言:“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②对于《西游记》学术史对象的确认与主体自觉,我意识到不仅可以如此,而且应当如此。

① 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9页。

三、也说“真理与方法”

“真理与方法”，这是现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哲学巨著的书名，该书的中心论题是“理解如何可能？”也即哲学如何完成对真理的解释^①。我借用这一术语，当然无意于康德式的哲学思辨内涵，而是指向其标识的方法论意义：方法如何保障“真理”（学术目标）的实现。

对于撰写《西游记》学术史，由于至今未有该类著作问世，事实上很难推断什么方法最为合适，任何方法都只具有潜在的探索性、尝试性意义。不过在另一方面，它从整体上毕竟从属于学术史范畴，是其中的一枝一脉，因而一切学术史著作包括美学史、哲学史、史学史以及红学史著作中行之有效的的方法都将是宝贵的借鉴。比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是两条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一切学术活动都必须遵循的哲学方法论原则，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从宏观、整体上把握《西游记》学术史的基本哲学方法论原则。这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结合《西游记》学术史的具体实际，为了达到自己的理论预设，应对、解决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在操作层面上还必须确立几条我们所依循和遵奉的原则，并成为贯穿到撰写学术史各个环节的主要方法。

其一，关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结合。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是完整的集合体，必然是一个宏观论题，其生发的内在动因（《西游记》本体及时代背景）、运动（发展）机制以及规律、成果积淀（学术体系）都是重大的宏观命题。但宏观命题离不开历史细节和具体材料的支撑，正是它们构成了“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恩格斯语），成为一切宏观命题的因子，宏观体系的基础。比如《西游记》的本事（叙事本体）是西天取经，这是一个带有本体论意义的宏观命题，然而取经人“苦历千山，远经万水”，行程十万八千里，这每一山如何攀越每一水如何渡过，其间的曲折艰辛，都无疑是微观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取经目的地灵山究在何处，取回的真经果为何物，这些问题或者在《西游记》

^① 参见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865页。

演化过程中分歧较大,或者在后来理解偏殊,众说纷纭,更值得作微观、精审的考辨。后一问题,已有曹炳建《〈西游记〉中所见佛教经目考》作了具体、详细的考证,唐僧取回的三十五部经目以及《西游记》文中提及的十八种经目(剔除两者重叠的数目)合计四十四种,可分为与佛教经目全同者、与佛教经目基本相同者、无此佛教经目然与佛教有一定关系者、查无所据者四类,各目出典皆有着落^①。而关于前一问题,笔者也十分愿意在后文作一粗略的考论,以为一管之见。可见,宏观论题中包孕着微观成分,微观材料中也透露出宏观信息。撰写学术史,必须胸有成竹,关注宏观命题,但仅从概念出发,或停留在模糊的鸟瞰式描述是显然不行的。当然,反而言之,过多地停留在细节,胶执于一隅,缺失宏观、整体性审视,以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瞎子摸象,舍本求末,也必然会流于零碎丛脞和肤浅谄陋。王国维说,学问之道,贵乎“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②,精辟地揭示出两者相互补充、有机融合的关系。

这就有必要引入中观的概念,它处在宏观、微观的过渡阶段,承上启下,既为宏观命题提供基础,也为微观研究输入提升层次的动力。在它的纽带(或曰中介)维系下,一部流动的学术史才串缀成为整体。也即是说,正是中观在理论上具有最丰富的包孕性,在这一点上,上可溯源,下可探流,沟通终始,观照整体,而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的逻辑链条上,一切都将豁然开朗:哪些是《西游记》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哪些是《西游记》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些重要的观点、流派、论争,以及理论阵地都会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可以使我们胸有全局,正本清源,提纲挈领,避免摸索和重复劳动,从而从根本上保障理论预设的实现,以及学术史达到应有的水准。

其二,关于纵与横、点与面的结合。学术史首先是纵向历时性的,表现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长度)的动态发展过程,所以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梳理历史线索,清点发展脉络,所谓“斩葛藤而清眉目”。就《西游记》学术史而论,根据其内在逻辑,四百年的历史长河可以划分为明清时期、现代、当代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可根据其发展实

① 参见曹炳建《〈西游记〉中所见佛教经目考》,《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转引于梁启超《国学论丛》之“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言。

际细分为若干环节:如明清《西游记》评点中,明代世本与李评本,受王阳明心学影响较大,清代则流行道家评本,弥漫着浓郁的道教气,两者呈现着不同的学术风貌^①。同样,现代《西游记》研究大致可以“五四”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段,前期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创立期,后期则有更大的深化与完善,学科形态逐渐明显。当代则可分解为建国初期、“文革”时期和新时期三个阶段,由于社会现实的特殊变迁,其间的学术差异性都比较大。而且,这些阶段又可在各自范围内作具体展开,构成更为细小的发展节点。也即是说,整个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进程正是由众多细微阶段(纵向单元)累积组合而成。但从另一方面,无论在哪个层面上的纵向演变,都将表现为共时性因素的整体,有关《西游记》诸如成书、版本、作者,以及思想与艺术等多重领域的研究将在相对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从而构建起一个统一的《西游记》学术平台。如果将纵向线索与横向条块作有机整合,特别是将明清、现代、当代各个阶段与成书、版本、作者以及思想、艺术等各块领域熔铸为一体,那么,《西游记》学术史必然是一个纵横交织、多层复合,而且不断向时、空两维开放的立体网络结构,一个充满丰厚历史蕴藉和现代意义的学术史体系。所以,撰写《西游记》学术史,既要注重纵向历时性展示,也需作横向共时性展开。纵向线索揭示不清,就会缺失历史感和史学品位;而横向透视狭隘逼仄,学术史必然会缺乏血肉,丧失理论的生气。

与之相适应的是点与面的关系。“面”是作为整体而言的,“点”则是其中的某一局部性问题。一部学术史从纵向可视为整体性的“面”,每一个单位时段则构成不同规模的“点”。在历史的每一点上发生的《西游记》学术活动并不对等,因为历史注定在某一阶段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某一阶段处于低潮或是“真空”状态,任何一个“点”在整体的“面”中地位并不相等。在横向上如将整个《西游记》研究作为“面”,那么它涵盖着作者论、版本论、源流论(成书论)、思想与艺术论等无数个“点”,这些局部性研究也永远不可能绝对地“平衡”。所以,“文革”时期的《西游记》研究,在上远不及五四时期,在下则难比

^① 这只是就其学术主潮而言,明清两代《西游记》学术史事实上各有流裔和其他特征。

新时期,撰写学术史首先应该尊重这一局部(“点”)原有的事实,当然也可以通过主体性开发,对点面关系作出合理的修复。又如新时期以来,《西游记》文化研究持续走热,作为局部性的“点”强烈地影响、冲击着整体的《西游记》研究,不过,只要它未能超越《西游记》母体所承载的范围,我们完全应当承认其合理性和积极性。当然,抽象、片面、脱离《西游记》文本实际的倾向是应当引起重视的。总之,撰写《西游记》学术史应该点面结合,从点切入,以点带面,通过具体细节问题的深入研究来揭示整体性、宏观性发展轨迹。

其三,关于中西古今方法的理解及采用。当今中国学术正处于空前繁荣、发达的时期,其标志之一即是中西古今各种治学方法的相互并存,相互渗透,各类学科形态缤纷多姿。由于“五四”之际,由小说研究(以《红楼梦》、《西游记》为代表)率先突发质变,实现了传统(古典)向现代学科形态的转型,并直接开启了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而这一突变众所周知是由西方新学及其科学方法的引入为契机的。随着学术成果的不断堆积,这些西方现代学术方法也得到强化,最终逐渐取代中国传统治学方法成为主流,并一度成为崇拜的对象,出现“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局面。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并无大的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只要西方的某一种流派、某一种方法一旦“侵入”,中国学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学子总会表现出非凡的热情,闻风而动,纷纷予以迎合和认同。从“老三论”、“新三论”一直到如今风行学界的后殖民主义和布迪厄、哈贝马斯,莫不如此。这固然是一种宝贵的现代性世界意识和开放意识的体现,但也从某种意义上暴露出传统学术的危机,并且业已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损害。如余英时就尖锐地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则越来越疏远,因为古典训练在这一百年中是一个不断堕退的过程。到了今天,很少人能够离开某种西方的思维架构,而直接面对中国的文学、思想、历史了;他们似乎只有通过西方这一家或那一家的理论才能阐明中国的经典。”^①

对此,有必要作重新审视和反思。方法,本是人类认识客观对象

^① 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七,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的工具,学术活动赖以进行的依据和手段,采用何种方法取决于“主体对对象的肯定方式”(马克思语),所以只有具体类别的不同,而没有价值高下之分。在当代《西游记》研究中,徐朔方、章培恒、郭豫适、黄永年等前辈学者都谈到过方法问题,并向世人展现了各自取得的实绩。陈大康最近发表了《论〈西游记〉的两次争辩》一文,就《西游记》研究方法提出了带有一定指导性的意见:“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各种理论,都是人类从不同方面、通过不同途径探索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认识的结晶,它们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借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决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①一方面肯定了各种方法相互借鉴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客观存在的关于方法论认识上的偏颇。由此可知,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在《西游记》学术史上,中西古今各种方法都大有用武之地,比如“五四”以来鲁迅、胡适、郑振铎等新文化大师较多地吸纳、采用西方新学及其方法,孙楷第、刘修业、赵景深等学者则更多地承袭、采用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但“家家门里透长安”,他们的《西游记》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将各种方法人为地对立起来,厚此薄彼、归于一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西方现代方法理应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生根开花,而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也应在新的时代精神烛照下获得蓬勃生机。“学无新旧,术无中西”^②。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不同文化及方法的融合,必将成为推进学术深入的利器,不断发掘《西游记》研究领域的新天地,并藉此开辟《西游记》学术史上的新阶段。

当我们将撰写《西游记》学术史的方法论作以上理解之后,还应补充说明:不可否认,任何方法只能着重于一个相对中心的地方,也因而意味着特定的遗漏,也即任何方法都在体现其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也不乏学术个体自身理解的偏见。还是用伽达默尔的话来结束这一段文字吧:“所有理解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种偏见,这种看法给了解释学问以真正推动。”^③

① 陈大康《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文汇报》2004年2月29日。

②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王国维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

③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转引于朱立元主编《西方现代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865页。

第 一 编

明清《西游记》学术史轨迹

第一章 明清《西游记》学术史概述

一、明清之际社会剧变与《西游记》学术背景

考察明清《西游记》学术背景,首先必须注意其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西游记》学术史的发生几乎与小说本身的问世(16世纪中后期)同步,因而与《西游记》的创作背景基本相同,起码是具有诸多契合、重叠的因素,明清之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变革和思想、文化潮流,以及其他现实矛盾,对《西游记》的创作和研究发生着共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学术活动与文艺活动毕竟分属于人类两种不同的创造工程,学术理性思维与文学形象思维也遵循着各自不同的规律,因而《西游记》学术史的生发和展开,必然也有自身的特点,它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更多地体现着学术理性和逻辑的线索。将两者关系予以梳理、整合,便构成了一个宏观、综合性的学术命题,并且成为论述明清《西游记》学术史轨迹的理论前提。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凡一代也必有一代之史学。明清《西游记》学术史发生在明朝后期,贯穿于明清两代,经历了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交替,在史学上被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①;在封建制度日趋腐败、瓦解的过程中滋生出反映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异质异动力,并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剧变的内在杠杆;传统儒学在自身的式微、蜕变中,其内有王阳明心学和李卓吾异端学说^②兴起,在外则有释道异流的渗透、夹击,在儒释道三教新一轮互补、合流中寻找平衡,构成了

^① 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南雷文集》卷二。

^②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传记类存目五》以孔孟程朱为儒学正统,列王阳明为杂统,李贽为异统。

这一时代中国哲学(思想)的主导精神;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则有长篇通俗小说崛起,一举取代传统诗文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而随着小说评点的瓦然勃兴,文学批评也以小说美学的崛起而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如此自上而下的全方位剧变,就上下五千年的中国社会而言,称其为“天崩地解”的时代是名副其实的。明清《西游记》学术史的发生、发展,与之息息相关,甚或根本就是这一社会变革的产儿。按其由远及近、从间接到直接的逻辑顺序,构成其学术背景的因素可凸现于以下方面。

其一,关于明清之际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异质异动力量^①,以及它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一般认为是通过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城市及市民阶层的壮大表现出来。对此,有大量文献证明是客观事实。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张岱《陶庵梦忆》、王士性《广志绎》等都记载着东南名都杭州商业的繁盛:

杭俗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而與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②

又,顾公燮记苏州繁华奢靡的盛况:

金阊(苏州别称)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养济院。^③

谢肇淛对大江南北商贾豪富的记述最为著名: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④

① 也有人概括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对这一问题,文史哲各科都有大量著述。就《西游记》学术史而言,可参看王先霭、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中“明清小说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一节,花城出版社,1988年。

②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③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④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其余如钱谦益记金陵“极盛”^①、张瀚说苏州“天堂奢风”^②、李日华艳羡扬州“人间佳丽之地”^③、叶权称广州繁华“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④等等，皆极为生动、可观。

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城市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必然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形成新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和时尚追求，从而引发整个社会背景和民众心理从上到下普遍性的流变。其突出的转变是：追求世俗享受，去朴尚华，奢靡之风淫炽。有钱人固然纸醉金迷，一掷千金，放纵恣肆，一般市民也争相仿效，锦帽绡鞋，酒色相伴，乐而忘忧，即或贫乏穷困者，依然“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⑤，是谓“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在这样世俗、浮躁的社会环境里，孔子当年盛赞尽善尽美、“无邪”之高雅诗文注定了失去它往昔魅力而走向式微，人们即使不对其持敌对、鄙夷的态度，也是敬而远之，无心去领略这种高雅的庄严，典朴的情调，而热衷于那些热闹、流畅、世俗色彩浓郁的文艺样式——长篇通俗小说。正如曹雪芹通过“石兄”之口所言：“市井俗人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闲趣文者特多。……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⑥《西游记》的问世、风行无疑适应了这一追求文艺闲适性、世俗化的社会潮流，而在这一社会背景影响下发生的《西游记》学术史也恰恰从这一点切入，最早的陈元之《刊西游记序》和李评本袁于令《西游记题辞》不约而同地揭示出《西游记》的游戏特征和娱乐审美功能。陈《序》称《西游记》“跻滑稽之雄”，认为“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一书”。袁《序》倡“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之说，肯定《西游记》的深刻思想（寓意）蕴含于“驾虚游刃”之中，也即托名李卓吾的叶昼所说“游戏之中暗传密谛”。

这一批评意向由明人开始，在清代也得到了继承。张书绅《新说

①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金陵社集诸诗人》。

② 参见张瀚《松窗梦语》卷七。

③ 李日华《恬致堂诗话》卷四。

④ 参见叶权《贤博编·游岭南记》。

⑤ 张瀚《松窗梦语》卷七。

⑥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页。

《西游记》以“奇”论《西游》，径称其“纯以游戏写意，此书之所以为妙也。”^①张阳全也说：“其（《西游记》）发覆也，每于戏谑中而推出天机，其破迷也，专在俗性内而敲开冥枢。”^②在清代《西游记》评点中，无论“释儒”、“谈禅”、“证道”，都是以肯定其游戏特征和娱乐审美功能，恣肆汪洋的世俗化浪漫文风为前提。究其后续影响，甚至还贯穿于五四时期鲁迅、胡适的《西游记》研究^③。

其二，受如此社会经济剧变和世俗风尚的催生，思想领域也是风云激荡，空前活跃，这是我国思想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被称为“多音之世”^④。其思想特征主要表现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挑战，孔孟之道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宋明理学遭受多方抵制、诘难预示着传统儒学日益走向式微，王阳明心学和李贽为代表的“狂禅派”“异端”思想则标志着儒学的新流变。顾炎武论述这一流变时说：

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来，而文成（王阳明卒谥文成——引者注）以绝世人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⑤

董其昌也指出：“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王阳明）始。”^⑥

王阳明“新说”大异于传统儒学（以宋儒程朱理学为代表）主要在于“师心”，以心为世界本原来代替所谓的天理，以“知行合一”来反对所谓的“知先行后”，并主张加强内心自省，以“致良知”的过程来达到整饬人心（“破心中贼”）的作用。所以他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致知格物”就是致心之理，格心之物，他说：

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①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第一回夹批。

② 张阳全《西游原旨跋》。

③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说：“据我看来，（《西游记》）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淛所说的‘《西游记》……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胡适也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

④ 参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

⑥ 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二。

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①

这就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格物致知”，也是著名的王门四句教的理论基础^②。对于治学，王阳明主张“惟求得其心”，将学问“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③。把学问当作反求内心，拷问灵魂，达到“万物一体”，致知格物的途径，而反对朱熹的“危微精一”，无条件地服从封建伦理规范和圣贤学说。他在《答罗整庵书》中明确指出：“学，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这对于晚明以后学界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培育关系颇为直接，如袁中道即说：“自东越揭良知，以开天下学者，若破云见日矣。”^④

明代《西游记》研究受王阳明心学影响极大。世德堂本凡二十卷，以邵雍《清夜吟》诗“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二十字编目，看来并非偶然^⑤。在宋代理学中，邵雍的太极象数学哲学观与程朱理学主流相比有更多的异端倾向，与后世王阳明学说则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在邵雍哲学里，作为世界本原的“道”，也称之为“太极”，却也可称之为“心”。他明确宣称：“先天学（即太极象数学），心法也。”^⑥而世本和李评本的评点（包括序跋和评语）中都有心学的内容^⑦，足见两者有多么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李贽的“狂禅派”思想最为激进、狂放，更富有“异端”色彩。他一方面作为王学的继续，是儒学内部的一种流变；另一方面，作为孔孟之道的对立面（叛逆者、批判者）似乎成了释、道两教从外部渗透、夹击儒学的呼应。他肯定人欲，以率真为本，倡导商品经济，推崇西方科学技术，公然与封建正统思想决裂。万历三十年（1602），张问达在那篇导致李贽入狱自刎的疏文中列数其“罪状”：

① 王阳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② 王门四句教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也是对孟子性善论及求放心说的改造和发挥。

③ 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紫阳书院集序》。

④ 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九。

⑤ 对这一编目方式，学界多以为版本现象，对其中的文化哲学意义一直未曾注意。

⑥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96页。

⑦ 其中最为著名者是第一回叙美猴王寻仙访道至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两本皆有夹批“灵台、方寸山，心也”、“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三点，也是心”云云。

(李贽)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也。^①

其中“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是最严重的一条“罪状”,李贽原文为:

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得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②

他把锋芒直指儒家大先圣孔子,指出世代沿袭之“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一金科玉律实在是“混账逻辑”,甚至采用“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这样荒诞的言辞来讥讽“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一类奇谈怪论^③。

同时,李贽在《童心说》、《三教归儒说》等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俗士假道学的虚伪本质。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夫世之不讲道学,而致荣华富贵者不少也,何必讲道学而后为富贵之资也?此无他,不待讲道学而自富贵者,其人盖有才,有为有守,虽欲不与之富贵,不可得也。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④

李贽认为,凡举一切俗士假道学本原皆在失却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即所谓赤子之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在李贽看来,童心是最可宝贵的,因为人的初心是绝假存真、美好无瑕的,它与一切虚伪、世俗和罪恶势若冰火,当为立身之本,圣人之德。诉诸于文学章句,则“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⑤。而反之,“失却了真心,便失去了真人”,言谈行止,皆如无本之木,违背人心根本。如此为政,则“政事无根柢”,昏官庸官糊涂官生焉;如此为文,则

① 《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

② 李贽《焚书》卷一《答耿司寇》。

③ 参见李贽《焚书》卷三《赞刘谐》。

④ 李贽《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

⑤ 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下同。

假情假意,无病呻吟,无聊文人、无耻文人、无行文人生焉。退而为细民,则言不由衷,词不达意,不识礼仪,委琐无知之徒生焉。总之,李贽是把失却童心视为世间一切罪恶之源的;社会上“无所不假”、“满场是假”,所以政治黑暗,充满罪恶,小人得志,英雄失路,贤者处下,不肖处上。正是失却童心把一切都搞乱了。这理所当然的是产生众多俗士假道学的根源。

正是由于李贽学说如此猛烈地抨击儒学(其实是伪儒学),论著中复多扬佛崇道的成分^①,所以被明清两代《西游记》研究所吸纳。自明代李评本号称“三教已括于一部”^②,至清初汪澹漪^③《西游证道书》发扬光大,直指“《西游记》一书,仙佛同源之书也”^④,后继之清本多有以三教合一、仙佛同源为评论《西游记》的宗旨。它们虽然没有公开树起李贽的旗号,或托以《悟真》、《参同契》、《华严》、《法华》、《易》、《大学》等各家经典,但明显皆以李贽学说为旨归,或受其三家合一思想的影响^⑤。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李贽的学说与王阳明心学一样正是构成明清《西游记》的重要学术背景之一。

其三,明清《西游记》学术史最直接最重要的背景是小说与小说评点的繁盛。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说:“楚之骚体,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揭示了文学发展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规律。至明清之际,中国文学主流从《诗经》、楚辞等抒情性作品向以小说为主要内容的叙事性文学发展,迎来了通俗小说的高峰;另一方面,中国古典小说自身也完成了由上古神话、传说而始至明清小说特别是长篇章回小说为终的流变过程。对后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得十分明达:“从神话演讲,故事渐通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

① 李贽早年习儒,中年钦羨黄老之治,晚年落发为僧,故融三教于一身。其有自述曰:“弟异端者流也。本无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为异端,相袭而排摈之者,不知其百年矣。并非不知,而敢以直犯众怒者,不得已也。”见《焚书》卷一《复邓石阳》。

② 袁于令《西游记题辞》。

③ 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多署汪澹漪,偶作汪澹漪,现为书写方便,本文中一律写作汪澹漪。

④ 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第一回回评。

⑤ 唯李评本托名李贽,系取其名盛而自重,一如容与堂本《水浒传》“托名温陵之名以行”(钱希言《戏瑕·贋籍》)。

雄,其才能在凡人之上,由天授的就是。……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学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可见,中国小说从远古神话、传说发轫,经先秦寓言、故事、笔记,魏晋六朝志怪、志人小说,隋唐变文、传奇,宋代话本、拟话本,到明清通俗小说,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主潮,甚至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阶段和最高阶段,体现了其从简单到复杂、从少样到多样,从萌芽粗糙到成熟完善的发展规律。

正如悠久的诗文传统哺育了辉煌的诗文批评,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必然带动小说批评的勃兴,小说创作的沃土终于催生出小说评点批评的理论之花。叶朗曾从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的关系来论述这种“必然性”:

小说评点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和小说美学的独特形式,既可以

对读者的阅读欣赏进行指导,又可以对作家的创作经验进行总结;既可以对作品的总体进行美学概括,又可以对作品的细部进行具体的艺术分析;既可以从各个角度议论作品本身的得失,又可以结合作品的评论,探讨各种美学理论问题。因此,它比较灵活,比较自由,容量比较大。^①

这一论述不仅揭示了明清小说评点繁盛的原因,也说明了小说评点的价值、作用以及在整个小说美学中的主体地位^②。

明清《西游记》学术史所涉繁芜,其成果散见于笔记(杂著)、诗文、方志、目录学著作以及《西游记》续书等各种文体之中,但主体无疑是评点(包括序跋和批语),明清两代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西游记》评本,站在不同的立场(政治、宗教、学术等),从不同的侧面,运用繁复的方法和汗牛充栋的文字,对作品进行了细致、深入(暂不涉正确与否)的阐释和解读。

《西游记》评点作为个案(即一个具体作品的评点)与整个小说评点批评存在着互动、互补的关系;明清小说评点批评构成了《西游记》评点的宏大学术背景,但后者也是前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自

①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0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尚可参阅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之“小说批评为何以评点为主体样式”一节,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

身独特的学术内容和品位,丰富并推动整个明清小说美学的理论内容。

学界一般以万历年间为小说评点的时间起点,并以此作为中国小说美学的“真正开始”^①。此论尚可商榷。就目前小说史资料,刊刻于嘉靖元年(1522)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清通俗小说的最早刊本^②。而这一刊本同时也是一部小说评点本,该本有序跋(即蒋大器《序》、张尚德《引》)、夹批两种评点因素,且批评内容颇丰,用以注明史实、注音释义,以及发表文艺评论。至万历十九年(1591)万卷楼翻刻本又添加了周曰校《识语》(类似于读法),评点形式更加完善。故而谭帆《小说评点编年叙录》首录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明清通俗小说评点的开端^③。

关于《西游记》评点的出现,学界通常指认为刊刻于泰昌、天启、崇祯间的李评本^④,我却以为是刊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世本,其理由容在后文展开。不过,我要指出的是,这两种观点不特分别了《西游记》评本出现的不同时间,更重要的在于刊本时间的不同还直接决定了它与整个明清小说评点的特殊关系,以及它在整个明清小说美学中的作用、地位的轻重、高下。如果认定世本为《西游记》评点开端,那么就意味着,它与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万历十九年,1591)、余象斗双峰堂刊本《三国志传》(万历二十年,1592)及双峰堂《水浒志传评林》(万历二十二年,1594)一起,同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后尘,除了其自身的评点价值,尚带有对于明清小说评点冰泮发蛰、草创开辟的意义。如果认定李评本为《西游记》评点开端,那么因它刊刻于泰昌(1620)、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之

① 参见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据陈大康考证:“这一事实是由庸愚子和修髯子两人证实的。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论及这部小说时,还只是说‘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显然是直到弘治七年时尚无刊本出现。到了二十八年后,修髯子在嘉靖元年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则言:‘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售诸梓,公之四方可乎?’这证实了至今犹存的嘉靖元年版《三国演义》确为这部小说的第一个刊本,也是目前所知道的明清通俗小说的第一个刊本。”见《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③ 参见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第171页。

④ 李评本未注明刊刻时间,学界所论跨度较大,这里姑且采苏兴的考证定为泰昌、天启、崇祯间,下文有详细论述。

际,其时的小说评点早已蔚为壮观,它与整个小说评点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出它对小说美学潮流的顺应和推动,只在较为狭隘、封闭的时段里显示它自身的批评价值而已了。当然,无论作何种认定,明清小说与小说批评的繁盛,构成了《西游记》评点更为直接的契机和动因,从而也构成了明清《西游记》学术史最为主要的学术背景这一认识,都是应该得到确认的。

最后要指出一点:虽然明清两代《西游记》评点繁夥,但学界评价始终不高。其实我在《导论》中已指出,这与其自身的缺陷与弱点有关。《西游记》各家评点,究其价值和学术品位,不能与金批《水浒》、毛批《三国》、张批《金瓶》、脂批《石头记》(《红楼梦》)等一流优质评点相轩轻,庶几是不争的事实。但却不能成为全盘否定和抹杀的理由。五四时期鲁迅、胡适、郑振铎都曾发表过类似全面否定的看法,这是五四新文化潮流使然,另当别论。叶朗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小说美学》与《中国美学史大纲》,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明清小说评点的理论价值和美学意义,对于构建中国小说美学体系功不可没。但他对于《西游记》评点恰恰持全盘否定和抹杀的态度,径称它们“胡言乱语,不堪卒读”,“在美学上都没有什么价值”,“并不是明清小说评点的代表作”云云^①,不免失之轻率、片面,也带有其时学术和思想的局限。我以为:撰写明清《西游记》学术史,必然将以众多《西游记》评本为主要内容,对它们视而不见,绝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必须抛开以往的偏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承认其不足甚或谬误的前提下,作出细致、深入的分析 and 评述。其终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总结明清《西游记》评点的批评经验和理论成果,并将它们推入到整个丰富的明清小说美学的宝库中去。在这一过程中,指诂、批判,开掘、提升,否定、扬弃(否定之否定)而复归肯定,这或许都是不可避免的。

二、明清《西游记》学术史鸟瞰

我们以小说评点为明清《西游记》学术史的主体,并事实上也将以

^①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360页。

世本、李评本和《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五个主要评本立纲展开重点评述。但须注意的是,整个明清《西游记》学术史并非这五个评本可以涵盖,它是明清两代《西游记》学术活动的整体性、历史性成果。一方面,除却评本,在明清士人的笔记、史论、诗文等文体中包含着丰富的有关《西游记》的学术见解。另一方面,即或是小说评点,在清代新说本以后,尚有刘一明《西游原旨》、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含晶子《西游记评注》等三个颇为流行的新版本存在,其中不乏一些独到的看法。又,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下简称《孙目》)记载有《蔡金注西游记》,据李时人著文披露有《西游记记》。从书名中“注”、“记”一类文字来看,两者皆当为评点本无疑,理应有关于《西游记》的若干看法。如据李时人介绍,《西游记记》这部题署由“咸丰七年丁巳重阳后三日庚寅力农人雨香盥沐谨志”、“戊午八年元旦戊寅日曹娥江人任蛟焚香恭赞”、“戊午中秋前三日甲寅学者达斋朱敦毅赘述”、“咸丰岁在丙辰正月初六甲子怀明重订”的手抄本,“似据悟一子(陈士斌)《西游真诠》,有双行夹批,回末批。批评者持三教同源观点,或引《易》或引《大学》、《中庸》。所奇者多采用词曲小令形式,或形容或说理,所用曲牌绕绕令、得胜令、香柳娘、江神子、下山虎、步步娇、二郎神、江儿水、桂枝香等几百余种”^①。以戏曲形式批评《西游记》堪为别出心裁。而《蔡金注西游记》则或为佚本,《孙目》明注“未见”,故未有人目验,其果为何书,真相如何,学界多有猜测^②。而且,关于明清两代《西游记》研究,学界尚不断有新发现,引人注目者如萧相恺于“稗海访书”时发现的《金丹大道》一书。据萧氏介绍,该书为手抄本,藏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凡四卷,分装四册,未题撰者姓名和抄写年代。该书一如其书名所示,以道家金丹理论评论《西游记》。

① 参见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又,《西游记记》后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出版。

② 据吴圣昔考证:该本出于好事者耳食之言。经查清刘一明《西游原旨序》,盖序中于批评《西游证道书》后曾有如下语:“其后蔡金之辈亦遵其说而附会解注之。”于是或疑其为清代之《西游记》佚本者。后有论者提出:“蔡金之辈”的“蔡、金”当为二人,所谓“蔡金注《西游记》”,就是指清代蔡元放“重订”之《西游证道书》。因该书扉页、目录页和正文首页上,多次题有“蔡元放或蔡亩慙(即蔡元放)重订”和“圣叹外书”字样,“圣叹”即金圣叹,蔡氏借金圣叹之名而自重,故有此误。这就是“蔡金注《西游记》”的由来和真相。参见吴圣昔《蔡金注《西游记》究为何书》,《文教资料》1995年第2期《〈西游证道书〉杂考两题》。又见《〈西游记〉佚本知多少》,《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2期。

现转述其中有关评语如下:

《西游》一书讲金丹大道,只讲得性命二字。千魔万怪,无非只讲得性命二字。前七篇原有伦次,以后或有伦次,或无伦次,颠来倒去,篇篇若有深义,如造化之雕刻万物,并无重复,归总于一元,参同契氏曰:孔窍其门。子舆氏曰:引而不发。惟善读者能神观默察而有以自得耳之。

篇中师徒心和意合,归正求真,所以修性命也。倘于饥寒,自当固穷,不可妄动,三藏见楼台欲化斋,行者望气色劝勿入,寓有叩侯门而求利达,戒冰山而慎行止之意。^①

以上所举这些史料所蕴含的学术价值显而易见,凡研究《西游记》者,特别是撰写学术史者都不可忽视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对世德堂本、李评本和《西游证道书》等五大明清主要评点本展开详论之外,有必要先行对其他明清《西游记》学术资源及成果,进行一次宏观、整体的鸟瞰,作一番简扼、概括的说明。现撷取有关资料汇合成若干论题论述如下,或可为明清《西游记》学术史拾零补遗,以呈全貌。

其一,以《西游记》为神魔小说之滥觞。

明清之际,崇道风盛,对文坛影响甚大。鲁迅在论述神魔小说的历史背景时曾指出:“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遍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显其赫,成化时有方士李孜,释继晓,正德时有色目人于永,皆以方伎杂流拜官,荣华照耀,世所企羨,则妖妄之论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②明清士人虽无神魔小说之名,但对这一小说潮流也有一定认识。如谢肇淛说:

俗传有《西游记演义》,载玄奘取经西域,道遇魔崇甚多,读者皆嗤其俚妄。余谓不足嗤也,古亦有之。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黄帝伐蚩尤,迷大雾,天命玄女授指南车;禹治水桐柏,遇无支祁,万灵不能制,庚辰始制之;武王伐纣,五岳之神来见,太公命时弼五器,各以其名进之。至于《穆天子传》、《拾遗记》、《梁四

① 转引自萧相恺《珍本禁毁小说大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81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公》，又不足论也。《西游记》特其滥觞耳。^①

谢肇淛，字在杭，福建长乐人，生卒年不详，万历三十年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系明代著名文学家、小说批评家、藏书家，学识卓越，著有《五杂俎》、《文海披沙》、《麈馀》等学术名著^②，对历史、时政、风俗、文艺常有精到见解，论《西游记》尤为一时翘楚。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指出描写神魔之争的内容的作品，“古亦有之”。他列举上古神话，至魏晋志怪小说，梳理了神魔小说的发展线索，认为《西游记》不过是“持其滥觞”，对这一派的继承发展而已。二、其中透露出一个信息：尽管《西游记》风行朝野，妇孺皆知，然其时士大夫对这一“侈谈鬼怪”的作品尝多非议，“皆嗤其俚妄”。如姑苏笑花主人说“《西游》、《西洋》逞意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③。戏笔主人称《西游记》“专工虚妄，且妖艳靡曼之语，聒人耳目”^④。烟霞外史在鼓噪《韩湘子全传》时说《韩湘子全传》“有《三国志》之森严，《水浒传》之奇变，无《西游记》之谑虐，《金瓶梅》之褻淫”^⑤，竟然是将《西游记》的“谑虐”与《金瓶梅》的“褻淫”等量齐观了。而谢肇淛与这些观点针锋相对，明言“余谓不足嗤也”，以为凡文艺“事太实则近腐”，倾力为《西游记》辩护。在他看来，《西游记》不仅遵循了以往的小说传统，是“持其滥觞耳”；同时，也开创了后世神魔小说的“滥觞”，实在是功不可没。从现在看来，这不失为一种先进的文艺观和小说观。

其二，指出《西游记》“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是一部深刻的寓言书、哲理书。

这一看法实于《西游记》甫就即有，世本陈元之《序》即宣称：“此其书直寓言者哉！”而在明清两代皆有持续发展。继世本稍后的李评本叶昼评点中说：“《西游记》极多寓言，读者切勿草草放过。”至盛于斯说得更详细一些：“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

① 谢肇淛《文海披沙》卷七。

② 谢肇淛，其生平《明史》有传，尤以曹学佺所撰《明通奉大夫广西左方伯武林谢公墓志铭》和徐 所撰《中奉大夫广西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所记最详。

③ 姑苏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④ 戏笔主人《忠烈全传序》。

⑤ 烟霞外史《韩湘子全传叙》。

指,即中间斜(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非作寻常影响。其末回云:‘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九,阳也;九九,阳之极也。阳,孩于一,茁于三,盛于五,老于七,终于九。则三,九数也。不用一而用九,犹‘初九,潜龙勿用’之意云。”^①

那么,《西游记》寓寄着何种深意呢?盛于斯虽有所涉及(如“亦皆关合性命真宗”等语),但所指颇含糊。在明代,还数谢肇淛说得最为明确、透彻:

《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②

这就是影响深远的“收(求)放心说”。所谓“收放心”,来源于孟子修心养性的人格思想,孟子云:“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③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是最重视人格修养的,倡导内修外治,“充实之谓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或谓过于孔子。他认为“学问之道”(学习、学术)的真谛(最终目的)就在于“求放心”,即寻回失落的心灵^④。谢肇淛把《西游记》与“求放心”的学说联系起来,一方面是顺应了当时的王阳明心学思潮。心学注重内省,强调“心外无物”,“致良知”,“事心上做工夫”,而究其思想的最初源头似在《孟子》,孟子首倡性善说,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后世心学盖从此“四善端”推衍而出。谢肇淛接受心学的影响自然更能直面《孟子》(跳过孔子《论语》)。另一方面,也密切地照应了《西游记》的创作实际,《西游记》思想繁杂,“所指”丰赡,然通过唐僧师徒经过千山万水、千魔百怪的考验最终得道成真,展现其修身养性的心路历程也当是应有之义,并且昭然若揭。所以“求放心”之喻既有深厚的哲学思想渊源,又有作品的内

① 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

②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

③ 《孟子·告子上》。

④ 相对于“求放心”之喻,孟子还有一个更为具体、形象的比喻:“忧指忘心者诚。”《孟子·告子上》:“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者,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其大旨也在修心。

容(情节)支撑,故而绝非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断,而是有的放矢之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五四时期,胡适、鲁迅力扫旧说,但对此论也持一定的认同态度,如鲁迅明确说:“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关于“求放心”一说,“已足尽之”^①。直接借此来说明自己对《西游记》的看法。

至清代,对《西游记》寓意的诠释出现了两种流向:一种演化为“证道”、“谈禅”、“劝学”各派学说,且宗教色彩渐浓;一种则相反,而是坚持从艺术批评角度来分析作品的大旨,有的甚至干脆承认《西游记》寓意深邃,未能明示而告阙如,存疑,各种言论纷呈,不一而足。

前者以清代评点家为代表,他们受清代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旨在阐释《西游记》的宗教意蕴。刘一明《西游原旨·序》中几乎把《西游记》视为宗教宝典:“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冯阳贵也为《西游记》“宗教化”推波助澜,他说:“《西游记》开精一心学之宗,阐三教一家之理,渡学者出洪波而登道岸者也。”^②尤以梁联弟说得最为具体:

《西游》一书,即《阴符》也,即《参同》也;《周易》也,《修真辨难》也。《西游原旨》之书一出,而一书之原还其原,旨归其旨,直使万世之读《西游记》者,亦得旨知其旨,原还其原矣。道人之功,夫岂微哉?一灯照幽宝,百邪自遁藏。从兹以往,人人读《西游》,人人知原旨;人人知原旨,人人得《西游》。迷津一筏,普渡万生,可以作人,可以作佛,可以作仙。道不远人,其在斯乎!其在斯乎!^③

完全是把《西游记》当作了指引修道的明灯,指点迷津的宝筏,一如《阴符经》、《参同契》之类。

后者以晚清小说家为代表,他们反对“宗教手册论”,主张从宗教之外来探寻《西游记》的寓意。不过也是其说纷纭。有的谓之“科学小说”,可资“中国科学不兴之咎”^④;有的谓之“哲理小说”,以悟空跨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冯阳贵《〈西游原旨〉跋》。

③ 梁联弟《栖霞山悟元道人西游原旨叙》。

④ 使人《小说丛话》,转引于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277页。

海学道比拟为“今日出洋求学之效果”，读《西游》可“以精器械，以致富强，保种在是，保教亦在是”^①。其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日益加剧，有识之士都在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可见这一类看法其实是对现实需要的呼应，也可说是近代改良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只不过有饥不择食、空疏无实之嫌。从文艺批评而言，则脱离《西游记》的实际，“勉求大当”，与清代评点派相比，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较来看，唯石庵所论颇客观而又引人思索：

余尝尽十日之力，取《西游》过细考求，复取各经上语录与之相证，千方百计，终不若全书画一。谓其皆本于道家，意此书亦不过一小说家言耳。……《西游记》虽不足为道书，然为一种寓言小说，余敢断言。惜时代相去已远，不知其寓意所在，且所寓者或一事，或数事，皆不可知，殊可叹也。^②

石庵指出，《西游记》是小说家言，“不足为道书”，但他看到了文艺作品形象与思想关系的复杂性，其寓意并非“画一”，“或一事，或数事”，殊无可知；同时，他认为，以往诸家揭示“证道”、“谈禅”、“劝学”，作为对《西游记》寓意的探索，皆是徒劳，因为《西游记》“时代相去已远”，后人“不知其寓意所在”，只好存疑。在石庵那里，《西游记》揭秘复归混沌，遂成不可知的宿命。

其三，高度肯定《西游记》的神幻特征。

这一认识肇始于袁于令为推介《西游记》而作的李评本《西游记题辞》：以“不幻不文”之说概括了“幻”与“真”的辩证关系。后经明清两代小说理论家的相继发挥，遂成《西游记》艺术风格的定评。

首先，我们看到谢肇淛为《西游记》辩护正是从肯定其神幻特征及价值入手。他不仅指出《西游记》“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而且其富有批评意识和理论力度的是：一、以其他步《西游记》后尘而联袂冒出的神魔小说作为印证，说“《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二、将《三国》、《列国志》等讲史类作品作为反衬，径称这些以“信史之补”为自我定位的小说“事太实则近

① 阿阁老人《说小说》，转引于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278页。

② 石庵《忤室随笔》，转引于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279页。

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耳”。三、以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至,不必问其有无也。”^①这里不论他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是否偏颇,也不论事实与虚构是否应为五五对开,仅就揭示出来的《西游记》神幻特征的价值与意义而言,是深中艺术的肯綮的。即使以现代文艺观念衡量,也不失为高明、精当之论。

我们还应看到一个现象:在晚明之际,论《西游》以谢肇淛为最,或常以谢肇淛代言,但实际上谢氏所论恰恰是对明人认识《西游记》的总结,而并非个人一管之见。即以关于《西游记》的神幻特征而言,明清之际,其共鸣者繁夥。如睡乡居士说:

《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浒》之讥。岂非真不真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②

指出《西游记》“怪诞不经”,然而“幻中有真”,其艺术魅力(“传神阿堵”)当在《水浒传》之上。

与之相类的还有张无咎,他说:

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云:“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西洋记》如王巷金家神说谎乞布施,效《西游》而愚者也。^③

张无咎(名誉,楚黄即今湖北黄州人,余不详)在这里看到了不同的小说类别(他分为“以真为正”类,以《三国演义》为代表;“以幻为奇”类,以《西游记》为代表;“兼真幻之长”类,以《水浒传》为代表)的不同艺术特征,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如以幻真关系为标尺,他认为“以幻为奇”的《西游记》不逮“兼真幻之长”的《水浒传》,也基本合乎逻辑。而指出《西游记》之后《西洋记》、《后西游》、《续西游》一类效颦之作,因“幻而失真”而成为神魔小说中等而下之的“愚者”,则完全正确。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

② 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

③ 张无咎《平妖传叙》。

至清代,以“奇”论《西游》成为风尚,从证道书以下,至含晶子《西游记评注》,莫不以“释儒”、“证道”、“谈禅”为思想一翼,以神幻、奇异为艺术一翼。特别是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更是满篇神字、幻字、奇字、妙字,将这一看法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时至今日,有人习惯于“言必称希腊”,一味地以西方学说与术语来解评《西游记》,将《西游记》的神幻特征与西方的浪漫主义概念等同起来,并以此与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相对立,那是后话。古人自当始料不及,这里“不说也罢”。

第二章 明代《西游记》评点

一、冰泮发蛰、百草权舆：作为《西游记》评点发轫的世本

据目前版本资料,可知现存百回本《西游记》最早刊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本。该本曾遭长期湮没,幸孙楷第1931年域外访书时于日本村口书店发现,1933年北平国立图书馆随即购入,同年由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首次披露,国人始知有此明刻百回本《西游记》。现依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以下简称《孙目》)所载列其版本概况(资料)如下: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村口书店)

明万历间世德堂刊本。题“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卷九、卷十、卷十九、卷二十又题“金陵荣寿堂梓行”、“书林熊云滨重锲”。图刊正文中,左右各半叶为一幅,颇古雅。字写刻,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亦端整可观。首陈元之序。

又,因孙氏于异域私人书店观书匆匆,所记简略,故列入《孙目》的版本资料颇感不详。现综合《孙目》和后来学界之研究,并参验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本补充于下:

封面、扉页未见。目录页首题“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尾题“出像西游记”。各卷首题略有差异。全书分二十卷,以宋邵雍《清夜吟》诗“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二十字为目,每卷五回。目录页每五回回目前分别题“月字卷之一”、“到字卷之二”等,依次类推至“知字卷之二十”;正文每卷首书题亦同,唯三、四、十四卷缺卷目。

卷首有《刊西游记序》，序前题“秣陵陈元之撰”，序后题“时壬辰夏端四日”。（按：孙楷第尝云：“世德堂本为原刊本，则以作壬辰万历二十年为是。”）《序》半叶六行，行十二字。

有插图及批注。图散插正文中，每回一到三幅不等，凡一百九十六幅。每幅图配有题辞，如第一回两幅分别题为“灵根育秀”、“心性修持”，第一百回两幅分别为“唐三藏取经回东土”、“五圣归西作佛成真”。所题与文中内容相契，字数不求整齐划一。批注无回前评、回后评和总评，只有少量夹批，分单行和双行小字注两种形式。

该本收藏多辗转，今存台湾故宫博物院。台北天一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行世。

世本系《西游记》善本，有残缺，但究竟残缺多少，以及残缺于何处，各家所论多有出入。现通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西游记》（人文本）谓残缺者为第十四、四十三、四十四、六十四、六十五、八十七等五回，并称已“根据‘书业公记’本（即张书绅评注本《新说西游记》——引者注）把它补齐”^①。从而成为最具权威性的现代点校本^②。江苏古籍出版社《新批本〈西游记〉》苏兴、刘兴汉《校评说明》称残缺的是第十五、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四、六十五、七十四、七十八诸回，且“悉用李评本相应回目的文字补足”^③。检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本，可知残缺处实为第十五、四十三、四十四、六十五、七十四、八十七等六个回目，另有若干地方有个别词句脱落。

我曾在《导论》中指出：陈元之《刊西游记序》（还有李评本袁于令《题辞》）“不仅开《西游记》评点批评的先河，也理所当然成为学术史的嚆矢”。这一评价的理论前提在于：世本不仅是现存最早的明代《西游记》刻本，而且是最早的《西游记》评点本。关于这一点，直接涉及明清《西游记》研究的形态、进程和理论成果，以及它在《西游记》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然学界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故而还须作进一步论述。

① 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西游记》卷首。

② 对人文本的评价，近年间也出现了不同的批评意见，可参见〔日〕中野美代子《〈西游记〉的秘密》，中华书局，2002年。

③ 参见《新批本〈西游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评点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主体样式,至明清小说评点已呈现出融注(注释)、评(评论)、改(改编)为一体的特征,由注向评、改转移的轨迹也甚为明显,金圣叹贯华堂刊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堪为其完备、成熟的范本。关于小说评点的一般形态,叶朗《中国小说美学》曾有所描述:

开头有个《序》,序之后有《读法》,带点总纲性质,有那么几条,十几条,甚至一百多条。然后在每一回的回前或回后有总评,就整个这一回抓出几个问题来加以议论。在每一回当中,又有眉批、夹批或旁批,对小说的具体描写进行分析和评论。此外,评点者还在一些他认为最重要或最精彩的句子旁边加上圈点,以便引起读者的注意。^①

显然,这是研究者以金批、毛批、张批和脂批为参照的理论描述,事实上从早期评点萌芽达到这一“一般形态”,尚有一个较为漫长的演进历程。故而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对此解释说:

这一段描述在总体上抓住了小说评点的形式特性,但这其实仅仅是对小说评点史上一些名著的概括,或者说,这是小说评点中最为完备的形态,而非小说评点的普遍形态。实际上,评点形态如此完备者在小说评点史上仅占极少数,大量的小说评点并不具备这一特点,或仅眉批、或仅旁批、或仅回末总评,而“读法”类文字在小说评点中更在少数。因而小说评点形态并非如以上描述那样正规划一,其自身有一个演化的线索,并根据不同的小说对象形成了不同的评点形态。^②

根据这一理解,其《小说评点编年叙录》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元年,1522)开篇。该本首置庸愚子(蒋大器)《序》、修髯子(张尚德)《引》各一,并有少量夹注,虽然文字不多,但对小说思想的揭示(如三国正统观),对历史典实的注释、对艺术特色的评析皆深中肯綮,并有深远影响,多为后世评本沿袭采用。以此为参照,产生于万历年间小说评点萌芽期的世德堂本《西游记》与之仿佛,当亦可作如是观,将它作为《西游记》评点本,似也无不当。

①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②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检验世本,除首置陈元之《刊西游记序》,尚有或出于校订者“华阳洞天主人”之手的夹批^①。陈《序》虽短略,但言简意丰、辞近旨远,于后世《西游》研究影响至大;夹批至目前发现者仅八条,数量尤少,但其意义似不止于数量,而在于一个类(序跋、读法、批注)的存在。世本有序跋、有批注,三者中占其二,作为评点本殊无可疑。窃以为对陈《序》与夹批亟须进行深入的探究,尽可能详细地发掘出其中隐寓的文化信息、批评价值,凸现其在小说评点史和《西游记》学术史上的意义。

先说世本卷首之陈元之《刊西游记序》。

陈《序》由孙楷第最早引录介绍,然《孙目》所载序文“颇有错乱”,甚或“不成文义”^②。究其原因,世本卷首陈元之《序》并无差错;系孙楷第所引录者为明刻《新镌全像西游记传》(杨闽斋本)卷首《全像西游记序》,而杨闽斋本为世本翻刻本,在袭用世本陈《序》时造成了诸多错讹和改动^③。现在已经学者指出和订正,可查阅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和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

陈《序》尾署“时壬辰夏端四日也”,据孙楷第定为万历二十年(1592),今人黄永年推测或为嘉靖十一年(1532),提前了一个甲子^④。无论是万历二十年,还是嘉靖十一年,都处在明清小说评点的萌芽时期,唯后者直逼明清小说评点的上限嘉靖元年(1522)《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庸愚子《序》,修髯子《引》;在《西游记》学术史上更是肇始权舆之作,是任何后世其他《西游记》序跋无可替代的原始文献。序文全文只672字^⑤,但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作者、刊刻过程、时代、订校以及文本批评等诸多方面,凝结着一个特定的时期对《西游记》的基本认识,直接奠定了后世《西游记》学术史的基础,可以说,它与《西游记》文本

① 目前学术界对华阳洞天主人果为何人有不同推测,推测对象有李春芳、陈元之、吴承恩等人。

② 分别见柳存仁《〈西游记〉的明刊本——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一》,香港《新亚学报》1964年第6卷第2期;陈新《再论〈西游记〉的版本源流》,《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

③ 参见方胜《〈西游记〉陈序错讹源于杨闽斋本》,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2辑,1988年。

④ 参见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载《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2辑,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又见《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⑤ 实际当增二字,据孙楷第指出:在“几乎遗《西游》”后,当重“西游”两字。

一起构成了一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的母体。

其一,关于《西游记》的作者。

《西游记》世本刊刻时作者佚名,导致今日《西游记》研究一大疑团,经过上百年旷日持久的探究和争论,谜底至今未解。但学界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即陈《序》中包含着关于作者的一丝宝贵线索,并成为后人研究的一个必要的参照。《序》中说:

《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

由于其时小说地位低下,作者不愿署名,《西游记》作者至陈元之时已无定论,只得作出以上推测。不过我们发现,这三个猜测(“或曰”)竟都与明代藩王府有关,即“侯王之国”,或具体的“八公之徒”(泛指王府门人)及藩王本人。这就给出了特定的范围和方向。

查《明史·诸王世表》,朱明王朝自太祖朱元璋始,历代先后封王立藩达五十家之多,其中有二十八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这些藩王文化素质高,经济条件优厚,且不参与国家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有闲),故而习文昌艺风盛,尤喜著书刻书,其刻书数量与中央各部门官刻并驾齐驱,占据半壁河山^①。今见有关《西游记》与明代藩王府有关的文献有两份:一是明人周弘祖(嘉靖间进士,曾任御史、福建提学副使、南京光禄卿)《古今书刻》,载山东鲁王府刻书四种,即《群书钩玄》、《萨天锡诗》、《西游记》、《蓬莱图》;山东登州府刻书二种,即《西游记》、《海道经》,但皆一无其他著录和说明。二是明人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称:“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此乎?’”^②鲁府《西游记》不知为何书;周邸《西游记》当为九十九回本或百回本小说。考虑到明代的藩王府(包括鲁府和周邸)在古代刻书上的地位,这两份记载对认识《西游记》作者有重要意义。据考证,第一任鲁荒王朱檀死于服丹,历代鲁王好丹术,笃信道家,所刊图书多有道家著作,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九世鲁王刊刻《诚斋易

① 参见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89年。

② 引自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77页。

传》，又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刊刻葛洪《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今藏北京图书馆。《西游记》包含较多的崇道内容，极易引起鲁府的关注。故周弘祖所记很有可能与小说《西游记》相关。周藩刻本亦多，嘉靖间周藩嵩岳主人刻《金丹正理大全》（道书全集之一），永乐间周藩定王朱 刻医书《普济方》，其子周王有燉撰杂剧数十种，以“诚斋乐府”为总名，刻《豹子和尚自还俗》等杂剧。故周邸刻有小说《西游记》实在情理之中。

陈《序》这段话虽没有实指《西游记》作者究为何人，但指认与藩王府有关，这一点意义重大，已成为今日推测作者的必要条件。如黄永年认为鲁府刻《西游记》就是“百回原本的初刻本”，“刊刻的年代在嘉靖十一年刊刻陈序本之前，可以姑且定它为嘉靖初年”，而登州府刻本则“也许是鲁府《西游记》的重刻本”，并因此提出：“陈元之《序》认为就是某藩王即鲁藩或藩府宾客所作，但只是个推测。”^①又如黄霖据此提出了具体的新入选：嘉靖时鲁端王朱观（或门人），直接与所谓“天潢何侯王之国”挂钩^②。沈承庆力主李春芳说，其一大理由是李春芳身为宰辅，“王公相平级”，“以王影相”，采用这种“套级”的办法，其旨意即在迎合陈《序》的这一规定^③。也有论者将陈《序》与盛于斯《休庵影语》说的周邸九十九回抄本或周如山“增入一回”而成的百回本《西游记》联系起来，认为《西游记》作者为周王府中人。甚至坚持吴承恩说的学者也认为找到了新史料，那就是70年代出土的吴承恩墓地，特别是写有“荆府纪善”四字（或曰“荆府纪善射阳吴公之柩”十字）的棺材挡板，终于与藩王府搭上了关系。反之，那些与藩王府无关的人选，如唐新庵、许白云诸人，其立论总显苍白无力，其原因即在不符陈《序》给出的先决条件，立论上存在先天的弱点。

其二，关于《西游记》文本（刊本）的问世。

《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早在民间流传，世本是其作为百回本小说问世的标志。陈《序》透露了刊本问世的过程和实际情况。其中说：

① 参见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② 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③ 参见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余维太史、漆园之意,道之所存,不欲尽废,况中虑者哉?故聊为缀其轶《叙》叙之。

这段话告诉我们:万历年间已有长篇章回小说《西游记》成书流传,诚如胡适所言,成为西游故事流传的最大集合体。大约在万历二十年(1592)前,书坊主金陵世德堂唐光禄购进了这部书,读后深以为奇。商人牟利的动因使他立刻决定刊刻这本奇书,于是他请人(华阳洞天主人)校订、润色,分成二十卷一百回,并请了一位名人(陈元之)作序推介,终于在万历二十年以世德堂的名义正式刊刻行世。

目前对其中的许多问题模糊不清。如“华阳洞天主人”生平无考,故而他是如何对唐光禄所购原本进行订校(也即再创造),我们不得而知;又因世本无凡例一类文字,故其思想和美学原则也无所考究;陈元之《序》称“缀其轶《叙》叙之”的所谓“旧叙”仅录有一小节文字,其基本面貌不详;等等。但是世本刊刻的动因、过程、刊刻年代,以及校者、序者(包括他写序的经过)、全书的卷目和字数等信息是清晰的。据此可以确认,世本是现存最早的《西游记》刊本,也是百回本《西游记》小说问世的标志,不过其有底本依托,而非原创之作,所依本子或以为抄本,或以为“吴氏书”初刻,现学术界常称“旧本”、“旧叙本”、“前世本”等(对这一问题后文有详论)。

其三,关于对《西游记》的基本认识。

明代是《西游记》学术史的发轫期,明人已发表了极富创见的认识,其中尤以陈《序》为最早、最集中,并最有系统性。就学术线索而言,它既保存了前人的认识(《旧叙》一节),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见;就理论内容来说,《陈序》不仅揭橥了小说的主旨,而且也对小说的艺术审美特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现择其要者予以评述。

对于《西游记》的主旨,陈《序》首先引录《旧叙》说:

其《叙》以为孙,狻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郭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

之成耳。

这段话充满象征隐喻意义：以狮、马为心意本真的借代，将魔视为达到心意本真的“恐怖颠倒幻想之障”，认为《西游记》降妖除魔，其旨即在“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最终实现“归之太初”、“心无可摄”，也即原初心意本真（“道之成”）的境界。总之是把《西游记》理解为修心养性的哲理书。这不仅是原叙者的认识，也反映了明代心学影响下的普遍认同。对此，陈元之是赞同的，故他紧接着说：“此其书直寓言者哉！”又进一步发挥说：“彼以为大丹之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湮，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已。”并与太史公“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庄子“道在屎溺”等思想相互印证，反复论述人的心意状态和修心养性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陈《序》除了渲染心性之学，还首次引入了两个道家的概念：“大丹之数”、“东生西成”。阎凤梧、李安纲解释说：“金丹学认为，金丹出产在东方，却必须到西方培养，才能成就；还必须再回东方，才能得到永固。……所以小说中孙悟空西游学法，唐僧西游取经，其目的都是要把从东方生出的金丹送到西方去长成，然后再取回送到东方来。‘西以为纪’，就是陈氏对于书名《西游记》三字的解释。”^①查世本夹批中也出现了道教的内容（详见后）。如将两者并案考究，或能显示出某些必然性。无论如何，在世本中这一并不强烈的道教意识恰恰成了后世证道求丹学说的最初渊藪。

陈《序》对《西游记》的另一个基本认识，是简扼地说明了小说的艺术审美特征：浪谑笑虐以恣肆，其言参差而俶诡可观。其中说：

余览其意近跖 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

余维太史、漆园之意，道之所存，不欲尽废，况中虑者哉！故聊为缀其轶《叙》叙之。不欲其志之尽湮，而使后之人有览，得其意忘其言。

^① 阎凤梧、李安纲《明清〈西游记〉文化思想研究概述》，《西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文中“太史”即指司马迁所谓“谭言微中”，“漆园”即指庄周所谓“道在屎溺”。“得意忘言”语出《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魏晋时王弼又发展成一个精深的玄学命题：“言意之辩”。陈元之认为《西游记》的审美特征在于以“滑稽”“卮言”，即以谬悠、荒唐的神魔故事来传达深刻的思想，呼吁大众撇开其神魔外衣，在浪谑笑虐、参差俶诡的描写中领悟修身养性的真谛，达到宁静无欲、鸢飞鱼跃的人生境界。

这就涉及对小说价值的评价问题。陈《序》一反千百年来轻视、鄙夷小说的文学观念，竭力提倡稗史野言的地位。针对有人（其实是陈元之有意假设）提出《西游记》是“非君子所志”的“丘里之言”、“东野之语”，“以为史则非信，以为子则非伦，以言道则近诬”之类观点，陈元之予以断然驳斥。他说：

否！否！不然！子以为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伦邪？子之子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伦，则子史之诬均。诬均则去此书非远。余何从而定之？故以大道观，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观，何所不有哉？故以彼见非者，非也；以我见非者，非也。人非人之非者，非非人之非；人之非者，又与非者也。是故必兼存之后可。于是兼存焉。

在当时小说地位低下、神魔小说草创尚不为人熟知认可之际，陈元之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他认为正史未必可信，诸子未必合乎常伦，正史和诸子皆未必中道，所以不能轻易非议小说，主张“两者必兼存之后可”，体现出他一种先进的文艺观，也充分显示了他兼收并蓄、豁达通融的文化胸怀。在文学史上，以文为宗者莫过韩愈，然他也主张文无定法，文章之道，贵乎张弛开阖，不拘一格；虽鬼怪荒诞，只要不损害孔孟之道，以文为戏，又有何不可呢！他一方面与张籍、裴度等正统文人论辩，公开宣称：“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于道哉！”一方面亲自创作了《毛颖传》、《祭鳄鱼文》等俳谐诞幻、带有小说意味的作品。两相对照，陈元之的看法与一代文宗一脉相承。可以说，陈《序》中的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陈元之与李贽、叶昼、陈继儒和公安三袁等人，都是明清之际推崇小说、

提高小说地位的理论先驱。

再说世本中夹批。

现已发现的八条夹批凡 67 字,涉及第一、二、四十一、四十七、四十八、六十四、一百等七个回目,其文字有长有短,所批角度、作用不一。现将其基本情况列表示于下:

序号	回目	所批白文	夹批(字数)	类型	后来刊本沿袭情况	
					李评本	西游证道书本
1	1	灵台方寸山	灵台方寸,心也(6字)	评	照录	照录
2	1	斜月三星洞	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一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24字)	评	照录	照录后加“一部西游,此是宗旨”。
3	2	尚未经水火锻炼	道家只有水火既济,才能得手。(12字)	评	照录	照录
4	41	燭得眼花雀乱	音秋(2字)	注(音)	照录	照录
5	47	倚山通路,傍岸临溪	此时入夜矣。(5字)	注	照录	无
6	48	“万里江山似玉团”诗句后	好雪(2字)	评注兼而有之	照录	无
7	64	“我等生来坚实”诗后	蔬言虜(虏)(3字)	注(音)	照录	无
8	100	虚劳致谢	此太宗御制之文,缀于《心经》之首。(13字)	注	照录	此乃太宗御制之文(下同)

对上表先行说明两点:

其一,表中八条夹批分属注、评两种类型,其中注四条,评三条,一条评注兼而有之,符合明代早期小说评点以注为主、以评为副的特征。其二,八条注在后世刊本的沿袭中可见出重要性:李评本全部原封不动予以照录,其他两本据世本翻刻的明刻删节本杨闽斋本和唐僧本(上表未列入)除有两条随白文已删外也予以照录,其间偶有个别字数调整。如杨闽斋本在第2条末句作“只言此心”,句末加一“中”字。《西游证道书》因是删节本,第5条、第6条、第7条因所批白文为韵文

遭删节,故告阙如。

现将八条注的具体情况按由注到评、由简而繁的顺序做逐一介绍如下:

第4、5、7、8 四条属注,其中第4、7 两条注音,第5、8 两条注义。第7条:第六十五回“木仙庵三藏谈诗”叙唐僧在荆棘林被树精摄至木仙庵,竹精拂云叟出场诗“我等生来坚实”中有“葛藤谜语,萝藦浑言”句,世本夹批“藦音虜(虏)”三字。查《汉语大词典》,藦音 luǒ,虏音 lǔ,夹批系单纯为生僻字注音,且所注精确无误(按古音的标准而言),似无深意。第4条亦注音。第四十一回“心猿遭火败”叙孙悟空与红孩儿怪相斗,被三昧真火“燭得眼花雀乱”,在“燭”字后夹批“音秋”两字。然情况比较复杂,其中可见出更多的信息内涵:一、“燭”字在此前已多次出现,如第七回叙猴头被老君“推入八卦炉中”,“将火扇起锻炼”,“把一双眼燭红了,弄做个老害病眼,故唤作‘火眼金睛’。”评注者皆失注,一直到此回才想起来注“音秋”,不无漫不经心之嫌,据此或可推猜测世本评注者不止一人,或非一次完成。二、“燭”字是名副其实的生难字,今人文本也有注:“燭(chǎo)——熏的意思。”^①该本以世本为底本校理,然无视世本夹批的存在,大约以为“音秋”有误。其实不然,个中当另有含义在。查《汉语大词典》,“燭”字有两解:一同“炒”,二作“熏”,其依据在《广韵》、《集韵》,联系书中描写,本句中作“熏”其意甚明,然上述辞书和音韵学著作皆未有注音“秋”者,确乎不知夹批竟出于何典。承华东师范大学陈璧耀先生赐函见告:“音秋”未必错注。不过它涉及古文字音韵问题——“精庄互谐”的语音现象。燭字是形声字,从火蜀声。蜀有二音:chú 和 zōu,而秋音 qi(o)ū 与 zōu 只有洪细音的不同,根据古代语言法则,两者应可相谐,所以世本有此“音秋”之注。当然这仅是汉语学家的一家之辞,究竟根据什么,尚待细考。但有一解,亦已可知人文本将其音注作“炒”,将其义注作“熏”,捏合“燭”字两解,未免简单化,且显得不伦不类。

第5、8 两条注旨在释义。第5条:第四十七回“圣僧夜阻通天水”叙唐僧师徒夜阻通天河,作者以一篇韵语描写河边一村庄,其中首联

^① 作者按:人文本评注者已注意到世本漏注的情况,正确地将该条注前移至第七回相关文下。

为“倚山通路,傍岸临溪。”夹批:“此时入夜矣。”只与书中“天色已晚”、“趁月光再走一程”等语印证呼应,点明时间而已。而第8条释义含义颇丰,尤可重视:第一百回“径回东土”叙唐僧取回真经后赴中土复命,唐太宗御制《圣教序》文以彰其功,并自谦曰“才愧珪璋,言惭金石”,“甚不足称,虚劳致谢”。此时有单行夹批:“此太宗御制之文,缀于《心经》之首”。《圣教序》全名《大唐三藏圣教序》,收入《全唐文》卷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云:“帝先许作经序,国务繁剧,未及措意。至此法师重启,方为染翰。少顷而成,名《大唐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笔自写,敕贯众经之首。”近人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圣教序”条云:“唐太宗制。述玄奘法师至西域求经译布中夏之事。后有高宗在青宫所作《述圣记》。末附玄奘所译《心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羲之草书以勒石,今按原文,记作于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至高宗咸亨四年始立碑。”又据今人张义壮引《辞海》、《辞源》介绍:太宗崩,高宗登极,将其序、记刻石立碑,且传世者有四:(1)《雁塔圣教序》,褚遂良正书,永徽四年(653)立,藏慈恩寺大雁塔下;(2)书法家王行满正书,显庆二年(657)立河南偃师(玄奘出生地);(3)《同州圣教序》,龙朔三年(663)立于同州(今陕西大荔);(4)《集王书圣教序》,唐长安弘福寺僧怀仁集王羲之行书。序、记二文后,又刻玄奘所译《心经》及润色、镌、勒诸人职官姓名,立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藏于西安碑林。四者中尤以《集王书圣教序》为墨宝极品^①。吴承恩(吴氏是否为《西游》一书作者,本文存疑;然为叙述之便,作者处遂用吴名,仍示存疑之意。下文同)巧用《圣教序》是《西游记》神来之笔,故而该条批注实为恰到好处,“此太宗御制之文”揭示史实,“缀于《心经》之首”有异于“敕贯众经之首”的史实,表现出吴承恩的艺术匠心,或系按西安碑林怀仁勒石集王羲之书而出。据此可知,世本所注夹批堪为恰到好处。又及,今人文本注释《圣教序》条谓“今所传刻的碑文,有褚遂良及集王羲之的书法两种”之说有误^②。

第1、2、3三条属评,与注音注义相比,具有更多文化的含量、更为

^① 参见张义壮《吴承恩巧用〈圣教序〉》,连云港市社科联编《西游记文化》2003年第4期。

^② 参见《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1194页注释。

突出的批评意识,毋庸置疑是世本夹批的核心和精华。其中前两条可合二为一: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叙美猴王为求长生之术,编筏渡海,寻仙求道,至西牛贺洲地界遇樵夫指点,言“神仙住处”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在此句中间和文末紧接两条双行夹批。第一条夹批:“灵台方寸,心也”;第二条夹批:“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一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两条互文见义,皆指“灵台方寸山”和“斜月三星洞”的隐寓之义为“心”;同时点明《西游记》的大旨在于修心养性。这一点最可注意:它一方面由文本“心性修持大道生”抽绎而出,符合美猴王求道及后来“收放心”历程的实际;另一方面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反映,体现着一定的时代精神。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应该说这两条批语比较贴切地揭示出《西游记》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文本的客观意趣。它出现在开宗明义第一回,对于人们认识《西游记》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李评本不仅照录这两条批语,而且复加注旁批云:“一部《西游记》,此是宗旨。”清代陈士斌《西游真诠》也直称心是“明大道之根源”,系作品“全部之统要”^①,由此足见其对后来《西游记》研究(评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3条夹批在第二回,文本情节与上回密切相关,叙须菩提祖师教孙悟空入定坐关一类修道基本功,其说至于长生则是“窑头土坯”,因为“就如那窑头上,造成砖瓦之坯,虽已成形,尚未经水火锻炼,一朝大雨滂沱,他必滥矣”。就在“尚未经水火锻炼”之后,有夹批云:“道家只有水火既济,才能得手。”这一条批语与上述第1、2条夹批有关,涉及修心养性的方法和途径:“水火锻炼”泛指各种修炼之法。但其最可注意者在于:第一次直接将作品与道家思想联系起来,或者说以道家思想来诠释《西游记》。查“水火既济”语出《周易》。“既济”为八八六十四卦之六十三卦,离下坎上(䷾),是一种吉卦。《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古人以事物相互交感象征变化、有前途,为吉卦。如泰(䷊)卦:地在上天在下,阳气上升、阴气下降象征着天和地的交感变化。“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②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解释既济(䷾)卦:“水在上

① 陈士斌《西游真诠》第一回悟一子回后评。

② 《国语》卷十《晋语四》。

火在下,水性润下,火性炎上,水上与火下的情势必然引起动荡,所以既济这一卦表示事情的顺利,有前途。”^①《周易》是中国古代文化元典,其八卦学说也当为儒学源头之一,但批注者却把它与道家联系起来。将水(坎☵)、火(离☲)两卦运用于修炼(道家外丹术),并以水火既济(调和)为原则,道家原有,但用这一思想来评注《西游记》则是批者的首创。对此,有两点说明:其一,夹批并非无的放矢,因为文中明确提到“水火锻炼”之术,往下追探至第七回,也有道教祖师太上老君在兜率宫以八卦炉炼丹的描写。同时还与陈元之《序》中的道教内容相吻合。其二,这一条批语原本在注释“窑头土坯”一词,或为批者信手拈来,但事实上对后世《西游记》研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可以说,它正是清代道家评本泛滥的最初源头。

第6条评、注兼而有之,然两方面作用都较简略。第四十八回“魔弄寒风飘大雪”叙通天河金鱼精灵感大王作法雪阻唐僧一行,在一首长篇咏雪诗上下阕之间,也即“万里青(人文本改作江)山似玉团”句后有夹批“好雪”两字,对这场鹅毛大雪及壮观雪景作了简约的评注。不过,人文本将其排入正文,颇令人不解。因为就该诗韵脚以及诗前曾两次出现“好雪”的语境来看,这里似不该出现“好雪”两字,当是评者批语无疑(查世本影印本果然如此),人文本整理者不及细察,遂将其误入正文^②。

纵观陈《序》与夹批,世本的价值已得到了充分的凸现:作为最早的评点本,它把《西游记》文本发展推入到正常的轨道,从而与《三国》、《水浒》、《金瓶》并驾齐驱,同为明代四大说部奇书;作为一个丰富的信息宝库,在作者、刊本等方面,为后人认识《西游记》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它对《西游记》主旨和审美特征的揭示,是《西游记》学术史上最原初的文本批评,并为部长达四百年波澜壮阔的学术史开启了序幕,开辟了方向,堪称第一块坚实的基石。在其中,我们应该看到:出版商世德堂主唐光禄、校订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9页。

② 这类情况在古典小说整理中常有,如为大家熟知的《红楼梦》第一回即有多条批语被移入正文。

者(及夹批者)华阳洞天主人、作《序》者陈元之三驾马车,在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各自的贡献,都值得我们赞赏和纪念。

二、李评本与《西游记》评点的成熟

明代《西游记》刊本从世本到它的两个翻刻本《新镌全像西游记传》(杨闽斋本,一作《鼎镌京本全像西游记》)和《唐三藏西游记》(唐僧本),从时间上至少有十年以上的跨度^①。或删削,或修补,在版本线索上有所演进;但作为小说评点,其发展却基本停滞。打破这一停滞局面,使《西游记》评点批评有所突进、并渐趋成熟的是出现于晚明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评本)。

李评本也曾遭长期湮没,在国内久已不传,唯海外有多种藏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内阁文库等均有藏,且以残本居多。至20世纪30年代,国人只有孙楷第、王古鲁、傅惜华三人有缘寓目^②,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介绍过它的基本面貌,但所记极为简略。80年代以来,学界先后披露我国已发现两部李评本全帙(局部有残缺),系解放后由政府出资从民间采购而得,现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河南省图书馆^③,河南省辖的中州书画社捷足先登,随即参校两书出版了影印本,并依原书尺寸,分两函十六册线装问世,人们始见其庐山真面目。目前介绍李评本概况的文字较多,尤以李时人《〈西游记〉版本叙略》一文所记最为详实,现将有关资料摘录如下: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不分卷,一百回。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图百叶,凡二百幅。图中署有四位刻工姓名,第三回“卓然”,第七回“君裕刘刻”,第七十一回“汤维新摹”,第八十二、八十五回“刘升伯刻”,第一百回“旌德郭卓然刻”。

① 唐僧本未署刊刻时间,杨闽斋本则改世本陈元之《序》所题“壬辰夏端四日”为“癸卯夏”,《孙目》推定壬辰为万历二十年(1592),癸卯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

② 据苏兴《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板刻》,载《文献》1986年第1期。

③ 参见蓼南《国内发现明刊〈李卓吾评西游记〉》,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邓平、式宁《失而复得倍觉亲——〈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简介》,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

卷首有署名“幔亭过客”的《题辞》，末有墨章二：“白宾”、“字令昭”。……《题辞》后有“凡例”五条，曰“批著眼处，批猴处，批趣处，总批处，碎批处。”正文有眉批、夹批及总评，字数最多的是回末总评。^①

不过，据笔者目验所知，李评本中的批语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本作眉批，而中州书画社影印本则为夹批，其文字内容大致相同，唯总数（条数和字数）略有差异。又，中州书画社影印本其实并无五条《凡例》，与李时人及《孙目》所记殊异。究其缘故，两者所据底本实非同一次刻版。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其时李评本在坊间颇为流行，曾经不断翻刻；而眉批与夹批的差异也体现出小说评点形式要素上的日益丰富。

作为小说评本，辨正李评本的评点者和刊刻时间极有必要。

关于评点者，李评本标明为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但已有多项资料显示其实系有人借托李贽之名。明人钱希言《戏瑕·臆籍》：“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并出叶手，何关于李。”又，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也说：“近日《续藏书》，貌李卓吾名，更是可笑。若卓老止于如此，亦不成其为卓吾也。又若《四书眼》、《四书评》，批点《西游记》、《水浒》等书，皆称李卓吾，其实乃叶文通笔也。”叶昼（字阳开，又字文通，江苏无锡人，生卒年不详，天启年间在世）之所以托名李贽自重，皆源于李贽在晚明思想界及文坛的巨大影响。陈继儒曾指出当时李卓吾文章及李评文献盛行的情况：“坊间诸家文集，多假卓吾先生选集之名，下至传奇小说，无不称为卓吾批阅也。”^②联系李贽推重小说的立场，以及其亲批《水浒传》的实际^③，虽然李评本并非出于李贽之手，但其思想与之有密切关系，当为必然。

① 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② 陈继儒《国朝名公诗选·李贽》。

③ 关于李贽批《水浒》，可参见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予病中草草视之。记万历壬辰（1592）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李贽自己也在《童心说》、《与焦弱侯》等文中谈及批点《水浒传》事。

关于李评本的刊刻时间。孙楷第据《五行山下定心猿》一图中岩石上细字“刘君裕刻”(实为“君裕刘刻”,按王古鲁说),推定为“昌启时刻书也”。刘君裕是昌启时的有名刻工,已有旁证。查历史年表,明光宗泰昌(1620)仅一年,熹宗天启(1621—1627)历七年,两朝合计凡八年。故有学者认为据此认定李评本刊刻于昌启年间“或可商榷”,其时间跨度未免过窄,如苏兴、李时人等指出:刘君裕既在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为姑苏龚绍(少)山梓的《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镌刻过插图(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又在崇祯间为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镌刻插图(见傅惜华《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五四五图及书眉的说明)和崇祯五年镌尚友堂刊本《二刻拍案惊奇》的图(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三及王古鲁关于二刻的说明),从事绘刻时间较长^①。其时孙楷第尚未发现李评本还有另一名刻工郭卓然,据日本长泽规矩也考证:曾由郭卓然任刻工的叶敬池本《醒世恒言》的刊刻年代不会早于天启七年(1627),其镌刻小说插图必然延至崇祯初年。综合以上材料,苏兴认为李评本刻书时间可“不妨前后稍稍拉长一点,定为万历末到崇祯的明末为宜”。现在学术界多认同苏兴所论:李评本的刊刻时间上限为明万历癸卯三十一年(1603),下限为崇祯年间(1628—1644),且以崇祯年间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将李评本纳入整个《西游记》的演化过程,并向上下两方面辐射考察,那么其小说评点批评和文本发展的双重价值便会凸现出来。一方面,《西游记》评点由李评本趋向成熟,并开启清代评点批评的繁盛;另一方面,由于李评本的评点采取逐回逐字“地毯式”搜寻的方式,发现了诸多早期刊本(主要是世本)的错讹衍漏,并进行了合理的订正和修补,从而成为继世本以来又一个《西游记》善本,故而在整个四百年《西游记》演化史和学术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先说小说评点史上的价值。

过去多有人将李评本视为“最早的《西游记》批评本”^②,这是不确

^① 参见苏兴《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板刻》,《文献》1986年第1期;李时人《〈西游记〉版本叙略》,《西游记考论》,第163页。

^② 参见蔡铁鹰、王国书《〈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简说》,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1辑,1986年。黄霖等著的《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也持这种看法。

切的。我在前文中已论及,刊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金陵世德堂本不仅是目前所知现存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刊本,同时也是最早的《西游记》评本。如果说,作为文本或有更早的旧本(或谓“前世本”)存在,那么作为评本,世本卷首《刊西游记序》显系专门为本次校刻而作,其中的夹批则由唐光禄(世德堂主)“益俾好事者”华阳洞天主人在订校(即“秩其卷目梓之”)的过程中随意写上的,故而无疑为《西游记》评点的发轫之笔。不过在我看来,李评本或许不是最早的《西游记》评本,却实际上开启了系统、全面评点《西游记》的先河,它是第一个趋向于成熟、完备的《西游记》评本。

从小说评点的形式特征上看,李评本已初备了成熟的形态。世本仅序跋、夹批两种形式要素(类型),李评本没有像杨闽斋本、唐僧本那样全文移录陈元之《刊西游记序》,而是以幔亭过客(袁于令)《西游记题辞》取而代之,同时又置有《凡例》^①,提挈评点的基本原则和美学意向——这使它独立于世本(或所谓“华阳洞天主人校”本)系统,而在明刻中自成一体。李评本全部照录了世本的夹批,但又新添了大量批语,并以眉批和夹批两种形式行世,极大地丰富了评点的形式和内容。而最富开创性的是它的回末总批,光字数即达近万言,所论或揭橥哲理大旨,或总结写作技巧,其文风或严峻沉郁,或幽默诙谐,体现了李评本独特的批评风格和极高的理论水准。总之,李评本的形式要素有序跋、有凡例(可相当于读法)、有眉批或夹批、有回末总批——只全书总评一项尚告阙如,在批评形态上已渐趋成熟了。

如上文曾论及,将李评本刊刻时间的下限定为崇祯间的明末,联系其时的小说评点,那么这一成熟形态的显现绝非偶然。我们知道,明清小说评点肇始于嘉靖元年(1522)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至晚明昌启、崇祯年间,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逐步走向繁荣和成熟: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出现了《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杭州容与堂刊本,万历四十七年(1619)出现了《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史传》,至崇祯十四年(1641)则有小说评点巨著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横空出世,步其后尘联翩而至者则有另两部评点杰作——“李笠

① 这里据孙楷第所见日本内阁文库和宫内省图书寮藏本。

翁先生著”《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及毛宗岗批评本《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小说评点已成蔚观。一般认为，上述李批容本《水浒传》、杨批《隋唐志传》在李评本之前，金批《水浒》和李批《金瓶梅》、毛批《三国演义》在李评本之后^①；处在这些优秀评点本之间的李评本水涨船高，达到相应的成熟高度是顺理成章的。

李评本的成熟形态直接开启了清代《西游记》评点的繁盛局面。一般而言，以《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为代表的《西游记》评点远不及金批《水浒》、毛批《三国》、张批《金瓶》以及脂批《石头记》（《红楼梦》）那样的思想艺术水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此也要作具体的分析：（1）这些清本批评者的批评意识发生了严重的误差，他们“以《易》、以《大学》、以仙道来解释《西游记》”，实在是“戴上了一副着色眼镜”，难免要“在大白天说梦话”^②。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艺术经验的总结和艺术规律的揭示，其中不乏关于文艺创作的大量真知灼见。（2）我们对清代评本的认识也远非足够得深入，全面否定也未免偏颇草率。事实上，“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特有的文学精神“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③，有清一代，《西游记》评本蜂起，作为文化和文学（创作和批评）现象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积淀，从中烙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人们（清人）对《西游记》的特殊认识，理应得到学术史的关注和重视。现单就小说评点的形态而言，《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都十分完备，比之金批、毛批、张（竹坡）批等并不逊色。如以新说本为例，其评点由序跋、总批、总评、目录赋、夹批、回前批、回后批组成，各类评点要素一应俱全。其他一些清评本也大致仿佛。可见，李评本承上启下，在发展世本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过渡到清代评本，起着纽带的作用。这些清本都不讳言受李评本的影响和对李评本的承接。证道书本就常常提及李评本。如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回前总批云：“此作者一片苦心，千古未经拈出^④。

① 参见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之《小说评点编年叙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③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④ 指五圣成真为大团圆，此回为小团圆，“此四众之来，或前或后，初若无意凑合，而其中实有铁板次序，井然不容紊乱”。

若非半非居士与余两人(指黄周星与汪澹漪)今日冷眼觑破,岂不被李卓吾、叶仲子辈瞞杀乎?”——这是对李评本的揶揄批评。又如第九十五回“假合形骸擒玉兔”回前总批曰:“玉兔抛球,欲招唐僧为偶,采元阳以成太乙上仙。然按空玄子云,天下之兔皆牝,惟月中兔为牡,故凡兔望月而孕。所以悟真诗云:‘坎配蟾宫却是男’。以月中兔属阳也。若然,则招偶采阳何为邪?尝见叶仲子之评此回曰:‘想是南风大作耳。’又曰:‘玉兔可谓弄童之雅号。’”——这是对李评本的认同和赞赏。

再说李评本在《西游记》文本演化中的地位。

由于世本是最早的《西游记》刊本,同为明刊本的李评本以它为底本翻刻,这是必然的^①。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显例是:李评本一如世本以及杨闽斋本、唐僧本这三个署名“华阳洞天主人校”本,没有唐僧出世故事,即八十一难的前四难,相对于后世通行本(清本),属于同一个明刻百回本系统^②。但在这一明刻百回本系统中,李评本又大异于世本等三个“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展现出独特的文本面貌,因而在《西游记》文本演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众所周知,世本是最接近吴承恩原著的本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曾指出它的种种善本“好处”:其一,世本百回本系全本,不仅情节完整,而且保存了大量“极具风趣的骈辞韵语”;其二,世本保存了丰富的方言,具有较高的语言价值。……但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一大弊端,即现存世本有少数回目严重残缺。50年代人文本以此世本为底本,并参校六种清代通行本(主要是《新说西游记》)对残缺处予以补足。殊不知,李评本一经重新发现,竟是完帙,且没有此等缺失。这就意味着:书业公记本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等清代笺评本极有可能得于李评本,或者至少是与李评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非我们通常理解的世德堂本,且存世版本较多。这样,李评本便自然成了校勘世本的一大参照本,80年代人文本再版时即宣告:“明崇祯年间刊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是接近世德堂本的较早刊本,初版(1955年)整理时未能见到。这次我们用此本作了校核,订正了一些

① 也有学者认为李评本或源于比世本更早的旧本或古本,这里姑且不论。

② 并非所有明刻本均无唐僧出世故事,据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明刻简本朱鼎臣编《鼎镌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朱本)就收有这个故事。

文字。”^①

又,世本草创初就,故多漫漶错讹。由于李评本系全面评点,阅读细致,所以能够发现其中的诸多错失并予以改正,而在这些修改中也能见出评改者独具匠心的批评意识和艺术创造。因此李评本比诸世本文字上更趋合理、洗练,结构和情节上更显完整、合理。试以两例来说明李评本的善本价值。

其一,世本正文缺失第十八回回目,由第十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服熊罴怪”直跳至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查世本总目,第十八回为“观音院唐僧脱险,高老庄大圣降魔”,但正文中回目脱落,致使第十七、十八两回夹缠不分。杨闽斋本、唐僧本照原样翻刻^②。李评本首先发现这一近乎荒唐的错误,并予以分割。其分割处在菩萨收服熊罴怪后的“有诗为证”,诗后即以“行者辞了菩萨,按落云头”一句开头转入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失袈裟故事。至《新说西游记》,又在该诗末句加上一句结语:“毕竟不知向后事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使文章结构更显合理。今人文本完全吸收了这一修改。

其二,《西游记》的情节主体是唐僧历难,世本唐僧出世故事阙如,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前四难只在唐僧出场诗“灵通本讳号金蝉”(七古)中予以简扼的交代,以后各难则逐一描述详尽。篇末由观音菩萨收验难簿,逐一细看,以印证唐僧一行功果。然而这份难簿与正文所叙次序不合,前后颠倒,紊杂不堪,有的历难故事在难簿中概括不准,眉目不清。对于这样的严重错失,杨闽斋本和唐僧本依然照单全收,一律沿袭。而李评本则予以了全部订正,或调整历难次序,或重划难数^③、另立难名,使簿子上八十一难与正文中历难本事前后一致,难名与历难故事两相吻合。清代的六种笺评本《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西游正旨》和《西游记评注》,无论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西游记》卷首。

② 这种情况在明清长篇章回小说中较为常见,如《红楼梦》第十七回、第十八回无论是回目,还是正文都混为一体。人文本《红楼梦》至今未分开。

③ 据郑振铎统计:《西游记》八十一难,历难故事四十一则,故每则故事所含若干难数并不整齐划一。

繁简,全部遵循李评本改正。对于八十一难故事的定型,不能不说,这是李评本的重大贡献。

另外,徐朔方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点校本所作《前言》中还指出了不少李评本对世本的勘误。著名的如:第十一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列举唐王驾下文武诸臣,既有徐茂公,又有李世勣,明显系一人妄分两人,李评本删去李世勣,改为张公谨。查阅李评本,此类无关宏旨的屑小改动当不在少数。不过,无论其对《西游记》文本作用的大小,李评本的善本价值都可见一斑,同时也处处张扬着它作为小说评点的批评意义和理论水准。

关于李评本对《西游记》的基本认识,还有评点者(叶昼)对作品思想、艺术的具体评析,可从其序文与各类批语两方面展开。

李评本卷首有署名“幔亭过客”的《西游记题辞》,末有墨章二:“白宾”,“字令昭”。孙楷第考证:“幔亭”、“令昭”、“白宾”皆袁于令字,故推定“则序作者乃于令也”^①。袁于令(1592—1674)初名晋,字韞玉,又字令昭、白宾,号鳧公,又号箴庵,别署幔亭仙史、幔亭歌者、幔亭过客、吉衣道人、吉衣主人、剑啸阁主人等。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明末贡生,入清后出仕官至湖北荆州知府。明清之际著名戏曲家、小说家,以传奇《西楼记》、小说《隋史遗文》影响较大^②。其小说理论方面的见解主要集中于这篇《题辞》及《隋史遗文序》。

序文写得十分精简,抄录于下:

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魔与佛力齐而位逼,丝发之微,关头匪细。摧挫之极,心性不惊。此《西游》之所以作也。说者以为寓五行生克之理,玄门修炼之道。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治?而必问玄机于玉匱,探禅蕴于龙藏,乃始有得于心也哉?至于文

①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7页。

② 袁于令生平可参阅王永健《袁于令传》,载《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章之妙,《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今日雕空凿影,画脂镂冰,呕心沥血,断数茎髭而不得惊人只字者;何如此书驾虚游刃,洋洋洒洒数百万言,而不复一境,不离本宗;日见闻之,厌饫不起;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也?故闲居之士,不可一日无此书。

这篇序文的理论价值有两点最可注意。

其一,竭力推介《西游记》。世本陈元之《序》也推崇《西游记》,但只站在为其辩护的立场上,认为“道在屎溺”,小说家言也有微言大义,在《西游记》“谬悠荒唐、无端涯涘”的文字中也隐寓着“作者之心傲世之意”,故“不可没也”。袁《序》则更进一步,由辩护而转为正面弘扬,指出《西游记》“文章之妙”,囊括三教,可“问玄机于玉匱,探禅蕴于龙藏”,读之有如经传,“日见闻之,厌饫不起;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以至于“何境不通?何道不洽”,最后竟为之高声呼吁:“闲居之士,不可一日无此书。”袁于令把《西游记》的地位推向极至,有力地推动了《西游记》文本的传布,并为清初李渔将其列入明四大奇书奠定了基础。这一看法与其自身的小说观念有关,也是其时文学思潮使然,是李贽、陈继儒、袁宏道、叶昼等人竭力提倡小说的反映,体现出明清之际小说观念嬗变演进的轨迹。袁《序》与世本陈《序》向被并视为《西游记》学术史上两篇最早的原始文献,然仅就对小说本质的认识,我以为唯袁《序》尤过之。

其二,深入揭示《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审美特征。《西游记》是明代神魔小说的开山之作,甫经问世,毁誉参半。在袁于令前后多有非议:或说“《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①;或称“《西游》专工虚妄,且妖艳靡曼之语,聒人耳目”^②;也有人直斥《西游记》“逞意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③。对于这些“虚妄谰虐”的“失真之病”,袁于令不以为然。早在《隋史遗文序》中他就提出“正史传信,小说贵幻”的观点;结合《西游记》描写鬼神的内容特点,他认为“幻”不是“失真之病”,而能“驾虚游刃”而“不离本宗”,它是小说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并从中概括为“极幻极真”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

① 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

② 戏笔主人《忠烈全传序》。

③ 姑苏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从而正确地描写了幻与真、真与理之间的辩证关系。比较《西游记题辞》与《隋史遗文序》，袁于令对《西游记》一类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逐步深化，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现了明清时代我国小说美学的深入。

至于叶昼的评点，所及芜陈，各色观点散见于全书，对其各类批语进行综合抽绎、爬罗清理，其中含有批评意义和学术价值者，见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心学阐发《西游记》的大旨。将一部《西游记》的宗旨归结为一个“心”字，滥觞于世本和谢肇淛。世本陈元之《序》（实为陈《序》引《旧叙》）：“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又第一回中夹批：“灵台方寸山，心也。”“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一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谢肇淛《五杂俎》中也说：“《西游记》曼衍虚诞，而且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旨“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叶昼承袭这一观点，并结合具体评点，进行了系统、完整的阐述、引申。他在第一回开宗明义，于全书引首诗最后两句“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处首度落笔，即加注旁批：“‘释厄’二字着眼，不能释厄，不如不读《西游》。”何为“释厄”？其回末总批有注释：“‘释厄传’，见此书，读之可释厄也。若读了《西游》，厄仍不能释，却不辜负了《西游记》么？何以言释厄？只是能解脱便是。又曰：‘高登王位将石字儿隐了’，盖猴言心之动也，石言心之刚也。”可见所谓“释厄”即指追求心灵“解脱”，由“心之动”而进入“心之刚”的境界。又在此回“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一语后照录世本评语，并再加旁批曰：“一部《西游记》，此是宗旨。”诚如他所说，至此已将《西游记》大旨“一一拈出，庶几不埋没了作者之意”。释厄，即是修心养性之道，不作此解便是“不知作者宗旨，定作戏论”^①。

这一心学思想由第一回“拈出”，在后文多有印证，并逐步强化。如第十三回唐僧出长安时与诸僧赠言惜别：“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叶昼再次加夹批曰：“宗旨”，并于回后总批中断言：“一部

^① 对于释厄两字，人文本有注：“释指唐僧，厄即灾难，即如本书所载唐僧于取经途中所遭遇的厄难。”当为一解，然不及李评贴近文义。

《西游记》，只是如此，别无些子剩却矣。”可谓一言以蔽之。又如第十四回叙孙悟空出五行山保唐僧取经，打死六贼试棒，李评本总批曰：“请问今世人还是打死六贼的，还是六贼打死的？”^①意犹未尽之际又连续批曰：“‘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八个字已分别说出。”“着眼，着眼，方不枉读了《西游记》。”“人当着眼，不然何异痴人说梦。”李评本以心论《西游》可谓一以贯之，不遗余力。

其二，《西游记》是超现实的神魔小说，然叶昼认为“游戏之中，暗传密谛”^②，常常借题发挥，着眼于现实，并以尖锐的文辞揭示出作品的揶揄刺世的寓意。

《西游记》中有四大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北俱芦洲，其中南赡部洲多影射中华现实（东土大唐）。第二回叙孙悟空了道后回花果山，向众猴讲述求道至南赡部洲的经历：“经至南赡部洲，学成人像，着此衣，穿此履，摆摆摇摇，云游了八九年余，更不曾有道。”叶昼即在此批曰：“原来南赡部洲无道。”又在此回总批中借题发挥：“篇中讽刺南赡部洲人极毒”，“南赡部洲人只会着衣穿履，摇摆而已，并未尝有一个为道者也”。更有甚者，作品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叙如来造经，要拯救苦难和愚昧的人类，曾历数人世“贪淫乐祸，多杀多争”之种种罪恶，对此叶昼甚有感触，在总批中写道：“南赡部洲，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逼真佛语也。然此犹从未取经之前言也。今大藏真经俨然在也，何反从凶场中多起干戈，恶海内猛翻波浪耶？真可为之痛哭流涕者矣。”小说评点极具评者的主观情感倾向和批判意识，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在李评本中，这一类愤世嫉俗、直刺时弊的评论所在多有，充分表现出“以痛哭流涕之心，为嘻笑怒骂之语”、“以谑语而为正言”的批评精神^③。

其三，对《西游记》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经验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和总结。在人物性格方面，叶昼极有心得，他在《凡例》中特置“批猴处”、“批趣处”。“批猴处”着意于行者的“顽皮”性格，“批趣处”则重点在揭示八戒之“呆状可笑”和沙僧的“冷语可味”。特别是对孙悟空

① 六贼为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泛指人的各种欲望。

② 李评本第十九回总批。

③ 《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的言语行状,李评常以“猴”一字中的,入木三分,叶昼认为悟空之妙,全在猴相猴性,“出人意料”,如果“别寻一字以模拟之,终不若本色猴字为妙”^①。在故事情节方面,叶昼强调合理性和新颖性。对于精彩合理的情节安排和艺术描绘,李评常以“好照应”、“好点缀”、“妙不可言”之类称道之。如对于第十一回所叙相良、刘全故事,叶昼大加称赞说:“此回最为奇幻,刘全李翠莲,相公相婆,俱从笔端幻出,殊为骇异,而贯串傅弈、萧瑀事尤为妙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六回孙悟空与二郎神相斗变化时他以夹批“匪夷所思”予以盛誉,但在第六十一回再叙悟空与牛魔王斗法,叶昼则以夹批提出了批评:“此等处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只管如此,便可厌矣。”对于相同的变化斗法描写,叶昼却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其标准就是强调情节的新颖性。后来,金圣叹反其意而用之,以为“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②。如果金圣叹的观点可称之为“特犯法”(正犯),那么,叶昼的观点则可称为“避犯法”。由“避犯”到“特犯”(特犯而不犯)既表示出对情节处理的不同原则,同时也可显出对情节本质认识的进步。

对于《西游记》的神幻特征,叶昼的看法与袁于令《题辞》完全一致,在评语中表现出全面肯定和由衷心仪的态度,赞美之辞俯拾即是。举其要旨者:“趣甚,妙甚!何物文人,思笔变幻乃尔!”(第七回夹批)“此等想头,奇甚”、“种种想头,出人意表,大作手也。”(第十一回夹批)“唐僧化虎,白马变龙,都是文心极美极妙,文笔极奇幻处。”(第三十回总批)“说到装天处,令人绝倒,何物文人,奇幻至此!大抵文人之笔,无所不至,然到装天葫芦亦观止矣。”(第三十三回总批)“以幻为真,奇绝,奇绝!”(第七十一回夹批)“天下文章,幻至此极矣。”(第七十五回夹批)“真是活佛出世,方能说此妙语。”(第九十三回总批)……李评本的这些赞辞较诸以往任何评论,更清晰地揭示出《西游记》的艺术审美特征,更深入到《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本质。它的意义不仅仅在对《西游记》一书进行珍赏鉴析,而且以其批评实践和理论积

① 《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淀有力地推动了后世神魔小说的发展。

综上所述,李评本作为《西游记》文本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具有无可替代的善本价值;正是它的重新发现,弥补了由早期刊本(世本)到清代通行本缺失的一环,成为与世本互勘的重要古本。作为小说评点本,它标志着《西游记》评点趋向成熟,从此开启了对《西游记》的全面、系统的评点;其自觉的批评意识、宏富的理论内容,对《西游记》思想和艺术的真知灼见,确立了它在整个《西游记》学术史和小说评点史上的特殊地位。黄霖等新著的《中国小说研究史》称其为“明人研究《西游记》的最佳总结”^①,堪为确当之论。该书对李评本的理论价值论述较详,可供参考。

^① 黄霖等《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第三章 清代《西游记》评点

一、《西游证道书》：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的主潮

《西游证道书》是清代第一部《西游记》评点本。相对于世本、李评本等明代全本,《西游证道书》是一部节本,但正是这一文本形式上的变化使它成为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和评点批评中的标志性成果^①,并事实上由此代替全本而成为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的主潮。因为《证道书》以后,清代曾相继梓刻过五种《西游记》,即《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西游记评注》。它们与《西游证道书》一样,不但都是笺评本,而且除《新说西游记》外,其他四种笺评本的白文也都是节本,而且很明显,它们都与《证道书》本有着血缘关系。孙楷第针对清代各本流行之证道说及第九回唐僧出世故事断言它们“盖皆从此本出”^②,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胪列明清两代《西游记》版本次序,以《西游证道书》为清代各本母体,各通行本皆由其衍生而来^③。其实,明代的百回本中,除世本、李评本以外,还有两种节本,即杨闽斋本和《唐僧西游记》;但是,这两种明代节本都不流行,与《证道书》本和清代其他节本也无渊源。相比之下,两种明节本刊行后为时不久便被湮没,唯《西游证道书》及其翻刻本《西游真诠》一枝独秀。究其原因,虽然同为节本,明节本主要从牟利着眼,只是简单地删节字数,压缩篇幅^④;《西游证道书》则注重对原本

① 当然,《西游证道书》的评本价值更主要体现在它的评点内容,对此后文多有详述。

②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8页。

③ 孙、郑两人的论断未必尽然,因为清代《西游记》演化甚为复杂,并非完全直接源于《西游证道书》;有的本子如《新说西游记》尚有另外的源头。本文对此暂且不论。

④ 杨闽斋本和唐僧本作为明节本阅读价值不大,但在版本研究中具有特殊的价值。

《西游记》进行思想发掘和艺术修补,进行了一系列符合艺术规律的创造性删改,存其精华,去其枝蔓,因而引起后刻者的青睐,乐意以此作为底本来进行翻刻。这更加确定了《西游证道书》在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中的主流地位。

另,《西游记》论坛一般将通行本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儿复仇报本”即被称为“唐僧出世”故事者视为清代文本的重要标志,而这无疑又以《西游证道书》肇其始。众所周知,凡明本《西游记》(百回本)包括以“唐僧西游记”命名的唐僧本皆不载唐僧出世故事,《西游证道书》则宣称:这一则唐僧出世故事出于一部叫大略堂《西游记》或《释厄传》的古本,并以不载这一故事的明刊《西游记》为“俗本”。这一举动,在清代《西游记》论坛反响强烈;人们不但信以为真,而且诧为异事,以致此后各种《西游记》版本竟纷纷加以沿袭,成为清代《西游记》与明本不同的一大特征。最为令人惊异的是,清代唯一的一部全本即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的白文,在以明代全本作为底本翻刻时,却又别出心裁地采用这则唐僧出世故事,插入孙悟空大闹三界之后,作为第九回,而将全本中原来的第九回及其后的第十至第十二回等四回文字,重新调整分割成第十至第十二回三回,结果便成为清代《西游记》版本中少见的异版,扑朔迷离,使后代的《西游记》研究者对其真面目至今疑团犹存。受其影响,如建国后人文本系按明本校刻,本无唐僧出世故事,但20世纪50年代初版时竟将其收了进去,并排入正文,作为第九回,而将原第九回作为第十回往后调整;而在80年代重校时,则又把这则故事拉出正文之外,排在第八回后作为“附录”,并恢复了明本原貌。至于其他各种当代出版的《西游记》,或入正文,或作附录,五花八门,各行其道。不解其故者简直茫无头绪,而追根溯源,实际上都是受《西游证道书》的影响。其实,《证道书》本这个唐僧出世故事,并非从古本移植,而是据明代的简本朱鼎臣编《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①(朱本)卷四改编而成。号称出自大略堂古本,不过是借古以自重。但是,百回本《西游记》中出现唐僧出世故事,据目前版本资料,实在以《证道书》本为始作俑者,不管贬之或褒之,信其真或疑其

^① 朱鼎臣编辑的《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过去习惯称作《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现据该书封面所题定名。

伪,《西游记》版本史上的这一现象,始终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总是事实;而后世印行《西游记》,对此总不愿割舍,也足见其弥足珍贵,影响至远至大,这也无疑总是事实。

以上所述,总体上勾勒出《西游证道书》的基本格局和特异面貌,介绍了它对后代《西游记》版本刊刻的深刻影响。我们不妨说:作为清代第一个《西游记》评本,《西游证道书》基本上确定了后世《西游记》文本发展的基础和方向,如果没有《西游证道书》,不但清代《西游记》的版本演变史会完全改观,甚至还将影响现代《西游记》的面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证道书》流行约三十年以后,由于它的翻刻本《西游真诠》的崛起,其原本随之失去流传的优势,直至最终湮没不传^①。20世纪30年代初,孙楷第扬帆东渡赴日本访书,在内阁文库发现《汪澹漪评古本西游证道书》一部,“颇可惊叹”,并随即在1932年出版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予以详细记录。据《孙目》介绍,《西游证道书》的基本面貌如下:

汪澹漪评古本西游证道书一百回(内阁文库)

清初原刊本。目录题“钟山黄太鸿笑苍子西陵汪象旭澹漪子同笺评”;正文题“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正”。板匡高营造尺六寸四分,阔三寸二分。前附“仙诗绣像”共十七幅。右图左诗,刻绘均极工细。第一幅“悟彻菩提真妙理”图,左下方有小字曰“念翼”。按“念翼”当即胡念翊,乃有名绘手,笠翁“无声戏”原本图,即其所绘。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六字。板心上顶格题“证道书”,中题“古本西游第几回”,下题“螭寄”。明本《西游》,皆不言撰人,如陈元之《序》,且以为不知何人所作。自汪象旭此书,始以为丘长春作,“证道”之说亦自此书倡之。首冠以虞集序,次《丘长春真君传》(原注出《广列仙传》及《道书全集》)。次《佘(玄)奘取经事迹》(原注出《独异志》,《唐新语》出《谭宾录》及《两京记》。)第九回载陈光蕊事,目为“陈光

^① 《西游证道书》原本何时佚去,至今未见有人推究。其间尚有乾隆十五年(1750)“蔡元放重订”之《增评证道奇书》(题“圣叹外书,西陵澹漪子评”)继出。又,《西游真诠》虽参照过明本,但主要据《西游证道书》翻刻,所以这一变化,其实并不影响以上我对《证道书》作为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主潮的判断。

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今通行本即沿用之。其第十、第十一二回目,亦皆与今本同。后来评注本,如陈士斌《真诠》,张书绅《新说》,刘一明《原旨》,无不有第九回之陈光蕊事,盖皆从此本出,而增刻劣本之载虞集序者,胪列评人,而评语至简略,实亦是本耳。

考这一“记录”,复参验原本(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本)版本事实,它揭示出一系列有关该本的学术命题,有的属于带有确定性的版本现象,有的则涉及评点批评的深层次学理问题,为我们评价它的评点价值提供了必要和合理的线索。究其要者有:一、关于《西游证道书》的评注者;二、关于虞集《序》(实为《西游记原序》);三、关于邱作说和证道说;四、关于第九回唐僧出世故事。

其中一、二两条属于刊本的基本要素,可先行简略说明于下;而三、四两条则涉及小说评点和《西游记》研究的学术问题,容在后面作充分展开。

关于《西游证道书》评注者,原刊本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表述,或谓“钟山黄太鸿笑苍子西陵汪象旭澹漪子同笺评”,或谓“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或谓“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证”,然大抵不出汪澹漪、黄周星两人。那么评注者果为何人?过去一般以为是汪澹漪,近来黄永年提出当为黄周星:“这个《西游证道书》里的评点、包括每回开头用‘澹漪子曰’名义的评语,实际上都出于黄周星之手而不是汪象旭(即汪澹漪)之所能写得出。”^①其所据有两:一、《西游证道书》一百回尾有小注:“笑苍子与澹漪子订交有年,未尝共事笔墨也。单阏维夏,始邀过蝸寄,出大略堂《西游》古本,属其评正。”二、黄太鸿(即黄周星),生平甚详,其知名度大于汪澹漪,并多有其涉足小说创作、评点的记载。如吕晚村《寄黄九烟》诗:“闻道新修谐俗书,文章买卖价何如?”且有自注:“时在杭,为坊人著稗官书。”黄永年断定:“这谐俗的稗官书明明就是《西游证道书》。”

笔者认为:黄永年提供的材料值得注意,但结论并不充分,汪澹漪对《西游证道书》的著作权尚不能被剥夺。因为该本几处重要的位置

^① 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下同。

都明确标有汪氏姓名,如书名题“汪澹漪评古本《西游证道书》”,正文中又题“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板心中题有“蝸寄”两字,据《济阴纲目》汪氏诠释本《序》及《尺牋新语广编·凡例》,知“蝸寄”系汪澹漪书室名。又,在全书夹批中,曾多次提及所谓大略堂古本,与黄永年所举“(黄周星)始邀过蝸寄,出大略堂《西游》古本”侔合。就此问题,谭帆《小说评点编年叙录》“《西游证道书》一百回”条说:“此书评点一般归于汪澹漪名下,但从所列《跋》文,则又似出自笑苍子(黄周星)手笔,实际应是两人合作完成的。”^①王裕明则于最近著文披露了一些新材料,进一步论述《西游证道书》评注者当为黄周星^②,皆可资参考。

关于虞集《西游记原序》。

由《西游证道书》披露的虞《序》,是值得后人诧异的。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临川崇仁(今属江西)人,系南宋抗金名相虞允文后人,列元代中前期诗文“四大家”之首。这篇《西游记原序》,尾署“天历己巳”即元文宗天历年间(1328—1329),比世本陈元之《序》(1592)早二百六十余年,距《证道书》刊刻的康熙初期^③,则间隔三百三十余年,其真实性颇值得怀疑。据我所知,最早指认其为后人伪托的是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西游记〉的明刻本——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一》^④,并为海内外《西游记》论坛普遍认同。考这篇序文,总括学者们的意见,“伪托”虞集的破绽颇为明显。

其一,该《序》不见于《道园集》(即虞集《道园学古录》)。鲁迅当时已怀疑该序非为《西游记》小说而作,谓“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⑤。但正如美国汉学家浦安迪教授指出,鲁迅只看到它所序的是另一部同名的《西游记》,而并没有意识到“这篇序文本身就是赝品”^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不仅《道园集》没有这篇《序》,而且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中

①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

② 王裕明《〈西游证道书〉成书年代考》,《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4期。

③ 关于《西游证道书》的刊刻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般定为康熙朝前期,黄永年推定为康熙三、四年(1664—1665)。

④ 载香港《新亚学报》1964年第6卷第2期。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文抄》也说“从虞集《道园集》取《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

⑥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

也没有这篇《序》，因此结论只能是由后人伪托。或为《西游证道书》笺评人汪澹漪（包括黄周星）辈伪作也未可知。

其二，虞《序》尾署：“天历己巳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不符虞集身份，显系作伪者百密一疏，于无意中露出的破绽。

查虞集生平，《元史》本传记载他于泰定（1324—1327）初“拜翰林直学士”，文宗（1328—1331）朝“除奎章阁侍书学士”，而未任翰林学士。据《元史·百官志》可知，翰林直学士为从三品，翰林院侍书学士为从二品，而翰林学士为正二品。虞集才识卓越，但由于他的“南人”身份，未能进入朝廷高官阶秩，与当时元廷在政治上奉行民族歧视政策，实行所谓“四等人制”（即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种等级）的现状相符。“天历己巳”虞集尚任京官，任翰林直学士奉政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兼国子祭酒，与“翰林学士”尚差几个等级^①，是断不会将自己的官阶品秩搞错的。何况虞集在朝备受蒙古官员的倾轧，忍气吞声，也断不敢自高身份，虚报官位、品秩，因为这对从政者特别是身为末等“南人”的虞集是十分敏感的问题。事实上，在虞集诗文中多署“直学士”，“侍书学士”、“侍讲学士”，以及“太史”、“史臣”、“博士”等官职，而从未署过所谓的“翰林学士”。

又，据《元史》虞集本传记载：“（虞集）早岁与弟槃同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故虞集诗文中多署“邵庵”，但自出仕之后，特别是任职京官之后就不宜再署了，像《西游记原序》中一方面署有“翰林学士”的官名，一方面又署有表达早年高洁之志的“邵庵”，实在是不伦不类，令人不可思议。

《西游证道书》作为清代第一部《西游记》评点本，其价值和影响（正面和负面）都是巨大的。在思想倾向上，它首倡邱作说和证道说，是清代盛行之“谈禅”、“证道”一类观点的滥觞；在艺术上，它注重于对作品进行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修补，尤其是“自谓得古本，增撰第九回陈光蕊事，自此遂为《西游记》定本”^②。

① 据李时人考证，参见其《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

②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第81页。

关于邱作说和证道说。

《西游记》自明中叶问世以来,作者佚名,明刊世本陈元之《序》谓“不知其何人所为。”至《西游证道书》约百年之后,汪澹漪首次明确将其归入邱处机名下,他在伪托的元虞集《西游记原序》中说:

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浹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夫取经不始于唐也,自汉迄梁咸有之,而唐之玄奘为尤著。其所为跋涉险远,经历艰难,太宗圣教一序言之已悉,无俟后人赘陈。而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

关于邱处机作《西游记》一说,鲁迅曾分析说:“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而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拨也。”^①现在细究虞《序》,看来问题并非这样简单:汪澹漪力倡邱作说,并非误将《西游记》(无名氏小说)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以为一书”,因为其序文中明说“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对于唐玄奘取经途中“跋涉险远,经历艰难”,太宗皇帝御制《圣教序》表彰圣功的事迹了然于胸,同时还提出了关于《西游记》“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的看法,凡此种种都说明他力倡邱作说是有意为之。

邱处机(1148—1227),原作丘处机,讳孔子改。金元间道士,字通密,号长春子。道教全真教七真之一,龙门派祖师。元太祖成吉思汗曾召见于雪山,赐号神仙,爵“太宗师”,总领天下道教。成为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道教人物。死后遗骨葬于北京白云观。

从《西游证道书》的编排看,汪澹漪力倡邱作说可谓煞费苦心、殚精竭虑。他先在卷首虞《序》中点出邱作说的主旨,后接《长春真君传》,宣扬其赴雪山觐见元太祖“一言止杀”的仁德功绩,又接《玄奘取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经事迹》，介绍唐僧取经伟业。三者连环互证，给读者的感觉是无可置疑。果然，从此以后，人皆谓邱处机作《西游》，《西游真诠》以下各本皆题“丘长春真君作”。甚至于连力倡儒学、攘斥佛道的张书绅《新说西游记》也竟说什么“忆邱长春，亦一时之大儒贤者，乃不过托足于方外”，其儒者宅心仁厚，“念人心之不古，身处方外，不能有补，故借此传奇，实寓《春秋》之大义，诛其隐微，引以大道”^①云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影响之大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力倡邱处机作《西游记》的目的是为了鼓吹证道说。如《西游证道书》虽然主张“仙佛同源”，但其主要倾向还集中在证道。虞《序》因借于元人口吻，不外“仙佛同源”及“收放心”之类老调，证道意味不浓，但在其他评点文字中则是竭尽全力，不厌其烦了。本书《仙诗绣像》第一幅“悟彻菩提真妙理”诗云：“学仙须是学天仙，唯存金丹最的端。”第十六幅“功成行满见真如”诗云：“万卷仙经语总同，金丹只此是根宗。”在第一回回评中说得很明白：“彼一百回中，自取经以至正果，首尾佛家之事。而其间心猿意马、木母金公、婴儿姹女、夹脊双关等类，又无一非玄门妙谛。”在第二回回评中，汪澹漪明确把《西游记》视为道经，“即以当《道藏》全书亦可”。针对“或问”：为何老君八卦炉制服不了孙猴，如来却能定猿？汪澹漪以五行金丹学说解释：心猿属火，八卦炉锻炼是“以火济火，二火互煽，弥见其燥酷决裂而已，又安望其定乎”？而如来以五指化为五行山，“五行俱全”，心猿“则不期定而定”。所以他认为“一部《西游》，无处不暗合五行，金丹大旨”。他不仅把传授孙悟空长生之法的须菩提祖师（历史上为释迦牟尼大弟子）认定为道仙，为了宣扬证道说，甚至连佛祖如来也穿上了道袍，改造成为法力高于太上老君的道祖了。

汪澹漪之力倡证道说，虽有诸多原因，但其自身的崇道立场是决定因素。据其所著《吕祖全传》叶生《序》：“澹漪子为谁，予友汪淇右子也，号澹漪，其受教善师之门，道名象旭云。”又该书前自题：“康熙元年初夏西陵奉道弟子汪象旭右子氏书于蝓寄。”可知他是道门中人，且崇道心甚，对自吕祖至邱祖历代道家祖师崇敬备至，著《吕祖全传》，笺

^①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

释黄老著作《济阴纲目》，以及将《西游记》笺评为《西游证道书》都是其崇仙倡道的结果。

在众多清代《西游记》评本中，对于作品艺术方面的整理、修补，《西游证道书》是最为突出的。理应予以充分的总结。

其一，作为节本压缩篇幅的基本手段，它大刀阔斧地删削掉全本中绝大部分的诗词偈语和几近全部的复述性文字，以使作品叙事过程干脆利落，情节发展流畅明快。

《西游记》全本中的诗词偈语多达七百余篇，每篇少则四句八行，多则数十上百句。文字总数十分庞大。韵散夹杂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共同特征，但《西游记》偈语诗词之多远超过《三国》、《水浒》等其他作品，则与其浓郁的宗教性内容有关。实际上，从艺术的自身与发展来看，这也是民间说话艺术的残留，更可视作为散文体叙事性艺术样式的小说在发展初创时期与诗词辞赋等韵文体样式混夹不清现象的残留，本不符合小说艺术的规律。所以，《西游证道书》短跋中竟责之曰：“有意续鳧就鹤，半用俚词填凑。”鉴于这样的艺术认识，《证道书》本大加删节，只保留了二百余首，竟删去七成之多。而且保留的诗词中也是多半由长诗改为短章，或只保留了两句一对。如第四回猴王初上天庭，至南天门时入里观看，明本用 463 字的长诗来描写其神秘恢弘的气象，《证道书》本只采用其中四句改成一绝。如第十七回行者来到黑风山，明本用了 84 字一篇韵语来描写其险峻奇峭，《证道书》本只采用前后四句：“万壑争流，千崖竞秀。鸟鸣人不见，花落树犹香。”又如第六十回唐僧师徒到金光寺，明本一篇韵语共 85 字描写其颓败萧瑟景象，《证道书》本却只以一对来作概括性形容：“遍地落花无客过，一庭啼鸟少僧来”，而且唯前句来自原诗，后句则是对“讲座幽然僧不见，禅堂静矣鸟常逢”的改写。当然，经过删节后保留的诗篇并非一定都是佳作，但其去芜存菁、精益求精的艺术准则是显而易见的。如上述“万壑争流，千崖竞秀”一对为顾恺之游会稽名胜后所作佳句，历来脍炙人口，移植过来描绘山势尤见神韵；形容金光寺的一对虽系自创，但也是俚对工整，意境鲜明，算得上是“绝妙好辞”。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大概与证道观颇有关联者多有照录，而只作情节因素重复出现的

则遽加删削。这与其“证道”意识相关,我们今日自不必苛求。总之,在《西游证道书》,韵散夹杂的现象大大减少,文字顿显简略紧凑。据初步计算,全书完全没有诗词的有二十二回,只有一篇诗词的有二十七回;而在其他各回收录的也多是短章,长篇辞赋可谓绝无仅有。当然,像第六十四回“木仙庵三藏谈诗”(其实为谈禅)和第九十八回“功成行满见真如”那种特定情景中,诗词穿插较多,篇幅较长,也不足为奇。关于《证道书》本大加删节诗篇的情况,也有学者不以为然,认为这些诗词颇为“风趣”,一旦删去,“最可慨惜”,并对汪澹漪“乱加斫除”的“硬心肠”深表诧异^①。“慨惜”或许会有,但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则享受到简洁明快的惬意。事实上,这么多的诗词辞赋夹杂其中,淡化了作品的矛盾冲突和情节进展,有些纯粹是游离于情节之外,形容风花雪月的套话,实在是欣赏过程中的一种阻隔和累赘。它们的大量产生,源于说书艺人或为吸引观众,或为卖弄学问的噱头,现在转化为以阅读为主的小说形式,自然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证道书》本予以果断删削,实际上是《西游记》越来越脱离民间文学的不自觉性,最终成为独立自觉文人的创作的表现,功大于过,理应肯定。

另外,经过细致校订,基本上纠正了全本中的诸多错失和缺陷,有效地提高了《西游记》作为文学文本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明本《西游记》中的错误和缺陷是不少的。这也可以理解,《西游记》是在民间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无数无名艺人的反复修改,加上结构宏大,长达六十余万言,因此,存在大量接榫不当,缺少呼应以及缺漏衍乙之类的错误。世本刊刻在先,此类错误更多一些,李评本据世本翻刻,改正了一些差错,也沿袭了一些差错,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差错。《证道书》据李评本翻刻,并参考了世本,改正了许多差错。不妨说,除个别深层次的情节错误未能纠正,照样沿袭外,其他的均已改正。显著的如第一百回唐僧取经回长安,向唐王递交通关牒文,牒文上印有国名单,包括世本在内的三种华阳洞天主人所校的明本有误。即狮驼国、凤仙郡、金平府未曾用印,且凤仙郡、金平府未必能称国,牒文却“榜上有名”,天竺国用过印牒文上却没名。

^① 见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对此,李评本有所发现,有所改正,即删掉了狮驼国,其他未改。《证道书》本则全部改正,与正文所述取经过程完全相符。改得最完善和绵密的当推第七十四回关于小钻风的差错。狮驼山巡山小妖一班四十人,都称小钻风。孙行者探山遇一个小钻风,自变小钻风,让此小钻风带至他那一班人处,提出几个问题让小妖回答。在明本中,回答问题的只笼统称小钻风,已经搞不清是指路遇小妖,还是他那些同伙中人;是一个小钻风回答,还是同班中的几个小妖回答;最后孙行者一棒将小钻风打死,显然是仅指先前遇见的小妖,则似乎对其他三十九名小妖撇而不顾;接着又自变小钻风去探狮驼洞,失误甚多。《证道书》本则改为让几个小钻风来分别回答问题,最后删节了一些文字后,增加了如下一句:“你们说的果然不差”,“你原着先来的这个跟我见大王回话去”,将先见的小妖与其同伙分开,然后在半路上打死,自变小钻风去探妖窟。妥帖恰当,毫无舛错。又如明本有不少衍文:第七十五回孙行者被装入阴阳瓶中:“幸得他有本事,坐在中间,捻着避火诀,坐在中间,全然不惧”;第二回猴王道:“我当年别汝等,随波逐流,飘过东洋大海,到西牛贺洲地界,径至南瞻部洲……更不曾有道。又渡西洋大海,至西牛贺洲地界,访问多时,幸遇一老祖。”两例中,前例衍“坐在中间”,后例衍“西牛贺洲地界”,《证道书》尽皆删却。有时候,仅仅是一字之改,或使作品确切无讹,或者境界全出。如第六十六回,弥勒佛祖降临,“一朵彩云坠地,满山头大雨缤纷”;第六十五回,“二十八宿惊张,五百揭谛发竖”。《证道书》本将前者改为“满山头花雨缤纷”,将后者改成“五方揭谛发竖”,将前后互读对照,高下立判。明本中的有些文字,简直颠倒错乱,不知所云,如第九十三回:“这时,寺中若大听说到了取经僧人,东土大唐,说话寺中若小……一一都来参见”;《证道书》本改为“话说这时,寺中听说到了东土大唐取经僧人……”。诸如此类,可见《证道书》本的删定者是何等的认真仔细,精雕细琢。这是其对原本文字的全面修订,使得《西游记》在艺术上有了明显的提高。

其二,《证道书》本《西游记》的最大贡献无疑当推增补唐僧出世故事,有效地加强了孙悟空大闹三界与唐僧西天取经“两截子”的衔接,增加了全书情节的完整性和结构的严密性,有使作品成为完璧

之功。

《西游记》在情节和结构上的缺陷一直被后世诟病。对此汪澹漪在《西游证道书》第九回回评中说：“童时见俗本删此回，杳不知唐僧家世履历，浑疑与花果山顶石卵相同。而九十九回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载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令读者茫然不解其故。殊恨作者之疏谬。”应该说，汪澹漪所论当为事实。在明本中，从孙悟空大闹三界到西天取经的过渡很不自然，特别是关于唐僧出世故事阙如。查阅原本，只是在第十一回选举高僧做水陆大会选中唐僧时，用“灵通本讳号金蝉”等24句一首诗话来交代出身事，其诗曰：

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摩，降生世俗遭罗网。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临恶党。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出身命犯落江星（错字，今人文改作江——引者注）星，顺水随波逐浪泅。海岛金山有大缘，迁安和尚将他养。年方十八认亲娘，特赴京都求外长。总管开山调大军，洪州剿寇诛凶党。状元光蕊脱天罗，子父相逢堪贺奖。复谒当今受主恩，灵烟阁上贤名响。恩官不受愿为僧，洪福沙门将道访。小字江流古佛儿，法名唤作陈玄奘。

显然，由于过于简约凝练，读者决无法明了有关唐僧出世的具体情况：如仅据诗中“未出之前临恶党”，怎能悟出是指他父母上任途中为舟子所害？“出身命犯落江星”，又怎知是其母为保其性命，断趾血书，木板抛江？很显然，正因为缺乏对唐僧身世的具体描写，致使作品后文许多地方失却呼应，衔接突兀不准。如既然“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官宦子弟的陈玄奘为何要自幼植锡为僧？在第九十三回写到大天竺国“高结彩楼，抛打绣球”，为公主招驸马时，唐僧禁不住感慨：“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为公主招驸马时，遇婚姻结了夫妻”，似乎突然跳出。至于如来难簿所载九九八十一难，其余各难都有情节印证，独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阙如，令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不能不说是作品的一大“疏谬”。

《证道书》本《西游记》增补这一则唐僧出世故事，其目的即是弥补这一“疏谬”。或有人认为唐僧是《西游记》中的次要人物，有一首诗来介绍身世足矣，何必再用基本上属于“人话”的故事来为这个基本

上属于“神话”的《西游记》画蛇添足。对此,我不敢苟同。我曾作《崇高:论唐僧的精神》^①一文,认为唐僧作为取经队伍的统帅,是绝对不能或缺的真正主角,对作品具有至关重要的本体意义。退而言之,即使作为次要人物,也与猪八戒、沙和尚的地位完全不一样。孙行者作为主角,有整整七回大书,叙其大闹三界,且作为序曲,置于全书之首,十分醒目。猪八戒、沙和尚包括白龙马,都是次要人物,在第八回中都有具体的叙述来说明其来历。除此之外,全书还经常用长诗韵文反复描绘各人的身世经历以及长相、武功、兵器等,如明本第十七回,描写孙行者的诗有64句,第十九回介绍猪八戒的诗也有64句,第二十二回则竟用两首诗来叙述沙和尚:一首52句,一首24句,合计76句(在《证道书》本中,上述四首诗分别删节成6句、42句、36句、16句)。相比之下,唯独对唐僧这个取经队伍中的核心,或曰次要人物中的主要者,却只用24句一首诗来介绍其曲折的人生和复杂丰富的性格。对此,惜墨如金是说不通的,唯一的解释是作品比例失当,顾此失彼,出现了“疏漏”。

《西游证道书》删去了介绍唐僧的那首24句之诗,而增补了整整一回文字来代替,或者说将一首小诗铺排为“唐僧出世”整整一大回文字。平心而论,这样的“补缺”工作是非常富有艺术创造性的,也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它适应了《西游记》作为文学文本的整体性需要,通过详尽地叙述交代唐僧的身世来历,使作品在情节的内容上有所呼应,在人物关系配置上更趋允当妥帖,“两截子”的毛病虽然不能说完全改正,但明显减弱趋缓,作品的结构更严密,故事更完整,弥补了吴承恩明本《西游记》一个显而易见的大疏漏。后来张书绅完全赞同这一“修补”,在《新说西游记》中也补刻了此回。他说:“刊本《西游记》,每以此卷特幻,且又非取经之正传,竟全然删去。初不知本末始终,正是《西游记》的大纲,取经之正旨,如何去得。假若去了,不惟有果无花,少头没尾,即朝王遇偶的彩楼,留僧的寇洪皆无着落照应。”^②可见,“唐僧出世”故事的插入,事关作品的整体和谐和取经的宏旨,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有利于刻画唐僧的形象。我

① 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4期。

②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第九回回评。

曾指出,唐僧虽然外表懦弱、贪生怕死,但其意志刚强,作为得道高僧具有坚韧毅力,聪慧而内秀:他为求取真经,教化东土人民,遭九九八十一难而不改初衷,义无反顾,苦度十四寒暑,历尽艰辛,显示出一种虽九死而不悔、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而这一则唐僧出世故事似乎使我们感受到这种崇高精神的必然性:早在躁动的母腹中,他就接受了生死磨难的洗礼;甫出娘胎,唐僧即已九死一生。这就实际上铸就了唐僧坚毅刚强的深层次性格特征,也为其日后取经途中遭受九九八十一难,饱经生死考验的命运奠定了一个逻辑上的起点。所以我们才得以明白,为什么如来的难簿上将这遭贬、出胎、抛江、报冤作为前四难,大凡圣人必欲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尤其应该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唐僧之崇高精神根本就是以生俱来的^①。

再者,从读者接受《西游记》的艺术效果上看,唐僧出世遭难的故事无疑是《西游记》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光辉篇章之一。《陈光蕊江流和尚》一类传统戏剧中关于唐僧出世的剧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后人增插的成分,它并非出于吴承恩之手,但一点也不逊色于吴承恩的文字,反而使吴承恩《西游记》大为生色。所以它不同于一些小说作品中的续书续作,狗尾续貂、续凫就鹤,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成功的艺术修补,而且已经和谐无隙地融会到《西游记》完美的艺术整体中去。

当然,《西游证道书》的删节改造也存在某些不足。如早有评论者指出:全本第四十四回猪八戒将三清像置入粪池,第三十一回天师责怪孙行者不谢天恩,玉帝无奈说“只待他无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第三十五回孙行者骂观音“该他一世无夫”等等,原本可以表达出对宗教、天庭的权威的蔑视,从而显示出作品异常复杂的思想意蕴,惜乎被《证道书》本悉数删去。又如第七回,孙悟空对玉帝高呼:“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证道书》本竟改为:“交椅轮流坐,明年是我尊。”在表现人物性格及语言神韵方面明显不及原本。但是,这些不足或失误,与它对原本《西游记》的艺术修补之功相比,实在是次要的方面,而其成就是主流。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西游证道书》虽然是一部

^① 参见拙文《崇高:论唐僧的精神》。

问世较晚的节本,但其对原本《西游记》所作的修补之功,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准,不但在明清时代所有节本中可谓上乘之作,而且比之全本,也有其不可替代的艺术特色,甚至不妨说,在某些方面的艺术成就大大超过全本,是《西游记》漫长的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只是以往对《证道书》本《西游记》重视不足,研究更少,加上版本难见,以致人们对其不甚了解。这种情况应当加以改进。

二、《西游真诠》与“谈禅”说

自康熙朝(1662—1722)初期《西游证道书》问世^①,风行约三十年后,至康熙丙子三十五年(1696)有《西游真诠》笺评本出^②,并进而取代之,成为清代最流行的《西游记》本子。孙楷第将其列为《西游记》三大通行本之首^③。因为系通行本,其各种类型的刊本国内外图书馆多有收藏,《孙目》所记颇简略,除原刊本(康熙丙子本)以外,计有清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刊本、芥子园刊小本、石印本、排印本等。此外据李时人《〈西游记〉版本叙略》则尚有:乾隆四十七年(1782)敦化堂本、光绪初翠云山房本、光绪十年(1884)良月校经山房校刊本、光绪十六年(1890)广百斋校印巾箱本等多种^④。进入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学界对《西游真诠》多有关关注,已基本确定其按《西游证道书》翻刻而来。据徐朔方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古本小说集成》(1991年)写的《西游真诠·前言》,可知该本的基本情况为:

《西游真诠》,牌记题《悟一子批点西游真诠》,一百回。有康熙丙子中秋西堂老人尤侗序。第一回署:“山阴悟一子陈士斌允生甫詮解。”陈士斌字允生,号悟一子,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此书有清乾隆庚子(1780)刊本。芥子园刊本,内封有《长春真人证道书》字样,实与《西游证道书》同一系统。

① 黄永年认为《西游证道书》的问世当在康熙三、四年,见其《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② 据该本尤侗《序》尾题“康熙丙子(1696)中秋西堂老人尤侗撰”可推出其与《证道书》相隔约三十年。

③ 据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西游记》三大通行本为《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和《西游原旨》。

④ 参见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

《西游真诠》及清刊本各种《西游记》的共同点是加入原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并将世德堂本的第九至第十二回重新合成三回,金山寺的和尚由迁安改名法明。

本书除上述特点外,它和世德堂本各回的标题、顺序、起讫完全相同,只有行文繁简的区别。^①

参验该本可知,《西游真诠》为绣像本,有图二十幅。图后附有赞词。图像依次为如来佛、李老君、唐太宗、魏徵、唐僧师徒和其他仙妖等;题赞署名者为玉湖钓叟、紫霞散仙、友鹤道人、指迷老人等。正文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作为《西游证道书》的翻刻本,从笺评形式上亦有许多变化:不仅更新了序跋、评注等全部文字和图赞,而且舍弃了夹批这一评点形式,只有回后总评,且评语冗长,最多者长达二千字。故而徐朔方称其为“与《西游证道书》同一系统”,而非同一评本。

郑振铎尝言:“《真诠》其实最靠不住,乱改、乱删的地方极多,远不如《证道书》及《新说》的可靠。吴氏原本所有的许多作为烘托形容之用的歌曲,几有十之三四被删去。这是最可慨惜的!吴氏的许多韵语,出自孙行者、唐三藏或诸妖魔的口中者,乃是那么的有风趣。不知悟一子为何硬了心肠,乱加斫除!”^②评价似不高,但这只涉及白文的删节,而非针对《西游真诠》的评注。且此论不确,因为《西游真诠》作为节本,不仅其删节源于《证道书》,“硬了心肠,乱加斫除”之辈当为汪澹漪、黄太鸿一流人物;而且相比较《西游证道书》,它参照明刊全本对被删文字实际上反倒有所恢复,其总字数据徐朔方统计达五十万言,增加了五万字左右^③。

为《西游真诠》作序者尤侗,系清初文坛领袖级人物,《清史稿》有传。尤侗(1618—1704),字同人,后改字展成,号悔庵、辰斋、西堂老人、梅花道人、万峰山长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顺治九年(1652)以贡生谒选,除永平府推官。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修《明史》三年,著有《悔庵年谱》、《西堂全集》,以传奇

① 转引自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57页。

②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③ 据粗略统计,白文约多万余字,又《西游真诠》回后评多达十五万字,比《西游证道书》批注总字数多出约四万余字。

《钧天乐》，杂剧《读离骚》、《吊琵琶》等（合称《西堂曲腋》）最为著名。尤侗尝得顺治、康熙两朝恩宠，顺治皇帝曾称他为“真才子”，康熙皇帝也赞他是“老名士”，尝自作中堂一幅曰：“真才子章皇天语，老名士今上玉音。”除了《西游真诠》的自身价值，尤侗名重顺康两代，由他为之作序推介，或许也是《西游真诠》得以替代《西游证道书》风行后世的主要原因。

尤序首倡“谈禅”之说，肯定《西游记》为扬佛崇禅之作，“论《西游记》者，传《华严》之心法也”，以《西游记》为“殆《华严》之外篇也”。不过，他对此也心存疑惑，因为“夫西游取经，如来教之也。而世传为丘长春之作。《元史·丘处机传》称为神仙宗伯，何慕乎西游？岂空空玄元有殊途同归者邪”？尤侗对邱作说是深信不疑的，所以很难将其与谈禅证佛联系起来，唯其博览群书，自称“三教圣人之书，吾皆得而读之矣”，并以“心性”一说括而统之，将儒释道贯通一体。他说：“东鲁之书，存心养性之学也；函关之书，修心炼性之功也；西竺之书，明心见性之旨也。”并由此得出结论，《西游》一书，仙佛同源，“兼佛、老之谓也”。此说基本上确立了《西游真诠》的大旨：谈禅。

评注者陈士斌，生平不详。据书中题记，只知其字允生，号悟一子，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据尤序可推知他于清圣祖康熙中期前后在世，且与尤侗友善交厚，尤侗称其为“圣人之徒”，“三教一大弟子”，其思想立意与学术取向当与尤侗相似。不过也有人认为他是奉道弟子一流，“悟一子”是其道号，他约尤侗作序，只是借其名而自重。对此，虽无确证，亦不妨为一说^①。纵观陈士斌的笺评，虽不出“三教一理”（突出道家）的大旨，但所论远比尤序繁复，却是事实。“形象大于思想”，《西游真诠》作为小说评点的基本倾向与主要价值绝非一篇短序所能涵盖，还须结合其中的具体论述进行深入的考察。举其要者大致在以下方面：

其一，陈士斌顺应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的潮流，采《西游证道书》文本笺评《西游真诠》，以邱处机为《西游记》作者，基本遵循着汪澹漪的证道观，但也有不少变化，体现了清代道家评本的某些新动向。

^① 参见袁世硕《清代〈西游记〉道家评本解读》，《文史哲》2003年第4期。

其显著者有二。一是对证道观作了强化和深化;二是第一次集中地以《周易参同契》(东汉魏伯阳撰)和《悟真篇》(北宋张伯端撰)两本道经来评注《西游记》。他在第一回开宗明义曰:

此明大道之根源,乃阴阳之祖气,即混元太极之先天,无中生有之真乙。能尽心知性而修持之,便成金身不坏,与天地齐寿也。俗儒下土,识浅学陋,不晓《河》、《洛》无字之真经,未明《周易》、《参同》之妙理;胶执儒书,解悟未及一隅;摈斥《道藏》,搜览皆糟粕。所谓醯鸡止知瓮大,夏虫难与语冰者也。予特悯夫有志斯道而未得真诠,既昧性命之源流,罔达修持之归要;揭数百年褻视之《西游》,示千万世知音之向往。但惜前人索解纰缪,蜚聒已久,不得不逐节剖正,以指迷津。如此回提纲二语,最着意者,在上一句,作为全书之统要。

在他看来,《西游记》的宗旨在于道家“尽心知性”,追求长生,“与天齐寿”的生命本真,而这在以往是被无视甚或“褻视”的,他评注《西游记》的目的是在“指点迷津”,求“真诠”、达“妙悟”,正本清源,拨乱而反诸正。又在第一百回“经回东土,五圣成真”修束全书后总评曰:

此篇全部收煞,包括金丹大意,只看诗中“五行妙色空还寂,百怪虚名总是空”二语,便了却要领。盖金丹由五行攒簇而成,始虽有为,终则无为,故一道果完成,自然安静,其诸般险怪,皆属空虚而已。

长春子丘真人留传此书,本以金丹至道开示后世,特借玄奘取经故事,宣畅敷演,明三藏之脱壳成真,由尽性而至命;三徒之幻身成真,由修命而尽性。虽各有渐顿安勉之殊,而成功则一,皆大觉金仙也。分而为五,则各成一圣;合而为一,则共成一真。皆真乙金丹也。

对于证道观,首尾已有呼应,那么中间呢?我们可以查到他在五十回回评中说的大段文字:

《西游》一书,讲金丹大道,止讲得“性命”二字,实止是先天真乙之气。修性命者,修此一气,性命双全,而还归于一。反反覆覆,千变万化,不离其元……或正言,或反说,或寓意,或设象。或戏谑闲情,发本然之理;或冷语微词,示下手之功。或隐指其要

诀,或显露其真传。横竖侧出,旁道曲喻,千魔万怪,无非止讲得“性命”二字,止修得先天真乙之气而已。

陈士斌通过对全书“逐节剖正”,认为虽然作品波谲云诡,旁道曲喻,然而“孔窍其门”(《参同契》),万变不离其宗,所叙皆合金丹大道,千魔万怪,不过是修持性命过程中必须铲尽的障碍而已,所以“无非止讲得‘性命’两字”。如此从开篇至结尾诚可谓“吾道一以贯之”了。对此,尤侗《序》中曾评价说:“今有悟一子陈君起而诠释之,于是钩《参同》之机,抉《悟真》之奥;收六通于三宝,运十度于五行。”指出了陈评道家评本的特色。

其二,继承发展并全面阐释了三教合一、仙佛同源的思想,对《西游记》的佛教意蕴也不乏精深的见解。

以三教合一、仙佛同源这一思想诠释《西游记》源于李评本袁于令《西游记题辞》:“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治?”汪澹漪《西游证道书》事实上是承认仙佛同源的,他说:“《西游记》一书,仙佛同源之书也。何以知之?曰:即以其书知之。彼一百回中,自取经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间心猿意马、木母金公、婴儿姹女、夹脊双关等类,又无一非玄门妙谛。岂非仙佛合一者乎?大抵老释原无二道。”^①至《西游真诠》尤侗《序》,倡“谈禅”之说,三教合一、仙佛同源的思想达到顶峰。

陈士斌有意识地强化证道观,必然会贬低其他学说,所以对三教合一、仙佛同源的思想也常予非议,如在第一百回回评中明确说:“后人不识为仙家大道,而目为佛氏小说,持心猿意马、心灭魔灭之浮谈,管窥蠡测,失之远矣。”可见他并不完全同意尤侗的意见。不过,他与汪澹漪一样,在评点中事实上不可能不谈三教合一、仙佛同源,正如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其中谈仙佛同源最为集中、明确的是在第六十四回,他说:

佛生于东印度国,其时周庄王九年四月初八日也。自汉明帝永平八年,其法始入中国大行。尝稽东印度国人,性强健,好杀伐,以战死为吉利,以善终为不祥。老子出函关,作浮屠法化之,

^① 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第一回回评。

令其内外剪除,不伤形体,名曰“浮屠”。至庄王九年四月初八日,恒星不见,星陨如雨,是夜释氏生,能修伯阳之道,国人宗之曰“佛”。佛即中国称之为神,其次曰“菩萨”。其国种类繁多,无鳏寡孤独,故人愿往生焉。然则佛教由中国而及西度,由西度而复回中国,非彝教也。老子实为佛祖,佛实演老子之法;神即佛,佛即神,不过中外字音之不同耳。

在这里,陈士斌完全认同了自六朝以来佛、道同源同祖的说法。他在具体的评注中既坚持证道说,又不放弃三教合一、仙佛同源的立场,不乏自相矛盾之处。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儒释道三家虽有各自的思想体系,但终究源于中国同一社会现实与文化土壤,儒道互补、玄佛互证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正如道家所谓“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元来是一家”。明清之际,三教合一的思潮时断时续,尤侗自称打通三家,融会佛、老,作为其挚友的陈士斌也当有如许学养。尤序称陈士斌《西游真诠》“收六通于三宝,运十度于五行,将见修多罗中有炉鼎焉,优昙钵中有梨枣焉,阿閼黎中有婴儿、姹女焉”,当为事实。其中,“六通”即指佛教教义“六神通”,“三宝”乃道教教义,即道、经、师三宝。“十度”、“修多罗”、“优昙钵”、“阿閼黎”皆佛教教义(术语)、“五行”、“炉鼎”、“梨枣”、“婴儿姹女”皆道教教义(术语)。无非谓玄佛互证、仙佛同源之意。既然佛道两教不可分割,那么《西游记》“谈禅”亦当为题内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西游记》以唐僧取经为本事,其情节和叙事模式都是按照佛教教义体系设计的。如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以天、人、阿修罗为三善趣,畜生、饿鬼、地狱为三恶趣,唐僧、八戒、沙僧以及白龙马都是以“原罪”开端,经过历难赎罪,消业而得道成真^①。《西游记》自始至终不脱佛教思想,字里行间充满佛光禅意,从思想立意上则是佛道互证,而又以崇佛为主,“重佛轻道”^②。尤侗《序》倡谈禅之意甚明,甚至直截了当地称《西游记》为“《华严经》之外篇”,而在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美国学者余国藩《英雄诗——〈西游记〉的另一个观察》,《中国时报》(台北)1973年12月13—14日;诸葛志《〈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

② 参见吴承学《〈西游记〉的三教合一和佛道轩轻》,《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

陈士斌的评注中,这一类谈禅的内容也比比皆是,崇佛倾向甚为突出。

第八回叙如来造经,观音赴长安选拔取经人,陈士斌在总结前七回“明金丹大道”、“修炼先天真一之气而成”这一“全篇统要”(即宗旨)以后紧接着批道:

仙师(指邱处机)恐世人愚昧,或谓仙佛乃系天生,非凡人可学而至。或谓参悟惟在一心,止自己可求而得。故下文提出玄奘一人,做个榜样;提出悟空、悟净、悟能、龙马,做个作用;见得仙佛人人有分,非天生性成;彼我共济,非一己孤修也。……仙师立言之意,发明未得真传,而有千魔万难之极苦;已得真传,而有一生永得之极乐也。故提纲云:“我佛造经传极乐”。正欲以至近至易者,救度众生。

第十二回“玄奘秉诚建大会”叙观音秉如来旨意授玄奘五色锦襴袈沙等宝物,以保其取经途中百物不侵。或问:既有佛祖如此庇护,怎么还要由孙悟空等人一路保护呢?而三徒既已了道,又怎么反要拜凡胎唐僧为师呢?对此“悖论”,陈士斌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作了解释,他说:

然玄奘必得三徒,而后能释见如来,其义易明。三徒已了长生之道,命根坚固,自是万劫不坏,何以反以玄奘为师?其说难晓。盖仙佛同道:佛曰“丈六金身”,仙曰:“修成二人”,俱是有为而至于无为。了命不了性,如宝镜不磨而无光,非有为之真空;了性不了命,如筑室无基而安柱,是无为之空寂。故有为者,必见性明心,而始能超脱五行,三徒之皈依佛法是也。

陈士斌真切地注意到,关于这个问题,道教无法解释,而只有依赖佛教教义,以及在《西游记》如来造经普度众生和金蝉遭贬历难等先验假设的情节模式中才能得到解释。

第三十八回“婴儿问母知邪正”叙写乌鸡国妖道谋害国王故事,陈士斌在此回评曰:

篇首一诗云:“逢君只说受生因,便是如来会上人。”言人能知受生之因从何而来,即知不死之方亦从此而造,岂不超然大觉,为如来会上之人!……言心致其洁清而身不与,此佛在尘世中广有,不在西天。体无分人我而法自灵,此神在虚无降来,不涉名相

也。《华严经》云：“菩萨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成无上正觉。”即尘世佛十方同看之义。

陈士斌在此以佛法言生死，超越了谋求长生、与天齐寿的金丹之旨。佛教以参悟生死为旨归，从印度原始佛教的“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的生死观到中国佛教（如禅宗）的“即心即佛”，淡看生死，追求来生彼岸世界诸种教义都属于生死大悟。本回内容言生言死，乌鸡国王由生而死，死而复生。陈士斌以《华严经》来参验“受生之因”、“不死之方”，说明他以证道观评《西游》，但从根本上却挣不脱佛教对生死大悟的义谛。

又，《西游记》篇末（第九十八回）叙唐僧一众历尽苦难抵达灵山，因不及向阿傩、伽叶两尊者敬贡“人事”，两尊者竟以无字真经相授。对此，后人一直以为佛之瑕疵，言佛教虚伪、徇私、腐败者不一而足^①。今考究《西游真诠》，原来陈士斌曾发表过相当独特、精深的见解，他说：

（唐僧）解脱凡胎，功成行满；逍遥于灵山之顶，拜身于如来之下；方识如来慈悲，一片之心，尽托于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之内，总不外于无字之真经也。此经至尊至贵，慎勿白手传经，以致独俗遇迷，毁谤慢取。以无字之经度上智，以有字之经度众生，佛祖之分别传经，与孔氏之因人施教，夫何异哉！阿傩先传无字之真经，非欺也，恐其慢褻也；后换有字之真经五千零四十八卷者，得金钵而传金丹也。盖无字为顿法，有字为渐法。顿为无为，渐为有为。出渐而顿，出有为而无为，皆真经也。

这里有几点可注意：一是无字真经“非欺”，而是如来慈悲之意，唯恐凡众不识真谛，怠慢褻渎，这与如来造经，不予赐送，而要唐僧“苦历千山，远经万水”求取的本意相通。二是无字真经与有字真经“皆真经也”，然而形式及用途不一。“无字之经度上智”，“有字之经度众生”；无字真经为“顿法”，有字真经是“渐法”，适合于不同的受众，陈士斌称之为“因材施教”。怪不得当孙悟空当众责问如来时，如来竟为两尊

^①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彭海《〈西游记〉中对佛教的批判》（《〈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和张乘健《论〈西游记〉的宗教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等文章。

者辩护：“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陈士斌如果没有对《西游记》作者创作立意的感应，没有对博大精深之佛教文化的真切领悟，是断不可能作出这段独到而精深的见解的。客观地说，如果将这一见解与后人的一些看法相比，不特在时间上“领先一步”，而且在对问题的认识上，也确乎“高人一头”。

关于陈批中的佛学意蕴，我想谈及一个《西游记》学术史上引起争议却悬而未解的问题。

对清代《西游记》评点，鲁迅曾作过评价：

评价此书者有清人山阴悟一子陈士斌《西游真诠》（康熙丙子尤侗序），西河张书绅《西游正旨》（当为《新说西游记》——引者注）（乾隆戊辰序）与悟元道人刘一明《西游原旨》（嘉庆十五年序），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①

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

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宜附会而已。

他把清代《西游记》评点分为劝学、谈禅、证道三派^②。其中张书绅《新说西游记》以《大学》注《西游》，属“劝学”一派甚明，汪澹漪《西游证道书》以下，包括《西游真诠》、《西游原旨》、《西游正旨》、《西游记评注》，也基本属于“证道”一类，那么，“谈禅”一说坐落何处呢？对此，海外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存异议^③，最近也有大陆学者著文指出：“（鲁迅等）平列出三种附会之说，看似周到，实则是由于所涉猎的评本不多，而未能觉察到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有清一代，《西游记》评本主要出自道家者流。”清代各家评点“其中并没有‘谈禅’的，至今也没有发现和尚们作的《西游记》评本，也没有人将《西游记》说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胡适也有类似看法。《〈西游记〉考证》：“《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

③ 参见〔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

成是一部‘禅门心法’”^①。

这一看法是值得注意的。“谈禅”一说不及“劝学”、“证道”之类典型,当是事实,其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由和尚笺评的评点本。但从另一方面看,清代《西游记》评本是否有“谈禅”说,主要是看其中的内涵,作者的身份(和尚、道士、秀才)并非是决定因素。窃以为如从三教合一、仙佛同源的文化视野来看,“谈禅”一说还是成立的,特别是陈士斌《西游真诠》对佛教底蕴的揭示是比较充分的,尽管它与证道观夹缠在一起,也尽管它多有附会穿凿的成分。尤侗《序》直言“记《西游》者,传《华严》之心法也”,即为明证。我以上所作的诸多评论,也可资证明一二。

对此,我还找到一处旁证:今人李安纲研究《西游记》是力倡金丹大旨的,且影响甚大^②。但对于《西游真诠》的思想倾向,他的评价是:“尤氏作为一个儒家的领袖,能够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来理解《西游记》,把它当作三教合一的典范,这当然都与陈氏的诠解有关。可见陈氏是第一个以佛教的《华严经》为主脑,以道教全真道的金丹大道为骨架,以阴阳八卦为线索来阐释《西游记》的。《西游真诠》由于从三教合一的多角度、全方位来研究,又经过儒教学者的弘扬,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③据此可知李安纲是完全认同《西游真诠》三教合一和“谈禅”说的。要之,鲁迅(以及胡适)对清代《西游记》评本“劝学”、“谈禅”、“讲道”三家的划分,还是有一定依据的,对此问题或有更为恰当、合理的评判存在,但从现在看来,似乎起码还不应予以完全的否定。

另外,《西游真诠》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并从一个特殊的方面体现出作为小说评点本的理论价值:通过异常活跃的社会历史批评揭示《西游记》无比广阔、丰富的思想内涵。

一般的小说评点,都是思想批评与艺术批评并举,两者相互促进,融合一体。因为《西游真诠》以求“真谛”、“妙悟”(所谓“钩《参同》之

① 袁世硕《清代〈西游记〉道家评本解读》,《文史哲》2003年第4期。

② 李氏倡证道说,比诸清代汪澹漪更甚。参见李安纲《苦海与极乐——〈西游记〉奥义》,东方出版中心,1993年。

③ 阎凤梧、李安纲《明清〈西游记〉文化思想研究概述》,《西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机,抉《悟真》之奥”之类)为目的,故而集中于社会历史批评一翼,而对艺术批评则大为忽视。尽管凡评点则离不开形象和情节的分析,但考察《真诠》,属于艺术范畴的评点确乎止于吉光片羽,不成体系,有意识、纯粹的艺术批评则几乎没有。过去有人试图总结《西游真诠》的艺术批评,立意可嘉,但效果甚微,甚至出现了批评上的误差^①。

《西游真诠》在社会历史批评方面却是表现不俗,颇为可观。

首先,对明代评本主要是李评本以王阳明心学批点《西游记》表示不满。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叙美猴王学道至“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世本、李评本等明代评本及后来的《西游证道书》皆注为心,陈士斌直斥为“管窥蠡测”,因为此回“总明灵根源流之奥旨”,“解者止提‘心’字为主,妄揣混注,反昧却大道之根源”,是“强以形象谬臆,五形妄参”的结果,“竟将仙师度世真谛全然遗弃,可惜!可叹!”

陈士斌并非完全舍离心学,而是对“心”有不同的理解,认为“心”不应与金丹之旨、长生之术分裂开来。所以他指出:“若云是心,以心向心,参禅打坐,祛欲循理,便可长生,又何用求师访道、东奔西驰邪!”故而“以此心为天地之心,则可;以此心为人心之心,则失之远矣”。将心分为“天地之心”与“人心之心”是陈士斌对李评本的批判、扬弃,表现了《西游真诠》的特殊贡献。

《西游真诠》是继承《西游证道书》的,但在心学与《西游记》关系的认识上,陈士斌比汪澹漪更进一步,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第十三回中唐僧取经出发之际有名言曰:“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汪澹漪对此十分心仪,批曰:“一部金丹总不出此二语,即此便是活佛真经,何必远求?”陈士斌以为“大错了也”。因为“若心灭已了宗旨,何必又向西方取大乘真经邪”,“故‘心生’、‘魔生’二语,不过指出人心之险,教人首先下手,为起脚之地耳”。他以为“心灭”者不过是

^①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蔡国梁作《陈士斌对〈西游记〉人物和情节结构的批评》(《文献》1985年第1期)和《陈批〈西游记〉零拾》(蔡国梁《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两文,从人物特征和情节结构方面来透视陈批的艺术理论,所论颇详。殊不知所据版本却是1922年由上海锦章书局石印的《绘图增像加批西游记》,此本虽标为“山阴悟一子陈士斌先生甫诠解”,但其大量的批语(特别是眉批、夹批)来自于《新说西游记》,而非真正的陈批,故而蔡氏所论遂为无的放矢,对其艺术批评的总结也未必准确。

“切要坚强刚断而已”，为唐僧自励之意。而众生“肉眼愚迷，不识活佛真形之妙”，还必须战胜各路魔障，赴西天取回真经，以求得正果，仅此而已。

其次，继承李贽、金圣叹小说、戏曲评点的传统，对明清之际的“假道学”和“伪学术”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和攻击。

程朱理学自宋元鼎盛，至明清已失其真髓和活力，而呈现僵化、腐败之势，并且日益成为社会发展和人心解放的羁绊，特别是不出朱子《四书集注》的科举制度更使它沦为士人追求功名利禄（所为“学干禄”）的“假道学”、“伪学术”。李贽、金圣叹的批评中已开启了对“假道学”、“伪学术”的批判：李贽怒斥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庸儒俗士“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①。金圣叹则斥之为“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直谓“天下之鄙秽殆莫过先生”^②。《西游记》每有如白骨精以假乱真故事，陈士斌必将矛头直指假道学，以为其寓意即在：“后世俗儒伪学，莫不剽窃其论（指‘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学说），掇取功名，其立意起念，止为荣肥之计，竟忘其本来面目，甚至盗名托义，败坏纲常，行奸作乱，无所不至，是救世之书而更为祸世之盗，罪可胜诛哉！”^③第六十五回叙黄眉老怪假设小雷音加害唐僧一众故事，陈士斌批曰：

此篇假佛窃取名理，工饰外貌，多诱善惑，人莫辨识，似是而非以为妖。彼自害而害人者小，此害人而至于陷命灭性，乃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所以为大厄难！

陈士斌进一步指出：“今儒、释、道门中，多黄眉饶袋（妖精法宝——引者注）并施”，他们“借尧、舜之道，而为跖、之行；托孔、孟之言，而济渔猎之志。其生心害政之祸，烈于洪水猛兽矣”。对于这一“殊可悲涕”的社会现实，结合《西游记》的情节描写，陈士斌发表了两种感慨：一是“虽圣贤（包括道祖、菩萨）亦未如之何，故劈题曰：‘大圣无计可施’”，深表愤慨而无可奈何。另一是“幸得一瓜实以收之”，“安得遍地种东陵而重烦行者”，借指弥勒佛与孙行者联手于瓜田降妖事，抒发

① 李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

② 《西厢记·酬简》金圣叹批语。

③ 《西游真诠》第六十六回回评。

扫荡伪学、重正学风的良好愿望。

再次,站在朴素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立场,对一些有关国计民生诸如为官不正、人民疾苦等问题,提出了不乏尖锐的看法。

比如四十回红孩儿故事,叙钻头号山枯松涧火云洞圣婴大王红孩儿怪为祸一方,“毁庙宇,剥衣裳”,搞得民众“不得安生”,甚至还把土地诸神“头也磨光,弄得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陈士斌批曰:此“非火性之蕴隆为害而何?如贪吏势焰,酷烈为虐,剥民膏而剥地皮者,其心其害,亦犹是也”。锋芒直指昏君、恶吏丧政害民的暴行。

比如第七十八回叙比丘国国王为治病而以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作药引。对于这一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暴行,陈士斌认为“揆厥所由,皆因人君昏昧,惑于邪妄所致”。比丘国王“上不能乞真法,下不能乞真食,空有释家乞上之号,不与尼山丹丘同实”,偏信妖言,误食小儿,遂有“将无知之赤子而加以牢笼刀俎之惨也”。他希冀有孙悟空再世,施佛法道术救民众于倒悬,也即后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之感叹。

又比如,第八十七回叙天竺国凤仙郡郡守过失造成人祸:“三停饿死二停人,一停还似风中烛。”陈士斌认为:正是郡守上官正将供饌喂狗的人祸造成了三年大旱的天灾。因为上官正“不能敬天而反褻天,罪莫大焉!”将自然灾害归结为“天意”,当然是无稽之谈。但结合中国古代儒家“敬天勤民”、“民为邦本”一类社会思想,指出“上有秕政,下有菜色”,“上行下效,气类相惑”,“守为风,而民为草,守不仁,则民不义”(也即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人民群众蹈于水火,完全是昏君失政所致,统治者不施仁义使然,则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其论述相当深入。他指出上官名曰“正”,其实不仁不义,何正之有,确乎不失为一种辛辣的讽刺。

纵观《西游真诠》一百回,如这一类指摘时弊、直刺官守、关怀下层民众疾苦的评述所在多有,显示出丰富而积极的社会意义。

自《西游真诠》问世风行以后,影响甚大,特别是三家合一、仙佛同源的思想实际上多为后世各家评本所继承。如《西游原旨》明称《西

游记》“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读《西游》“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①。张含章评注《西游正旨》也称“《西游》之大义，乃明示三教之源。故以《周易》作骨，以金丹作脉络，以瑜伽之教作为无妙相”^②。可以说，它实际上已成为清代《西游记》评点的主导倾向。

三、儒学别体——《新说西游记》

清代另一个重要的《西游记》评本是《新说西游记》。

该本为通行本，清代以降，国内外藏本颇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录有晋省书业公记藏板本（北京图书馆“西谛藏书”）、其有堂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上海味潜斋石印本（王韬序本）三种^③。其中晋省书业公记本是初刻本，始见于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④，余皆为翻刻本，翌年（乾隆己巳十四年，1749）有其有堂刊本；后上海味潜斋石印本有光绪十四年（1888）王韬序，系“后来石印本从此出”，影响最大。

《新说西游记》各种刊本内容基本相同，唯笺评人张书绅所撰各类文字位置前后稍有出入。以味潜斋石印本为例，基本面貌如下：

书名题作《新说西游记图像》（白文一般简称为新说本），题“西河张书绅题”。首张书绅《自序》；次《新说西游记图像序》，序后题“光绪十有四年岁在戊子春王正月下瀚长洲王韬序于沪上淞隐庐”；次《新说西游记总评》，不题撰人，实即乾隆十三年书业公记本署名张书绅所撰的《新说西游记总批》；次“目录”，下接“中节气稟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目录共计二十七篇”、“《新说西游记》全部经书题目录共五十二篇”；次《西游记总论》，后署“乾隆戊辰年秋七月晋西河张书绅题”；次《全部西游记目录赋》，下署“张书绅”；再次为“新说西游记图像”二十幅，第一幅为“如来佛”，末幅为“孙悟空”，该幅左下题“元和吴友如

① 刘一明《西游原旨序》。

② 张含章《西游正旨后跋》。

③ 王重民、柳存仁等书目著作尚著录其他刊本多种。

④ 据《新说西游记总论》尾署“乾隆戊辰年秋七月晋西河张书绅题。”

绘”，有印章为“吴嘉酣印”。又，正文每回尚有题图一幅，每四回为一组，全书凡一百幅。如第一幅为“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图，第一百幅为“径回东土，五圣成真”图。

正文半页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每回有夹批、回前评和回后评。正文有关回目后和回前评之前有所谓“经书题目录”，如第一回：“大学之道”，第二回：“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第三回：“克明峻德”。有的一回一目，有的数回一目，凡五十二目。

张书绅批语繁复。计有《自序》百余字，《总评》近万字，《目录注》近二千字，《总论》六百余字，《目录赋》六百余字，回前回后评文字长短不一，合计约二万字，散见于全书的夹批字数难以统计。仅就字数而论，《新说西游记》实为今见全部《西游记》版本中最多者。笺评人张书绅生平不详，据晋省书业公记本《自序》后题及几枚墨章可知其人字道存号南薰，三晋古西河（今山西汾阳）人。据自述，他于乾隆十三年（1748）六月至闰七月的“长天炎暑，日夜难禁”之际，作为消夏之法而评注了《西游记》。自六月下旬“觅本”，至七月上旬“草稿粗成”，至闰七月二十日“削笔初定”，历时凡二月。在《西游记》评点史上，可谓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最为繁复翔实的评注，说是激情洋溢、一气呵成当为不错，张书绅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也当无可疑。

在明清两代《西游记》版本中，新说本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新说西游记》是唯一的一部名副其实的全本。在清代通行本中，《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以及后来的《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和《西游记评注》全部是删节本；而《新说西游记》则将被《证道书》本和《真诠》本删削的内容全部予以恢复^①。明代的四种百回本，包括三种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和李评本虽是全本，但皆无唐僧出世故事，如以清代通行本为比照，似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全本。唯《新说西游记》以明刊本为底本，又据《西游真诠》（或说《西游证道书》）补足了这一唐僧故事，即八十一难的前四难，明本和清本两个版本系统在此得到了融合。究其原因，这一方面体现了张书绅的求全倾向，

^① 味潜斋本曾将第三十一回、三十二回两回文字刊落也可能因底本原缺，故以《真诠》本补足；而该两回评语亦为悟一子陈士斌回后评。夹批或为味潜斋主人新加，而无张书绅的批语。

他说：

刊本《西游》每以此卷特幻，且又非取经之正传，竟全然删去。初不知“本末”、“终始”，正是《西游》的大纲、取经之正旨，如何去得？假若去了，不惟有果无花，少头没尾，即朝王偶遇的彩楼、留僧的寇洪，皆无着落，照应全部的关锁、章法俱无，已不成其为书，又何足以言“奇”也欤！^①

查该回的“经书目录”作“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大学》），说明他将其作为八十一难的前因后果来予以重视。另一方面，张书绅从小说全书结构着眼，以为这一故事有关“大章法”、“大关锁”，实不可或缺。他又说：

（唐僧）一出娘胎，便遭此大难，前以刘洪之难起，后以寇洪之难终，是一部书的大章法，一生的大结局。尝读唐史，见尉迟恭，身无完肤方才成得个国公；三藏虽未至此，而心力已尽。可见世之欲安然以成正果者，岂非大妄！

果由花结，花以蕊放。未到西天结果，先在东土开花；未见东土开花，先见长安发蕊，此所以为“陈光蕊”也。功业本于四时，文章成于天造，不啻葱岭之河，一泻万里矣。^②

尉迟恭系唐王朝开国元勋，唐玄奘挚友，后其侄窥基成为玄奘传人^③，据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第五出“诏饯西行”：尉迟恭曾送唐僧至长安城外，唐僧曾为尉迟恭“摩顶受记”。陈光蕊系唐僧之父，淮海一带有关于陈光蕊父子的完整传说^④。张书绅以尉迟恭来说明唐僧故事的真实性，以陈光蕊（寓“未到西天结果，先在东土开花”）来说明唐僧出世故事的必要性，真可谓煞费苦心。《新说西游记》补足这一则唐僧出世故事，不仅是它作为清代通行本之必然，同时也使它成为有史以来情节最为完整、文字（篇幅）最为庞大的《西游记》全本。

其二，清代《西游记》论坛流行道家评本或以道家为主、兼涉佛家的本子，所谓“谈禅”、“证道”，“文词甚繁”。唯有《新说西游记》系以儒家经典评注《西游记》，评注者张书绅直谓其“名曰《西游》，其实却

①②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第九回回评。

③ 据（宋）志磐《佛祖统纪》。

④ 参见李时人《〈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

是‘大学之道’”，又说：“把一部《西游记》，即当作《孟子》读亦可。”可谓在清本系统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王韬味潜斋本《新说西游记图像序》称：“今余友味潜主人嗜古好奇，谓必使此书别开生面，花样一新。”王韬（1828—1897），字紫诠，号仲弢，是清末文坛领袖，在政论、新闻、文学诸方面都有极大号召力，1879年曾为政论名篇郑观应《盛世危言》作序，名震一时。故味潜斋主人请他作序以自重和射利。唯王韬不稔《西游》，应景勉力而为，于《序》中错误迭出^①，然指出该本不同于通行之道家评本，“别开生面，花样一新”，当为的评。

作为《西游记》评点本，《新说西游记》在批评形态上可谓集大成之作。序跋、总评（相当于读法）、总论、回前回后评、夹批（又分为行中夹批、行间夹批）一应俱全，各类文字皆统一于“证圣贤儒者之道”的宗旨，且相互联系、印证，自成体系，“成一家之言”。其中《目录注》和《目录赋》是其独创，在小说评点史上绝无仅有，丰富了小说评点的形态要素。就《西游记》评点而论，后来之《西游原旨》、《西游正旨》、《西游记评注》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一模式。

《新说西游记》的评点价值，集中体现在对儒家理义的阐发上，以《大学》注《西游》，反过来又把《西游》注成《大学》，成为儒学之异体。这样把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哲学与文学）硬性捏合在一起，明显带有机械批评的弊端，与“谈禅”、“证道”属于同一种思维路数，故而在后来多受批评。不过，作为清代一部重要的《西游记》评本，《新说西游记》在评本的思想倾向方面有着充分的特殊性，其出现绝不是偶然、孤立的，而是代表着其时的儒学道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光大儒学的社会使命。我们先来看评点者的动机。虽然张书绅生平事迹不详，他的儒学道统、人格背景皆无从考稽，但从现有的资料看，他以《大学》评注《西游》的动机是相当清晰的。

一是针对当时读者特别是数家批评对作品的误解。张书绅在《自序》中劈首指出：“此书由来已久，读者茫然不知其旨。虽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或以为谈道，更又以为金丹采炼。多捕风捉影，究非《西

^① 王韬《序》中的主要错误有：一、王韬指出《西游记》作者非邱处机，显系受钱大昕、纪昀等人的影响，但说“《西游记》一书，出悟一子手”更为荒谬；二、王韬文末云“因序《西游记》真诠而为辨之”，却又显系将张书绅《新说西游记》与《西游真诠》混为一书。

游》之正旨。”又说：“《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书，原是论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①如此“将有根有据之学，更目为荒唐无益之谭”，实“有负此书也多矣”。在“可叹”之余，张书绅表明自己评点《西游记》的初衷：“予欲以数月之暇，注明指趣，破其迷罔，唤醒将来之学者。此亦‘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

二是对其时儒学道统衰败、空疏清淡而不关事务的学风表达不满。早在明清交替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就尖锐地批评过宋明以来儒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音，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弊端。如顾炎武指出“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今儒学者“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惟精惟一之说”，枵腹空谈，失却世用，不惟误己，甚而误国，“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②。张书绅继承了这一激进思想，并以此来作为评点《西游记》的主导原则。他说：“《西游》一书，以言仙、佛者，不一而足。初不思佛之一途，清静无为，必至空门寂灭而后成；即仙之一道虽与不同，然亦不过采炼全真，希图不死。斯二者，皆远避人世，惟知独善一身，以视斯世斯民之得失，漠不相关；至于仁义礼智之学、三纲五伦之道，更不相涉。”又说：“仙佛之事，与人也无涉，且幻渺不可知。人事之常，日用之所不可离，虽愚夫愚妇，莫不共知，若必以人事之所不可知者解之，则何如人事之所共易知者解之？与其以世事无益者而强解之，则何如以人生之有益者而顺释之？”在他看来，“谈禅”、“证道”一类学说与人类生计无关，与人生无益，属空疏清淡一流；而大学之道，在新民，在克明峻德，可以经世致用，强国利民。而《西游记》则是“有根有据之学”，只是“将《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以《大学》注《西游》“确然可据”，相对于以往诸家批评则无异于“破其迷罔”，拨其乱而返诸正。

过去一般认为张书绅是以《大学》注《西游》，但事实上张氏并非局限于《大学》，而是涉及众多儒学经典。张书绅博览群经，在评点中不可能将《大学》从儒家经典中完全分割出来。查《目录注》所例“经书题目录”，其52条经书语录分布如下：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克明峻

①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卷十八。

德”；“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知止而后有定”；“《康诰》曰：‘作新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意诚而后心正”；“此谓修身在正其心”；“知至而后意诚”；“物格而后知至”；“克明德”；“顾天之明命”；“定”；“静”；“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生财有大道”；“鹵莽厌烦者，决无有成之理”；“释‘明明德’”；“释‘新民’”；“释‘止于至善’”。凡 27 条。

《论语》：“戒之在色”；“见利思义”；“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臣事君以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由大之”；“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凡 10 条。

《诗经》：“思无邪”。凡 1 条。

《书经》：“听德惟聪”；“视远惟明”；“弗敬上天，降灾下民”；“饮惟祀德将无醉”。凡 4 条。

《易经》：“行险以徼幸”。凡 1 条。

《中庸》：“半途而废”。凡 1 条。

《孟子》：“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而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养心莫善于寡欲”；“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凡 6 条。

以上合计凡 50 条。又有两条，笔者始终无法查到经籍出处，不知归属^①。这些语录以《大学》(27 条)居多，《论语》(10 条)、《孟子》(6 条)次之，涉及《礼》、《易》、《诗》、《书》诸经。所以张书绅注《西游》，实是以《大学》为主，辅以他经，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儒学理义系统。

^① 这两条内容为：“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同其已知之理而益通之，以求至乎其极。”

张书绅以《大学》三纲、八目为主线,全面阐述儒家仁学思想和内修外治的人格理想。第一回以“大学之道”开篇,第一百回以“释‘止于至善’”收束全书,中间穿插众多(共50条)大小关目。全书上下独尊儒学,攘斥佛道,且大纲细目,开阖有序,以《大学》(儒学)一以贯之。纵观其所述内容,其提纲挈领,尤可注意者在如下方面。

其一,以《西游记》为“《大学》之道”。

张书绅在《总评》中明确指出:“其名曰《西游》,其实却是‘《大学》之道’。”“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事(《大学》)耳。”并在第一回的评注中具体、深入地阐述了这一核心观点。

《西游记》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叙天地开辟、石猴出世故事,张书绅以为此为全书总纲:“《大学》之道”。“灵根育孕”即是天地开辟,“心性修持”即是人之大道。他在回前总批中指出:

人之道,悉本天之道,所以天之道即人之道也。故开手必从天地写起。是笔笔写天地,正是笔笔写道;笔笔写道,正是笔笔写人。论本清源,此方是真学问,方是大文章。

天地开辟寓寄着“人之道”,见解透彻,但怎样才能合乎“《大学》之道”呢?为此张书绅对本回内容逐一评点,揭橥其中的奥义。如在“水、火、山、石、土,谓之五形”一句下,他批曰:“即仁、义、礼、智、信之道也。下文五行山、水、木、金、火、土、青、黄、赤、白、黑(凡举五者)无不本此。”在美猴王决定出海寻求长生之术时,张书绅批曰:“转正‘大学’。《大学》之道,原千古不磨,故曰长生。学至长生,其学大矣。非大人不能作此想,非大人不能为此学。”美猴王在求道过程中一路游山过海,张书绅又批曰:“一直西来,穿州过府,登山涉水,极写‘游’字,正是极写‘学’字,此所以为《西游》,此所以为‘《大学》之道’也。”又说:“由东胜写至西牛,方是个《大学》之道,移作别句不得。”作品写到须菩提祖师赐猴王姓孙,谓“正合婴儿之本论”,张书绅随即批道:“婴儿乃如来也,言学以复其本来,即是个大人。”明显系由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来。这样,张书绅终于实现了天地开辟与“《大学》之道”的联系,把《西游记》纳入到《大学》的轨道上来。他在本回回后总评中说:

此书原讲《大学》“明德”之要,开手却写天地之道昏朦,是从

反面写。但天地之道由黑暗以至清明,正照人之德亦当如是也。从天地写至人世,由黑暗写至清明,然犹是全部的起讲,总在明与不明上翻,以此落出“道”字、“学”字,方归此回之正传也。

这一转换过程不免牵强附会,其推理缺乏逻辑上的严密链接,在表述上也时过随意。这无疑显现了张批的理论弱点,不过,这不会全然抹杀以《大学》注《西游》的价值,因为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个带有先验性的假设,是其全部评点的理论前提,整个张批的内容远比这个“假设”丰富、深入。纵观 52 条经目(其实即是 52 个方面),有许多还是符合或比较符合作品描写的实际的。如以“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批点孙悟空乱蟠桃故事(第五回),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来批点唐僧出世故事(第九回),以“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批点泾河老龙犯天条故事(第十回),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批注唐王游地府故事(第十一回),以“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批注试禅心故事(第二十三回)等等,从人物性格、情节内容上考察,无不侔合相楔。这些经目皆取诸《大学》,却仿佛为《西游记》而作,这不能不使我们相信两者间确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大学》注《西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二,以唐僧取经历难(九九八十一难)为达“至善”之途。

《大学》之道(即儒家“三纲”)是“在明明德、在新(一作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学倡导之修身养性、垂世立教,始于“明德”(弘扬、彰明人们光明的德性),终于“至善”(最完善的人生道德境界),其途径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八目”),作为修身养性的人生阶梯大致包括“内修”、“外治”两个方面,孟子以“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相概括。张书绅以《大学》注《西游》,以《西游》为《大学》,直接将作品的情节本事,唐僧所历九九八十一难等同于“《大学》之道”,达“至善”之途径。他说:

《西游》一书,是把一个人(唐僧)从受胎成形起,直写至有生以后;又从有生以后,直写到老,方才罢手。五圣成真,是人一生之事业已完,有此功德文章,自可以垂千古而不朽。此即“长生”之学,此即“至善”之旨也。

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方才作得将相,方才建得功业,方才成得大圣大贤,——是正面写而明言之;彼三藏之千魔百怪,备极苦处,历尽艰辛,方才到得天西,取得真经,成得正果,——是对面写而隐喻之。《孟子》一章,是言纲领指趣;《西游》一部,正是细条论目功夫。^①

由于孟子对“三纲八目”阐释最切,故张书绅以《孟子》类《大学》,直谓“把一部《西游记》,即当作《孟子》读亦可”。又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何以却写出许多妖怪?盖人为气稟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是为不明其德者一翻。于是忠之德不明,则为臣之道有亏;孝之德不明,则子之道有未尽。以至酒色财气,七情六欲,争名夺利,不仁不义,便作出许多的奇形,变出无数的怪状。所以写出各种的妖魔,正是形容各样的毛病。此德不明,至善终不可止,而如来又何以见也。^②

在他看来,取经道上的各色妖魔皆是人“气稟所拘,人欲所蔽”的产物,是人明德、新民、达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魔障,是“新民”即弃旧图新、去恶从善的对象。

《新说西游记》第九回据《西游真诠》(或说为《西游证道书》)补充的唐僧出世故事中谓唐僧乃西方极乐世界如来佛二弟子金蝉化身,因犯错遭贬历难,甫经出场亮相,便迭逢“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对此,张书绅最为看重,认为是全书之“大章法”,他在回后总批中说:

三藏却是金蝉化身,不惟埋伏“脱壳”之案,正见妙理无穷也。凡人生斯世,无非一个金蝉,莫不由凡入圣,以脱其壳,又何独一三藏!此正是作者的正意,蕴蓄之玄关,而世竟目为闲书^③,则误矣。

此回文字正是九九八十一难的前四难,是唐僧历难的开端,也是明明德、新民、达至善之途的开端,其中蕴蓄着作品的“正意”和“玄关”。

作品第九十九回“九九数完魔划尽,三三行满道归根”叙观音查看唐僧难簿,发现只八十难,离九九圆满之数尚缺一难,于是便派金刚去途中设难再起波澜。张书绅心灵神会,批曰:“少了一难,即少用一功,

①②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

③ “世竟目为闲书”云云,指此节文字曾遭世本刊落。

如何能造其极(至善)?亦一簣未成之意。”又说:“三三即是九九,八十一难,亦即九九之数。《语》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八十一难,少了一难,即是经炼不全,功夫不到处,如何言得成功?如何言得行满?即如杨雄、蔡邕、李陵,皆因不能死节,少此一难,千古令人叹惜,以议其大节有亏也。”至一百回,功德圆满,唐僧一行成真飞升,张书绅以“释‘止于至善’”为“经书题目录”置于回首,紧接着又批曰:“此回言灵山已到,真经已得,天德克全,人道悉备,已得至善而止矣。于是清者成其为清,和者成其为和,任者成其为任,时者成为其时。明、新各立其极于当时,功业共垂教于后世。此即‘长生’之学,此即‘至善’之旨也。”而在全文多处夹批“释‘止于至善’”、“一部《西游》,于此层层收煞,‘止至善’三字方不落空”云云。

其三,以读《西游》为释厄、劝学之法。

基于以上理解,张书绅进一步把《西游记》奉为“圣经”,提出读《西游》即是释厄、劝学的最佳方法,力倡“天下无人不可以为学,无人不可以为善”。他指出:

《西游》又名《释厄传》者,何也?诚见夫世人,逐日奔波,徒事无益,竭尽心力,虚度浮生;甚至伤风败俗,灭理犯法,以致身陷罪孽,岂非大厄耶?作者悲悯于此,委曲开明,多方点化,必欲其尽归于正道,不使之复蹈前愆,非释厄而何?

又在作品引首诗“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句后解释说:“《大学》,其传十章,莫非释厄之文。‘厄’即气禀、人欲所以困厄人之身心性命者,‘释’即解释也,故曰《释厄传》。”举世滔滔,非愚即妄,唯读《西游》者可以释厄渡困。

要之,张书绅对《西游记》的“释厄”功能十分心仪,他以为大儒邱处机能作《释厄传》,唐僧一行能释厄成真,天下人(读《西游》者)也不能达至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并引用孔子所云“柴也愚,参也鲁,师也僻,由也喭”之语来印证世人虽禀性不一,但明德劝善之心则同,“惟其无人不可以为学,无人不可以为善”。甚至不无自负地断言:只要《西游》一卷在手,则《五经》不用再传,《四书》亦可不作。唯“长春本天人之学,抱绝世之才”,“寻此(指《西游记》,下同)绝大之题目,构此绝世之奇文”,世人只要“少发其中之蕴蓄”,即可释厄,止于至善,

故而“吾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矣”!可谓对其心向往之,叹为观止。

这里,有必要论及张书绅对邱处机的看法。《西游记》作者为邱处机一说,由汪澹漪《西游证道书》肇始,在清代深入人心。但邱处机是元初全真教七真之一,龙门派创始人,他所作的《西游记》怎么会有《大学》之旨呢?这显然是一个先天的矛盾。张书绅的办法是把邱处机进行改造,重新包装成一代大儒、孔孟传人。他说邱虽系羽流中人,但本性思儒:“忆邱长春,亦一时之大儒者,乃不过托足于外耳”,正有如“微子去殷,张良离汉,施耐庵隐于元,贾阉仙隐于僧”,其为势所迫,不得已耳,“味其学问文章,品谊心术,无非经时济世,悉本于圣贤至正之道,并无方外的一点积习,盖即当时之水镜黄石,一隐君子也”。他认为邱处机之所以写作《西游记》,原出于儒者之宅心仁厚,“念人心不古,身处方外,不能有补,故借此传奇,实寓《春秋》之大义,诛其隐微,引以大道,欲使学者焕然一新”^①。他一再强调自己对邱处机以及《西游记》的崇敬之情,说:“长春本天人之学,抱绝世之才,而身落方外,当此明窗净几之下,实无可消遣此岁月,故寻此绝大之题目,构此绝世之奇文。”“吾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矣。”^②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大有当年孔子梦见周公、子贡颂扬孔夫子的架势。

客观地说,张书绅如此把邱处机改造、包装成“一代大儒”的做法,不无滑稽,但也从一个侧面看出他以儒学注《西游》的主观意图和自觉性,“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振兴儒学为己任,也实在是“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不遗余力了。

另外,在艺术创作和鉴赏方面,张书绅也提出了许多看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比如张书绅以“奇”说《西游》,盛赞其“无一不奇”:“观其龙宫海藏、玉阙瑶池、幽冥地府,紫竹雷音,皆奇地也;玉皇、王母,如来、观音,阎罗、龙王,行者、八戒、沙僧,皆奇人也;游地府、闹龙宫、进南瓜、斩业龙、乱蟠桃、反天宫、安天会、盂兰会、取经,皆奇事也;西天十万八千里,筋斗云亦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经即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卷以天地之数起,结尾以经藏之数终,真奇想也;诗词

①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

②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第一回回评。

歌赋,学贯天人,文绝地记,左右回环,前伏后应,真奇文也。”^①明清两代皆以《西游记》为“奇书”,但张书绅将以“奇”论《西游》推到极至,这对认识《西游记》浪漫主义神幻特征是功不可没的。

比如张书绅揭示出《西游记》“一笔三义”的艺术境界。他说:“《西游》每笔必寓三意:其事,则取经也;其旨,乃《大学》也;其文,又文章也。是以写取经处,先要照定正旨,又要成其文章。手弹丝弦,目送飞鸿。一笔写三义,已难;一笔解三义,更难。”盛赞《西游记》“文境之开山,笔墨之创见”,达到了“以山岳作砚,云霞作笺,长虹为笔,气化为文”的艺术仙境,令人“读之如入四时寒暑之中,俯仰其间,而莫识风云之奥妙也”^②。

再比如,张书绅指出读《西游》切忌胶柱鼓瑟,而要“通人读书,只往通处解”。针对《西游记》所述各难或有重复的诘难,他指出这正是《西游》妙处:“譬如欲写一猪八戒,先写一黑熊精;欲写一铁扇仙,先写一琵琶洞;欲写一宝象国,先写一试禅心。不惟文章与文章接,书理与书理接,而且题目与题目接,妖怪与妖怪接矣。”他还为此赋予以一个形象、响亮的名字:“隔年下种法”。继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之后,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方法和写作技巧。

针对有人提出疑问:孙行者大闹天宫,普天神将“莫能禁制”,而西天路上区区小妖,反而常不能取胜,“何乃自相矛盾”,张书绅解释了其中的“至理”(原因):“即如闹天宫,原是写小人(即‘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譬如有一小人在此横行,即有许多君子,实在亦无法可制,此其一也。又如火云洞,原是讲借债,未借之先,就是铁罗汉亦不能相强;既借之后,就是李老君亦不能相抗。此原理之不胜,非力之不胜也。”张书绅对孙悟空的评价未必正确,但他指出“此一时彼一时”,不能依死理一概而论,却符合艺术鉴赏的辩证法,也不失为真知灼见。

纵观张书绅的评点,虽多有偏谬,但上述一类不乏真见的意见俯拾皆是,所在多有,这里不能尽说。笔者以为,《新说西游记》作为评点本,是明清《西游记》评点的集大成之作,内涵丰富,理论价值亦大,但

①②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

客观地说,与金批、毛批、张批及后来之脂批相比,似还有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它的理论内容较为零杂散乱,其间谬误较多,故而尤其需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鉴别。

第 二 编

现代《西游记》学术史进程

第四章 现代《西游记》学术史概述

一、五四新文化与现代《西游记》研究开端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19 世纪中叶以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不断衰微窳败,几呈快速解体的迹象。一方面西方列强加剧瓜分中国的步伐,由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入侵;另一方面,一大批觉醒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信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别求新声于异邦”,自觉地学习西方,谋求强国富民之道,“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①。“西天取经”一时成为国人的共同信念和社会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蜂拥流入,中华大地风云激荡,“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作为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终于在 1919 年爆发,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将中国社会推入崭新的现代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为中国文学和学术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现代新文学拉开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帷幕,并与科学、民主的时代强音遥相呼应,自始至终成为整个五四新文化的重要一翼。早在五四前夕,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业已开始共举“文学革命”大旗。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1915 年 9 月)中首发号召:“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李大钊随即响应唱和,他说:“由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必须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 4 卷,第 1406 页。

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①呼吁与旧文学、旧文化作彻底决裂。随后,胡适在《新青年》(1917年1月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具体阐述了文学革命的纲领“八大主张”(“八不主义”)^②,提倡“活的文学”(白话文学),反对“半死文学”(古文文学);赞扬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特别是明清章回小说),针砭贵族文学(古典诗文)。他指出:“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明确提出“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在他们的倡导下,具有全新现代性意义的新文学以奔涌澎湃之势开展起来,其中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和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成为其伟大实绩的体现。

由于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大师推崇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以《水浒传》、《西游记》等为代表的白话通俗小说必然受到褒奖、重视。它们一改长期以来受鄙视的稗官野史、丛残小语的地位,一方面被视为中华文化沃土中的奇葩异卉,成为现代新文学创作的宝贵借鉴,另一方面则以中国文学典范的姿态昂首登上现代学术舞台,其思想、艺术以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得到重新衡估与评鹭,进而成为严谨的学术对象,小说研究则以茆然勃兴之势成为中国学术的重要领域,纵观其时的小说研究,它在五四新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十分突出,尤可注意者有二:

其一,现代小说研究一经肇始即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哺育。新文化的旗手们慧眼独具、早着先鞭,不惮开辟草莱之辛劳,身体力行——鲁迅于20年代前后在北大、北师大等高校轮番讲授中国小说史,并在《古小说钩沉》等小说史料学著作的基础上撰成《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将小说研究(考证)视为大学问、大事业,遍考《红楼》、《西游》、《三

①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

② 胡适在此文中提出的八大主张(“八事”)与稍后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中提出的“八不主义”精神一致,但表述上略有变化。

国》、《水浒》等小说名著,后集为《章回小说考证》一书,自成宏大体系;陈独秀曾作《红楼梦新评》,以佩之的笔名发表于1920年版的《小说月报》,后又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新式标点本《水浒传》作《水浒新叙》,该文开以民主及阶级反抗思想评论《水浒传》(以及其他小说)的先河——更有一大批五四健将和学界宿儒加盟参与:钱玄同、刘半农、沈雁冰、周作人、俞平伯、郑振铎、闻一多、徐志摩、陈寅恪、董作宾、顾颉刚、郭绍虞、冒广生、徐嘉瑞、赵景深、汪原放、胡怀琛、陈子展、谢无量、孙楷第,其间还不乏名震学界的经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余嘉锡、刘师培……^①小说研究群英荟萃,阵容壮观,在其时学界诸多研究门类中首屈一指。

其二,这一阵小说研究的浩大浪潮直接掀起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众所周知,在五四前夕的世纪之交,由于进化论等西方新学的流入和影响,新史学萌生而出: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成为20世纪“史学革命”的宣言。胡适、王国维、罗振玉、李济、夏曾佑、顾颉刚、陈寅恪、唐长孺、孟森、傅斯年、陈垣等纷起响应,一举完成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几乎是与此同时,“新红学”(这里所指为与传统的清代评点派红学相对应的现代《红楼梦》研究)爆发。王国维于1904年作《红楼梦评论》,引入叔本华哲学及方法,揭示出关于“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的哲学意蕴,“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的悲剧精神^②。这是红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系统性、学理性的现代性研究论文,体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文论的全新的现代性学术品质——学术思想、学术规范和学术形态。以蔡元培为主要代表的索隐派,其结论或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或为“抒国变沧桑之感,在曹雪芹亦有朝闻夕死可矣之悲”,“书中以甄指明,以贾指清,正统也,伪朝也”(邓狂言《红楼梦释真》);或为顺治皇帝和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故事,“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王梦阮《红

① 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列有完整的名单。

② 《教育世界》1904年第76—78号,转引自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6页。

楼梦索隐》)①,虽然不免牵强穿凿,但它采用了历史研究注重分析和阐释的方法,并非完全一无是处,事实上也取得了不少被后人认可的成绩②。及至胡适、俞平伯及周汝昌的“新红学”(专指与“旧红学”相对应的红学流派),卓然成为一门独立、成熟的现代学科。

应予指出的是,新史学与新红学(作为现代小说研究的主要方面)是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和相互推动的,正是各自所具备的现代性学术品质成为两大领域融合的基础。王国维在红学研究中吸纳西方哲学,在历史研究中则跳出旧套,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二重证据法”。胡适借鉴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史学界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但支撑其理论主张的实绩却来自《〈红楼梦〉考证》。顾颉刚一方面为“新红学”命名③,一方面创立“古史辨”学派,他主张“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历史观,其主要依据来源于对千古流传之孟姜女传说(小说)的考察④。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的急先锋,他一方面采用西方新学作为张扬新思想新道德的锐器,另一方面也竟以《聊斋》故事来戳穿旧思想的鬼把戏,成为他“惑经”、“叛经”的依据⑤。其余如陈寅恪、余嘉锡、冯友兰、董作宾、王重民、孟森、吴宓、汤用彤、汪辟疆等学者皆不薄稗官野言,兼治史学与红学(或者如《水浒》、《西游》等其他小说分支科目),且两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新红学与新史学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现代小说学研究不仅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型,也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并为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推波助澜。

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条件下发轫

① 以上引文均见诸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第六章《索隐派的代表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② 这种索隐派研究余波所及,甚至蔓延到其他研究领域,例如有人就将《西游记》当作“一份世界上最长的密码”来进行破译而别开生面。参见王国光《西游记别论》,学林出版社,1990年。

③ 顾颉刚在为俞平伯《红楼梦辨》(1923年)一书所撰的序中高度赞扬胡适、俞平伯红学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有“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之语,“新红学”与“旧红学”旋即成为《红楼梦》研究中的固定术语。参见《红楼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6页。

④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北京大学《歌谣周刊》1924年11月23日第69号。

⑤ 参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31页。

的。究其演进的历程,与新红学并行不悖,其取得的成绩——一个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也与新红学相媲美,共同成为五四新文化、新学术的光辉结晶^①。

二、现代《西游记》研究的辉煌历程

现代《西游记》研究发轫于五四之际,延伸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基本与中国社会和新文学发展同步。据其自身发展线索和学术面貌,大致可分为五四时期^②和五四时期以后(简称后五四)两个阶段。

一般人将胡适对《西游记》的考证作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开端,其时在20年代初叶。胡适曾记述这一“过程”:

民国十年十二月中,我在百忙中做了一篇《西游记序》,当时搜集材料的时间甚少,故对于考证的方面很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这一年之中,承许多朋友的帮助,添了一些材料;病中多闲暇,遂整理成一篇考证,先在《读书杂志》第六期上发表。当时又为篇幅所限,不能不删去一部分。这回《西游记》再版付印,我又把前做的《西游记序》和《考证》合并起来,成为这一篇。^③

这段话告诉我们:(1)胡适与鲁迅两位五四新文化大师对现代《西游记》研究开辟草创的奠基工作大约同时。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他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主讲小说,并撰成油印本讲义《中国小说史大略》,大约在20年代前后,而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正式出版《中国小说史略》在1923年。这一时期他与胡适还互通书信,就《西游记》进行反复切磋探讨。(2)胡适《〈西游记〉考证》实为渐次累积而成:先于1921年写成《西游记序》,发表于《亚东图书馆馆刊》(1921年12月),同期刊出的还有汪原放《古本〈西游记〉校读后记》、陈独秀《〈西游记〉新叙》;紧接着于翌年(1922年)在“病中多闲暇”之际写成《〈西游记〉考证》,发表在当年《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6期;后来又于1923年乘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西游记》新式标点本之际,把前述两文“合并起

① 这一问题涉及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历史评价,宜在后面作专题评介。

② 所谓五四时期一般指五四前夕至新文化浪潮消退,大约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

③ 胡适《〈西游记〉考证》。

来”,遂成今日所见之长文《〈西游记〉考证》。该文收入《胡适文存》(四),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初版,又载于《读书杂志》民国二十年(1931年)。

从实际的影响而言,以胡适(包括鲁迅)为开端是合理的,但如从学术史上进行还源探溯,那么现代《西游记》研究尚有更早的线索可寻:在梁启超、蒋瑞藻、钱静方、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学术研究中已有关于《西游记》的内容。自“小说界革命”以来,小说资料搜稽、目录纂述、史实考镜一时繁盛,黄人1907年作《小说小话》,蒋瑞藻1911年在《东方杂志》第8卷第1期发表《小说考证》,钱静方1913年在《小说月报》第4卷第1期发表《小说丛考》,皆涉及《西游记》的内容。又有署名颠公^①者在《文艺杂志》1914年第4期刊出《〈西游记〉为明人吴承恩所作之异说》一文,其内容与叙述方式都不同于一般史料学和目录学著作,应该视其为最早的一篇现代《西游记》研究论文。还有几部中国小说史著作出现在胡适、鲁迅有关著述之前或同时,主要有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0年出版)、郭希汾《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中国书局1921年版)、庐隐《中国小说史略》(《晨报》附刊《文学旬刊》1923年6月1日、7月1日、11、21日,8月1、11、21日,9月1、11日),都对《西游记》有所评论,如张著关于《西游记》作者,以为非明人吴承恩,而出于元人之手;庐著称《西游记》“极幽玄奇怪之思”,与《水浒传》、《红楼梦》“可配为天、地、人,三者在中国小说界上,诚足鼎争学霸”^②,给予其很高评价,所具学术品格也已具备现代性学术因子。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于民国四年(1915)从日本影印带回《新架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列入罗氏主持的《吉石盦丛书》出版,并附有王国维、罗振玉两氏分写的跋(凡三篇),简约地介绍了《诗话》的情况和价值。由于它与《西游记》有十分密切的源流关系,这三篇跋文理所当然成为其时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与《诗话》一起立时成为研究《西游记》的宝贵资料。胡适于1922年2月11日的

① 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据《容窗笔记》云,颠公系清末江阴人金捧闾,字玠堂,贡生;另毕树堂《小说琐志》谓系松江雷缙,字君曜,莫知孰是?”

② 参见庐隐《中国小说史略》,《晨报·文学旬刊》1923年9月1日。

日记中写道:“《唐三藏取经诗话》残本一册,罗振玉影印。……可供《〈西游记〉考证》的材料。”^①罗王二氏大约正是前文所说“承许多朋友帮助”写成《考证》的“朋友”(另外还有鲁迅、董作宾等)。鲁迅在1926年、1931年分别写有《关于〈三藏取经纪〉等》、《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两文,并与郑振铎发生过一场学术讨论,这也足见《诗话》的重大学术价值。应该说,罗振玉、王国维以及梁启超、陈寅恪等国学大师的加盟,为《西游记》研究注入了极大的学术含量,提升了它的学术品位。

当然,这一阶段《西游记》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胡适《〈西游记〉考证》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之中,因后面有分章专论,这里不再赘述。其羽翼者则有汪原放、陈独秀、董作宾、赵景深、傅惜华、徐旭生等五四健将和学术名流。董作宾(字彦堂)是甲骨学一代宗师,殷墟发掘的奠基者主持者之一,与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以及郭沫若(字鼎堂)并称“甲骨四堂”。胡适在《读书杂志》第6期(1922年)刊出《〈西游记〉考证》伊始,董作宾即据自己掌握的考据资料,翌年写成《读〈西游记考证〉》一文,与胡适《考证》一起收入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出版的《胡适文存》,后来又发表于《读书杂志》民国二十年(1931)第7期,成为胡文最早的回应文字。该文首先赞同胡适对吴承恩的考证,称誉说“从此吴承恩的姓名,藉着他底文学作品(《西游记》)得以永远不死”,并称:“现在我们索性把搜求所得,未曾见于《考证》里面的材料,写了出来,供献给适之先生,让他作个综合的研究”,且敦促胡适“作出一个(吴承恩)年谱来”。其次,罗举该文披露的史料以及结论有价值者:(1)根据同治十二年(1873)《长兴县志》名宦传页十五(吴承恩传)、《明史》徐中行传和《明诗综》所引李本宁《大本山房集》,综合考定吴承恩官长兴的年代(大致范围);(2)据《淮安志》和《海州志》有关记载,指出水帘洞系在海州云台山,云台山又史称苍梧山、青峰(风)顶、覆釜山、逢山、郁州,其名称多与仙山仙境有关;(3)发现《明诗综》所录吴承恩佚诗七首,《淮安志》所录吴承恩佚诗二首。胡适读后,即据此补作了一份吴承恩年表,大大丰富了《〈西游记〉考证》对吴氏

^① 转引于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生平的记叙^①,由此可见该文价值之一斑。

徐旭生《〈西游记〉作者的思想》一文发表于《太平洋》4卷9号(1924年12月),开始将作者(吴承恩)的思想与作品思想结合起来,从历史、思想与艺术三个方面研究《西游记》。其历史批评的结论是指出吴承恩实有所本,是根据史载与民间传说,以“一种新精神,新形貌,把神奇的传说化作不远人情的故事”。其思想批评的结论则为反对自清初以来流行之“三教合一”:佛道皆非吴承恩所持有,因为“吴氏对于佛学知道得很浅”,“对于道家,实在不能存什么信仰”,而张书绅所谓“儒家正心诚意说尤其荒谬”。他认为吴承恩《西游记》是以三教故事(或思想)“借题发挥”,阐发丰富的现实寓意。

另外,陈独秀《〈西游记〉新叙》站在社会革命和文学革命的立场,批判了《西游记》“三教合一的昏乱思想”;赵景深《〈西游记〉的民俗文学的价值》(载《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7月5日)从民俗文化角度来鉴析《西游记》的价值;傅惜华《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之研究》(载《南金》1927年1号)虽然沿袭了杂剧作者之误,但却是最早一篇关于杨东来批评《西游记》杂剧的论文;浩川《供研究〈西游记〉者参考》(载《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9月25日)一文,大抵与董作宾《读〈西游记考证〉》同类,旨在披露若干吴承恩和《西游记》的研究材料。这些文章视角不一,引征材料新颖,颇多可观之处。

20年代中后期,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但现代《西游记》研究并未随之冷落,只是逐渐褪却了表面上的一些喧闹,在学术上反而更显向理性回归的趋势,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相对疏远开来,因而其时的《西游记》研究表现出更强更显著的学术自觉的特征。鲁迅、胡适等第一代拓荒者继续关注着这一研究领域,而以郑振铎、孙楷第、俞平伯、赵景深、陈寅恪、刘修业等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现代学者以其卓越的学术才华和成果,将《西游记》研究推向深入。

郑振铎、孙楷第是鲁迅、胡适学术事业杰出的继承者、发扬者,他

^① 与《〈西游记〉考证》比较,这份年表新增内容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徐中行进士;三十九年(1560)至四十一年(1562),徐中行丁父忧,在长兴;万历六年(1578)中行死于江西布政任上;七年(1579),吴承恩作《瑞龙歌》。另外对吴承恩生卒年、中岁贡年份、任长兴县丞时代都作了修改。事实上是对吴承恩生平进行了重写。参见胡适《〈西游记考证〉后记二》,《胡适文存》第2集第2卷。

们是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殿军,也是五四以后《西游记》研究新阶段中的排头兵。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汇集了胡适《考证》、鲁迅《史略》以后十年间的新发现、新成果,是《西游记》研究中名副其实的“世纪杰构”;孙楷第秉承传统治学中版本目录学研究,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等小说目录学著作中,对《西游记》颇多精见,可谓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关于郑振铎、孙楷第以及稍后的刘修业的《西游记》研究容在后面详述。

俞平伯作为五四新文学健将,1923年出版《红楼梦辨》,与胡适共创“新红学”学派,但涉足《西游记》较晚,且与胡适从红学盟友一变而为论争对手,可谓五四时期学界奇观和佳话。1933年7月,他在《文学》创刊号发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一文。其驳斥的对象即是胡适。1931年五六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刊出在宁夏发现的无名氏《销释真空宝卷》,胡适作跋文对此作了介绍、鉴析,文中重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俞平伯随即作《驳〈跋销释真空宝卷〉》,除对宝卷抄本年代、真空和尚事迹等问题提出商榷意见,尤有意义者,则是明确对吴承恩著《西游记》一说提出异议,他指出:

现存《西游记》的最古的版本是明刻世德堂,上写着“华阳洞天主人校”,有谁说校订者是吴承恩?(吴是江北人,华阳洞在江南)这本上有壬辰(万历二十年,一九五二)秣陵陈元之《序》:“《西游》一书不知何人所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踈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而充叙于余。”既说“秩其卷目梓之”,序首又题“刊《西游记序》”,这概是最初的刻本。……或曰“天潢”,或曰其门客,词虽吞吐,均非吴氏明甚。

这是自鲁迅、胡适于20年代论定“吴承恩说”后第一次提出完整的否定性意见,虽然在他之前已有同类意见存在(如颠公),但就其论述的力度和影响而言,此文为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非吴著说”的主要代表,并直接开启了后来海内外学者愈演愈烈的“非吴著说”的思潮^①。

^① 关于“非吴著说”,80年代后主要代表论文有: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张静二《有关〈西游记〉的几个问题·撰者是谁的问题》,载《中外文学》(台北)1983年第12卷5期;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载《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对《西游记》的渊源学研究,在20年代前后开始,梁启超作有《千百年前之留学生》(《改造》四卷一号),详细分析了玄奘取经的本事渊源^①,但集大成者当为陈寅恪。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对东方文化(如印度佛经)造诣尤深。他在30年代前后开始“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这一课题的研究,先后撰成《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论文,其中择取的研究文本中即有百回本小说《西游记》。这一课题对于揭示《西游记》渊源及演变贡献颇多。其主要成果为:从印度史诗《罗摩延传》(现通译为《罗摩衍那》)考出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渊源,从义净所译佛经考出猪八戒高家庄招亲的渊源,从《慈恩传》(即《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考出沙僧流沙河故事的渊源^②。因为这一研究同时隶属于比较研究,以中西文化对照,小说与佛经等其他材料校勘为主要方法,所以也可视为《西游记》比较研究的重大成果。应予指出的是,陈寅恪的研究,在关于孙悟空来源的论争中成为“外来影响说”的有力证据。

192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射阳先生存稿》。以此为契机,吴承恩研究深入展开,并成为《西游记》研究的一大中心论题。刘修业开始校理吴承恩诗文、考证吴承恩生平交游事迹的工作,赵景深、汪馥泉等撰写了吴承恩年谱。

赵景深在这一时期以较大精力从事《西游记》研究,涉及面也较广。1933年他发表《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③,1937年写成《〈西游记〉杂谈》^④,简要评述了杨致和本《西游记传》。这两篇文章涉及了《西游记》的成书和版本的若干问题。不久又着手撰写《〈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最初发表于《中国学生》1937年2卷1—4期,经修改后先后收入《小说闲话》(北新书局1937年版)和《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60年版)。现将《年谱》摘要如下:

弘治十三年庚申(1500),吴承恩生。

① 对此,胡适曾有提及。参见《〈西游记〉考证》。

② 参见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民国十九年二本二分册,收入作者《金明馆丛稿二编》。

③ 发表于《文学》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卷一号。

④ 见赵景深《小说闲话》,北新书局,1937年。

嘉靖八年己丑(1529),三十岁。作《海鹤蟠桃篇》。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四十五岁。得岁贡生。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六十一岁。始任长兴县丞。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六十七岁。辞长兴县丞。

隆庆四年庚午(1570),七十一岁。在淮安,与陈文烛、徐中行往来酬应,酒酣论文。约在此时,始作《西游记》。

万历七年己卯(1579),八十岁。作《瑞龙歌》。

万历十年壬午(1582),八十三岁。吴承恩卒。

由于此时已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吴承恩资料齐备,故而该份年谱比之胡适、董作宾以前所列年表要充实、准确得多,并成为刘修业《吴承恩年谱》的先声。

及至40年代,战火纷飞,连年板荡,学术凋零,但《西游记》研究并未完全泯灭,仍在艰难中进行。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论文有许郭立诚《小乘经典与中国小说戏曲》(《艺文杂志》1944年9月1日第2卷第9期)、台静农《关于〈西游记〉江流本事》(《文史杂志》1947年6月16日第1卷第6期)、袁圣时《〈西游记〉研究》(《台湾文化》1948年1、2月3卷1、2期)、冯汉鏞《孙悟空与猪八戒的来源》(《东南日报》1948年4月21日)、庄一拂《目连戏与〈西游记〉》(《通俗文学》77期,1948年4月26日)、汪浚《吴承恩与〈西游记〉》(《文艺复兴》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中国文学研究号”下)等。

许郭立诚《小乘经典与中国小说戏曲》大抵遵循着陈寅恪渊源学和比较研究的路数,唯更加仔细、详尽。仅关于《西游记》的人物和情节,他从各类小乘经典中揭橥得出的渊源(原型)约有十条之多,例如《六度集经》中的猕猴王故事、《中阿含经》所记大目犍连尊者入定时入魔腹中故事与《西游记》相关情节的对勘,十分深入,其材料和结论都在《西游记》研究中别开生面。

我曾在《导论》中指出汪浚所作《吴承恩与〈西游记〉》是《西游记》学术史上最早“带有学术史性质的著述”,这是考察这篇长文的具体内容后得出的想法。其文所述内容(仅举章节标目)如下:一、天启《淮安府志》始载《西游记》;二、阮葵生反对入志;三、吴玉搢在《山阳志遗》里的记述;四、丁晏的再提出;五、陆以湑、邓文如、冒广生的记述;

六、蒋瑞藻的《小说考证》；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八、胡适的《考证》；九、董作宾的《读〈西游记考证〉》；十、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十一、赵景深的吴承恩年谱；十二、《西游记》的写作年代。另有附录：吴承恩与李春芳、吴承恩与长兴县丞、吴承恩善书、元人《大圣降水母》小说等五题。现代《西游记》研究自“五四”时发轫至汪浚于民国末年（1949）写作本文，几乎穿越整个现代中国发展历程，亟须予以总结、归纳，故其学术史意识开始萌生。对此，胡从经称之为“吴承恩及《西游记》的研究小史”，其意义在于“使截至四十年代的有关记述与研究一目了然”^①。评价颇为公允。该文确实可以被视为对现代《西游记》研究的一次粗略的回顾与总结。

三、现代学术范式：一个历史的总结

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上，“五四”无疑是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段里，《西游记》研究发生了一次伟大的巨变，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并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学术范式^②。当然，将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推为现代学术范式，至今还是一种未曾有过的新认识，也无疑是一个意味深厚的新课题。此种评价，在以往的学术界，举凡数部古典名著的研究，似乎唯《红楼梦》才能当之。然而，在对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作整体审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它与《红楼梦》研究同受五四精神哺育，不特其学术精神一脉相承，就其现代性学科形态而言，也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尽管它们在实现现代性转型的程度和影响上确实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俞平伯等五四学术大师，皆治学广博，多以一人之力同时涉足于《红楼梦》与《西游记》研究，如胡适 1921 年作《〈红楼梦〉考证》，1923 年作《〈西游记〉考证》，从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上都是一以贯之。鲁迅 1920 年作《中国小说史大略》一气呵成，其中对《红楼梦》与《西游记》的基本看法都已确

^① 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231 页。

^② 作者按：西方现代哲学家库恩有“范式”论，这里仅借鉴这一术语，与其理论内核没有必然联系。

立。诚如“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建立”标志着《红楼梦》研究现代学科形态的确立^①,由于鲁迅、胡适两位新文学大师的奋力开拓,复加郑振铎、孙楷第以及刘修业、赵景深等著名学者的不懈努力,现代《西游记》研究凝结起一股汹涌澎湃的强大合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并迅速汇入到现代学术进程之中。其现代性学术品格的确立,标志着古典学科形态的终结,现代学科形态的开启,在长达四百年的《西游记》学术史流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并迅速为后世持续性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源。在今日全面深入地评价、总结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之际,将其作为一个现代学术范式,便成为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之事。

事实上,促使我进行这一思考的,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在当下《西游记》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对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作单边否定的倾向。近年来,中外《西游记》论坛都先后出现了这一类针对鲁迅、胡适的观点。如有日本学者指责他们“主观地将吴承恩判定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认为当年鲁迅、胡适清洗“邱作说”是“愚蠢”的,论定“吴作说”则是“轻率”的^②。国内也有学者与之遥相呼应,声称“揭开”了《西游记》作者的“谜底”,发现了作品的“奥义”,说什么《西游记》是一部“演金丹大道之作”,其作者是道门羽客中人,这样,鲁迅、胡适的一系列论断便“不攻自破了”,他们甚至叫嚣正是鲁迅、胡适“一笔抹杀”了《西游记》的文化意义,并且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砸烂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③。还有的学者虽然承认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大师“为学博大,造诣精深,为后人鲜能企及者”,但又指认他们的《西游记》研究“仅余事尔”,因“案头纷繁,不容回顾”,意为浅尝辄止,或者难免“妄议”,故而不足为训^④。这些意见虽然其“目的”各有不同,但表现出来的对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缺乏了解却是共同的,其中,割断历史,随意附会,“自命新奇,务反旧

① 顾颉刚《红楼梦辨·序》,参见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② [日]中野美代子《吴承恩与丘处机——围绕作者的误解》,《西游记文化学刊》第1辑,东方出版社,1998年。

③ 李安纲《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西游记〉文化学刊》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④ 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说”，“轻率”地作判词、下结论的浮躁文风也颇为明显。鲁迅、胡适不是不能怀疑，也不是不能对五四时期的一些论断持异议，学贵置疑，多歧为尚，献疑解惑，追求真谛，实在是学术的旨归。然而从事《西游记》研究必须恪守理性法则，秉持学术公心，发布新论必须言而有据，言之成理，否定不能简单化，如果所论只在重拾“邱作说”、“证道说”一类明清旧说的唾余，而并无多少新意可言，反而无视鲁迅、胡适的历史贡献，甚至将他们诬为《西游记》的“罪人”，则不仅是无知至极，而且是无理透顶。这绝对不是正确评价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方法，对此，凡有学术良知的研究者都有责任作出回应。我们相信，当我们对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进行整体审视，并从现代学术范式的高度揭示其学术史意义，总结它对后世《西游记》研究的学科典范价值，那么，以上这些对于鲁迅、胡适的“轻率”否定之辞便真的会“不攻自破”。显而易见，这是我形成这一理论课题的直接动因和契机。

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之为现代学术范式，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其时社会变革和思想潮流在学术界的反映，是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思想与学术实现现代转型的必然产物。作为其学术背景，五四之际，发生了中西文化富有现代意义的大碰撞、大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别求新声于异邦”，而进化论等西方新学和实证主义等现代科学方法的流入，直接引发了中国思想和学术的裂变，《红楼梦》、《西游记》等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首当其冲，可以说得时代风气之先，最早启动了变革的历程，成为现代学术的开端。

首先是小说观念的变革。鲁迅曾宣称：“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①顾颉刚后来也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来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②正是进化论的流入加速改变了人们对小说的看法。小说繁盛远在诗文之后，所以向被视为“小道”，在中国文学中位居末流；而以后来居上的进化论观点来看，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

① 鲁迅《三闲集·序》。

②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

的最后阶段和最高阶段,《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理所当然地担当了中国古典文学“终结者”的角色。恰如鲁迅的评价:“其在文林,有如舜华,是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①可见,现代精神的灌注,促使小说的地位空前提高,从其势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一跃而为文学世界中的翘楚。在这一现代文学观念指引下,胡适热衷于小说考证,并把它视为一项前所未有的“大事业”;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旨在打破“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②。在《西游记》研究中,以《〈西游记〉考证》(胡适)、《明之神魔小说》(鲁迅)、《〈西游记〉的演化》(郑振铎)、《〈西游记〉目录提要》(孙楷第)、《〈西游记〉民俗文学的价值》(赵景深)、《〈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陈寅恪)为代表的杰构佳作应运而生。这些文章的一大特点便是高度评价《西游记》的艺术成就,探幽烛隐,含英咀华,发掘其丰厚的审美文化的价值,其为最伟大之小说,其作者(吴承恩?)为最伟大之小说家,遂为学界定讫。

其次是学术方法的变革。“五四”之际,西风东渐,现代科学方法蜂拥流入,其影响至大者首推实证主义。1919年,美国实证主义大师杜威来华巡回讲演,受到热烈欢迎,几度逗留,直至1921年始归国。杜氏所讲,大抵不离实证主义范围,其宗旨在于重实证、求真知,“从事实上求真理知识”、“去做真理的主人”^③。在此种哲学影响下,中国学术的现代方法论开始确立,利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成为其时学界潮流。如五四新文化先驱者蔡元培主张:“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中为更进之发明;非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④王国维倡“二重证据法”:“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以两者相互印证^⑤。后来陈寅恪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三重证据法,复加“异族之故书”,“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⑥。

① 鲁迅《古小说钩沉·序》。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题记》。

③ 参见白吉庵《胡适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

④ 转引自徐兰婷《倡学术自由,开一代新潮——学界泰斗蔡元培校长》,《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39页。

⑤ 《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⑥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胡适是杜威的传人,更得实证主义的精髓,20年代初期他即把自己的治学方法归纳为五条:(1)特殊的,不是笼统的;(2)疑问的,不是盲从的;(3)假设的,不是武断的;(4)试验的,不是固执的;(5)实行的,不是空谈的。后来又概括为四条:(1)怀疑,有了怀疑态度,就不会上当;(2)事实,我们要求实事求是;(3)证据,就是拿证据来;(4)真理,朝夕去求真理,是尽一点责任。最后归根结底,抽象、凝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原则^①。

《西游记》研究体现了这一科学方法的实绩。鲁迅、胡适从事实出发,以证据说话,考定《西游记》作者为淮安儒生吴承恩,逐一洗去明清时期谈禅、证道一类臆断妄论,把《西游记》研究牵引到符合学术规范、贴近文本实际的轨道上来。郑振铎、孙楷第以及马廉、王古鲁、王重民、赵景深等致力于搜罗史料,探寻异本,终于将明清两代的《西游记》版本蒐集齐备,从而列定《西游记》版本次序,揭示出它在漫长的世代累积中的演化轨迹。1931年,世本与朱本被发现,胡适欣喜地说:“从此《西游记》的历史的研究也可以有实物的根据了。”^②郑振铎则认为新证据的出现打破了《西游记》研究的“黑暗时代”。以此为契机,《西游记》研究从对象、方法和学科形态上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裂变,其现代学术品质全面形成,从而开创了一个《西游记》学术史上的新阶段。

还应该看到,除却西方新学的推动,《西游记》研究学术范式的形成,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裂变,特别是《西游记》研究自身的历史演进。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发展至乾嘉朴学以归纳类比的方法训诂文字,以无征不信的原则考据史实,已有了现代科学精神的萌芽。正如胡适指出:“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都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又说:“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③这种科学因子与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构成了五四时期学术的最佳

① 参见白吉庵《胡适传》,第195页。

② 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2年。

③ 转引自《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形态,曾被梁启超誉为“中西文明结婚之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①。胡适、鲁迅、郑振铎等新文化大师博古通今,中西融合,他们的《西游记》研究既植根深厚的中国学术传统,又善于吸纳西方新学的科学方法,贯穿着强烈的现代科学精神,具有充分的现代学科品质,特别是以科学理性检视以往的《西游记》学术史,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全面订正了明清时代的种种谬误,从而取得了许多划时代、开创性的成果,当之无愧是这样的“宁馨儿”之一。

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作为学术范式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还具有内在的学理规定,其标志是一系列确定性的内部品质和表现特征,它不仅在学术品质和操作层面上可作清晰的量性界定,而且在学科形态上凝结为相对固定的学术模式,在可持续性发展意义上表现出可贵的典范效应。如以明清时期小说评点为比较的参照系,这些特征大致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科学理性精神的灌注。

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认识和探求真理,是在理性精神指导下的高级认知活动。梁启超说:“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②但在过去的《西游记》研究中,学术的理性法则并不健全。明清之际,《西游记》研究首次形成高潮,各派评论蜂起,众说纷纭。但作为重阐释、重解读的传统研究方法,小说评点多半是感悟式、即兴式的,停留在审美欣赏的体验层次上,虽有轻灵新奇、言简意赅的优点,但也还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精神。至于那些以《易》、以《大学》、以仙道来解释《西游记》的评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则纯粹是出于评论者的主观意念和预设,以谈禅、证道等“一己之私见”强加于作品,这与其说是对《西游记》的研究,不如说是对《西游记》的附会。如作为明清《西游记》评点发轫的世本,在第一回美猴王求仙访道至须菩提祖师住处“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时加评点道:“灵台方寸,心也”;“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后来的李卓吾评本不仅照抄这条评注,又加评说:“一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页。

②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中西文化》,1922年8月23日《时事新报·学灯》。

部《西游记》此是宗旨。”结合他在回前诗“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之句的评点：“‘释厄’三字着眼，不能释厄，不如不读《西游》”，可知他是将《西游记》附会为心学著作了。这一类评点渗透着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不乏灵气与感悟，但显而易见失之于分析的简单、褊狭，表述的笼统、模糊，一句话便是理性精神的淡薄，缺乏学术品质，也不能科学地揭示出作品的实际蕴含。这种纯粹主观、轻视学理的评论在后来汪澹漪《西游证道书》、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等评点本中，有近乎恶性的发展。

现代《西游记》研究确立了重证据、重实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用理性分析的方法避免先入为主的臆断，代替不合逻辑的妄说，从而形成了科学的学科格局和形态。鲁迅、胡适是这一科学研究的奠基者，他们的卓越的研究实践成为后人感佩的典范。为了考证《西游记》作者、源流等问题，他们不断地相互切磋、交流史料，尽可能占有资料，掌握证据，搜集范围除了一般的文史领域，还涉及道藏、佛典、方志、家谱，对于一致的看法相互引录、印证，对于不同的意见则展开激烈的驳难、论辩，并且秉持学术公心，敢于随时承认错失，修正谬误。如胡适根据鲁迅、董作宾等人搜得的关于吴承恩的资料写成一系列《西游记》考证的文章，但当鲁迅将《纳书楹曲谱》中有关无支祁的材料抄写给胡适时，胡适却坚决反对鲁迅以无支祁为孙悟空原型的看法。鲁迅则对胡适关于《西游记》主题的揭示深表赞同，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发挥说：“（《西游记》）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还于文后特别注明“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①。鲁迅甚至向比他年轻一辈的郑振铎公开承认“错误”，他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的《西游记传》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那精确的论文，就抄录在《徇傚集》里。”如此为追求真理而不计私利，不拘私交，不耻下问，恪守以理服人、以诚相待、平等论学的治学态度，成为学界佳话。它们充分体现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科学理性精神，并为后来者提供了严谨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治学的楷模。

其二,治学方法的现代化。

由于科学理性精神的灌注,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在治学方法上也出现了以理性分析代替主观臆测,用事实证据检视先验假设的特征。结合其时的研究实际,现代方法论除了重实证的一般原则,在多元比较研究和动态历时性研究两方面取得了重大建树。

先说多元比较研究。传统的《西游记》评点是单一的文本研究,重在阐述文字、发其幽思。汪澹漪评本第十八回“高老庄行者降魔”回评:“篇中描写行者变翠兰处,妙在不真不假,不紧不松,不甜不苦,情文两绝,使老猪笑啼死活不得,才是传神绘影之笔。若使见面就打,何异《水浒传》之‘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耶?”虽然涉及与《水浒传》的对比,但这一类文字殊不多见,同时其比较也未具体展开,更谈不上自觉、明确的多元比较研究。

现代《西游记》研究中,最早明确倡导比较研究方法的是胡适,他说:“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需解释,自然明白了。”并且把它视为打破传统方法“闭关孤立”局面的有效途径^①。他在《〈西游记〉考证》中,将《西游记》与《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比较,揭示出取经动机、背景、取经人身份等一系列变化。又将它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比较,得出了孙悟空形象来源于印度神猴哈奴曼的结论。鲁迅的《西游记》研究也贯穿着比较研究的方法,并且卓有成效。他将《西游记》与《三国》、《水浒》等作品作多元综合比较,认定其为神魔小说,对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定位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常以《西游记》为比较的参照论述其他作品,如论《封神传》“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鼎足视之者也”;论《西游补》谓只得《西游记》余韵,“惟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鲁迅的比较研究最富学术贡献的在于:第一次将百回本《西游记》与简本《西游记传》作了详细比较,发现、提出了认识《西游记》演化史上许多

^①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923年1月第1卷第1期。

重大问题的线索,为后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向。

在鲁迅、胡适的影响下,《西游记》比较研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孙楷第 30 年代作《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将各种不同文艺种类的《西游》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许郭立诚《小乘经典与中国小说戏曲》通过比较《西游记》与小乘经典情节上的契合关系,比较深入地论述了《西游记》受佛经的影响,以及在内容与形式方面蜕变的痕迹。

再说动态历时性研究。传统的小说评点属于静态文本研究,所作阐释多局限于文本自足封闭系统,各派评点或谈禅,或释儒,或证道,其论述范围比较褊狭。由于进化论的影响,现代学术注入了历史的观点,梁启超最先倡导历史研究法,接着顾颉刚创立古史辨学派,构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胡适研究《西游记》采用的是“历史的演进法”,并据此初步地考察了《西游》故事几近千年的演化;鲁迅则是以史统论,以论证史,史论结合,具有很强的历史感。

对于动态历时性研究方法,国学大师陈寅恪于 30 年代初所作《〈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不失为光辉的典范。据其自陈,他对《西游记》的研究是以“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因考其起源,并略究其流别”,从而推论出《西游记》“故事演变之公例”^①。这种“溯其本源,析其成分”的源流研究得到了三个实例的印证:(1)《贤愚经》中顶生王升天因缘故事和印度史诗《罗摩延传》(今译《罗摩衍那》)中工巧猿造桥渡海神技,是“《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故事之起源”。(2)义净所译佛经所载天神化大猪故事当为“《西游记》猪八戒高老庄招亲故事之起源”。(3)《慈恩法师传》所载莫贺延碛(沙河)故事必为《西游记》沙和尚故事的蓝本。这三大实例除第三例为“世人习知”,胡适《〈西游记〉考证》已论及外,余皆为陈寅恪首度发现,这充分显示出他渊博广大的学识,也充分体现出动态历时性研究方法的实绩。它不仅在《西游记》研究中有重大贡献,而且对整个小说研究都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直接推动了小说渊源学的形成。

其三,现代学科形态的体系性和独立性。

我在《鲁迅、胡适与〈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五四时期〈西

^① 见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718 页。

游记》学术史论之一》^①一文中已先行指出:研究领域的多方面拓展,全新的研究方法的确立,其结果必然会引发学科形态的更新。《西游记》研究现代学科形态的呈现是作为学术范式的重要学理规定。与传统的《西游记》研究相比,其现代学科形态的变更主要表现在:从零星的评点形式上升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从依附于文本的从属形式蜕变为独立的学术形态。

关于小说评点的表现形式,叶朗《中国小说美学》曾作一般性概括,大致有序跋、读法、回前或回后总评、眉批、夹批或旁批,同时还有圈、点等辅助手段,不可不谓灵活、丰富而富有中国特色^②。不过,作为评点主体的眉批、夹批和旁批是随意、零星和即兴式的,而包括序跋、读法以及其他附录在内的整个评点在结构形态上多半是散乱无序的,各项因素缺少内在的逻辑联系。《西游记》评点亦复如此。以最为完备的汪澹漪《西游证道书》为例:首置虞集《西游记原序》、《丘长春真君传》、《玄奘取经事迹》、《仙诗绣像》,回前总评署“澹漪子曰”,正文中有大量夹批。其中虞集《序》是伪托,与丘(邱)长春、玄奘两传旨在推销“邱作说”,《仙诗绣像》寓读法,然其《悟真诗》意在宣扬金丹大道,与《西游记》的实际内容实在并无多少关联,整个评点结构的庞杂散乱由此可见。现代《西游记》研究大大强化了学科的体系意识,对从作者到文本,从作品的思想到形式的各项研究因子进行全面整合,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学科形态。这种学科形态的总体构成可以成熟的《红楼梦》研究作为比照。“红学”一般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考证)学以及文本研究四大板块。审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形态,其构成与“红学”完全相同。对《西游记》作者的考证是鲁迅、胡适的主要工作,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吴承恩著《西游记》”的结论尚有不同意见,但这一深入繁复的吴承恩研究是客观事实,吴承恩已历史地与《西游记》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其最终结论如何,将永远成为《西游记》研究的重要内容,从鲁迅、胡适到赵景深、刘修业,其学术贡献也不会被抹杀。《西游记》版本的复杂性较《红楼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明本与清本、全本与简本、官板(包括王府本)与私刻诸种关系的错综夹缠,更是为

① 载《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

② 参见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红楼梦》所不具备,郑振铎、孙楷第两位学术大师为厘清《西游记》版本线索倾注了大量心血,初步建立起《西游记》研究的版本目录学内容。《西游记》是一部经过几近千年演化历史的世代累积型巨著,从作者到内容都留下了种种疑团,对其探佚解密的工作,从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以来数十年间从来没有间断,新发现、新成果成批涌现,极大地丰富了《西游记》研究的学科内容。《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博大精深,向有“天书”之誉,对其文本价值的研究不仅属于一般文艺学研究的范畴,而且还构成了整个《西游记》学科形态的基础。由此可知,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对象体系已全面确立,一个具有相对完备、成熟的学科形态宣告成立,“《西游》学”稍具雏形。

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从学科形态上还具有学术的独立性品质。以往的《西游记》评点式研究依附于原作,是文本的从属形式。而这种学术的独立性品质完全打破了附庸地位,而呈现独立的形态。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它独立于政治等其他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视《西游记》研究为一项纯粹的学术活动。鲁迅、胡适是五四新文化启蒙大师,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斗争性,但他们对《西游记》主题的揭示却出乎当时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鲁迅说《西游记》“出于作者之游戏”^①,胡适指出《西游记》是一部“滑稽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指谈禅、证道之类)^②。如果离开学术的独立精神,我们今天就很难理解何以会出现这样重大的文化反差。二、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它开始独立于文本,不再成为原作的附属性内容。鲁迅、胡适等人的《西游记》研究,虽然也不乏序跋、评注、书信等形式,但更多的是采取了现代科研论文(或论著)的形式。它从思想立意到表达形式都相对独立,阅读这些论文,既可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但更能感受到其自身理性思辨的力量。可以说,这是现代《西游记》研究在学科形态上的重大更新。传统的研究中也不乏精辟的见解,但鲜见独立的论文形式。如纪昀从《西游记》中发现多处内证,认为《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其作者不可能为元初道士邱处机,结论不可谓不醒目,但他却采取了幽默小说的形式,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② 胡适《〈西游记〉考证》。

虚拟了一个扶乩巫术情节来讽刺邱作说的谬误^①。虽然也有其特殊的价值,但毕竟远离了学术本体,学术上的影响力也受到制约。后来,鲁迅、胡适在此基础上撰写成严谨的考论文章,一举论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二者在学术品格上的价值高下,不辨自明。

综上所述,科学理性精神的灌注,治学方法的现代化,现代学科形态的确立,这三方面相互联系而又层层递进的内容,构成了《西游记》研究作为现代学术范式的学理规定。从传统的评点式批评到五四时期现代性学科的呈现,《西游记》研究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变革,这是一次带有飞跃性质的重大变革,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关于现代学术范式,还有几个相关的问题需要说明。

其一,将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作为现代学术范式,是基于这一学科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并且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深远、持续的影响。这是在《西游记》学术史上有目共睹、不可逆转的客观性事实。不过,我们必须进一步注意的是,今日之《西游记》论坛对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历史地位,认识尚未到位,主要表现在对其中一些带有包孕性、前瞻性的隐性线索缺少清晰的揭示。比如胡适、鲁迅曾预测“在吴承恩之前,果有一部古本《西游记》小说”作为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百回本巨著的过渡形态;再如郑振铎、孙楷第推测吴承恩原本或当有唐僧小传,而由于某种原因为世德堂本刊落;还有像郑振铎所列版本图表中所隐喻的吴本与古本、明本与清本、全本与简本诸种关系问题;孙楷第对“华阳洞天主人”的考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当时并未有定论,但一直吸引着后人研究探索的兴趣,从中孕育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论题,至今备受重视。这恰恰表现了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内部蕴含的强大张力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学科品质,真正称得上功在当时,惠及后世,值得今日学人予以深入关注、总结和评价。

其二,在论述《西游记》研究作为学术范式时,必然将《红楼梦》研

^① 参见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究作为比照的对象。这是因为五四时期现代学术范式的出现,正是时代精神所使然;学术范式的确立,是中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在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哲学等领域都发生了这样具有现代学术范型意义的变革。在小说研究中,学术范式并不局限于“红学”,也不局限于《西游记》研究,《水浒传》研究、《三国演义》研究都具有一定学术范型的意义。总之,思想和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过去论现代学术言必称“红学”而不及其他是不全面的。但是,我们揭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学术典范意义,并非是要以此来与“红学”较高下,或是来贬低“红学”的地位,从而抬高《西游记》研究的地位,两者并非是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出于在新世纪之初新的《西游记》研究阶段有必要对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作一番全面的审视和历史的总结。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西游记》研究与“红学”曾经并驾齐驱,共同创立中国现代学术范式,则是这一历史审视和总结的理论成果。

其三,《西游记》研究学术范式确立之后,必须对其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作科学、辩证的评价。它作为认识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的一个窗口,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上标志着学科形态的成熟,并开启了后世新的研究高潮,这些都是可以得到认同的。近年来,学术界相继出现了一些轻率否定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成就的倾向,了解《西游记》研究的学术典范意义,无疑是有助于消除这一类对鲁迅、胡适等新文化大师《西游记》研究的怀疑态度。而对于那些出于低劣目的,对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进行恶意诋毁的言论,“事实胜于雄辩”,这是最有力的回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即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作为五四时期出现的现代学术范式必然受到新的时代精神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它的范式作用与新的学术精神对旧范式的突破倾向所构成的合力,正是一股将新时期《西游记》研究不断推向前进的强大动力。

第五章 鲁迅与胡适

一、鲁迅、胡适与《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

《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之际。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中国社会发展开始融入世界整体格局,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除了《红楼梦》研究不失时机地实现了从“旧红学”向“新红学”的飞跃,《西游记》研究从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和学科形态上也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裂变,其现代转型最为彻底和典型。究其成因,除却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潮流的推动,无疑还植根于《西游记》研究的内部张力,相比之下,它具有最多的引发裂变的胚胎和因子,其酝酿、积聚过程又尤为充分、持久。

众所周知,《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并称明四大奇书;清季《红楼梦》问世、风行后,又并举为中国五大古典名著,然就其研究和学术品位而言,《西游记》研究从一开始便呈现了相对后进的态势:明人批评一味侈谈心性,附会心学,清疏玄空;清代评本蜂起,“谈禅”、“证道”,又几沦为宗教的附庸。其时就引起相互诟击,其中以刘廷玑的批评最有代表性。他指出汪澹漪诸家“大半摸索皮毛”,犹如“刻画美人,唐突西子”,未能道破作品的奥旨,其穿凿附会的结果便是使“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批评未能起到正确引导、推动大众阅读的作用^①。

至五四时期,西风东渐,随着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的流入,《西游记》研究中的这些弊端和谬误日益显露出来,不满之声愈炽。如鲁迅

^① 刘廷玑《在园杂志》。

直指其“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文辞甚繁”,而所论“皆得随宜附会而已”^①。胡适则禁不住拍案而起,斥责“《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这些解释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②。稍后的郑振铎也指出:“那些真诠、新说、原旨、正旨以及证道书等以《易》、以《大学》、以仙道来解释《西游记》的书都是戴上了一副着色眼镜,在大白天说梦话的。”^③正如地热的积聚、运行终会迎来火山的喷发一样,应该说,《西游记》研究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正是诱发并加速其现代转型的内在动因。

鲁迅、胡适等五四新文学大师为《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揭开了序幕,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鲁迅于20世纪20年代初作《中国小说史略》,“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④,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轨迹和规律。其中也梳理、总结了神魔小说的历史,精辟地论述了《西游记》“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艺术特点和美学价值,并搜罗明清两代史料,根据钱大昕、吴玉搢、阮葵生、纪昀等前辈学者提供的线索,论定《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从而为现代《西游记》研究奠定了基础,指引了方向。与此同时,胡适数度作《西游记》考证,除了与鲁迅书信往来,相互切磋,共同考定《西游记》的作者,还对作品本事的历史渊源、主要人物如唐僧、孙悟空的演化,八十一难的历史依据以及其中的文化象征内涵作了全面考评。他不仅全力支持《西游记》新式标点本的出版,并为之作序呼吁,有力地推动了《西游记》研究汇入现代学术的进程,而且还亲自动手改作唐僧历难之最后一难第八十一难,以纠补作品的纰漏,表现出他对《西游记》的特殊兴趣和意向,堪为《西游记》研究史上的一则佳话^⑤。总之,对于《西游记》用心之广,用功之勤,这在胡适的古代小说考证中绝无仅有,他为现代《西游记》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正是在鲁迅、胡适等新文学大师的大力推动下,《西游记》研究的学术品位得到了整体性提升,出现了全新的学科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胡适《〈西游记〉考证》。

③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④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题记》。

⑤ 参见后面《胡适对现代〈西游记〉学术史的一个特殊贡献》一节之详论。

格局,并逐渐实现了影响深远的现代转型。

《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标志之一是其研究内容得到多方面的拓展,从而初步建立起现代学术研究的对象体系。鲁迅、胡适卓有成效的《西游记》研究,不仅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学术成果,而且赋予了研究对象的现代性特质,基本划定了现代《西游记》研究的范围,给后人以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现举其荦荦大端具体评述如下。

一、关于《西游记》的主题,《西游记》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我们今天应以什么样的眼光去读它?

对于《西游记》这样的皇皇巨著,探求其大旨本非易事,出现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现象完全符合文艺鉴赏与批评的规律,历代读者和评论家也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与需要来进行品味和解读,从而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然而纵观以往之种种旧说,在主题揭示方面,其偏离正常的文艺批评甚远,偏离《西游记》的实际甚远,那些《证道书》、《真诠》、《正旨》、《原旨》和《新说》的评论者,多以劝学、谈禅、讲道来评论《西游记》,充斥着大量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它们歪曲了作品的真谛,以“一己之私见”强加于作品,误解甚多。平心而论,这一类学说,虽非完全无益,但其真见与谬误夹缠,真见为谬误遮蔽,对《西游记》研究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详细评介见前面第二章“明代《西游记》评点”、第三章“清代《西游记》评点”)。

对此,鲁迅以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为依据,认为《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根本上也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不过是一种折光、变形的反映,其“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亦即荒荒诞诞说鬼,真真切切说人。《西游记》作者性诙谐,喜鬼神,善幽默,其怪力乱神必有寓意,冷嘲热讽皆成文章。然作者之讽刺、揶揄、幽默皆“取当时世态”,全系对现实生活的有感而发。故而鲁迅指出《西游记》的价值大抵在其匪夷所思的艺术想象和精美绝伦的艺术描绘,“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①。至于其中所谓金丹大道之类的“大旨”,即便有也还在其次。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意之驰”数语,“已足尽之”^①。因为其间释迦、老君、观音、元神等仙佛其实与种种妖魔鬼怪一样,都是神魔小说之“神化”的产物,“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究其“寓意”,志在现实,而不是儒、释、道三家的宗旨。

胡适与鲁迅意见基本相同,但态度更显激烈。他直斥《西游记》这部名著被糟蹋了。尤为可恨者,在这些旧说的影响下,“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他主张“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还它以本来面目”。为此,他倡导读《西游记》宜用“笨眼光”,亦即老老实实在地将它视作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一部神怪小说,通过鉴赏其中的人物、情节(故事),去感受、领略文学的魅力。他说:“《西游记》小说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其所谓主旨“不过是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②。说到底,这种“笨眼光”正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眼光和审美心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掌握《西游记》的真谛。

至此,《西游记》之种种旧说业已被推倒殆尽,数百年来笼罩在《西游记》之上、迷失历代读者心眼的“尘埃”得到全面清洗,人们始得真正心明眼亮地洞悉其艺术的堂奥,《西游记》文本流变也终于被推上了健康、正常的轨道。

二、在《西游记》研究史上,第一次论定它并非文人独立创作,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改编、流变的过程,是以往全部《西游》故事的总结性、集大成之作。

这一问题最早由胡适提出,它不仅关系到《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而且还涉及中国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揭示了中国长篇章回小说由世代累积型到文人独立创作型转变的轨迹,所以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胡适《〈西游记〉考证》。

所谓世代累积型,是指某一部小说作品经过史书记载、民间艺人演说的长期流传,最后由某一文人改编定型。一般来说,早期之《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世代累积型,《金瓶梅》带有较多的《水浒传》的痕迹,故有“《水浒传》外典”之称,但已与《三国》、《水浒》等世代累积型作品有了根本性变化,其中文人独立创作的成分占据了主导和压倒性地位,到了曹雪芹《红楼梦》(《石头记》)则完全蜕变为文人独立创作^①。《西游记》问世于明隆万年间,目前所知最早版本系万历二十年(1592)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金瓶梅》、《红楼梦》之前。那么,介于两者之间的《西游记》是为前者乎?是为后者乎?

胡适通过对《西游》故事演化、传播史的梳理,通过对所见之历代《西游》作品的比较甄别,认为《西游记》当为一部世代累积型文学巨著。首先,他把眼光投向了遥远的史籍,对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慧立、彦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高僧传》等历史著作进行了细致、周详的考证,指出《西游记》具有丰富而直接的史学渊源。然后又通过对唐宋之际笔记小说的爬罗剔抉,发现了唐玄奘西游事迹“神化”的迹象,特别是对宋元之际流行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进行反复的勘录、对读,清晰地揭示出唐僧取经本事神化的过程和规律,从中发现《西游记》最终以神魔小说出现的内在依据和必然性。同时,胡适又从《西游记》的艺术源流着眼,重点考察了元代吴昌龄(实为明代杨景贤)《西游记》杂剧,认为从这一规模庞大的六本体制的《西游记》来看,可以肯定“元代(实为明代或元明之际)已有一个很丰富的《西游记》故事(作品)了”,它正是元明时期有关《西游》作品的“一度大结集”,西游故事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它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一百年后吴承恩“最后大结集”(指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基础。其最后结论便是:“《西游记》小说——同《水浒》、《三国》一样——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其成书过程说明,它是一部典型的世代累积型之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

1924年7月,鲁迅在西安暑期讲学时,援引了胡适的这一论断,也

^①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中收录的《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中国古代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的兴起》诸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说：“这部小说（指《西游记》），也不是吴承恩所创作，因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在前边已经提及过——正说过猴行者，深河神，及诸异境。元朝的杂剧也有用唐三藏西天取经做材料的著作。此外明时也别有一种简短的《西游记传》（即杨本）——由此可知玄奘西天取经一事，自唐末以至宋元已渐渐演成神异故事，且多作成简单的小说，而至明吴承恩，便将它们汇集起来，以成大部的《西游记》。”^①进一步完整、真实地指出了吴承恩改编《西游记》的实际。

应予指出，鲁迅与胡适认定《西游记》为世代累积型作品，并非贬低吴承恩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也并非有损《西游记》的价值，而是旨在说明成书过程，揭示小说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尊重历史事实。鲁迅将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并举为明代小说两大主潮，又将《西游记》列为神魔小说的主要代表和典范之作，认为吴承恩的伟大贡献在于将历代流传的西游故事“汇集起来，以成大部的《西游记》”，而且以其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把《西游记》推向世代累积型作品的最高峰，“所以人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②。可见，《西游记》之为最伟大的小说，吴承恩之为最伟大的艺术家，皆当之无愧。

三、考定《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

在《西游记》研究中，作者问题一直是一个疑团，至今仍为一大研究热点。造成这一疑团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西游记》最初在明代刊刻时未具作者的姓名。因为中国文学向以诗文为正宗，轻小说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丛残小语”，甚至“刍蕘狂夫之议”，小说作者往往不愿意署上姓名，以免遭封建士大夫们的轻视；或者署上“主人”、“山人”之类的假名，故意混淆视听。因此，虽然《西游记》问世后流行朝野，雅俗共赏，引起读者争相传阅，但人们并不知作者为谁。二是清初刊刻《西游记》时，有好事者杜撰元人虞集《西游记原序》冠于卷首，从而将《西游记》的作者归为元初道士邱处机，于是“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③。

胡适在20年代初作《西游记序》时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

①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谁,但对世代流行的“拿邱处机来顶名冒替”^①的做法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根据《西游记》之种种内证完全可以肯定“《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后经广泛收罗史料,深入考证,并与鲁迅反复商讨,最后于《道藏》中发现《长春真人西游记》,两人遂不约而同地宣布:邱处机所作《西游记》非百回本《西游记》小说。胡适说:“小说《西游记》与邱处机《西游记》无关”,后者“乃是一部地理学上的重要材料,并非小说”。鲁迅指出:“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字浩然,号真常子,邱处机弟子——引者注)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②从此,长期以来邱处机冒名《西游记》作者之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清理张冠李戴现象、否定邱处机作《西游记》的谬说之后,胡适与鲁迅进一步正本清源,论定《西游记》作者为淮安吴承恩。除了称引钱大昕、纪昀等人的考证结论,他们所引用的明清两代的史料主要有:明代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列:“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又该书卷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比较详细地载有吴承恩的生平事迹:“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以后又有康熙《淮安府志》、同治《山阳县志》以及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吴玉搢《山阳志遗》等书所载与此相同或相关的内容。据此可知,胡适与鲁迅关于《西游记》作者的论据是相当丰富、充分的,结论也颇为可信,故为后人公认,从此以后出版之《西游记》皆题署“吴承恩著”。

当然,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对这一论断尚有不同意见。如章培恒指出:“天启《淮安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多少卷多少回,又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那又怎能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作为小说的百回本《西游记》而不是与之同名的另一种著作呢?……大概比吴承恩大二十岁左右的安国就写过名为《西游记》

① 见董作宾《读〈西游记考证〉》。

② 分别引自胡适《〈西游记〉考证》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的纪游之作,那么又安知吴承恩的《西游记》不也是游记呢?”章培恒还进一步指出,吴承恩的《西游记》在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恰是被著录在卷八史部地理类的,也就是说,极有可能“吴承恩的《西游记》乃是一篇通常意义上的游记”,“它确是与小说《西游记》同名的另一部著作”^①。以此为契机,《西游记》论坛掀起了新一轮关于作者的大讨论,目前重新提出《西游记》作者的可能性人选已达近十人之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管这一讨论如何发展,最终的结论将怎样,鲁迅、胡适当年考证《西游记》作者的历史功绩是不会被抹杀的,那是因为:首先,他们对“邱作说”的辨伪已铁定如山,再无反复;其次,关于吴承恩著《西游记》或许有待进一步检验,但他们的考证,都是后人无法绕开的研究成果,是一切新说立论的出发点。

四、最先对《西游记》的版本史料和演变作出了初步的梳理。

由于《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累积型巨著,自唐时史著至世本,已积淀起丰富的史料;而《西游记》问世后,深受读者欢迎,于是竞相翻刻,又多沿袭演变,形成了异常复杂的版本系统。对《西游记》的相关史料、对其复杂的版本系统和演变线索亟须进行梳理。鲁迅与胡适对此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倾力鉴别《大唐西域记》、《三藏法师传》等史籍,考察《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等早期“西游”故事,特别是对明代简本与繁本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然而限于客观条件,其时所见版本不多,特别是尚未发现《永乐大典》13139卷“送”韵“梦”条中的《西游记》(平话)残文《魏徵梦斩泾河龙》、朝鲜古代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中的《西游记》章节《车迟国斗圣》,以及两种重要的明版《西游记》即世本与朱本,他们所作的梳理还是初步的,并不完整。这一深入严峻的工作由稍后的郑振铎和孙楷第来完成。而且在版本问题上胡鲁二人意见多有不合,甚至完全相反。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与明代简本杨致和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的关系上:鲁迅认为杨本是吴本的祖本:“《西游记》(吴本)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一作杨致和,又明刊《西游记传》署名阳至和,现学界以杨致和较通行。——引者注)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唯杨志和本虽大

^① 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描写,几乎改观。”^①胡适则完全相反,认为杨本《西游记传》“是一个妄人删割吴承恩的《西游记》,勉强缩小篇幅”的产物,其目的是要归入《四游记》,与其他三种作品篇幅大致平衡对等,究其关系,“乃是阳(杨)本全依吴本的次第”^②。

由于看法尖锐对立,胡适对鲁迅的诘难相当激烈,他找出许多“铁证”来“证明他(鲁迅)的错误”。鲁迅对此也进行了反证。这一问题虽然至今尚无定论,然而其价值在于提出并初步确立起百回本繁本与简本关系这一复杂的学术命题,同时,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两位现代新文学大师不拘私交,为探求真理而敢于直陈己见、认真严肃的学术风范。

《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另一个标志是逐步确立起一种全新的、适应现代学术精神和治学规范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小说评点(包括序跋、读法)相比,鲁迅、胡适研究《西游记》,与多元比较和动态历时性研究的方法论并行不悖,采用了宏观综合、微观分析互渗,考评结合、史论贯通并举的方法,为现代《西游记》研究奠定了重要和特殊的方法论原则。

方法,是人类认识客观对象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在学术研究中意义重大。在西方学术史上,先后有培根《新工具》、笛卡儿《方法论》、黑格尔《逻辑学》以及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等论著对“方法”进行深入研究。黑格尔还把方法称之为“人类行动中的理论”,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方法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如果将方法比喻为农民耕地的犁,那么,“犁是比由犁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会消失并忘却。”^③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引起了人类哲学思想的一次伟大革命。

毋庸置疑,《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也得力于研究方法的更新。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胡适《跋〈四游记〉本的〈西游记传〉》。

③ 转引自《文艺新科学、新方法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鲁迅、胡适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五四新文学大师,善于“拿来”,“别求新声于异邦”,借鉴一切先进、合理的思想观点与方法。鲁迅最早接受的西方思想是进化论,坚信未来胜过过去,注重用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方法看问题;胡适是美国现代实证主义大师杜威的传人,倡导科学研究中的实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推重证据,切忌空谈。他们用这一治学精神与方法来进行《西游记》研究,为这一传统的学术领域新开垦出一片广阔的天地。

先说宏观综合、微观分析互渗的方法。所谓宏观综合,是指研究从整体出发,大处着眼,又寻找到各大命题之间的联系作并案考察;所谓微观分析,则是指在研究中从具体问题入手,对某一问题作深入、仔细的解剖分析,从而对宏观综合进行事实和史料的支撑,避免宏观研究沦为“空对空”的猜测臆断。鲁迅、胡适的《西游记》研究正是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一方面,他们抓住《西游记》主题、性质、成书过程、作者考订、版本嬗变等属于学科基础层面的宏观命题,并从这些命题的综合考察中揭示出《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规律,从而呈现出较高的学术品位和理论层次。另一方面,他们又从这些宏观命题出发,引申出许多有关《西游记》的具体问题,如钩稽某一条相关资料,说明某一具体现象,分析某一形象的生成,阐释某一种既有的结论,等等,从而解决了许多实际的问题,并以此来显示完整的宏观链条。例如梳理唐僧取经本事的历史演变是一宏观命题,直接关系到《西游记》作为文学文本的存在,但胡适对《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六本)的考辨都做得十分“微观”,特别是将它们与后来的《西游记》进行仔细、具体的比照,发现了许多以前的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诸如唐僧西行的动机问题,取经历险的“神化”问题,孙悟空的来源(进口)问题等等,清晰的事实链条构筑起宏观研究的整体格局,并对论题以强有力的逻辑支撑。

再说考评结合、史论贯通并举的方法。这也是鲁迅、胡适《西游记》研究中最显著的方法论特点。所谓“考”是研究的途径和过程,重在推理和实证,即“以事实说话”,所谓“评”是指进行符合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更多地指向考证的结论;所谓“史”是指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旨在纵向审视,所谓“论”则是以史学眼光对某一特定对象进行理论描

述,重在横向透视。考评结合、史论贯通侧重有所不同,但治学精神一致,都是试图通过特定的方法来确保论述的言之有物,信而有征,确保其结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鲁迅研究《西游记》的实绩,主要体现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顾名思义是一种史学背景下的研究,所以史论贯通的特点非常明显,虽然其中也有对作者生平、作品成书方式及年代、情节本事源流以及版本嬗变的考辨。他不仅将《西游记》纳入神魔小说的发展轨道,揭示其作为神魔小说的开山之作和最杰出的代表作,对后来的神魔小说具有示范作用,对其艺术特征与美学品格的论述深刻精到,而且还将《西游记》放在中国小说的整体格局中进行分析、评论,指出了宋元以降,崇道风盛,至明成化、正德之际登峰造极,道流羽客“皆以方技杂流拜官,荣华熠熠,世所企羡”,终于导致神魔小说蔚成大观,构成与世情小说并举的两大文学潮流。鲁迅以史统论,以论证史,二者结合贯通,相得益彰,史学品位十分突出,从而将《西游记》研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胡适是新文学大师,作为北大著名教授、文科学长,复具有深湛的国学根柢,被尊为“善于给小说作考证的胡适之先生”^①,声震学界。中国古典小说一开始就受到悠久璀璨之中华文化的哺育,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为胡适的“《西游记》考证”提供了内在动因和用武之地。他是效法乾嘉学派把考证古典小说当作一项“大事业”来从事的,如关于《水浒传》他曾说:“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②他的《西游记》研究也完全一样,其论著命名为《〈西游记〉考证》,所论通篇就是一个考证的过程,涉及的史料丰赡广博,考证的过程逻辑严密,几乎无懈可击,所考的命题陈陈相因,互为因果,层层推进,他以史料事实说话,言必有据,考评结合,结论多令人折服。就其所取得的成果而言,“五四”以来,在古典小说考评方面,胡适堪为第一人。

总之,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他们作为新文学大师,呼吸着时代

① 见董作宾《读〈西游记考证〉》。

② 胡适《〈水浒传〉考证》。

的新鲜气息,紧扣着社会变革的脉搏,敢于最早吸纳西方新学;同时饱经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浸淫,或擅长史论,或精于考评。这两方面的深厚学养,特别是考评结合、史论贯通的科学治学方法,使他们的《西游记》研究别开生面,并最终取得划时代的成就。

最后尚需提及以下两点:

其一,研究领域的多方面拓展、全新的研究方法的确立,其结果必然会引发学科形态的更新。鲁迅、胡适的《西游记》研究,形成了崭新的研究格局和学术面貌:它完全不同于以往《西游记》评点分散、零星特征的宏观整体视野,那一系列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命题,构成了学科的体系完整性;其现代精神的烛照、时代意识的贯穿、新的治学理念的引入、新的学术方法的确立,奠定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性学术品格;两位学术大师精深的考辨、史论工夫,深入、缜密的研究过程又在整体上确保了其学术成果的正确性,从而使学科呈现出现代学术必备的科学性。还有,我们注意到,胡适曾预测在《取经诗话》与今本《西游记》之间可能存在一种过渡形态的话本,鲁迅也曾推断“在吴承恩之前,果有一部古本的《西游记》小说”^①,这种预见和猜测后来都得到完全证实,那就是以《永乐大典》残文为标志的平话本《西游记》的被发现,这说明他们的研究还具备一种学科体系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总之,正是鲁迅、胡适的不懈努力,实现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分支的“《西游》学”也粗具雏形。

其二,我们肯定鲁迅、胡适《西游记》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卓越贡献,并非不见其中的不足和缺陷。囿于时代条件的某些局限,作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奠基者,胡鲁二人筚路蓝缕,首创难工,疏漏错失在所难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其时,他们掌握的版本不全,且看到的多是清本,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吴承恩《西游记》(明本)全貌的认识,因而对版本流变的梳理、考辨做得还显薄弱,其中鲁迅断定第九回唐僧出世故事为“吴所加也”更是明显失当,缺乏充足的理由。正如当年鲁迅所感叹的:由于版本资料不足,“旧本希觐”,“观览又不周洽”,唯

^① 参见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当虑讹谬”，“诚望杰构于来哲也”^①。这是先生自谦之辞，也客观地道出了实情。因此，他们最大的历史功绩便在于开拓创新，继往开来，为现代《西游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他们当年期望的“来哲”、“杰构”，我以为最突出的代表便是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他沿着两位先生留下的线索，进一步进行开掘，简略者详之，阙略者补之，正确者光大之，错失者修正之，在《西游记》研究史上，又一次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二、胡适对现代《西游记》学术史的一个特殊贡献

关于胡适与现代《西游记》研究，还有一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就是他曾亲自增改《西游记》。这不仅说明了他对《西游记》的特殊兴趣（不同于《红楼梦》等其他小说），而且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在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的特殊贡献，尽管从实际效果来看，他的改作差强人意，并不怎么成功。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大家知道，在《西游记》文本流变中，出现过许多改作、续书，其中关于“唐僧取经”这一情节本事，特别是取经人所历之九九八十一难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增改：一次是康熙初年印行由汪澹漪笺评的证道书本《西游记》，在孙悟空大闹三界和取经过程之间插入“唐僧出世”故事，补足了吴承恩世德堂本所缺八十一难的前四难；另一次发生在民国时期，由新文学大师胡适改作最后一难也即第八十一难。为了总结胡适改作的经验、教训，宜将两者并案考察。这两次增改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所起的效果不尽相同，所续文字本身在后世流传中的命运也大相径庭。分析、比较这两次创作实践，对于揭示《西游记》文本流变的历史线索，总结、探寻其中的规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一般而言，改编文本并非研究者的任务，金圣叹开此先例，这则涉及另一种文艺现象和理论问题，这里姑且不论。

据有关资料显示，汪澹漪和胡适增改《西游记》，有其明确而直接

^① 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记》、《题记》。

的目的:汪澹漪倾力前楔八十一难之开端,胡适精心增改最后一难赍续结局,都是为了追求作品情节的完整与结构上的平衡。汪澹漪,明末清初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生卒年不详,号残梦道人,据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所录,著有小说《吕祖全传》,系清本《西游记》重要整理者与笺评人,其《西游证道书》开“证道说”之先河,于《西游记》论坛影响甚大。他发现《西游记》在情节上存在重大缺陷:大闹天宫与取经过程是明显的“两截子”,中间缺乏纽带作必要的联结,特别是取经主体唐僧身世阙如,所历八十一难残缺不齐,实为不可容忍之病,他说:“童时见俗本(指明刊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引者注)删此回,查不知唐僧家世履历,浑疑与花果山顶石卵相同。而九十九回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载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令读者茫然不解其故。殊恨作者之疏谬。”^①于是他根据原本第十一回所叙唐僧主持水陆大会时的一首出场诗《灵通本讳号金蝉》(七古)提供的线索,铺排为“唐僧出世”整整一大回文字,插入大闹三界之后,作为第九回,而将原本中的第九回及其后的第十至第十二回等四回文字,重新调整分割成第十至第十二回三回,从此,吴承恩世德堂本夹带汪澹漪增改“唐僧出世”故事,便成为清代以来流行的《西游记》定本^②。

胡适 1923 年作《〈西游记〉考证》,搜罗明清两代史料,根据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纪昀、陆以湑等前代学者提供的线索,论定《西游记》作者是淮安吴承恩^③,并对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来源、演化,八十一难之历史依据和其中的意象含义作了全面考评,对于《西游记》研究最富精见,贡献巨大。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西游记》文本存在一些纰漏,为这部名著之微瑕,其中第九十九回所叙唐僧师徒求得真经返回东土途中,被通天河大白赖头鼋打入江中一难(第八十一难)过于谄陋粗糙,有凑“九九归真”之数的嫌疑,与前述八十难(包括汪澹漪增补之前四难)绝不相配,因而在结构上虎头蛇尾,颇欠平衡。大约在民国初期 20 年代前,他将这一看法与鲁迅作了交流,指出“《西游记》的第八十

① 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第九回回评。

② 参见前面第三章第一节《〈西游证道书〉: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的主潮》。

③ 大约在同时,鲁迅也以相类似的材料与方法考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

一难(九十九回)未免太寒伧了,应该大大的改作,才衬得住一部大书”^①。约近十年后,他将改作交当时的《学文月刊》发表,后来收在由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里。这在现代《西游记》研究论坛颇是一件影响广泛的轶事。当然,除了结构上的目的,胡适的增改似还有美化唐僧形象、强化佛教教义的主观意念。关于这一点,后文有所展开。

关于增改的方法,汪澹漪和胡适都是在原作基础上作局部性有限的改编,不同于那些一般意义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续著。续书系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的常见现象。清康熙时刘廷玑曾指出一般续书的特征:“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有后以续前者,有后以证前者,甚有后与前绝不相类者,亦有狗尾续貂者。”^②其意在极言好事者“袭名而副,自出下下”,“续书之不可作”^③。自此,续书之声名、价值骤跌。汪澹漪的文字实有所本,他托名大略堂古本云云,目的是借古以自重,为自己的改作增加号召力,实际上是根据明代刊行的《西游记》简本朱鼎臣《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④卷四改编,其本事宋代时已在民间流传,宋代无名氏之戏文《陈光蕊江流和尚》、明初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中已演绎成完整的“唐僧出世”故事。汪澹漪在整理《西游记》文本时,出于全篇情节上的考虑,将其移入,又根据小说艺术的要求,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修饰、创编。胡适的增改号称要对《西游记》进行“大大的改作”,“把《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完全改作过了”,改造的力度比诸汪澹漪的“增插”^⑤要大得多。他新制文字七千有余,将原作第九十九回“菩萨将难簿目过了一遍”起到第一百回“却说八大金刚使第二阵香风,把他四众,不一日送回东土”为止的大约七千字抽去,重新改写了第八十一难。然而它与前八十难的基本线索是贯通的,在九十八回唐僧面谒如来之后,顺势敷衍出一段如来劫初“玉兔烧身”的故事,而后

① 胡适《〈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

② 刘廷玑《在园杂志》。

③ 参见俞平伯《红楼梦辨》。

④ 朱鼎臣编辑的《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过去习惯称作《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现据该书封面所题定名。

⑤ 对汪澹漪增改的评介,可参见李时人《〈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

言唐僧受金刚点化入梦,接受观音菩萨所设地狱的考验,历经最后一难。改作基本遵循了原作关于八一十难的情节特征与叙事模式,沿袭着吴本《西游记》的性格设置和语言风格,所作文字与删削文字也大致相当。所以说到底胡适的改作也是一种局部性有限的改编,并未脱胎换骨,也当与一般的续书有别。

汪澹漪与胡适对《西游记》唐僧历难的增改出于共同的艺术追求,在方法上也大致相同,但是改作的效果以及所续文字本身在后世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汪作证道书本《西游记》问世以来,虽褒贬不一,但所续第九回已完全融入通行本《西游记》,成为百回本的有机部分,几乎成为定评;今日一般读者对其增改的痕迹早已漠然不察;而胡适所作的第八十一难,仅在当时风行一阵后即湮没不传。汪澹漪是移植“古本”依葫芦画瓢,胡适则是另起炉灶,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按理说,具有原创性的胡作其价值应高于移植现存材料的汪作,但事实上却不尽其然。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众所周知,《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是一部世代累积型巨著,大致经历了由史书记载、民间流传、艺人讲演到文人创编的过程,其浓厚的历史积淀性构成了作品的固有品格。“唐僧取经”本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据《旧唐书·玄奘传》及《高僧传》记载:玄奘(600—664)姓陈名祿,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南缑镇)人。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十五岁时出家为僧,游历各地,访求名师,讲论佛法。他“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玄奘只身赴天竺(印度)取经,历时十七载,经历百余国,行程数万里,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声震中外。“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经论难,蕃人远近尊伏之”。归国后,“太宗见之大悦”。于是玄奘奉诏述西游事迹,由门徒辩机等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以后慧立、彦惊撰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①。为了神化玄奘,突出取经之路的艰辛,他们加进了一些神话传说,如狮子王劫女产子,西女国生男不举,迦湿罗国“灭坏佛法”等。由于唐僧取经本

^① 参见《旧唐书·玄奘传》。

身具有极大的传奇性、幻想性和生动性,再加上刻意神化,故事很快在民间流行开来,并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神奇。

关于唐僧本人的身世,因史传语焉不详,故而更富有想象的空间,成为民间演绎、发挥和神化的对象,至宋时唐僧已被神化为“观音菩萨的化身”^①。现最早可见唐僧出世故事的资料是宋代戏文《陈光蕊江流和尚》,叙唐太宗时状元陈光蕊赴任洪州途中遭洪江水寇谋命夺妻,其子嗣后复仇报本故事^②。经考,其事本于宋人周密笔记《齐东野语》之“漆盒盛儿浮江中”故事;又,唐传奇有《郑德璘》,叙书生郑德璘因缘结恩于水府,后水神感恩拯救他钟情的女子韦氏出水,并玉成美妙姻缘。宋代戏文显系糅合两者而成。明初杨景贤作《西游记》杂剧(六本),其中用一本四折叙述这一唐僧出世故事,情节又有发展。直到朱鼎臣《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朱本)而变为小说,基本形成了“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儿复仇报本”的格局。可见,它有一个漫长的积累、流传过程,在民间早已耳熟能详,深入人心,颇受人们的欢迎。吴承恩最后推出百回本《西游记》,考虑到作为神魔小说之基本上属于“神话”的特点,没有采纳这一基本上属于“人话”的唐僧出世故事^③,但吴承恩生性“喜神怪、好奇闻”,曾到处搜罗志神传说,搞得满肚子都是妖魔鬼怪^④。他熟知笔记野史,知晓以上故事是完全可以确定的。事实上,吴本《西游记》也接受了唐僧故事的影响,在介绍唐僧出场时有古风《灵通本讳号金蝉》曰:

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摩,降生世俗遭罗网。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临恶党。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出身命犯落江星,顺水随波逐浪泅。海岛金山有大缘,迁安和尚将他养。年方十八认亲娘,特赴京都求外长。总管开山调大军,洪州剿寇诛凶党。状元光蕊脱天罗,子父相逢堪贺奖。复谒当今受主恩,灵烟阁上贤名响。恩官不受愿为僧,洪福沙门将道访。小字江流古佛儿,法名唤作陈玄奘。

① 参见宋李昉《太平广记》、赞宁《宋高僧传》等。

② 钱南扬辑录《宋元戏文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③ 按系孙楷第说。

④ 吴承恩《禹鼎志序》谓自己“旁求曲致,几储满胸矣”云云。

汪澹漪改作的实质是：删去这首介绍唐僧的二十四句之诗，而增补了整整一回文字来代替；或者说将一首小诗铺排为“唐僧出世”整整一大回文字。而无论作何种理解，其来源都是从宋元戏剧直到朱本的有关文献材料，它保留了长期流传的“唐僧出世”故事的全部丰富性，完整地继承了其中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从情节线索而言，与吴著有着内在的逻辑呼应，故而改作甫出即受到舆论的好评。如张书绅就完全赞同这一“修补”，并在《新说西游记》（以明百回本李评本为底本）中迅速补刻了此回，他说：“刊本《西游记》，每以此卷特幻，且又非取经之正传，竟全然删去。初不知本末始终，正是《西游记》的大纲，取经之正旨，如何去得。假若去了，不惟有果无花，少头没尾，即朝王遇偶的彩楼，留僧的寇洪皆无着落。”^①从客观效果看，平心而论，这样的增改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它适应了《西游记》作为文学文本的整体性需要，通过详尽叙述唐僧的身世来历，使作品情节内容上有所呼应，在人物关系配置上更趋允当妥帖，“两截子”的毛病虽然不能说完全改正，但明显减弱，作品的结构更趋严谨，弥补了吴承恩明本《西游记》一个显而易见的大疏漏。诗体所长在于抒情，而不在叙事，由于以上出场诗过于简约凝练，读者绝无法明了有关唐僧出世的具体情况：如仅据“未出之前临恶党”，怎能悟出是指他父母上任途中为舟子所害？“出身命犯落江星”，又怎知其母为保其性命，断趾血书，木板抛江？如来难簿所载九九八十一难，其余各难都有情节印证，独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阙如，令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汪澹漪的增改正好克服了原本中情节失去呼应、衔接突兀不准、主人公行状多无着落的纰漏。另一方面，它还有利于刻画唐僧的形象。唐僧虽然外表懦弱、贪生怕死，但其意志刚强，作为得道高僧具有坚毅、聪慧的内秀：他为求取真经，遭九九八十一难而不改初衷，义无反顾，苦度十四寒暑，历尽艰辛，显示出一种虽九死而不悔、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而这一则“唐僧出世”故事似乎使我们感受到这种崇高精神的必然性：早在躁动的母腹中，他就接受了生死磨难的洗礼；甫出娘胎，唐僧即已九死一生。这就实际上铸就了唐僧坚毅刚强的深层次性格特征，也为其

^①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第九回回评。

日后取经途中遭受九九八十一难、饱经生死考验的命运奠定了一个逻辑上的起点。所以我们才得以明白,为什么如来的难簿上将这遭贬、出胎、抛江、报冤作为前四难,大凡圣人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尤其应该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唐僧之崇高精神根本就是与生俱来的^①。正因如此,历代读者都对这一增补产生了感性层次上的共鸣和理性层次上的认同,自觉不自觉地都把它视作《西游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喜爱有加。

而胡适的改作却没有这样的幸运:《西游记》文本发展的历史最后没有选择它、接受它,现代流行的本子,第八十一难仍然是出于吴承恩之手、被胡适斥责为“太寒俭了”的通天河老鼋的故事。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作为原创性的增改文字,缺乏历史的积累、大众文化的传承,没有一个在民间长期流传、结聚的过程,缺乏受众阅读心理的响应,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硬插在《西游记》中,其实是以一己之见强加于吴承恩,虽然它文意超凡,文辞高古,但总体上与原作的整体制式和受众心理定势格格不入,“隔”的痕迹未免太过明显,最终遭到淘汰湮没的命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凡是存在的总是合理的。”对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我们还可再作进一步分析,就胡适增改文字本身内容而论,倘与汪作比较也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胡作第八十一难梗概如下:

观音菩萨查阅难簿后,言“佛门中九九归真,圣僧受过八十难,还少一难”,便差金刚将一行甩落凡地婆罗涅斯国克伽河。东行之“三兽宰堵波”宝塔,唐僧向行者等讲述如来劫初时玉兔烧身故事。后扫塔入梦,各路妖魔奉地藏王菩萨法旨到这里与唐僧了结公案,这些金箍棒和钉钯底下的死鬼扯住唐僧高喊“唐僧还我命来”,并作凄苦之状。唐僧先是恐惧不堪,后因佛心仁厚,将“恐惧之心完全化作慈悲不忍之心”,决心效法如来“玉兔烧身”,将一身骨肉一刀一刀割下布施诸妖。这时,只听得半空一声“善哉!是真菩萨行。”唐僧大梦醒来,原来是观音所设最后一难,合“九九归真”之数。

^① 参见拙文《崇高:论唐僧的精神》,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这一难共七千余字,写得非常认真,据胡适自称:“前后历时十年”^①;文字风格与吴本相近,其情节也与原作结构堪称匹配,用胡适的话说是“衬得住一部大书”的。然而也正因为太拘泥于原作的模式,过于追求与原作的接榫磨合,反而流于滞呆陈腐,缺乏原创应有的新意和灵气。首先,其中如来“玉兔烧身”故事本佛祖释迦牟尼杀身成仁典故,由唐僧长篇大论,完全是一种游离于唐僧历难本事的抽象说教,阐释佛家教义而已,失去了神魔小说的神奇性和生动性,“硬插”的迹象十分明显。其次,唐僧入梦受难故事与《西游记》原本第十一回《游地府太宗还魂》中“唐王入冥”故事重复。后者是为取经缘起而作,言太宗因负泾河老龙被告于阎王地府,其间被“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路草寇”(即被太宗征剿的各路诸侯枉死的鬼魂)索命,后经判官崔钰斡旋,答应为他们做度亡道场而还阳。没有太宗入冥,没有李世民艰难的心路历程,就没有水陆道场,也就没有了唐僧求法取经,就没有《西游记》一部大书,可见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推动情节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②。而胡适所作唐僧入梦,与其如出一辙,而只得其外衣,未及神韵,并没有这样浓厚的文化意义和全局性的结构作用,仅仅是凑合了最后一难而已。且前已有如来“玉兔烧身”,后再叙唐僧割肉度妖,与佛祖“割肉饲鸽”一脉相承,从内容上已一无新意可言。又,这一难系观音对唐僧佛性的最后考察,与原作第二十三回所叙唐僧初踏取经征途之际,观音菩萨邀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梨山老母设庄化美女留宿唐僧以试禅心暗合,创意难免故旧。再次,或许是更为重要的,胡适指责《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过于粗鄙寒碜,认识也不尽其然。吴承恩描写唐僧历难变化无穷,其每一难的象征含义不同,表达方式也富于变化:有的是生死劫难,有的则是征途中的小插曲而已;有的劫难错综复杂、波诡云谲,有的则简明平直、单线演绎;有的文字庄严肃穆,慑人心魄,有的则是游戏笔墨,轻松畅快;有时一回并写数难,有时则数回合写一难,总之是深得一张一弛、开阖有序、错落有致的为文之道。第八十一难设置在面谒如来求得真经,唐僧一行欢天喜地、忘乎所以之际,由通天河老鼋突然发难,而原因却在鸡毛蒜皮的琐屑之事,实在令人始料

① 胡适《〈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

② 参见拙文《自由:〈西游记〉主题新说》,《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不及,却又妙趣横生。它呼应全文,对唐僧作了善意的揶揄,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九九归真”,妙味自现,匠心独具,又怎么会显得“寒伧”呢?胡适在最后一难大肆铺陈,详则详矣,试图把八十一难搞得整齐划一,反倒冲淡了作品结束之际如来授经,唐僧大功告成而又不居功自傲的理想构思。凡此种种,皆说明了胡适增改文字备受冷落、复遭湮没的命运,具有历史与现实、创作与欣赏等诸多因由。关于这一点,胡适本人事实上也有所意识,对自己的改作缺乏自信,1921年11月,他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新式标点排印本《西游记》作序,同年又在此序文基础上作《〈西游记〉考证》,都没有透露出任何关于修改唐僧历难的信息,而后来在该书再版时,他也不愿意将这一改作插入到原本中去,致使所作之文,几成绝版。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接受美学的原理来考察这两次改作。

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实践,汪澹漪、胡适关于《西游记》唐僧历难的增改是值得肯定的。运用现代接受美学理论,尤能说明其价值。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灵性的对象,一方面具有本身我向性自足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开放的品性和发展的态势。其发展的动力既根植于作品内部的张力,也借助于外力,特别是读者创造性阅读的介入。所以,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来不是所谓的“定本”,而只能是一种有待于发展的“不定本”,它的最终完成决定于受众的选择^①。接受美学的创立者尧斯形象地指出:“文学作品不是一座独立式地宣告其超越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更像是一本管弦谱,借人们不断地演奏,并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回响。”^②伊瑟尔则明确揭示出这种文本开放性得以实现的内在机制:大凡伟大的作品,都是有一种潜在的、巨大的“召唤力量”,因为它的结构充满“空白”(包括缺失),即许多隐语、象征、暗示及空缺,成为“一种寻求缺失的连接无言的邀请”,邀请读者运用自己的情感、个性和想象去进行弥补、丰富、发展和

^① 参见马以鑫《接受美学新论》,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7页。

^② 尧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见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09页。

改造,完成对作品“空白”结构的“填空”^①。

《西游记》由伟大作家吴承恩集大成,在其前已有漫长的流变过程,自明万历二十年(1592)世德堂梓印百回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其故事基本定型。但在之后其文本发展流变仍在进行,在明代先后出现过杨闽斋梓刻的《新镌全像西游记传》、不题刻者的《唐僧西游记》以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其内容、文字都有所增删、改动,至清代则形成《西游记》文本发展的高潮,汪澹漪《西游证道书》、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刘一明《西游原旨》、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以及含晶子《西游记评注》等六种文本在较集中的时间里连绵冒出,从各个方面对吴本《西游记》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其中尤以汪著最有价值,它虽然是一部节本,但以其高度的艺术创造性和成就决定了清代《西游记》发展的主潮流。汪澹漪所增补之第九回唐僧出世故事从此几为所有全版《西游记》所刊载,足见其弥足珍贵,风行之盛^②。这从接受美学来看,都是符合“文学科学”的正常现象。而胡适的改作也可作如是观。

接受美学作为艺术理论流派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但其基本思想上世纪初在它的先驱什克洛夫斯基的俄国形式主义美学、胡塞尔的现象学美学中已经提出,并与现代派文学一起传入中国。不能说胡适已接受了此种现代文学理念,但胡适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学大师,得风气之先,较早受到接受美学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五四”以来,他大量译改古诗,倡导白话文学,并醉心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章回小说的考证,常能发前人所未发,极多精辟之论。这些文学实践都是符合接受美学的原理的。在现代文学史上,他脱胎于古典诗文的白话新诗如《尝试集》是划时代的,而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面,他对《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名著的考证代表了新文学大师们富有开拓性的治学实绩,就其学术地位而言,当与鲁迅先生并驾齐驱。

对于《西游记》,胡适具有研究者(考证)与创作者(增改第八十一

① 参见伊瑟尔《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载《上海文论》1987年第3期。

② 当代通行的《西游记》文本,对汪澹漪增改之唐僧出世故事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或入正文,或作附录,五花八门。参见拙作《论〈西游证道书〉的艺术修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难)的双重身份,并在两方面都为《西游记》文本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仔细比较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胡适关于《西游记》考证与研究的中心观点是“游戏说”,认为吴承恩“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将《西游记》当作证道、谈禅,是“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①。而从他精心增改的第八十一难来看,他非常重视宣扬佛性,在其中大讲如来“玉兔烧身”,大讲唐僧割肉度妖,宣扬至高无上的佛性,不知不觉中一头扎到缥缈的佛光中去了。这显然是原本《西游记》本来的逻辑规定使然。纵观胡适的艺文之路,学术长于创作,旧学优于新学,考证高于文学。不过,他的增改之作虽然作为文本湮没不传,但与考证一起成为我们研究《西游记》的宝贵材料,从而体现出一种对现代《西游记》学术史的特殊贡献。

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站在现代接受美学的观点来肯定汪澹漪、胡适对《西游记》唐僧历难的改作,并非主张后人对《西游记》文本作无原则的改编。事实上,接受美学可以说明他们增改的动因,但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增改必然超越原本。其改作是否成功,在于它们是否符合艺术规律,作者是否具备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其艺术实践是否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②。汪澹漪、胡适的增改,其成败得失,皆可资证明。

三、同含异体、和而不同:鲁迅、胡适的学术差异

论现代《西游记》学术史,必将鲁迅、胡适并称,他们并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奠基者,同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第一代拓荒者。然而学术贵乎独创,以多歧为贵,即使两人曾经并肩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共同发起“文学革命”,但由于对新文化根本认识、立场的偏差^③,入学

① 胡适《〈西游记〉考证》。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③ 1921年初,在政治上逐渐转向保守改良主义立场的胡适退出《新青年》,五四新文化领导层发生分裂,鲁迅支持李大钊,坚持《新青年》的革命精神,鲁迅与胡适因此曾一度交恶疏远。参见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74页。

途径、术攻领域以及研究方法也均有不小差别,对《西游记》研究也必然呈现诸多异相。同含异体,和而不同,恰可概括他们治《西游记》的基本情状。在评价、彰显他们的共同贡献,齐师并尊的同时,客观地鉴析、梳辨两人学术个性的差异和各自的特殊功绩,特别是透视两人就《西游记》有关问题的相互论争、辩难,更能见出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多元并存、异彩纷呈的学术面貌,也理所当然的是我们撰述《西游记》学术史的题内应有之义。

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作具体展开。

第一,从宏观、整体上评价《西游记》,也即关于作品的“大旨”,鲁迅与胡适颇持相同(相似)的看法,但同中有异,同含异体。鲁迅说,“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胡适也赞同“游戏说”,也说过《西游记》是“游戏的小说”的话^①,不过他更多、也更著名的提法是“滑稽小说”,概括有所不同。

这一层面上的差异比较微妙,且事实上常被论者忽视。鲁迅的论述是:

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不像《三国演义》,见刘胜则喜,见曹胜则恨;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②而胡适的论述是:

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③

①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③ 胡适《〈西游记〉考证》。

其共同性还有一处互证:胡适《〈西游记〉考证》曾称引阮葵生《茶余客话》:“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并注明:“周先生(即鲁迅)考出《茶余客话》此条系根据吴玉搢的《山阳志遗》卷四的”,说明胡适不仅赞同“游戏说”,而且其论还受到鲁迅的影响。而鲁迅在论述《西游记》游戏特征时也参考、引证了胡适的观点:“作者稟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并径直注出:“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①。可见两人在这一问题上是互通信息、互相称引并相互支持的。

但是,如作仔细对照,则不难发现两者并非完全契合,在“游戏”和“滑稽”的概括中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却是不该忽视的区别。

众所周知,鲁迅与胡适都以反对、清除明清旧说为己任,但在否定的程度上,在具体论述上各有侧重。鲁迅在思想文化方面一贯主张“拿来主义”,故而对以往的思想资料采取审慎态度,并力图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

评议此书者有清人山阴悟一子陈士斌《西游真诠》(康熙丙子尤侗序),西河张书绅《西游正旨》(乾隆戊辰序)(当为《新说西游记》——引者注)与悟元道人刘一明《西游原旨》(嘉庆十五年序),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未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

鲁迅对“劝学”、“谈禅”、“讲道”一类旧说是持否定态度的,明确提出此书“实出于游戏”,但他也承认小说“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的事实,所以对谢肇淛“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之说^②也表示一定程度的赞同。当然他的表述很精审周到,说是“假欲勉求大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谢肇淛《五杂俎》:“《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鲁迅在论述中全文引录。

旨”，又谓“如果一定要问”^①，那么也就是这点“求放心之喻”，也即作品所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喻意罢了。态度比较温和，意思是说一定要这样理解也无不可。

胡适则不一样。我们早已领略过他以雷霆万钧、横扫千军之势彻底地否定“旧红学”的风采^②。他的《〈西游记〉考证》也采用了“一网打尽”的办法，对明清以来的一切旧说皆予以彻底的否定和批判。他说：

《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现在我们把那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胡适不仅指责明清旧说是“走错了路”，而且不无义愤地指出了它们“弄坏”《西游记》的罪状，视其为《西游记》的“大仇敌”。他呼吁清除罩在作品上的“儒释道三教的袍子”，显露其“本来面目”——滑稽小说和玩世主义。这一评价的基本精神在于对以往研究的全面否定，显示着彻底决裂的姿态。其时胡适在政治上已有了保守改良主义的倾向，但在学术上仍保持着五四文学革命的锐气。比较而言，对于清理旧说，揭示《西游记》的真谛，当推胡适最为功勋卓著。

在《西游记》论坛，曾一度出现过贬低胡适的倾向。比如有人指责胡适的“滑稽说”、“玩世主义”是取消作品的现实意义，“表现了十足的民族虚无主义”^③。这显然是出于误会了。其实胡适观点的完整表述是：“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爱骂人的玩世主义”。“滑稽”作为美学范畴，本身就具有喜剧和讽刺性寓意；“爱骂人”是指吴承恩有满腹不平，《西游记》是孤愤之作，所以胡适激烈地反问道：“如果著者没有一肚子牢骚，他为什么把玉帝写成那样一个大饭桶？为什么把天上写成

① 分别见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②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劈头说：以往的“旧红学”“都是走错了路”，“他们不去搜寻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在搜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实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结论是一言以蔽之：“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研究者“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

③ 参见寇养厚《〈西游记〉的文心之微与研究方法——学习鲁迅关于〈西游记〉的论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那样黑暗、腐败、无人？为什么教一个猴子去把天宫闹的那样稀糟？”这些都同样见诸《〈西游记〉考证》，我们不该断章取义，忽视胡适如此深刻的思想。

第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鲁迅、胡适有许多完全不同（对立）的看法，甚至发生激烈的论辩。其中有些问题是具体细节，属于局部性的。如关于吴承恩生卒年，鲁迅定为 1510？—1580，胡适则定为 1520？—1580？。又如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胡适沿袭王国维考证视为“南宋‘说话’的一种”，而鲁迅则“疑此书为元槧”^①。这些局部性枝节问题虽对其他问题发生着影响，但未能从根本上制约整体的《西游记》研究。有些问题则影响全局，关乎对《西游记》的根本看法，认识上的分歧直接体现出两人不同的学术个性，所以两人坚持己见，直至展开反复论辩。这主要表现在关于祖本问题和孙悟空来源问题的两次争论上。祖本问题的分歧前文已有所涉及，兹就有关孙悟空来源所作的讨论、辩难介绍、评述如下。

鲁迅最早对孙悟空来源进行探究，提出了“民族传统说”。他据《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七《李汤》条和《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所收《西游记》一折中有关无支祁（一作巫枝祗）记载等事实，认为孙悟空来源于民间无支祁传说。他在 1922 年 8 月 21 日致信胡适，称：“再《西游》中两提‘无支祁’，盖元时盛行此故事，作《西游》者或受此事影响。其根本见《太平广记》第四六七《李汤》条。”又在另一信中指出朱熹《楚辞辨证》中关于无支祁的材料，说明南宋时即盛传“僧伽降无支祁”故事。同时，他将这一观点（包括材料）写进《中国小说史略》并作综合考辨说：

宋朱熹（《楚辞辨证》中）尝斥僧伽降伏无支祁事为俚说，罗泌（《路史》）有《无支祁辨》，元吴昌龄（实为明杨景贤——引者注）《西游记》杂剧中有“无支祁是他姊妹”语，明宋濂亦隐括其事为文，知宋元以来，此说流传不绝，且广被民间，致劳学者弹纠，而实则仅出于李公佐假设之作而已。惟后来渐误禹为僧伽或泗洲大圣，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

^① 鲁迅《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第 176 页。

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

胡适在 1923 年初所作《〈西游记〉考证》中引用了鲁迅所寄的全部史料,并称:“或者猴行者的故事确曾从无支祁的神话里得着一点暗示,也未可知。”但他从根本上认为孙悟空当有另外的源头,那就是印度史诗《摩罗衍那》中哈奴曼传奇故事,他说:

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因为《太平广记》和《太平寰宇记》都根据《古岳渎经》,而《古岳渎经》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书。宋元的僧伽神话,更不消说了。因此,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Ram-ayana)里寻得一个哈奴曼(Hanu-man),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

通过对哈奴曼形象的分析,以及他与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的比较,胡适找出了两者的联系:

第一,《取经诗话》里说,猴行者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花果山自然是猴子国。行者是八万四千猴子的王,与哈奴曼的身份也很相近。第二,《拉麻传》里说哈奴曼不但神通广大,并且学问渊深;他是一个文法大家;“人都知道哈奴曼是第九位文法作者”。《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初见时乃是一个白衣秀才,也许是这位文法大家堕落的变相呢?

对于胡适的“外来影响说”,鲁迅不同意并坚持己见,此后又专门就此问题作了说明:

我以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则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俄国人钢和泰教授也曾说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可是由我看去:1. 作《西游记》的人,并非看过佛经;2. 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没有和这相类的话;3. 作者——吴承恩——熟于唐人小说,《西游记》中受唐人小说的影响的地方不少。所以我还以为孙悟空是袭取无支祁的。但胡适之先生仿佛并以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传说的影响,这是我现在还不能说然

否的话。^①

“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两说并峙以后,后世学者皆有沿袭,各自从中得到莫大启迪。从稍后的陈寅恪、郑振铎到当代季羨林、金克木等著名学者都著有相关论文,讨论孙悟空的“国籍”归属,虽然至今未有定讞,也已足见当年鲁迅、胡适的论辩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丰厚的学术含量。

关于鲁迅、胡适的学术差异,除了以上两个层面的比较、展示以外,如果从方法论意义上,再结合他们整体的小说研究,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议。那就是胡适重视探索《西游记》本事史实的考证,鲁迅则善于对作品进行类型概括,针对《西游记》提出了神魔之争、神魔小说等概念。

胡适的《西游记》研究以考证为特色,通过查稽相关史传、地理典籍和以往全部“西游”作品(主要是宋元时的话本与戏曲)探寻《西游记》的演化轨迹。他从《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考出玄奘西行的初衷和一些具体的过程(经历),揭示出取经目的的变化、《心经》的来历、御弟(唐太宗与唐僧结拜为兄弟)的故事原型。而这些对于认识《西游记》“神话化”(也即演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这个动机,不幸被做《西游记》的人完全埋没了。但传中说玄奘路上经过的种种艰难困苦,乃是《西游记》的种子。”又说:“这一点大可注意。《西游记》中的唐太宗与玄奘结拜为兄弟,故玄奘以‘唐御弟’的资格西行,这一件事必是从高昌国(在今新疆吐鲁番市东)这一段因缘脱胎出来的。”胡适认为历史上的玄奘西行可分前后两个阶段,遇到高昌王麴文泰之前饱经艰辛,之后则是“阔留学”,见解非常精辟。《西游记》舍弃了这一段“阔留学”过程,让唐僧自始至终陷于苦厄之中,表现出自觉的艺术意向。胡适又依据《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初步揭示出《西游记》的演化史。他指出《诗话》历难“虽没有八十一难之多,却是八十一难的缩影”,“南宋或元朝已有了这种完全神话化了的取经故事”。并进一步作出推定:《西游记》故事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在元代“还不曾有相当的散文的写定,还不曾成为《西游记》小说,当时若有散文(与韵文相对)《西游记》,大概也不过是在《取经诗话》与今本《西游记》之间的一种平凡的‘话本’”^①。胡适的这个推测,完全源自对《西游记》与以往西游故事和史料的联系的精审考察,所以有很大的合理性和预见性,并被后来发现的《永乐大典》13139卷“送”字韵“梦”字条所引《西游记》平话残文《梦斩泾河龙》,以及朝鲜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记载《西游记》平话“车迟国斗圣”(片断)等材料所证实。

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小说史学的奠基之作,除了以中国小说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即时间顺序立纲的特征外,还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框架:小说的类型体系——这在明清时段更加突出,分别以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等类型来归纳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潮流——从而构成了不同它前后所有小说史著作的一大特色^②。陈平原认为正是“将小说类型的演进作为中国小说史叙述的重点,构成了鲁著(指《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引者注)的一大特色”,从而使得“整个小说史研究焕然一新”^③。胡从经进一步指出《史略》“在小说类型研究中”具有“开山作用”,他具体评述说:

展示鲁迅在二十年代上半期推出的《小说史大略》、《中国小说史大略》、《中国小说史略》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四种相互关联(前三种其实是小说史讲义的几次修订本)的小说史著作,即可看出作为一个极赋才情、史识与首创精神的小说史家,根据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按照组织和结构所形成的特殊种类,设计了各种小说类型,作为小说史著作的若干构件。同时,这些设计在研究的进程中,又不断地修正与完善。^④

① 以上引文均见于胡适《〈西游记〉考证》。

② 据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五四’以后,中国学术界打破了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自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共出现了十五种中国小说史专著。……其中有三种问世于鲁著(指《中国小说史略》——引者注)之前,十一种出版于鲁著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③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3章“中国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④ 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第422页。

鲁迅对《西游记》研究的一大贡献即在于他对作品中神魔关系的看法,并提出了神魔小说这一重要概念。其一,鲁迅根据明朝帝王崇道风盛,方士杂流拜官显赫,“荣华熠熠”,引起士流俗众企羡同好,“妖妄之说自盛”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揭示出神魔小说繁盛的原因,其流向大致为:《平妖传》开其先,《四游记》(包括《八仙出处东游记》、《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即《南游记》、《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即《北游记》和杨致和《西游记传》)继起若鹭,《西游记》集大成,为“鸿篇巨制”,《封神榜》等为殿后。十分精辟地揭示出神魔小说的发展历程,并在其中突出了《西游记》的地位。其二,鲁迅深入分析了《西游记》中三教并存、九流杂处的复杂关系,经过归并剔析,概括为神魔关系,并以此总而统之,使其纲举目张,有条不紊。他说:“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①纵观以往对《西游》的评论,皆不及“神魔关系”一说简扼得当。其三,《史略》第十六至十八篇皆以“神魔小说”总题之(分上、中、下),首次正式提出了这个小说类型,它既能隐括这一类小说的创作思潮和美学特征,又能与其他类型的小说相并列、相区别,涵盖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内容。特别是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又进一步将以《西游记》为主要代表的神魔小说与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在《史略》称人情小说)并举为明代小说两大主潮。从此以后,神魔小说成了中国小说研究特别是《西游记》研究中的专门性术语,大凡评论《西游记》者很少有不采用或借鉴这一术语的。

与鲁迅不同,胡适《〈西游记〉考证》使用的是“神话小说”这一概念。由于两人的研究同步进行,互通有无,对《西游记》总体性质持大致相同的看法,故而两者所指在当时可能本无大的差别;但在后人看来,由于神话原型批评、文学人类学批评、宗教文化批评等方法的引入,历史—审美研究的深入,这两个概念的差异便越来越显露出来。神话是上古先民为了战胜和支配自然力,借用想象创造出来的,是原始思维的产物,是人类童年时代天真和幻想的体现^②,用“神话”这一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2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概念,只能涵盖《西游记》的外在形式特征(如充分的浪漫主义写作手法),却与《西游记》的文化精神并不吻合,并与其自觉的艺术创造意识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抵牾。而神魔小说这一概念既能符合神话(现代再生型神话)的形式特征,还能如实地概括作品的全部丰富的文化精神,这就显得比前者更为合理和科学。我们没有必要由此去指责胡适混淆原始思维和自觉的艺术思维、原始神话与《西游记》一类再生型神话的区别,但却对于鲁迅的精审慎到、完备恰当的归纳抽绎深感佩服。

顺便提及一下,关于“神魔小说”与“神话小说”两个概念,学术界曾展开过一些探讨,两者的拥护者各有其人^①。

^① 参见何满子《〈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李希凡《〈西游记〉与社会现实》,均载《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钟扬《“神魔”、“神话”二说之起伏消长——“西游学”史片面观》(《安庆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所论尤详。

第六章 郑振铎、孙楷第和刘修业

一、《〈西游记〉的演化》：现代小说研究的世纪“杰构”

五四时期以后,鲁迅、胡适继续关注并参与《西游记》研究,但大规模的考证史论工作宣告一个段落,同时也对后来者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所谓“诚望杰构于来哲也”^①。考察其时《西游记》研究实际,我以为鲁迅先生当年期望之“来哲”、“杰构”者,唯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当之无愧。郑氏因循鲁迅、胡适等拓荒者留下的线索,进行进一步开掘:简略者详之,阙失者补之,正确者光大之,错讹者修正之,继往开来,拨乱而反正,为现代《西游记》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不过,我们注意到,自《〈西游记〉的演化》问世至今七十年,虽然经常可见学术界对其中观点、材料的引用、申述,却始终未见对这篇世纪宏文之成就、意义和学术地位作全面、整体的评价,即便是对其中某些具体的研究成果也尚未有足够深入的探讨和认识。究其原因,人们一般都将郑振铎与鲁迅、胡适并为五四时期现代《西游记》研究的第一代奠基者,并将他们的学术研究融会贯通,视为一个整体,较多地注重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相对忽视了郑振铎的学术个性、学术品格和特殊地位。其实,郑振铎固然与鲁迅、胡适同受五四精神哺育,也以“一代才华”(郭沫若语)与他们并为现代学界巨擘,但其自身也有着鲜明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学术轨迹,他们的《西游记》研究也有着清晰的层次感: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在1923年,其原始之北大讲义完成于20年代初;胡适首次作《西游记序》在1921年,经累次补足的长文《〈西游记〉考证》发表于1923年;而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作于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题记》。

1933年至1934年之间,与前者相隔十年。而这十年中,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剧变,思想、学术,包括小说研究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西游记》研究也从观念、方法和学科形态上焕然一新。郑振铎始终站在《西游记》学术研究的前沿,真切地感受、掌握着其中的变化和走向。《〈西游记〉的演化》正是这一时期《西游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积淀着本学科领域丰富、新颖和全部之学术成果,毋庸置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西游记》研究史上则显示着无可替代的意义。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述之。

首先,对《西游记》新史料的发现与认识。

五四初期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发轫期,态势强劲,但文献资料相对薄弱,正如鲁迅当年感叹:“明清小说阙略”,尤其是“旧本希觐”,版本资料匮乏,“观览又不周洽”,故而其时研究很难深入,且难免存在一些疏漏错失^①。有鉴于此,郑振铎与孙楷第、马廉、赵万里、董康、傅芸子等学者致力于搜罗史料,检索文献,他们西越英伦,东渡扶桑,所到之处废寝忘食,“笔不停挥”,收获颇丰。1925年,郑振铎在《时事新报》副刊《鉴赏周刊》(第2—18期)率先发表《中国小说提要》,展示访书业绩,并称:“颇有野心欲对于中国小说作一番较有系统的工作”,以改变中国小说研究“文献不足征”的局面,“一方面经自己搜集进一步的研究材料,一方面也可顺便的将中国小说的宝库的内容显示给大家”^②。有关《西游记》史料尤有创获:1930年,郑振铎与马廉、赵万里访书宁波,意外发现了明初无名氏(一作贾仲明)《录鬼簿续编》天一阁抄本,其中明确记录着明初杨景贤作有《西游记》杂剧,于是以此为契机,始有学者据此考定今通行本《杨东来批评本西游记》(杂剧)作者当为明初杨景贤,而非原先认定之元前期杂剧名家吴昌龄,从而一扫中外学术界数十年之误^③。当然,记录、评介《西游记》新史料最为丰赡的文章正是《〈西游记〉的演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份珍贵的《西游记》史实汇编,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始文献信息库,现择其要者

① 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后记》。

② 郑振铎《中国小说提要·短序》,《中国文学研究》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③ 参见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胪列、评述如下：

其一，世本。目前所知最早刊刻的百回本《西游记》小说当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之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该本曾遭长期湮没，郑振铎详细地介绍了世本发现的过程。

1930年，一个极偶然的机，上海中国书店在某书封皮背面发现明刻本《西游记》一页，行内人士“诧为奇遇”，后此页经赵万里转赠给郑振铎。郑将其称为“四大套明刻吴本《全书》（指世本）发现的先声”；1931年9月，孙楷第受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委托，扬帆东渡访书，遍寻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帝国图书馆、尊经阁、静嘉堂、成簒堂等公私文库所藏之小说珍本秘籍，发现包括世本在内的明刻《西游记》达七种之多，并抄录一部分资料回国。1932年，经多方呼吁，北平图书馆花重金购入世本与朱本，消息传出，万众瞩目，《西游记》论坛欣喜雀跃。郑振铎称“这使我们如何的高兴”，并“连忙坐了公共汽车进城，得以第一次获观数年来念念不忘的两部书”。至此，世本宣告正式发现，国人得以重窥明刻百回本《西游记》之全貌。这是20世纪《西游记》研究中最重大的文献发现，对此，胡适高度评价说：“国内至今还没有可贵的《西游记》本子，而孙先生在日本所见到的明刻本共有七部，加上宋刊的两种《三藏法师取经记》和盐谷温先生印行的吴昌龄（实为杨景贤——引者注）《西游记杂剧》，从此《西游记》的历史的研究也可以有实物的根据了。”^①现代《西游记》研究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其二，朱本。据《〈西游记〉的演化》记载，当年北平图书馆购入的另一部明刻（简本）为《鼎镌全相唐三藏西游记传》（第一卷末又题作《唐三藏西游释厄^②传》，今以后者通行）。郑振铎根据其题署“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书林莲台刘承茂绣梓”，以及版式、纸张的特点断为明代嘉隆间闽南书肆刻本，“其时代最迟似不能后于万历初元”，并进而认定是“一套从未见之记载的一部异本”，甚或“说她是一部孤本，大约也不会错”。该书在此之前孙楷第曾于日本村口书店见过，然唯“以

① 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2年6月初版。

② “释厄”朱本原作“释尼”，学界多以为刊刻之误，当为“释厄”。

半小时之力恍读一过”，虽“叹为秘籍”，无奈所观未周，其《书目》所记也难免多有语焉不详处^①。向国人作详尽介绍，并对其版本性质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对其在《西游记》文本流变过程中的地位，特别是与世本、阳（杨）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评述，实始于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其三，“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平话（残文）。《〈西游记〉的演化》说：“正当此两部不平常的明刻本《西游记》及《西游记传》出现的时候，一个更重大的消息也为我们所宣传着。”那就是“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平话》（残文）的发现。原来，在北平图书馆善本室所度藏的《永乐大典》抄本 13139 卷“送”字韵“梦”字条中引有一千二百字的“梦斩泾河龙”，标题作《西游记》，内容相当于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发现者未指明，但就文中所谓“孙楷第先生曾钞得此条见寄”推测，孙楷第或为此本发现者之一。据目前版本资料，可知将该片断全文第一次公布于众者，当推《〈西游记〉的演化》。郑振铎将该残文内容与世本相关篇目作详细对读后指出：这是一部稀见之“古本《西游记》小说”，它的发现证实了鲁迅先生早年预测“在吴承恩之前果有一部古本的《西游记》小说”的论点，进而断定：“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就是吴承恩本的祖源。

.....

众所周知，史料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其革新创造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凭空而为，而必须实际地占有史实，从第一手文献出发，故而学术界始有“一切学科皆是史科学”的治学准则^②。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③小说研究亦是如此，胡适、鲁迅治小说的重大贡献和特色之一便是考证史实，辨析文献，蒐集钩辑史实。胡适认为：“做文学史（小说史）和做一切历史一样，有一个大困难，就是选择可以代表时代的史料。”^④从小说研究实际来看，每一次新史料的发现都会引发一场学术的突变，如关于曹雪

① 参见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83页。

② 傅斯年曾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参见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

③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④ 胡适《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4月初版。

芹生平史料的发现直接催发《红楼梦》研究从“旧红学”到“新红学”的质变;《录鬼簿续编》的发现,使鲁迅得以根据作者与罗贯中为忘年交的线索考定罗贯中为元末明初间人,从而对《三国演义》的源流和成书情况有了新的认识。同样,由于上述《西游记》新史料的发现,《西游记》研究也必将引发一场根本性的剧变,并促使其学科实现意义深远的现代转型,《〈西游记〉的演化》这篇世纪“杰构”正是建立在翔实、丰厚的史料基础之上,发前人之未发,提出了许多开创性、建设性的论断,从而在现代《西游记》研究中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其次,献疑解惑:关于《西游记》第九回。

献疑而后解惑,也即通常所谓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一切学术的基本精神,同时也构成了学术活动的基本环节。作为“五四”学术大师,郑振铎既具有发现问题的慧眼、提出问题的胆识,而且更富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为世人称道者便是关于《西游记》第九回即唐僧出世问题的深湛考辨及其精辟论断。

《西游记》在其漫长的文本演化中,渐次形成了种种难解的疑团,其中第九回唐僧出世之谜尤为人注目。胡适、鲁迅治《西游》时所本者皆为“真诠”、“新说”、“原旨”之类清本《西游记》(百回本),明本全部阙如未见。世本被发现如上所述在1932年,另一部重要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只有傅惜华、王古鲁、孙楷第等少数人较早在域外访书时见过,迟至上世纪中叶国内才见原书。清本的第九回是“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在取经缘起“太宗入冥”故事前详叙唐僧身世,因其内容十分翔实生动,且衔接颇为融洽,故而未引起他们的注意。世本问世后,人们才知明刻百回本并无“陈光蕊、江流僧”这一唐僧出世故事,其第九回径直作“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从回目到内容皆与清本之第十回相近似,但其时《西游记》论坛表现出惊人的通达与宽允,竟将这种差异视为《西游记》文本流变中增减衍脱之普通现象,故而一直未有人作深究。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的一大贡献便是突破了这一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最早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和考论。他在本文开篇即展示了一个发现,他说:

问题虽然较小,却很少有人拈出过。想不到那末大的一个罅

漏,居然会没有人发见,而任他逃出读者们的“注意”之外。原来近三百余年来盛传的种种异本之吴承恩的《西游记》,无论是新说,或证道书,或其他,其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第十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的开场白若干语,几乎完全是雷同的。

对此,郑振铎敏锐地意识到这并非是文艺创作中的偶然性疏漏,其中隐藏着关于《西游记》的重大奥秘,《演化》在全文引述这两段文字后,作者明确指出:“为什么紧接着的两回,《西游记》的作者乃这样不惮其烦的抄上如此相同的文字呢?吴承恩^①是决不会笨到这样的。”并进而断定:这是一个谜!这个谜关乎整个《西游记》演化的大局。

那么,这个谜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又该将如何解释呢?

郑振铎将新发现的两种明本(世本与朱本)与各种清本进行仔细对读,条分缕析,正本清源,逐步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先是从最先增插唐僧出世故事的百回本《西游证道书》评注本中寻找到其肇始的原初动因,那就是“证道书”笺评者汪澹漪在第九回的回评:

俗本删去此一回,致唐僧家世履历不明,深疑与花果山顶石卵相同。而九十九回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载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令阅者茫然不解其故。殊恨作者之疏漏。后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备载陈光蕊赴官遇难始末,然后畅然无憾。……始补刻此一回。(郑振铎原文引自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文字略有脱漏,现据《西游证道书》补足。——引者注)

由于这一意见颇符合创作规律,且迎合了读者受众的欣赏要求,“确有可取处”,故而《西游证道书》“补刻此一回”这一举动在清代反响强烈,“真诠”、“新说”等各本皆予修订沿袭,从而成为清代《西游记》与明本不同的一大特征。当然,号称出自大略堂古本云云,不过是借古以自重,殊不足信,但却明确透露出它“当有所本”、并非空穴来风自行杜撰的信息。

^① 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五四时期郑振铎等人皆持吴著说,这里为论述方便姑从鲁迅、胡适所说。

对此,郑振铎提出两种可能:“到底这陈光蕊故事是吴本所原有而世德堂本删去的呢,还是吴本原无,而为清代诸刊本所妄加的呢?”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难解的疑问。而郑振铎的看法倾向性似很明显:“吴承恩的原本,乃至《永乐大典》的古本,当都无此故事。”唯明代简本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卷四载有一个完整、详细的唐僧出世故事,汪澹漪“却是无疑的从朱鼎臣本转贩而来”,经改编、充实而成。现世本、朱本俱在,可知此论不虚,堪为征信之辞。只是非经仔细对读、深入甄别、鉴定和精密的考辨而莫办。

或说:朱本既为简本,由百回本删节而成,其所载内容怎么可能超越世本呢?其实,《〈西游记〉的演化》也早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其中说:

朱本第一卷到第三卷,叙述孙悟空出身始末者,离吴氏书的本来面目,尚不甚远,亦多录吴氏书中的许多诗词。其第四卷,凡八则,皆写陈光蕊事,则为吴氏书所未有,而由朱氏自行加入。其所本,当为吴昌龄(实为杨景贤——引者注)的《西游记杂剧》。

原来,“陈光蕊之官逢盗,江流僧复仇报本”故事早在民间盛传,宋元时即有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演绎其事,同一母题的作品则在唐代已经出现,其经不断累积而集大成之作便是明初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六本)。它以整整一本的规模来叙述这个故事,其四折内容为:之官逢盗、逼母弃儿、江流认亲、擒贼雪仇。可见今存朱本中的情节本事已完全具备。所以郑振铎解释说:“到了朱鼎臣删改吴本的时候,他似见到戏剧中的陈光蕊的故事,而颇以吴本不详为憾。故而自显身手,编了一卷八则的洋洋大文加入。”又因为朱本是简本,“见者似不多”,流传不广,直至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出,才促其风行、广为人知;只不过其修补缀合之功并不到家,未能做到天衣无缝,妙合无垠,遂留下新旧两个第九回文字雷同、吴本与朱本重叠的“大罅漏”。

当然,这个问题本身异常复杂,而由于资料缺乏,要辨明其演变真相,更显棘手,使人不免有扑朔迷离之感。正因为如此,郑振铎在论述中也似乎存在两可之论,他一方面说吴承恩原本“当无此故事”,一方面也有疑虑:“难道吴氏原本果有此一段故事,而为世德堂所脱落?这也很有可能。”我们注意到,《西游记》论坛对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存在

不同意见,争论不休,据此亦可理解了。如李时人便认为吴承恩原本即有唐僧出世故事,惜乎为世本刊落,而所幸朱本保留了“这一璀璨的艺术珍宝”,遂使《西游记》成为完璧,从而成为一种“难得的文艺化石”^①。笔者认为,这样多方面的思考、探索对于学术研究是极其有益的,任何学术问题的争辩未必能一锤定音,对已有的结论完全可以商榷讨论,不过也应充分认识到,正是郑振铎最早发现这一问题并进行深入探讨,才开启了后人的学术思路,成为他们进一步研究所遵循的线索,就《〈西游记〉的演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而言,无论是其精湛的考辨工夫,还是足成一家之言的精辟论断,都是极有价值的。

再次,溯流探源:揭示《西游记》的演化轨迹。

《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小说巨著,从唐初玄奘西行取经求法本事到明代中期(16世纪末叶)由文人创编为长篇巨帙,经历了长达近千年的演化、发展,《〈西游记〉的演化》顾名思义,其精髓在于溯流探源,梳理脉络,揭示其演化的轨迹。这一工作始于胡适、鲁迅,然而他们侧重于考证和史论:订正史实,论定作者,清洗有关《西游记》主题的种种旧说;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对这一漫长、复杂的演化过程进行全面梳理,痛下过一番排云破雾、磨光刮垢,或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夫,并且得出一系列研究结论的,实为郑振铎。细读《〈西游记〉的演化》,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十分丰富,令人注目。

其一,最早论定《西游记》非作者个体原创,而是有一个据旧本改编的过程。

鉴于《西游记》经过漫长演化的实际,鲁迅、胡适都似感到吴承恩《西游记》百回本小说当有所本。鲁迅认为《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其“全书次第,与杨志(致)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②。并推断“在吴承恩之前,果有一部古本的《西游记》小说”。胡适则认为“元代已经有很丰富的《西游记》故事了”,“这个故事在戏曲里虽然已很发达”,但“还不曾有相当的散文的写定,还不曾成为《西游记》小说”,假设“当时若有散文《西游记》,大概也不过是在《取经诗

① 参见李时人《〈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话》与今本《西游记》之间的一种平凡的‘话本’”^①。由于他们未见吴承恩“所本”的“古本”，故而未能对此作更深入的探究。

胡适、鲁迅的预言，由于30年代数种《西游记》古本被发现而被证实，并凸现出重要的理论意义。郑振铎甚至将它视为“最大的一个问题”，他在《〈西游记〉的演化》中开宗明义，劈首便说：

吴承恩本的《西游记》是创作的呢，还是将旧本加以放大的？易言之，即吴承恩的地位，到底是一位曹雪芹呢？还是一位罗贯中？他的《西游记》到底是一部《红楼梦》似的创作呢？还是一部《三国演义》似的“改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仔细的加以讨论。

郑振铎将“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平话残文《梦斩泾河龙》与世本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进行仔细对读，发现后者竟完全是对前者的“放大”，“内容几乎无甚增改”，故事内容，甚至像“辰时布云”，“下（雨）三尺三寸四十八点”等细节也完全雷同。这就说明百回本《西游记》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并非作家个体的原创之作，而是依附前作，承袭旧本，有一个改编的过程。

当然，郑振铎也充分肯定《西游记》“神骏丰腴，逸趣横生，几乎另成了一部新作”，吴承恩“功力壮健，文采秀丽”，当之无愧为《西游记》这部稀世巨著的“造物主”。故而他的结论是：“吴承恩之为罗贯中、冯犹龙一流的人物，殆无可疑。吴氏的《西游记》，其非《红楼梦》、《金瓶梅》，而只不过是《三国志》和《新列国志》，也是无可疑的事实”，其地位“殆为诸改作小说的最高峰”。此论务实公允，被后世学者奉为的评。

其二，最早推定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是“永乐大典本”古本《西游记》平话。

《西游记》既非文人原创，又非一时猝成之作，在其漫长的演化中以《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史实为发端，不断吸纳后世民间传说、故事，特别是唐代传奇、宋元戏曲以及诗话、平话等多种文艺作品的成果，渐次累积而成。那么，作者在创编过程中主要

^① 胡适《〈西游记〉考证》。

参照的前代古本(《西游记》研究者习惯称之为“祖本”)究竟是什么呢?

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鲁迅。其时世本与朱本尚未被发现,作为明代《西游记》小说只有由余象斗《四游记》保留下来的简本杨致和《西游记传》,因此他“别无选择”地认定杨本就是《西游记》祖本。不过其时“认定”比较含糊,一是因为杨本“虽大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与真正意义上的“祖本”还有一定差距;二是吴承恩本《西游记》取材“颇极广泛,于《四游记》中亦采《华光传》及《真武传》,于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记杂剧》及《三藏取经诗话》(?)……”^①所以,事实上要确定《西游记》祖本只有在30年代多种明刻古本发现之后才有可能。

郑振铎以其非凡卓越的学术胆识,抓住了这一宝贵的历史性机遇,经过深入透彻的比较鉴别和理性分析,在《〈西游记〉的演化》中,他作出了如下断言:

鲁迅先生所说的吴氏书有祖本的话是可靠的。不过吴氏所本的,未必是杨致和的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而当是《永乐大典》本。

又说:

《永乐大典》本《西游记》之为吴承恩本的祖源,却是无可疑的。就此一条文字(指“梦斩泾河龙”)看来,古本《西游记》小说,其骨干与内容是不会和吴承恩相差得多少的。

这样,《西游记》的源流,是颇可以明了的了。最早的一部今日《西游记》的祖本,无疑的是《永乐大典》本。吴承恩的《西游记》给这“古本”以更伟大、更光荣的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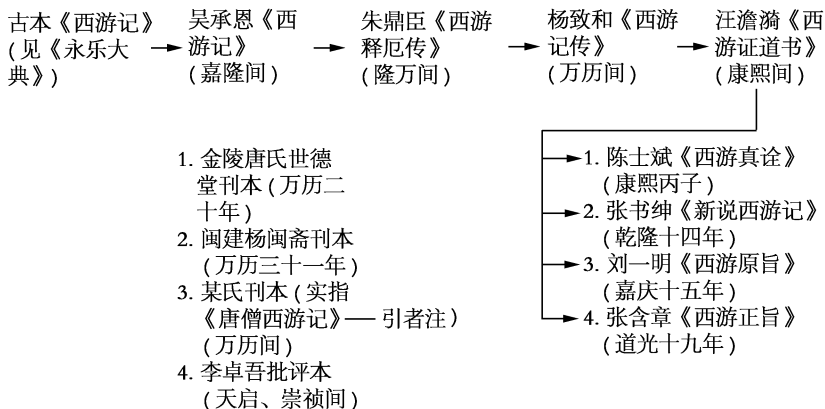
这一论断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鲁迅先生欣然地将其称赞为“精确的论文”,并由此订正了自己关于杨本为祖本的看法:“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的《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②于此,足见其学术的价值与影响。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且介亭杂文二集》。

其三,第一次全面厘定明清《西游记》版本演变的轨迹。

《西游记》成书后,雅俗共赏,风靡于世,于是竞相翻刻梓印,从而形成了复杂的版本系统。随着各种版本的相继发现,各种关系交织夹缠,如全本与简本的关系,包括不同的全本与不同的简本之间的关系,原本与笺评本的关系,世本与祖本的关系,明本与清本的关系,等等。它们或错综交杂,或相衔相衍,或漫漶重叠,不解其故者简直茫无头绪,即或是一些研究者也不免一头雾水。郑振铎有鉴于此,花费大量精力,溯流探源,爬罗剔抉,终于依据其刊刻的时间顺序和内部的逻辑线索,全面厘定《西游记》明清两代各种版本的演变轨迹。现据《〈西游记〉的演化》转录于下:



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出,《西游记》的祖本是《永乐大典》古本,吴承恩本是百回本原本,从万历到崇祯间先后产生了四种明刊翻刻本,同时还有朱本和杨本两种明简本,然后便是清初汪澹漪笺评本《西游证道书》,并以此为母体,衍生出四种清刻笺评本,其中《新说西游记》系按李评本并参照汪本翻刻,总计明清两代共有《西游记》各类版本十二种。虽然不能说此表已经将明清两代的《西游记》版本囊括殆尽,以及此表中的每一种版本之定位完全准确无误^①,但平心而论,在《西游记》研究史上,这是第一次将各种版本胪列出来的“明细表”,《西游记》文本演化的轨迹从整体上已一目了然,从而基本解决了版本错杂

^① 此表的不妥之处主要有:一、世本、杨闽斋本、唐僧本、李评本不能并列、安置在同一层次;二、《西游证道书》与《新说西游记》不是同一个版本系统,不能作为新说本的母体。

无序、混沌不清这一《西游记》研究中的“难题”。而对于《西游记》版本研究,它以其多方面的线索,连同其中的错讹,开拓了宽阔的讨论空间,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方向。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西游记〉的演化》这篇世纪宏文的最重大的贡献。

其四,第一次评述了《西游记》神魔故事的集合方式和结构特征。

作为神魔小说,《西游记》故事的集合方式和结构方式,有着自身鲜明的特征。郑振铎对此问题也进行了重点评述,在《〈西游记〉故事是如何集合的?》专章中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首先,他将《西游记》的整体内容分割成孙行者闹天宫记、唐太宗入冥记、唐三藏西游记三大相对完整、独立的内容板块,如果考虑到“陈光蕊、江流僧”故事的特殊性,那么,“其所集合的故事的‘单元’,不止是三个而是四个了”。其次,他指出“唐三藏西游记”是整部作品的主体,“内容最繁赜”,其九九八十一难,按其除魔故事本身的逻辑,实际上可以合并为四十一个故事,它们丰富多彩、变幻莫测,“构成了五色迷人的一部西行历险图”。最后,也是最富创见的地方,郑振铎把《西游记》的结构命名为“蚯蚓式结构”,即“《西游记》的组织实是像一条蚯蚓似的,每节皆可独立,即斫去其一节一环,仍可以生存”。这是吴承恩的天才创造。在此之前,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已有了《三国演义》的网式结构,《水浒传》的链式结构。所谓网式结构,便是经纬相织,纵横交错;所谓链式结构,便是环环相扣,陈陈相因,最后首尾相接成链;加上《西游记》的“蚯蚓式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方式大为丰富。这不能不说是吴承恩艺术实践的伟大功绩。而创作实践需要理论的总结,正是郑振铎将它上升到理论层次,全面总结、分析了《西游记》的结构特征,并赋予其一个响亮、不朽的名字,所以我们在称赞四百年前吴承恩的天才创造的同时,也将由衷地感谢郑振铎学术慧眼的发现和如此精辟、透彻的概括。

任何学术活动都受到时代精神的推动,但也必然带有这一时代条件的局限。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也同样如此,它一方面受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影响,特别是这一时期大量新史料集中发现的惠赐,得以在《西游记》研究中创下如此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另一方面,由于

他的许多研究是属于开拓性的,草创维艰,疏漏错失在所难免;还有当时虽有大量新史料发现,但多数仍在深藏之列,难以从容、仔细阅读,故而有些问题还来不及作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因仓促断言而不免有误。比如,他指责真诠本“乱删乱改”,其实是将它与证道书本混淆了,没有对两者进行仔细的甄别。又比如,他将杨闽斋本、唐僧本与世本并列,但同时又说杨闽斋本唐僧本出于世本,明显是矛盾之论。再比如,他高度评价鲁迅对《西游记》古本存在之可能性的预言,但同时却没有注意到胡适也曾有同类的预言,从而在祖本问题上对之进行了一些不合事实的批评。从学术规律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明显系学术条件的局限使然,实难完全避免,也是白璧微瑕,丝毫无损于这篇世纪宏文的崇高地位。学术之流,代代承传,借用鲁迅当年的话,订正、解决这些问题,仍需“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二、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孙楷第的《西游记》版本目录学研究

在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论中,我是将孙楷第与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并列的:胡适、鲁迅为先驱,郑振铎、孙楷第是殿军,他们前后相继,共同确立、推动了现代《西游记》研究。比较而言,孙楷第的《西游记》研究,更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且正是这些特点带来了某些复杂性,所以在对孙楷第的《西游记》研究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行作一些说明,以确立立论的出发点。

其一,在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孙楷第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但其地位似乎一直未能受到充分的重视。究其原因,这与现代学术文化的大背景有关。众所周知,“五四”之际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发轫期,受其时代精神的催发,特别是白话文学的倡导,现代西方文学观念与学术方法的流入,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促使了小说研究的勃兴,《西游记》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一样发生了根本性的裂变,实现了影响深远的现代转型。所以从本质上说,《西游记》研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甚至可以说是新文化的重要一翼。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等新文化大师以最大的热忱投身、参与其中。如1920年开始,上海亚东图书馆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

史》、《红楼梦》等十四部明清小说名著进行标点整理出版,为其作序推介的有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郑振铎、徐志摩、俞平伯、汪乃刚、叶德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五四新文化巨子和学界名流,其中《西游记》由汪原放作新式标点,胡适作《西游记序》,陈独秀作《西游记新叙》,由两位五四运动的发起人亲自担纲,尤见其推重之意。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在《西游记》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必然与他们在新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成正比。比较而言,孙楷第(1898—1986)有着自己独立的人生道路和思想轨迹,他早年师从杨树达、高步瀛,受乾嘉朴学熏染,专注于旧学,一心研习音韵、训诂和校勘学,与新文化存在较多隔膜,没有像胡适他们那样站在五四新思潮的前沿。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是非常重视学术的意识形态性的,学术地位的评价也常受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因而在《西游记》学术史上,孙楷第很自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忽视,新近出版的《名家解读〈西游记〉》(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书备集现代名家之论,却未收孙氏只言片语,堪为显例。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胡适、鲁迅、郑振铎在《西游记》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们确实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首次论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一扫清初以来三百年“邱作说”之误,并揭示了该著作为神魔小说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价值;胡适数度作《西游记》考证,对作品的故事渊源、人物原型以及其中的文化象征内涵等方面作了精辟论述;郑振铎探源溯流,厘清《西游记》演化轨迹,列定历代版本次序,创见尤多。退一步说,他们即使不是五四新文化的旗手或健将,其隆盛的学术地位也不会动摇。孙楷第的学术研究在当年紧逼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与其难分轩轻,各有千秋。故孙楷第的学术研究也完全应该得到充分的评价,在《西游记》学术史上则亟须予以合理的定位。况且,“五四”的主要精神是反帝、反封建,追求科学、民主和弘扬爱国主义,孙楷第立志继承绵长的国学传统,实系其自觉的科学精神和深厚的民族意识使然。国难当头之际,他大义凛然:1931年在日本东京访书期间,“遽闻辽东之变(九一八事变),悲愤填膺”,恨而欲归^①。所以作为一名优秀超拔

^①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

的知识分子,孙楷第的精神意识与五四主潮是完全一致的,其《西游记》研究理应融合到五四时期的学术史之中。

其二,孙楷第研究古典小说是从版本目录学入手的。他毕尽一生精力搜寻史料,纂述提要,胪列书目,写成版本目录学著作多种。与如今通行的文本研究相比,孙氏研究有着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作为基础研究,孙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在校勘文字、考证史料、鉴别版次等目录学工作,其主要目的和作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另一方面,版本研究对于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特别是文本解读是必不可缺的,其重要性早有公论,诚如郑振铎所说:“‘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之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目录,可以省掉许多人的暗中摸索之苦”^①。而且,每当文本研究行进到一定程度,版本、目录的重要性就会越发凸显出来。鲁迅、胡适作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第一批拓荒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免陷入“文献不足征”、明清两代善本不全的困境,鲁迅先生就曾感叹“旧本希觐”,故而“观览又不周洽”,唯“当虑讹谬”,“诚望杰构于来哲也”^②。孙楷第于1931年赴日访书,翌年归国写成《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③和《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提要》。1933年,又在此两书基础上扩展、充实,撰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这三部著作以其丰富的版本文献资料“为中国小说史立下了目录学的根基”^④,也为《西游记》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其惠泽学林,起予后人,功德无量。

还必须指出,孙楷第的目录学著作,其实也并非单一的外部研究。由于其博学、深察以及治学的严谨,在整理史料、编纂目录的过程中多有发现和精见,尤其对《西游记》的考证、评介尤详,既解决了当年胡

① 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郑振铎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② 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记、题记。

③ 《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④ 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见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2年6月初版。

适、鲁迅的一些疑而未决的问题,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不少进一步思考的线索。所以,单以《西游记》文本研究的标准而言,孙楷第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故而胡适评价其为“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包括《西游记》)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作为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上的重要一员,孙楷第当之无愧。

胡适 1932 年在为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所写的序中说:

沧县孙子书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他在这几年之中,编纂中国小说书目,著录的小说有八百余种之多。他每记载一种书,总要设法访求借观,依据亲身的观察,详细记载板刊的形式与内容的异同。这种记载便是为中国小说史立下了目录学的根基。这是最稳固可靠的根基,因为七八百年中的小说发达史都可以在这些板本变迁中沿革的痕迹上看来出。所以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①

这段话虽有盛誉之意,但基本概括了孙楷第学术活动和治学方法的特征:版本目录学研究。它是针对整个小说史研究的,但在《西游记》研究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其具体要义主要包括:一、访求借观,亲身观察,言必有据;二、编纂书目,胪列版本;三、撰写提要,记载各种版次自身特点并鉴别相互间的异同。同时,在此基础上,胡适也客观、公允地评价了这一“目录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特别是作为小说学的“根基”,后代学者从中多受裨益的事实。孙楷第自己也曾谈到过这一特点,他说:

对于读过的每一种小说,皆撰有提要,详细的记录了板本的形式,故事的原委;必要时照抄原书的题跋目录;并且,考校异同,

^① 引自《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71页。

批评文字。为读者提出了若干问题,也相当的解决了若干问题。^①

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小说目录学始于近代黄人 1907 年所作的《小说小话》,其胪列明清章回小说凡九十一目。后经历代学者不断增补,规模渐大,至 1990 年《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共收历代小说一千一百六十部,总目扩大十倍之上,其间将其发扬光大者代有其人,然贡献尤大者则首推孙楷第:早在 1933 年,《孙目》所收小说已达八百余种,在黄人《小说小话》(九十一目)、郑振铎《中国小说提要》(二十目)等书目基础上突发巨变,已成浩浩大观之势,并成为 1990 年版《总目提要》最主要的来源与借鉴。

以《西游记》为例。在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巨著中,《西游记》版本系统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官刻、私刻以及各类王府本的关系,全本与简本的关系,包括不同的全本与不同的简本之间的关系,原本与笺评本的关系,世本与祖本以及前世本的关系,明本与清本的关系,加上在成书源流中曾出现过的诗话、杂剧、平话以及可能出现过的词话等各体西游作品,或错综复杂,或漫漶重叠,且数量十分繁富。现在所知的《西游记》小说版本已达十四种,其中为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记载的有《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杨闽斋本)、《唐僧西游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评本)、汪澹漪笺评古本《西游证道书》(汪评本)、《鼎锲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朱本)共六种,而后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搜罗齐备为宗旨,所收各类版本已达十三种,并且记录了《西游补》、《续西游记》和《后西游记》三种续书。尤为可贵者,上述书目中,经孙楷第发现并介绍给国人的珍稀刊本竟达七种,《西游记》版本之有今日蔚为大观者,孙楷第居功至伟。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鲁迅首发“明清小说阙略”的感叹,并亲作《关于小说目录两件》与《明以来小说年表》以倡导目录学建设之际^②,郑振铎、孙楷第、马廉、傅芸子、王古鲁等后起学者纷纷赴域外访书,致

① 孙楷第《重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序》,《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

② 前文载于《语丝》(146,147),后文生前未予发表,仅有手稿保存至今。据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124 页。

力于搜罗史料,检索文献。1931年9月,孙楷第受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之命,扬帆东渡访书,两个月间废寝忘食,“笔不停挥”,“将东京公私所藏小说调查完毕”,观览颇丰,《西游记》版本资料收获尤多,先后在内阁文库发现明清白堂《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杨闽斋本)和清初《汪澹漪笺评古本西游记》(汪评本),在村口书店发现明万历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和《鼎锲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朱本),在帝国图书馆发现《唐僧西游记》,在宫内省图书寮发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评本),共计六种明清珍本《西游记》,其中汪本与朱本“尤世所仅见”,颇使孙氏叹为观止:“(在日本)保存旧本,如斯之多,颇可惊叹”,并立志“不憚详细述之”^①,将它们列成书目,不但记述书名、卷数、款式、刊刻时间和书铺、刻工姓氏、藏书地点,而且“记事者必提其要,纂意者必钩其玄”,每目下皆纂有提要,对其版本特色、文献价值及后世影响都有详细申述,对某些《西游记》演化史上的关键性或疑难问题还作了精细的考辨说明,以供后人参考借鉴,从而起到指点迷津的作用。对此,胡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为《孙目》所作的序文中说:“国内至今还没有可贵的《西游记》本子,而孙先生在日本所见到的明刻本共有七部,加上宋刊的两种《三藏法师取经记》和盐谷温先生印行的吴昌龄(实为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从此《西游记》的历史的研究也可以有实物的根据了。”正确、公允地揭示了版本新史料的发现在《西游记》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郑振铎甚至将《西游记》研究以孙楷第这些版本发现为界,称其前为“不知有吴氏原本,无论他著的黑暗时代”,其后为光明时代,“学者的摸索寻途之苦,当可减少到最低度了”^②。

孙楷第曾将自己的目录学研究概括为“博考载籍,旁搜故实”,搜集记述原始资料^③。关于《西游记》,正是孙楷第第一次全文抄录了两篇最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便是《全相西游记序》(今通作《刊西游记序》,陈元之撰)和《李评本题词》(今通作《西游记题辞》,幔亭过客即

①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3页。

② 参见郑振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和《〈西游记〉的演化》。

③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自序》,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初版。

袁于令撰)。前者附于三本明刻华阳洞天主人校本《西游记》目下^①,后者附于明刻《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目下。其中陈元之《序》撰写于“壬辰夏端四日”即万历二十(1592)年,它是现存最早的一篇完整的《西游记》研究文献^②,提出了明人对《西游记》的基本看法,并为后人提供了关于《西游记》的作者、成书及演变等基本问题的诸多线索。袁于令《题辞》第一次评价了《西游记》的神幻特征,可以说是为后人认识其浪漫主义创作精神定下了基调。在小说目录中全文抄录该目的序跋资料,至今已成惯例,然则肇其端者实始于孙楷第,这不仅增加了其书目的资料性、可征度,增加了自身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使其《西游记》研究独树一帜,在学术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孙楷第的《西游记》研究以目录学方法切入,以搜辑史料、整理文献、考定版本见长,生前未曾出版文本研究的专著,甚或《西游记》专文也不多见。然而,诚如前说,孙楷第并非局限于单一的外部研究,他非常熟悉各版文本,又擅长校勘诠释注疏之学,故而在对《西游记》版本的发现和研治过程中,特别是在版本目录(提要)的编纂中,文思所及,时有发现和新见,并涉及大量的理论问题,而以其博闻广大的学识,谨严深察、厚积薄发的方法,或鉴别考辨,或旁征博引,或条分缕析,对考察对象进行精深繁难、充分仔细的论述,从而作出了许多富有开创性、建设性的论断。这些文字虽然多半附录于各项词目之下,且篇幅简短,但就其学术含量而言,是断然不亚于某些长篇大论和高头讲章的。如将它们整合起来看,则不难发现其体大思精,自成一统,在现代《西游记》研究中影响甚伟。现择其要者予以展开评述如下:

其一,第一次胪列三种明刻华阳洞天主人校本《西游记》目录,并鉴定三书之优劣,论定世本为《西游记》原刻本。

孙楷第在日本东京发现明刻百回本《西游记》计四种,除《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外,其余三种皆题“华阳洞天主人校”,亦皆附有秣

① 孙楷第所引陈《序》“颇有错乱”(柳存仁语),其原因在于孙氏按杨闽斋本转录,将该序页码第七、第八两页错简在第四页后,以致“不成文义”(陈新语),今已经学者介绍世本陈《序》原文。见《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刊登之陈《序》全文。

② 据汪澹漪评本《西游证道书》,元人虞集《西游记原序》尾署“天历己巳”(1329年)早于陈《序》,但学术界对其真伪持怀疑看法。

陵陈元之《序》，属同一系统。孙楷第通过对三本的对读校勘，将李评本作为共同参照，提出论断：世本为原刻本，卷首陈元之序后署“壬辰夏端四日”当为万历二十年（1592），且该本“颇古雅”，“字端整可观”。杨闽斋本“刻工不甚精”，又其陈序后署“癸卯夏念一日”，当作万历三十一（1603）年为是，推其为世本的翻刻本。《唐僧西游记》不题梓者，亦未指明刻印时代，但明显系据世本翻刻。孙楷第依据各本文字优劣、刊刻沿革的实际，以及杨闽斋本、《唐僧》本皆有所删节和缺失的情况，以为在此三种《西游记》中，唯世本最为珍贵。

这一论断，为后来学者们公认，建国后人文本 50 年代初版及 70 年代重印本皆以世本为底本进行校勘、整理，出版者对世本的善本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并进行了全面评述^①。由此可知，孙楷第的论断可谓一锤定音。

与此相关，孙楷第作出的另一个学术贡献是对世本校定者“华阳洞天主人”进行了初步然而卓有成效的考证。他引《谈薮》云：茅山为金陵洞穴，周围一百里，名曰“华阳洞天”。齐梁之际，有名的“山中宰相”陶弘景隐于此，自称“华阳隐居”。查《梁书·陶弘景传》：齐永明十年，弘景辞归，止于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宫，名为金坛华阳洞天。”并在山中建屋安居，自号“华阳隐居”。据此可知《谈薮》所记非虚。于是，孙楷第推断说：“茅山在句容县境，则此所谓‘华阳洞天主人’者，盖为句容人。秣陵即南京，句容亦明应天府属县。则此书校刻之始，盖与南京应天府有密切关系矣。”^②孙楷第虽未考定“华阳洞天主人”究系何人，而只考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但在学术史上意义很大，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方向。现在学术界已先后提出李春芳、唐光禄、吴承恩等多位人选，但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必须符合当年孙楷第提出的大致范围。今后一旦果真考定“华阳洞天主人”其人，孙楷第的考证当导夫先路。

其二，根据汪澹漪《西游证道书》透露的线索，首次提出大略堂古本问题。

^① 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西游记》卷首。

^②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 74 页。

在为《汪澹漪评古本西游证道书一百回》所做的长篇说明中,孙楷第向世人披露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和研究信息。他首先谈及作者问题:“明本《西游》,皆不言撰人,如陈元之序,且以为不知何人所作。自汪象旭此书,始以为邱长春作,‘证道’之说亦自此书倡之。”^①在《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等通行本中,其作者皆署元初道士邱处机,对此清代钱大昕、纪昀等皆示怀疑,后鲁迅、胡适根据明清两代史料考定为吴承恩所作。其时人们并不知流行三百年之久的“邱作说”竟肇始于《证道书》:有好事者伪托元人虞集序,妄称邱长春作《西游记》,至孙楷第此项新版本发现才真相大白,它是对鲁迅、胡适的考证结论的有力的印证。

当然,该本最大的文献价值,孙楷第所撰该本提要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首次提出了所谓的“大略堂”古本问题,并在《西游记》研究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西游记》演唐玄奘西天求法取经史事,故清代通行本如陈士斌《真诠》、张书绅《新说》和刘一明《原旨》等各本《西游记》第九回皆为“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俗称唐僧出身小传),对此,历代学者一直未有持疑议者。随着日本东京六种明清《西游记》珍本发现,孙楷第指出了—个震惊学界的事实:所有明刊百回本均不载这个故事,究其源头“盖皆从此本(《证道书》)出”。那么,明、清两代刊本是如何形成这一差异的呢?孙楷第在该本第九回回评中搜寻到一条宝贵资料,其中略云:

(古本)谓俗本删去此一回,致唐僧家世履历不明。而九十九回,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载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令阅者茫然不解其故。及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备载陈光蕊赴官遇难始末,始补刻此一回云云。^②

对于这一重大发现,孙楷第作了许多精深的辨析:所谓大略堂古本,究系何人何时所刻,汪澹漪未明言,不排除他随意言之、借古以自重的可能。此其一。大略堂《释厄传》非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虽然两者书名相似。后者虽亦载唐僧出世故事,然属简本系统,

①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第78页。

② 孙楷第此处所引回评文字略有脱漏。

不符繁本体制。且其卷首木记题“书林刘莲台梓”，为闽建书林，不题“大略堂”。此其二。举其为文错讹繁多，“因即汪书第九回文与本书他回文合观之，实未能融合无间”，诗文风格迥然不一，凿枘不合之处屡见，故知该篇文字断非吴承恩原作。特别是第九回、第十回两回文字“开端数语从同”，明显带有改纂的痕迹，“假令吴氏为此，亦何其文思之窘也”。此其三。这些论述，皆言出有据，分析透彻，为学界所认同。

再有，孙楷第进一步探求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原有唐僧出世故事。从现有资料看，孙楷第坦言“固不可知”，但就作品本身的故事逻辑和结构特征来看，他则倾向于“原有”，而为后来之世本刊落，并对刊落的主要原因作了初步推测：“万历年间刻书者嫌其褻渎圣僧（指玄奘之父被害，母被污），且触忤本朝（高皇），语为不详，亟为删去。”^①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刊落说”。对此论，因孙氏未提出确凿的证据，学术界虽视为宏论，然而一直争议颇多。“五四”以来，已有郑振铎、黄肃秋、柳存仁、李时人、张锦池、吴圣昔等众多研究者先后参与讨论，并在《西游记》论坛几度反复，遂成热点，可说已积淀为一个精深的学术命题。

其三，考定朱鼎臣其人，推论朱本非吴承恩世德堂本祖本，而系一部简本。

《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今存两大明刊《西游记》简本之一。20世纪20年代发现于日本，1931年孙楷第在东京村口书店首次亲睹，并将其版本的基本资料抄录归国。1932年，经学界有识之士吁请，北平图书馆花重金购入。从此，《西游记》研究又增添了一份宝贵的史料。

朱本卷首有题词：“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书林莲台刘求茂绣梓”，但对朱鼎臣其人，我们所知甚少。孙楷第早年遍览群书，文史积累丰厚，于说部尤为熟稔，他指出尊经阁藏《鼎镌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一书，该书以摘选戏曲和小说为要旨，亦题有“教坊掌教司扶摇程万里选，后学庠生冲怀朱鼎臣集，闽建书林拱塘金魁绣”。据此他说：“以二书互证，则朱鼎臣字冲怀，广州人，且为庠生。”又据《大明春》确是万历刊本（日本文求堂主人田氏精于赏鉴，亦云定是万

①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第81页。

历本)这一事实可知:“朱鼎臣者当为万历间人。”^①后来,郑振铎又有所发挥,结合该本版式、纸张的特点进一步断定朱本“当是明代嘉隆间闽南书肆的刻本,其时代不能后于万历初元”^②。朱本刊刻年代的确定对于认识其版本性质和价值,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朱本被发现之际,“颇惹中日学者之注意”,当时已有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发表文章,“疑为《西游》祖本”。因为其为湮灭已久的珍本(郑振铎曾说:“说她是一部孤本,大约也不会错”),孙楷第在东京访书时,村口书店主人出于自珍,只是“出是书相示”,未能从容观览。幸而他博闻强记,识力过人,“乃以半小时之力恍读一过”,随即对其已有了初步而完整的认识,并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予以详细记述,就其版本性质进行深入的辨析,最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朱本并非如日本学者所言,是吴承恩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而是和杨致和《西游记传》一样,是一部简本。对此,孙楷第从正反两方面提出了证据,他解释说:“惟统观全书,与明诸百回本比,除陈光蕊事此有彼无外,余仅繁简之异,西行诸难,前后节次,以及精怪名称,故事关目,无一不同。倘是祖本,焉能若是!”又若假设它为祖本,那么,“由十卷《西游传》之仅存崖略,语意不完者,扩大充实而为百回之《西游记》,乃其关目情节以及名称无一不同,宁非异事!夫惟删繁就简可无变更;由简入繁乃欲丝毫不变原本,在理为不必要,在事为不可能。故余疑此朱鼎臣本为简本,且自吴承恩之百回本出。”此论一出,即流行《西游记》论坛半个多世纪,中外学者奉为定谥^③。《西游记》版本演化链条日趋完整,同时,其简本系统也随之得以确立。

孙楷第一生治学硕果累累,著述等身,其晚年时曾亲自圈定一组代表作,其中《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赫然在列^④。研读这篇雄文,深感其考证精湛,辨伪周详,驳难繁深,诚为其《西游记》研究,甚至

①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第82页。

②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③ 新时期以来,学界始有不同看法。参见陈新《重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地位与价值》,《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又见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④ 参见杨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2页。

整个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登峰之作,在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有突出的地位。

《西游记》杂剧与宋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残文)古本同为《西游记》演化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宝贵资料。今存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刻本“杨东来批评本”《西游记》杂剧署作者为元前期杂剧名家吴昌龄,该书《总论》(勾吴蕴空居士所作)对此言之凿凿,其中说:“《太和正音谱》备载元人所撰词目,有吴昌龄《东坡梦》、《辰勾月》等十七本,而《西游记》居其一也。”甚至还编有令后人深信不疑的文坛趣事作为佐证:“昌龄尝拟作《西厢记》,已而王实甫克成,知无以胜也,遂作是编以敌之。”后经臧懋循《元曲选》、焦循《剧说》等反复引述,吴昌龄作《西游记》杂剧遂成定论,为世人所认。

1939年,孙楷第作《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杨东来评本〈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发表于《辅仁学志》1939年八卷一期,据天一阁抄本贾仲明(一说无名氏)《录鬼簿续编》提供的新材料,对吴昌龄作《西游记》杂剧的成说提出质疑,继而考定其作者当为明初杂剧家杨景贤。据孙楷第介绍:关于唐僧赴西天取经事,宋元有戏文(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有《唐三藏》,元代有吴昌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明初则有杨景贤杂剧《西游记》。南戏《江流和尚》叙唐僧出世故事,实未及取经过程,金院本《唐三藏》今不传,吴昌龄《西游记》清初尚有传本,藏于钱曾也是园,但后来亡佚,今传杂剧《西游记》本为杨景贤所作,但却被勾吴蕴空居士等误挂在吴昌龄名下。

孙楷第重新将《西游记》杂剧的著作权判归杨景贤,其依据为:第一,据钟嗣成《录鬼簿》(天一阁抄本),该剧有题目正名为:“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按杂剧体制惯例剧中当有相应情节,但与今传杨东来本《西游记》杂剧(六本)不合,可知当为二书。第二,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明确载有“杨景贤《西游记》”,且作者与杨为相交五十多年的老朋友,对其情况掌握得相当详尽,故而可信度极大。第三,杨景贤《西游记》抄本流传不广,唯正嘉间文士李开先(字中麓)曾亲见,但其《词谑》中竟将剧名《西游记》误为《玄奘取经》,从而导致两剧

混淆不清。孙楷第以此为契机,广查载籍,终于在一部《词谿》抄本中发现其引有署名“杨景夏”(即杨景贤)的《玄奘取经》杂剧的第四出,而这一出内容经孙楷第鉴别比勘正与今传所谓吴昌龄《西游记》第四出相契合。根据此种内证、外证,孙楷第断言:现存之“杨东来批评本”《西游记杂剧》系后人误署作者,实应为杨景贤作。

那么为何会发生如此张冠李戴的误会呢?孙楷第进一步予以详细分析,他说:

其所以如此之故,大约因为:(一)原本不存,传说多谬,抄书刻书人都不免错标名字。(如百种曲所题人名,现今考就有好几处是错的,这不见的是臧懋循捏造的,因为他们误题的人名,有时别的选本也是一样的错。)(二)《录鬼簿》通行无注本,现在我们见到的天一阁注题目正名的《录鬼簿》以及所附《录鬼簿续编》,当时人都不曾见到。(三)两书都演玄奘事,名称亦容易混淆。如《录鬼簿续编》著杨景贤曲是《西游记》,而李中麓引杨曲称《玄奘取经》。以此推之,杨曲既称《玄奘取经》,则吴曲亦未始不可称《西游记》。

又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前述考证结论。

这一考证,意义重大,一扫中外学术界数十年之误。并旋即为学术界普遍认同:20世纪50年代后期,隋树森编定《元曲选外编》,对该目作者即改为“杨景贤作”,并特意注明“兹据孙楷第考证”^①。举此一例,即可知此说实为不刊之论,且影响巨大。

三、刘修业:吴承恩研究的奠基者与集大成者

将刘修业纳入现代《西游记》学术史原本是理所当然的。在作者研究方面,就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而言,刘修业独步海内外。作为吴承恩研究的奠基者与集大成者,她最早撰成较为完整的《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传》,以及《吴承恩交游考》、《吴承恩著述考》等一系列钩辑、总汇和考稽吴氏生平事迹的文章。尤为世人称道者,她首次对20世

^①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编校说明》,中华书局,1982年。

纪20年代末发现于故宫博物院的《射阳先生存稿》进行校点、整理,并于1958年冠名《吴承恩诗文集》正式出版。这些著述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吴承恩研究,成为后人研究《西游记》的重要资源,可谓功不可没。刘修业的这项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并延续至建国以后,她是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继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之后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建国以来一个时期里《西游记》论坛的领军人物。

但是,时至今日,《西游记》研究的学术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问题都面临重新审视,一些既有命题遭到质疑甚或诘难,并由此正在酝酿新一轮突破。一个突出的动向是,围绕《西游记》作者问题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许多学者认为五四时期鲁迅、胡适论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即使比诸“邱作说”更具有合理性,但从学理逻辑上说仍然不够充分;也还有人十分顽强地坚守着“邱作说”。我们注意到,虽然这种“非吴”的倾向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间断过^①,但无疑恰是在当下达到鼎盛。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另一些学者也迫切地意识到必须寻找新的材料和应对策略才能“保卫”既有的阵线,并为此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故而论辩双方对峙、拉锯空前激烈。这就意味着,如果一旦剥夺了吴承恩著作权的可能性存在,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包括刘修业在内的全部吴承恩研究,将面临釜底抽薪的严峻挑战^②。我们又将如何评价他们对《西游记》研究的贡献,确定他们在《西游记》学术史上的位置?

这个足以令研究者萦怀不已的问题也使我深感困惑,同时在不断的思索中萌生出一种强烈的理论冲动。吴承恩研究位居整个《西游记》研究的基础层面,怀疑甚或推倒“吴著说”,对于《西游记》研究并非是可悲的末日,因为旧有基础的消解,是展开全新的理论思维的结果,同时也预示着新的更坚实的基础的重建;但它对于具体的研究者个人而言,则无疑是“灭顶之灾”,意味着对自身的全面否定。为此尤

^① 1933年,俞平伯在《文学》创刊号著文《驳〈跋销释真空宝卷〉》,对吴承恩作《西游记》提出怀疑;40年代,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也认为吴承恩《西游记》是否即百回本小说“不无可疑”。

^② 关于这一理论预测,可参见陈大康《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文汇报》2004年2月29日。

其需要作客观、慎重、公正的评价,对这一研究群体的评价也尤显其学术史意义。将刘修业从《西游记》学术史上淡出,以不变应万变,避免日后恐或出现的背时、落伍的危险,并不是符合学术理性的一般原则,因为它无视在《西游记》学术史上曾经有过的丰富而宝贵的理论展开,抹杀许多学者独特的理论悟性和实践功绩,一部奔腾不息的现代《西游记》学术史将会平淡许多,其理论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基于这种认识,特作如下理论界定,以作为评述刘修业的必要前提。

其一,现代《西游记》研究是一股连绵不绝的学术之流,对作品母体丰富多元的价值揭示不止于是与非、肯定与否定这样的简单评判,正、反、合,否定之否定构成它不断前进的辩证逻辑,真理与谬误夹缠显示着它包罗万象、有容乃大的学术品格。追溯自《西游记》问世四百年来的学术史,真见与谬误相辅相成,诚信与怀疑缠绕始终,真理积淀为永恒不祧的法则,谬误也时时闪耀着思维和智慧的光辉。学术史的对象应该是全部的理论展开和整体性的学术成果。虽然邱处机在“五四”之际被褫夺对《西游记》的著作权,但对邱氏的研究从来没有被剥离出《西游记》研究的范围,有的研究成果还被公认为学术经典^①,有的相关观点还在《西游记》论坛引起了一定规模的争论^②。同样,无论出现何种趋向,吴承恩研究都将是《西游记》研究的组成部分,关于吴承恩的历次争论永远是《西游记》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即使吴著说果为谬误,那么也是科学的谬误,也是“为科学的谬误立碑”。这是一种学术史眼光,也是撰写学术史的一条基本原则。

其二,任何历史研究说到底都是后人对史实的追思和还原,其真理性和价值源于史料的确证。从目前看,否定吴承恩的著作权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或者是否正有不断增大的趋势,作为怀疑也还停留在假设和推测的阶段,它的实现还有待于史料的支撑和实证:一是找到天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西游记》原本,

① 这一类现象可以柳存仁的《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为代表,该长文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5期—第9期后,其观点与材料被学界反复称引。

② 如金有景作《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南通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和《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南都学坛》1989年第4期)重提《西游记》(祖本)的作者为邱处机,并认为邱处机作的可能是刘一明笺评本《西游原旨》的白文,此论一出即遭到多方质疑。

证明它确实不是今见之百回本小说,而是一种别样文体的著作;二是寻找到新的早期《西游记》刊本而又确实署有别人的名字;其中任何一条都将从根本上动摇“吴著说”。而事实上这一类新史料的发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或许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因为吴承恩著《西游记》毕竟存在着更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吴著说”就永远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理论命题,可以围绕它作肯定、否定各种流向的思辨,但永远不可能轻易地回避。大而言之,要研究《西游记》就绕不开吴承恩。解放前,叶德均作《〈西游记〉研究的资料》,可以说已为我们作出了借鉴。他在开篇时即指出:“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均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此《西游记》是否即通俗小说,不无可疑,但在尚无确证可以推翻吴作说之前,仍不妨认他为《西游记》的一个修订者。”^①并以此为前提展开对《西游记》资料的蒐集、钩辑和征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先贤的成功经验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今日面对这一严峻命题的一个醒目的坐标。事实上,在笔者的这部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中,对鲁迅、胡适、郑振铎,特别是刘修业的吴承恩研究,都是以此作为理论前提的。

现将刘修业的相关研究成果分列于下:

1. 《吴承恩年谱》,1950年发表于《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收入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丛考》1958年版,收入《吴承恩诗文集·附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 《吴承恩著述考》,收入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丛考》1958年版,收入《吴承恩诗文集·附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 《吴承恩交游考》,收入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丛考》1958年版,收入《吴承恩诗文集·附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以上三篇作于1942—1946年间。

4. 《吴承恩著作杂事考》,收入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丛考》1958年版,收入《吴承恩诗文集·附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①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56页。

5. 《吴承恩诗文事迹辑录》。
6. 《吴承恩诗文集序跋辑录》。
7. 《校点吴承恩诗文集叙例》。
8. 《吴承恩诗文集后记》。

对《射阳先生存稿》的整理,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上四篇收入《吴承恩诗文集·附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9. 《关于吴承恩生平及〈花草新编〉三则》,收入《西游记研究》第1辑,江苏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1986年版。

10. 《吴承恩传》,收入《西游记研究》第2辑,江苏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1988年版。

以上两篇写于建国初期。

11. 《吴承恩生平述略》,《文史知识》1990年第9期。

以上所列不能说已将刘修业有关吴承恩的研究文字囊括殆尽,但遗漏当不会太多。我对刘修业的评述将以此丰富的研究成果为第一手资料。审察这些材料,大致可勾勒、归纳出她在吴承恩研究中的成绩,并确认其在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的特殊贡献和地位。

其一,构筑“吴著说”的坚固营垒。

20世纪20年代,鲁迅、胡适考定《西游记》作者为淮安儒生吴承恩,诚为一时信论。但其时文献资料有限,胡适《〈西游记〉考证》所列主要有三项:天启《淮安府志》、同治《山阳县志》、阮葵生《茶余客话》;鲁迅也大致相同,唯考出阮著所论实出于吴玉搢的《山阳志遗》。故有学者指出,当年胡、鲁两位考定“吴著说”所据直接材料仅一条,间接材料仅两条^①,推论未必充分。但稍后的郑振铎、孙楷第皆视之为不刊之论,对此问题基本未甚涉及。刘修业也是此论的坚定拥护者,她说:“天启以后,《西游记》普遍的流行起来了,可是因为原书上不著吴承恩的姓名,知道是他作的人,反倒愈来愈少,近三百年来,渐至没有人知道了。直到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大家才又知道这部《西游记》是吴承恩作的了。”^②但与郑振铎、孙楷第不同的是,她有意识地将《西游记》研究的重心集中于作者吴承恩,特别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

① 参见陈大康《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文汇报》2004年2月29日。

② 刘修业《吴承恩著述考》。

长期、深入和全面的探究。可以说,正是她作出的卓越成绩,构筑起“吴著说”的坚固营垒。

大约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刘修业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帮助王重民先生鉴定中国善本图书,有机会接触大量稀见之文献资料,便以《射阳先生存稿》为线索,开始搜集吴承恩的生平事迹的材料,并先后写成《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著述考》等一批考证文章,其中一个主要任务便是对“吴著说”作进一步的阐述和证实。举其要者有两个方面。

第一,据1958年出版的《吴承恩诗文集》附录《吴承恩诗文事迹辑录》,刘修业钩稽、收录的有关吴承恩著作《西游记》的材料已达十四种之多:

1. 天启《淮安府志》,包括卷十六“近代文苑”和卷十九“淮贤文目”;
2. 同治《山阳县志》;
3. 《续纂山阳县志》;
4. 光绪《长兴县志》,包括卷二十二《名宦传》和卷三十一“杂识旧闻”;
5. 《故宫善本书目》;
6.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7. 郭麐《灵芬馆诗话》续卷;
8. 丁晏《山阳诗征序》;
9. 吴玉搢《山阳志遗》卷四和卷一;
10. 李宗昉《宝翰堂娑罗树碑歌》;
11. 罗振玉《淮阴金石仅存录》;
12. 阮葵生《茶余客话》;
13. 丁晏《石亭记事续编》之《书西游记后》;
14. 叶德均《读稗杂录关于吴承恩诗》。

这些材料与吴承恩《西游记》皆有或大或小若干关系,尤其是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清晰、有力地印证着“吴著说”的事实。与胡适、鲁迅当年所掌握的材料比较,则有所承袭,有所发现,有所辨析^①。至此,加

^① 1926年鲁迅出版《小说旧闻钞》,辑得吴承恩和《西游记》相关材料十八条,刘修业在此进行了甄别、归并、挑剔。

上她校点的《射阳先生存稿》(包括各种序跋),吴承恩的资料已基本搜罗齐备,成为后人《西游记》作者论的宝贵资源。

第二,在《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著述考》等文章中,刘修业对吴承恩著作《西游记》这一核心命题展开了考证和论述,提出并解释了一系列具体和实际的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发生着影响。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关于《千顷堂书目》所载“吴承恩《西游记》”。

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后简称《千目》)系为修纂《明史·艺文志》而作,“乃就有明一代之书,详加著录”,收录丰浩,是查稽明版图书的重要目录学著作。正是刘修业最早从中发现了一则宝贵的资料,她在《吴承恩著述考》中指出:“第十七世纪末年完成的《千顷堂书目》卷八页十三下著录着‘吴承恩《西游记》’,当然也就是这部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可惜编者把它编入《舆地类》了。”后来又在《吴承恩诗文集·后记》中重申:“我们还可以从明黄虞稷在十七世纪末年编成《千顷堂书目》卷八找到‘吴承恩西游记’这一条极为重要的记载,虽说黄虞稷把《西游记》分入游记类,还是可以给鲁迅的考证,作一个有力的注脚。”难能可贵的是,刘修业不仅在博览中发现了这一条“极为重要的记载”,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它对“吴著说”的史料价值,将它作为印证鲁迅、胡适《西游记》作者考证的一个“有力的注脚”。

当然,刘修业未能意料的是,这一条材料后来也被一些学者用来作为否认吴承恩作《西游记》的理由,他们认为:正因为《千顷堂书目》将《西游记》归入舆地类,那么它极有可能也是一篇游记,而非今日所见之百回本小说^①。近二十年来,围绕《千顷堂书目》的这条记载,学术界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论,这从一个侧面凸现出它在《西游记》作者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确认了刘修业这一发现的价值。

关于《春秋列传序》及撰写时间。

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载有吴承恩著作:《射阳集》、《春秋列传序》和《西游记》,凡三种。暂不说《西游记》,《射阳先生存稿》也于1929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并在《故宫周刊》第

^① 参见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十二期(1929年12月28日)至五十三期(1930年11月11日)分期刊出,唯《春秋列传序》尚是一个谜。

据《射阳先生存稿》所载《吴序》称:“是编也辑于庐守周大夫,而实承梅国中丞公之美意。小子受而读焉,因感盛衰之由,而知教之不能已,遂言其故。然笔于书而莫之有让者,补承公意也。”线索清晰,但难解其意。刘修业据此考出《春秋列传》的主修者当为刘节而非周瑯,因该书为周大夫承梅国美意而辑撰,查明刻《春秋列传》五卷,题“大庾刘节介夫重编,蕲水周瑯校”。并该卷丘九级《序》里说:“梅国刘公之为书”,两者互证,可推定周大夫为周瑯,梅国是刘节,其为《列传》著者甚明,唯吴承恩谓周瑯是《春秋列传》著者有误。

又查《蕲水县志》卷十三《周瑯传》:“周瑯字光载,号西山……工著作,于群书无不窥,而独癖《左氏》,故著作大类左,正德丁卯举于乡。……历左陟都,凡八年,所论列居多,竟以抗直故出庐州。”周氏于正德辛巳举进士,释褐后八年任庐守,可知其为庐守当自嘉靖八年(1529)始。民国《大庾县志》卷八《刘节传》:“刘节字介夫,弘治十四年乡试第一,十八年成进士,授兵部武选司主事,正德间以忤刘瑾谪知宿松县,转广德州,擢四川提学僉事,备兵云南金腾……未几迁广西按察史,历福建参政,浙江布政史,擢副都御史巡抚山东……总督江淮漕运。”查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四,刘节在淮安任漕运总督期限为嘉靖九年(1530)三月至十一年十月。且与周瑯嘉靖八年始任庐守相合。根据以上史料,并经过对照互勘,刘修业作出结论:“刘节在嘉靖九年督淮安漕运,所以承恩作序,应在嘉靖十年左右。”^①这一考证,材料充实,逻辑清晰,结论无懈可击。至此,《春秋列传序》之谜始解,《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著作也全部有所着落。

关于《禹鼎志》。

《禹鼎志》是吴承恩的重要著作,《府志》未载,故知至迟已于天启前佚去。或说清末淮安人王朝徵曾见过此书原本^②。但《射阳先生存稿》录有它的《自序》。这不仅是认识《禹鼎志》的重要线索,也是显示吴承恩性格和胸襟气度、印证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重要材料。对

① 刘修业《吴承恩论著杂事考》。

② 参见《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6页。

此,囿于历史条件,鲁迅、胡适均未涉及。鲁迅曾展望《存稿》的发现可以找到吴承恩著《西游记》的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但事实上未有深究。关于吴承恩诗文与《西游记》的关系,胡适曾看到《山阳志遗》所录《二郎搜山图歌》,并说它“很可能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①。但不曾论及《禹鼎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及杂俎》对牛僧孺《玄怪录》和段成式《酉阳杂俎》有详细介绍,然而也不曾注意这篇与之有极大关系的《禹鼎志序》。

刘修业则对此篇予以了充分重视。她在《吴承恩著述考》中予以全文著录,并据其内容如“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何其让焉”云云,推测《禹鼎志》是一部传奇小说,“体例是仿牛僧孺的《玄怪录》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而作”,并且第一次将它用来作为“吴著说”的傍证。她在《吴承恩著述考》中说:“由这篇序可见他原是喜奇闻的,极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西游记》,因为《西游记》也是‘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的一部小说。”又在《吴承恩年谱》将写作《禹鼎志》视为“他后来又试用民间通俗文字,写成那永垂不朽的百回《西游记》的远因”。这一论断,印证了鲁迅对吴承恩诗文集(《存稿》)的期待是有根据的,并与胡适对《二郎搜山图歌》的分析,构成了《射阳先生存稿》对吴承恩著《西游记》的两大内证^②。

其二,再现吴承恩的丰富人生。

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向为丛残小语,作者也多为民间底层艺人和落魄文人,故常遭湮没不传的命运。如罗贯中、曹雪芹等小说大师目前所见资料极少,施耐庵是否有其人尚存怀疑。吴承恩则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不仅著作了小说巨著《西游记》,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诗文作家,故而留下生平资料相当丰富。然而由于这些资料来源繁杂,十分紊乱,加之漫漶错讹,不能传达出真实的人生面貌。刘修业吴承恩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即在于整理、厘清这些资料的脉络,一方面力图呈现它们的内在关系,另一方面旨在凸现那些鲜为人知的生平事迹,

^① 胡适《〈西游记〉考证》。

^② 在胡适与刘修业的示范下,这一类内证不断地从《吴承恩诗文集》中被揭示出来,如苏兴对《赠子价》的分析,薛梅、宋克夫对《赠张乐一》的分析,等等。

从而将吴承恩的丰富人生真实地再现出来。其主要成果即是刘著《吴承恩年谱》。

吴承恩的年谱,据笔者所见,至今已达五份之多,其数目或可为明清小说家之冠。最早为吴承恩制年谱的是胡适,第一次勾勒出吴承恩生平的基本轮廓和一生的几个重要阶段:

正德末(约 1520),吴承恩生。

嘉靖中(约 1550),岁贡生。

嘉靖末(约 1560),任长兴县丞。

隆庆初(约 1570),在淮安与陈文烛、徐子与(中行)往来酬应,酒酣论文。

万历初(约 1580),吴承恩死。^①

因为胡适的《西游记》研究处于开荒草创之际,年谱十分粗略,在吴承恩漫长一生中只涉及五个年份。后来他在《读吴承恩射阳文存》等文中有所补证。

1936 年,赵景深发表《〈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②,内容有所拓展,涉及年份达到二十三年,据赵氏定吴承恩生卒年为 1500—1582,享寿 83 岁,约占一生中的 28%。

显然,作为名震寰宇、享誉四百年的四大奇书之一《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年谱,这是不能满意的,尽管为小说家作年谱,本身便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著录完备的吴承恩年谱要在近年半个世纪之后,《西游记》研究深入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的前提下才能出现,那就是 198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苏兴《吴承恩年谱》和 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刘怀玉《吴承恩年谱》。

刘修业《吴承恩年谱》作于 1942—1946 年间,正处于承上启下的阶段。它记录了有效年份达三十九年,分别为:1 岁、9 岁、16 岁、26 岁、30 岁、32 岁、33 岁、40 岁、41 岁、42 岁、43 岁、47 岁、48 岁、50 岁、51 岁、53 岁、54 岁、56 岁、57 岁、59 岁、60 岁、61 岁、62 岁、63 岁、64 岁、65 岁、67 岁、68 岁、71 岁、72 岁、73 岁、74 岁、75 岁、76 岁、78 岁、79 岁、80 岁、83 岁,在吴承恩一生中占一半左右,在胡、赵两份年谱的

① 胡适《〈西游记〉考证》。

② 载《中国学生》1936 年 1 月第 2 卷第 1 期。

基础上有重大突破,并为后来者赓续这一工作提供了不少线索。如刘怀玉的研究更是得到了刘修业的直接指导,他说:“我的工作,一直得到刘修业先生的关心与指导,她认真地为我审阅了全稿,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①

更须我们重视的是,刘修业《年谱》的价值不止在基本编定吴承恩的一生时序,作为年谱已初具规模,作者还以精湛的考证工夫辨析、澄清了一些吴承恩的主要事迹,为后人准确、完整地认识吴承恩作出了重大贡献。现试择取两则予以说明:

第一则,关于吴承恩生年。

刘修业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生卒年不可考,过去有两种推测:一种推测说他大约生于公元一五一〇年;一种推测提前了十年,说他大约生于一五〇〇年。后一种推测是我在二十年前研究了前一种说法以后,在我写的《吴承恩年谱》内提出的。”^②

先予说明的是,这段话有几处小偏差:一是在刘修业之前推测吴承恩生年的有1520年(胡适)、1505年(胡适)、1510年(鲁迅)多种,在刘氏之后尚有1504年(苏兴)、1506年(刘怀玉)诸多说法,而非“两种”;二是最早推测吴承恩生年为1500年的是赵景深。不过,如将这些推测分为靠前和靠后两类,“靠后说”的主要代表是鲁迅,那么,力主“靠前说”的主要代表便是刘修业。对此,她先后提出过多重证据:(1)吴承恩《鹤江先生诔》中说:“昔受公知,昉於童孺,登龙识李,即以斯文见赏,有怀雅遇,二纪于兹。”本文作于嘉靖庚子十九年(1540),鹤江系淮安大士绅蔡昂,在一方“掌吐握之事”,有“登龙识李”,“收名定价之权”,二纪之前吴承恩“即以斯文见赏”于他,“若是生于一五一〇年顷,则他那时只有六岁”,其时尚未开蒙,何来“斯文”,故以定生年为1500年为宜,其时吴16岁,为县府学里的生童,较为可能。(2)吴承恩撰《沈公合葬墓志铭》中说:“昔承恩与祭酒(沈坤,嘉靖辛丑二十年状元)俱童稚,同试生儒郡县,一见相钦异,定交数百人中,因互拜其父母。”现查知沈坤生于1507年,沈坤父母卒于1527年,又有文献显

① 刘怀玉《吴承恩诗文集笺校·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② 刘修业《关于吴承恩的生平及〈花草新编〉三则》,江苏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1辑。

示吴承恩年长于沈坤,在三到七岁之间,故知吴氏生年不可能在 1510 年,而作综合平衡,以定 1500 年为宜。(3)据吴承恩《海鹤蟠桃篇》云,嘉靖己丑九年(1530),吴承恩曾受命为漕运总督唐龙的母亲撰寿文,并受到称赞。据此史实,刘修业判断说:“漕运总督肯指名吴承恩给他的母亲撰寿文,恐怕承恩已经不是十九岁左右的小生童,而是已经年近三十并且在葛木的书院里有了名,才能得到这样的文誉呢!”(4)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中说:“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而公顾辱知之。”又在《先府宾墓志铭》中说到卮山公曾召其父入州府为宾。刘修业考定卮山先生为淮安知府葛木,其任在 1530 年左右,据此,她分析说:“若是这时候吴承恩仅只二十岁,即使他个人得到葛木的赏识,还未必能因子及父,若是把承恩生年定在一五〇〇年左右,这时候吴承恩已经三十岁,在书院(葛木主办——引者注)里是一个老大学生,说不定能代山长管点事,代代课,已经不是一个纯学生的身份,所以能有机会交官接吏,因而得到葛木的特殊知遇,在行乡饮酒礼里时,才肯请到他的父亲。吴承恩的父亲这时候已经近七十岁了,就是卖花线出身,也算有资格了。所以我觉得按封建时代的社会关系来说,定在吴承恩的三十岁上比二十岁好。”

其他旁证还有一些,但平心而论,以上四条已足以显示“靠前说”比之“靠后说”有更多的合理性、更大的可能性,所以后来学者纷纷予以认同,如流传极广的人文本《西游记》郭豫适《前言》即据此说定吴承恩生年为 1500 年。

不过,刘修业也承认,此说也面临种种来自史料的质疑,并在后来有所修正,她的最终结论是:“如果说一五〇〇年左右的说法早了一点,一五一〇年顷的说法是晚了一些;吴承恩比较正确的生年,可能是一五〇二、三年间;但至晚不能晚过一五〇五年。”^①

第二则,关于任长兴县丞时间。

对此问题,传统的看法是嘉靖末。鲁迅谓“嘉靖甲辰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②。甲辰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算上困顿乡里和赴京候

^① 刘修业《关于吴承恩的生平及〈花草新编〉三则》,江苏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 1 辑。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选,赴任长兴县丞当在嘉靖末。胡适年谱则明确为“嘉靖末(约1560),任长兴县丞”。后来又在长兴发现了隆庆元年十月十日由归有光撰吴承恩书的《梦鼎堂记》和《圣井铭》,查历史年表,知隆庆元年为1567年,这样,此说就更为世人所信了。

但是,刘修业却有自己的见解,她的《吴承恩年谱》改定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并有详细考论。

她首先援引董作宾《读〈西游记〉考证》中的相关材料,即根据《长兴县志》之《名宦传》和县丞表,嘉靖年间县丞一职有二十四至二十五、三十一至三十四、三十九至四十五共三个缺额,而吴承恩确于嘉靖朝任此职,然后对这三个空额进行逐一辨析:“二十四至二十五”这一空额明显不符,因为吴承恩中岁贡在二十三年。而“三十九至四十五”这一空额同样是必须排除的,她分析说:

吴国荣撰的《存稿跋》说:“(承恩)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依据承恩撰《先府宾墓志》,说他的父亲壮岁纳侧室,我因此想到那时候他的父亲若是三十岁,侧室张氏,至少也应有十五六岁了。他父亲死在嘉靖十一年,年七十二岁,母亲也应该是将到六十岁的人了。若是承恩到嘉靖三十九年,才因为母亲去做长兴县丞,那时他的母亲就要快九十岁了。

吴承恩是孝子,当恪守先圣“亲老不远游”的古训,所以刘修业说:“那时他的母亲若还在人世,他大概未便说是‘为母屈就’罢。”所以,这断然不是吴承恩任职的时期。

对于嘉靖三十二年吴承恩任职长兴县丞,刘修业还提供了一项旁证,即是吴承恩与后七子之一的长兴徐中行在长兴唱和一事^①。查《明史》,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杨继盛案发生,徐中行受累遭严嵩打击,不容于京师,只好罢官归隐故里。刘修业说:“中行归省,当在三十二年办完了秋审以后,他到家乡的时候,应在年尾或次年春天了。那时候先生正在长兴做县丞。”

比较旧说而言,刘修业将吴承恩任职长兴县丞时间提前了十余年,联系她将吴承恩生年定在1500年,联动上移当为应有之义。故两

^① 参见《长兴县志》之《名宦传》及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叙》、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

个问题可视为一体,一损俱损,定一而安二。

其三,《吴承恩诗文集》的校理及其考证。

刘修业的吴承恩研究还有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整理、校点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并对相关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考证。

吴承恩髫龄即有文名,他的诗文被盛称为“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沉辞渊深,浮藻云峻,文潜以后,一人而已”^①。并常被一些诗文总集和别集著录,在其同时或之后有广泛流传。但是从今存故宫博物院的《射阳先生存稿》来看,篇什不算丰富。原来,吴承恩的文艺思想是“选精而不务博”,对其时“欲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的文风深为不满^②。校刻者秉承他的旨意,必然要作大量删削。明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丘度(吴承恩的表外孙)又对陈文烛序、吴国荣跋的《存稿》进行重刻,甚感舅外祖务精不务博的教诲,专请李维桢作了校删,这样,《存稿》又一次被“瘦身”。对于《西游记》研究,这实在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后人甚至叹息“不知被删削掉多少研究《西游记》及其作者很有价值的诗文。或许其中有《西游记》的自序和吴承恩自传的吧”^③。

有鉴于此,刘修业校点《射阳先生存稿》以故宫博物院 1930 年原刻本的铅印本为底本,广寻别本参校,在校勘异文、订正手民排印之误的同时,还着意搜寻佚文,以补足原本。据刘修业《校点吴承恩诗文集叙例》,这些补入的佚文来自于以下方面:(1)1777 年吴进据吴玉搢所谓《续稿》辑得吴承恩古文十六篇,又 1921 年冒广生刻《射阳先生文存》从《山阳县志》补入《淮郡文献志后序》,凡十七篇;(2)《山阳志异》所录古文三篇,诗歌八篇;(3)万表《玩鹿亭稿》中得吴承恩佚诗四首;(4)从厂市购入吴承恩遗墨一篇:《云湖画菊跋》。刘修业将这些作品进行辨析校笺后一并补入《存稿》,并更名为《吴承恩诗文集》。

应该说,囿于文献不足的历史条件,刘修业补入的篇目不算太多,但这一工作为后人开了一个好头,90 年代刘怀玉对《吴承恩诗文集》进行补校和笺注,从各类地方志和文人集子中搜得不少吴承恩佚作,

① 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叙》。

② 参见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叙》。

③ 苏兴《吴承恩诗文集笺校·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大大地丰富了该集的内容。

此外,刘修业校理《存稿》在学术上还有一个特殊价值,那就是对相关问题作了不少精到的考证,其过程和结论都向为学界推重,被誉为“救活一本集子”。1947年春天,刘修业将她的吴承恩研究成果编成《吴承恩事迹交游考》一书(因故未能及时出版),请孙楷第先生作序。孙楷第看后即“大吃一惊”,感其“援据这样浩繁,考证这样详细”,当为“三十年来研究小说史有数的著作”。他说:

修业先生这部书最得力的地方,就是把《射阳先生存稿》里所出的别号,一一考出来,知道某一别号属于某一人。结果,许许多多生疏的人,都在纸上活跃起来了。无关紧要的应酬文章,也成了有用的重要史料了。沉埋在下寮,一生不得意的吴承恩事迹,本是极不容易明白的。这时,因为明白了他的师友渊源之故,也完全明白了。^①

原来,《存稿》发现以后,人们无法阅读,学者无法利用,因为其中充斥大量文人雅号、别号,有的甚至有号无姓,或有姓无号,真实的姓名反而十无其一,吴承恩大量酬和之作失去了必要的语境,他广泛的交游迷失了对象,其生平事迹变得一团模糊。刘修业为此进行了精湛繁难的考证,《存稿》中多次出现的重要人物或与吴承恩过从密切的人物,经刘氏考证逐渐明了的有:

鹤江蔡公,即蔡昂;约庵周公,即周金;白溪张公,即张景华;介川毛公,即毛恺;熙台潘公,即潘坝;养吾范公,即范櫜;中玄高公,即高拱;念吾高公,即高时;南岷王公,即王廷;苏山陈公,即陈文烛的父亲陈柏;抑斋庐大夫,即庐蕙;张凤原、张巽卿,即张侃;冯南淮,即冯焕;李石麓,即李春芳;宗万湖,即宗杰;金秋泉,即金彦;周兰墩,即周于德;丁忍庵,即丁煮;谢迂的儿子留翁汝湖公,即谢丕;谢丕的儿子陈巖公,是谢用栻;松山公,是孙继鲁;东园公,是徐天赐;存斋公,即徐阶;梅国中丞公,即主修《春秋列传》的刘节;卮山先生,即葛木;庐守周大夫,即周瑯;叶太老夫人、叶太母孔老夫人,即叶淇的继室……

考索这些人物,非有广博学识和精深的考证工夫而莫办。刘修业

^① 见《吴承恩诗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

查阅了大量的明清方志,正嘉隆万间的文人集子,复以互校参阅、比照辨析,终于鉴定出他们的真实身份,理清了这些人物关系,从而使《射阳先生存稿》“四通八达,联成一片”。所以,孙楷第先生高度评价为“这是奇迹”,是“真才实学”,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①。从《吴承恩诗文集》与《西游记》的关系而言,特别是对吴承恩研究的实际利用而言,这一评价是公允和正确的。就考证工夫来讲,在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鲁、胡、郑、孙之后,当推刘修业,她是吴承恩研究名副其实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

^① 见《吴承恩诗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

第 三 编

当代《西游记》学术史流向

第七章 当代《西游记》学术史概述

一、当代《西游记》研究历史回眸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战火硝烟中建立,历史进入当代。

在党和中央政府的指引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爆发出空前的热情和创造力:一方面继续展开军事斗争,肃清盘踞各地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和土匪武装,击退国际敌对势力的重重威胁,保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多快好省、全面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遍地疮痍的旧中国一跃成为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强国,昂首挺立于世界。

但是,万事万物,“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当代中国在乘风破浪的进程中,也遭遇过暗流,受到过挫折,甚至在局部时段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新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同命运、共进退,也走过了光荣和曲折的道路。它犹如一个新生的婴儿,在建国初期蹒跚起步,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茁壮成长;至“文革”时期,在“终风且暴”的时代环境里遭受毁灭性打击,学术园地几近荒芜;进入新时期^①,沐浴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文化事业逐渐复苏葳蕤,并迅速走向新的辉煌。站在今天的角度作历史回眸,鸟瞰当代《西游记》研究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的发展轨迹,它大致可

^① 一般以1976年“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时期的标志。

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9年建国至1966年“文革”爆发。

这一时期的《西游记》研究表现出两重性特征。一方面,由于学术惯性的作用,承袭着三四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格局,并在新中国万象更新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双百方针”的鼓舞下,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在学术深度上有所推进,先后出现了张默生、严敦易、黄肃秋、魏建功、冯沅君、胡念贻、霍松林、沈仁康等一大批学者关于《西游记》的论文^①,不仅刊出时间比较集中,而且学术水准较高。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它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性,与政治挂钩较为紧密,特别是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所谓“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②的批判,直接催使《西游记》研究向阶级斗争学说靠拢,张天翼、童思高、李大春、沈玉成、李厚基等作家、学者纷纷著文^③,试图“撇开了一切玄虚的、歪曲的旧说,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西游记》”^④,之后的研究即多以阶级斗争或农民起义为主线,开始出现了一种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学术趋向。对这种学术研究的两重性特征,已有学者评论说:“关于《西游记》的主题讨论,在建国前建国后是截然不同的,突出表现在建国后(主要是指前十七年——引者注)的讨论文章多引入阶级分析、大是大非的思想观念,麝杂着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⑤这一阶段的学术成果主要保存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

第二个阶段:自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

1966年,“文革”爆发。众所周知,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① 张默生《谈〈西游记〉》,载《西南文艺》1953年第8期;严敦易《〈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黄肃秋《论〈西游记〉第九回问题》、魏建功《略论〈西游记〉的结构形式和语言工具的成就》,载《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8期;冯沅君《批判胡适〈西游记考证〉》,载《文史哲》1955年7月号;胡念贻《〈西游记〉是怎样的一部小说》,载《读书月报》1956年第1期;霍松林《略谈〈西游记〉》,载《语文学学习》1956年第2期;沈仁康《〈西游记〉试论》,载《新建设》1956年第2期。

② 参见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该信写于1954年10月16日,发表于1967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③ 张天翼《〈西游记〉札记》,载《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童思高《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载《西南文艺》1956年第2期;李大春《读〈西游记〉的几点心得》,载《解放军文艺》1956年第1期;沈玉成、李厚基《读〈西游记〉札记》,载《光明日报》1955年10月23日。

④ 参见沈玉成、李厚基《读〈西游记〉札记》,《光明日报》1955年10月23日。

⑤ 黄霖等《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①。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西游记》研究也深受其害,几经摧残,遂成万马齐喑的萧条局面。据粗略统计,这十年间,除了十数篇关于《三打白骨精》的鉴赏文章发表于语文教参类杂志上外,罕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刊出。唯1973年人文版《西游记》附有由郭豫适、简茂森撰写的长篇《前言》,在对作品作一般性介绍之外,对《西游记》故事演变、成书过程以及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如神话特征、浪漫主义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学术层面的分析。从学术史意义上说,此文可谓硕果仅存。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随着评论《红楼梦》、批判《水浒传》运动日益与“阴谋文艺”^②夹缠在一起,《西游记》研究也明显成为政治的附庸,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的主题观一统天下,实际上已偏离正常的文艺批评甚远,严重违背学术理性和学术规范了。

总之,长达十年的“文革”时期,在漫长的《西游记》学术史上可视为一个短暂的黑暗期,构成了令人窒息的“真空地带”。

第三阶段:“文革”之后的新时期。

随着林彪、江青两个反动政治集团的倒台,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终于在1976年宣告结束。“夫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在思想战线正本清源、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的伟大转折,并成为结束全局性的阶级斗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标志,我国进入到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西游记》学术史也进入了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期。

相对于以往各个时期(“文革”十年除外),新时期《西游记》研究为时不长,但由于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处在奋发开拓、与时俱进的升平盛世,受世纪之交改革开放的时代惠赐和现代精神的烛照,特别是全新的学术观念的指引和科学方法论的确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所加强,堪称一日千里,后来居上,是以往任何时期的研究都无法比拟的。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特指“文革”时期江青反革命集团为推行其政治纲领而炮制的反动文艺作品。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如果说建国初期的《西游记》研究值得总结,“文革”时期的《西游记》研究需要反思,那么,新时期的《西游记》研究则理所当然应大书特书。“援古以鉴今,鉴往而知来”。回顾这一辉煌的学术进程,我们首先应予注意的是:正是《西游记》这部伟大名著内部的强大活力和《西游记》研究的深厚传统,使它有幸成为学术界最早从“文革”时期禁锢、寂寞的文化环境中苏醒过来的学科门类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起步、思想战线刚刚打破坚冰之际,《西游记》论坛便呈现出积极回应的态势,并发生了一场围绕作品主题性质的论争。先是朱彤在《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发表《论孙悟空》,紧接着又在《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2期刊出《论吴承恩的思想》,从人物形象、作者思想等方面重新评价了《西游记》的主题性质,认为孙悟空既非农民起义的英雄,亦非“投降”的叛徒,而是一个“穿着神话外衣的市民英雄形象”,《西游记》的主题是“歌颂新兴事物的反抗”。这对于一个时期以来习惯于阶级分析,以“农民起义”解释一切的《西游记》研究不啻是一声惊雷,引起了强烈震动。对此大多数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先后有赵明政《孙悟空是“新兴市民”的典型形象吗?》(《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简茂森《孙悟空形象的阶级属性》(《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朱式平《试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第6期)、郝世峰《孙悟空形象略谈》(《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4、5期合刊)、严云受《孙悟空形象分析中的几个问题》(《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苗壮《从孙悟空看〈西游记〉的思想倾向》(《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罗东升《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等十几篇文章参与讨论,从而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影响,可谓先声夺人。这一讨论的理论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胡光舟的《吴承恩与〈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书中;值得指出的是,胡著是新时期以来最早的一部《西游记》研究专著。

当然,从总体上看,其时的研究还相当肤浅,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且较多地带有极“左”思想的痕迹。对此,何满子最早提出不满意,呼吁突破与深入,他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把艺术从社会学的框子里解放出来——谈神魔小说〈西游记〉的社会内容》(《社会科学》1982

年11月号)和《〈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后收入《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对所谓“十七年《西游记》的研究误区”,特别是当时流行之种种关于《西游记》的误解以及庸俗社会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清理、批判,对《西游记》研究起到了正确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鉴于《西游记》研究的强劲势头,展开大规模的学术活动水到渠成。1982年10月,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分会、《江海学刊》编辑部以及连云港市、淮安县两地人民政府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和淮安县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文学界、社科界、高等院校及其他部门的《西游记》研究者一百二十余人与会。会议就《西游记》的思想和艺术、孙悟空等人物形象及其源流、成书过程和版本演化,以及吴承恩生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是《西游记》研究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新观察》、《江海学刊》等多家报刊登文向海内外宣传会议实况和取得的成果,江苏古籍出版社在会后快速出版了论文集《西游记研究》。会议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将主办下一届会议的“使命”传授给有关地方、有关人员,于是在间隔不长的时期里,又相继召开了第二届(1986年浙江普陀山)、第三届(1988年新疆乌鲁木齐)全国《西游记》学术研讨会。这三次盛会对于新时期《西游记》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积聚了队伍,形成了合力,展示了研究实绩,开启了新时代条件下的学术模式,并预示着新时期《西游记》研究高潮的到来,起到了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

学术研究的深入,有赖于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协力支持。继《安徽师大学报》于1978年首先发起关于《西游记》的讨论,1983年初,《江海学刊》开辟专栏,推出一组《西游记》研究重头文章,标志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发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此后,《北方论丛》、《社会科学战线》、《思想战线》等学术刊物相继集中地刊发《西游记》研究文章,后来《古典文学知识》甚至还于1999年第4期出版了专辑,逐渐形成了一些《西游记》研究的重要阵地。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则长期开辟《西游记》专栏,一如既往地热衷于组织学术活动,推介学术成果,在提携培养后学、新人方面功不可

没。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三大权威刊物也参与其间,刊载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西游记》论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文本研究之外,作者论、版本论、源流论等方面的研究也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弹指之间,新时期《西游记》研究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辉煌历程。“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顾炎武语),日积月累,聚沙成塔,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审视整个新时期《西游记》研究历程,从时间的纵向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集中于对《西游记》主题的研究,初步消除了过去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对作品性质的侵蚀;第二时段在80年代中后期,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作者、成书、版本等基础学科层面的问题,《西游记》研究开始全面展开;第三时段是指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西游记》研究朝多元、纵深态势发展,出现了一浪旨在发掘作品深层次思想内涵的文化研究,在审美文化、神话原型批评和宗教文化研究方面成绩尤为卓著。这一时序完全符合小说学的基本规律,那就是从形象(主题)的鉴赏出发,逐步展开对作者生平、成书年代、本事源流及版本嬗变的钩稽考辨,最后开掘作品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并宏观考察它在整个小说史、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当然,这样的时段划分并不明显,它们相接相衔,实际上很难截然断开。而从研究平面上看,新时期的《西游记》研究的各个方面可以归并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大板块。作者、成书、版本属于外部研究,主题和文化蕴涵属于内部研究^①。前者较多地联系着中国传统的治学精神,而后者较多地吸纳了西方流行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显现出不同的学术流向和面貌。同样,这些方面也是相互缠绕,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从整体的《西游记》研究中割裂出来。所以从总体上看,新时期《西游记》研究呈现着齐头并进、稳步健康发展的繁荣局面。

^① 这里借用现代西方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提出的术语,但是“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分野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实际上早就存在。

二、《〈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建国以来(十七年间)《西游记》研究的精华

建国初期,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文化界、学术界也掀起了一次可喜的“复兴”,在各个门类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为了展示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大好形势和巨大成就,作家出版社于1957年撷取其中精华,采取“分门别类,集中起来”的办法,编辑、出版了“古典文学研究文集”丛书,当年推出第一批包括《楚辞研究论文集》、《乐府研究论文集》、《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水浒传〉研究论文集》和《〈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共六种,编辑者遵循客观展现的原则,对所选论文“不作任何论点上的变动”,以达到据此“约略可以看出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情况”的目的^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57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转向,极“左”思潮开始滋生、蔓延,直至走向于1966年爆发的十年“文革”,学术研究也日益受到窒息,这一出版项目遂停顿下来,关于《诗经》、三曹、唐宋八大家和《红楼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论文集便无缘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西游记》在内的这一批研究论文集便尤显宝贵了。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实际上保存了建国以来(十七年间)《西游记》研究的精华,是我们认识这一时期《西游记》学术史的主要资料。该集除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收录论文十七篇,附录一篇,凡十八篇,目录如下:

《〈西游记〉札记》(张天翼);《读〈西游记札记〉》(沈玉成、李厚基);《〈西游记〉的现实性》(刘樱村);《〈西游记〉是怎样的一部小说?》(胡念贻);《〈西游记〉试论》(沈仁康);《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童思高);《谈〈西游记〉》(张默生);《略谈〈西游记〉》(霍松林);《〈西游记〉读后的一些体会》(萧歌、竞华);《读〈西游记〉的几点心得》(李大春);《略论〈西游记〉的结构形式和语言工具的成就》(魏建功);《谈猪八戒》(方白);《〈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严敦易);

^①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出版说明》,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卷首。

《〈西游记〉里的道教和道士》(高熙曾);《〈西游记〉中对佛教的批判态度》(彭海);《论〈西游记〉的第九回问题》(黄肃秋);《有关〈西游记〉的一个问题》(秦绩);附录:《〈西游记〉的校订和注释工作》(黄肃秋)。

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在1953—1956年间^①,原刊这些文章的报纸杂志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西南文艺》、《文艺学习》、《读书月报》、《新建设》、《语文学习》、《解放军文艺》、《文学书刊介绍》等。而从这一份目录可以看出,研究范围虽比以往有所拓展,但还不能说全面、广泛,较多地集中在作品思想评价方面,其他问题虽有所涉及,但在数量上较少,在全书只起点缀作用。应该说,它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当代《西游记》学术史起步阶段的真实面貌。

《论文集》大约有十篇文章是从总体上评论《西游记》的,除了个别篇什停留在鉴赏层面,学术意义比较肤浅,张天翼、张默生、胡念贻、沈仁康等文写得极为严肃,且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颇高,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影响较大,即使在整个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上也称得上“名家名篇”^②。这些文章有如下特点:

其一,比较明显地承袭着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等学者“五四”以来的研究课题和方法,特别是较多地吸取了他们在本事(史实)、成书、作者方面的考证材料和结论。有的文章论题宏大,视野开阔,从作者、故事流变到思想、艺术成就,以及后世影响,纵横开阖,无所不包。读者读其中一篇即能初步了解《西游记》及其研究的基本情况。如张默生的《谈〈西游记〉》一文,洋洋二万字,分“引言”(总论《西游记》)、“真实的取经故事”、“人民创造的‘西游故事’及其记录”、“《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及其思想意识”、“《西游记》的总结与创造”、“《西游记》中重要人物的分析”、“《西游记》的艺术成就”等七大部分,几乎囊括了《西游记》研究的所有方面,颇具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胡光舟著《吴承恩和〈西游记〉》一书之雏形。这一类文章在向大众普及《西游记》,吸引、指导年轻一代走向

① 以各篇文尾注出原刊物发表时间为参考,其实际的写作时间或许更早一些。

② 199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名家解读〈西游记〉》,收录了该论文集的五篇文章。

学术之路,特别是进入《西游记》研究领域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二,围绕《西游记》主题,展开了一场较为集中、热烈的讨论,并显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对后人产生着较大的影响。其发轫之作便是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列于《论文集》第一篇)。

《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基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刊出著名作家张天翼《〈西游记〉札记》长文,这曾是文学界、也是《西游记》研究界的一件大事。文章第一次运用了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西游记》,直接把作品描写的神魔斗争与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联系、等同起来,把作品的主题明确规定为“反映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于《西游记》前七回大闹天宫(三界)与后面写西天取经二者在思想内容上是对立的——“后者否定前者”,所以他认为孙悟空在开始是代表农民起义的反抗英雄,但后来“投降了神”,并且“保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一路上和他过去的同类以至同伴作恶斗”,这就“像《水浒》里所描写的宋江他们那样,受了地主统治阶级的‘招安’,成了农民革命的‘叛徒’”。这便是著名的《西游记》主题矛盾说,亦称为孙悟空投降(叛徒)论。

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张文引起极大的反响,包括《论文集》中的其他文章,许多论文可说都是针对张文,或是从张文引申出来的。他们大多对张文的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表示赞同(更多的是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誉其为是一场“撇开了一切玄虚的、歪曲的旧说”的革命,但对主题矛盾说,尤其是孙悟空投降论表示不满,坚持孙悟空具有正义和斗争精神,“坚强、幽默、机智以及善良”,是“理想的典型”,是“正面形象”,假如说他“投降了统治者”,“就会大大地减弱孙悟空这一正面形象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甚至有可能“进而得出否定《西游记》”的“结论”^①。于是纷纷提出了对张文的批评或是修正的意见,出现了诸如“双重主题”、“主题转化”、“主题统一”等多种《西游记》主题观。

平心而论,这是当代《西游记》研究中第一场学术论争,加深了对

^① 参见沈玉成、李厚基《读〈西游记札记〉》。

《西游记》主题的认识,特别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新的认识,意义不可低估;但同时也打上了一些特殊的时代痕迹:过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侵蚀了学术的固有本性,从而萌生了日后泛滥成灾的庸俗社会学研究的因子。其中,个别观点不免机械和简单化,政治附会的成分较多,偏离了正常的学术理性——这一点也是应予以准确认识的。

关于人物研究,《论文集》收录了方白《谈猪八戒》一文。孙悟空是作品的主要人物,历来是《西游记》研究的一大重心,但往往与作品主题缠绕,故其时反而没有出现单论孙悟空形象(性格)的文章。方文以及稍后刊发于《新港》(1959年第12期)的《猪八戒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是两篇最早的研讨猪八戒形象的论文^①,在人物研究方面可谓独辟蹊径,奇峰突起。方文的中心观点是:猪八戒与孙悟空一样,“不但是主要人物之一,而且是正面人物之一”,如果说孙悟空是历代劳动人民“通过无数传说创造出来的理想的典型”,那么“猪八戒代表了劳动人民的现实的一面”,而且在他身上较多地体现出文学的真实性、人民性和人情味,因为“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更多的一般人的缺点,而且他并没有被这些缺点拖到泥坑里去,终于还是成了正果。因此,就觉得这个人物更真实些了”。后来,研究猪八戒的论文多起来,著名的有旷源《闲话猪八戒》(《山茶》1982年第5期)、龚维英《猪八戒艺术形象的渊源》(《文学遗产》增刊1983年第15辑)、吴圣昔《呆子形象面面观——猪八戒剖析》(《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等,论述更加全面、深入,但却多少受到方文的影响。

《论文集》还选入了两篇论述《西游记》与道教和佛教的文章。《西游记》以唐僧赴西天取经为情节本事,属于宗教性内容,且“三教已括于一部”,“变化横生,引而伸之”^②,十分驳杂,但以往的研究基本集中在阐释道教、佛教教义方面,对佛道基本持宣扬和歌颂的态度。这在明清评点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五四时胡适清洗明清旧说,提出的是玩世主义,并没有指出对宗教的批判;鲁迅说《西游记》“释迦与老

① 早于方文的论文仅一篇:冯汉鏞《孙悟空与猪八戒的来源》,载《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21日,但系孙悟空与猪八戒的合论。

② 袁于令《西游记题辞》。

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处,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①,虽表示不满,但也未对《西游记》的宗教性批判意识作深究。可见对作品的宗教研究几乎还是空白。高熙曾《〈西游记〉里的道教和道士》和彭海《〈西游记〉中对佛教的批判态度》两文则正面注意到作品对佛道的批判倾向,具有贬抑佛道的思想内涵,体现出一种新的学术视野,从而揭示出作品新的思想价值。高文指出:“在《西游记》里,只要道士一出场,总归没有好事,作者不但对道士们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而且连道教的祖师及其组织都给挖苦得一塌糊涂,简直是有意来揭露道士们的无能、阴谋、专横以至祸国殃民。”彭文认为作品表面上是推崇佛教的,但实质上是“通过孙悟空的形象,反映了人们对封建统治、对佛法统治的不满和攻击”,其直接的表现有:“批评‘与世无争’、‘悉听天命’的佛家思想,表扬和荼毒生灵的妖魔鬼怪战斗的精神”,“抨击佛教戒律、佛家的道德标准”,特别是以西天佛祖(实为迦叶、阿傩两尊者——引者注)索要“人事”的情节“进一步刻画了佛教僧侣勒索人民钱财的真实嘴脸”,等等。两文从作品形象和情节出发,结合明代中叶佛道发展实际,所举材料充分,言之有物,有很大的说服力。从此以后,人们评说《西游记》都将注意到这一思想内容,如1962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1964年由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写进了《西游记》批判宗教的内容。

秦绩《有关〈西游记〉的一个问题》所论“问题虽然很小”,但意义颇大,旨在修正鲁迅先生关于《西游记》祖本论述的一处错误,其中说:“鉴于有不少人仍然承袭了事实上已经被鲁迅本人在后来所否定了的看法^②,把吴承恩的《西游记》跟杨志和的《西游记传》的关系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解释;问题虽然很小,但为了避免以讹传讹,因此我才提出上面的一个小小问题,谨供大家参考。”这一问题在现在已成常识,但在当时却尚未被熟知,所以秦文在消除误解、宣扬真理方面有其积极意义。又,该文是针对鲁迅的,鉴于鲁迅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崇高地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的《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那精确的论文,就收在《徇傥集》里。”

位,作者以追求真理为旨归,敢于指摘他在研究中的错失,其实求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管见所及批评鲁迅先生小说史研究的文章,只在解放前其同代人中出现过,如胡适、俞平伯、郑振铎诸人,赵景深作有《中国小说史略勘误》一文,指出《史略》中的错误十七条,其中尚“不包括细小的错失”^①。不过,学术研究常常一波三折,至新时期,又有学者根据新的材料新的认识重提这个问题,认为当年郑振铎对鲁迅关于祖本论述的更正“未免失之草率”,鲁迅本人虽然“后来同意郑先生的结论,但还是值得认真进一步考察”^②。这一变化是秦绩当时所未能预料的。

《论文集》中的其余文章也都各有特色,各有价值。严敦易《〈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通过重点讨论杨东来批评本《西游记》杂剧,揭示出《西游记》与元明杂剧的渊源关系,有助于对《西游记》演变过程的进一步认识。魏建功《略论〈西游记〉的结构形式和语言工具的成就》是一篇专门讨论作品结构和语言特征的文章,所举例证非常充分。虽然清人丁晏、吴玉搢都曾指出《西游记》多淮安方言,但所论颇显不详,称不上严格的语言研究。魏文的目的只在研究《西游记》的语言特色和吴承恩的幽默风格,但实际上对于版本研究、作者研究都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功用。

必须予以特别重视的是黄肃秋的两篇文章。《〈西游记〉的校订和注释工作》是为1955年作家出版社校勘出版《西游记》所作的“出版说明”,颇为详细地介绍了世德堂本及其校理的基本情况,成为之后《西游记》版本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论〈西游记〉的第九回问题》涉及版本源流问题,有较大的学术含量,其论题是由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发轫,复经郑振铎、孙楷第探讨而又未果的“唐僧出世”。黄文的中心论点为:吴承恩原本《西游记》原有这一故事,但为世本刊落。文章通过对小说十处内证的考察,认为“作者对于‘陈光蕊、江流儿一节’故事的发展,始终在前后的照应着”,因而“‘陈光蕊、江流儿一节’故事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是存在的”。黄文的举证和论证不失充

① 参见赵景深《中国小说论集》,上海永祥印书馆,1950年。

② 陈新《〈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93页。

分、严密,但由于该问题的复杂性,其结论事实上未成定谳,后来赓续这一课题并有较大影响的有苏兴和李时人等人,他们对黄文的结论分别从正反(肯定与否定)两方面进行了检讨和探究^①。

当然,这一时期的《西游记》研究成果并不局限于《论文集》。同一时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也收录了若干篇《西游记》论文。李希凡、陈毓罍、苏兴、袁世硕等年轻学者已登上《西游记》论坛,分别写出了高水准、有影响的论文,其中部分文章还成了他们的成名作,如苏兴《〈西游记〉的地方色彩》(《江海学刊》1961年第11期)、袁世硕《漫谈孙悟空和〈西游记〉的时代特色》(《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为他们未来深入研究《西游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俞平伯、赵景深、叶德均、冯沅君、吴晓铃、林庚等“五四”以来的老学者继续关注、参与《西游记》研究,并分别撰写了学术文章。其中赵景深《谈〈西游记平话〉残文》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朴通事谚解》所引的《西游记》平话(残文),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平话的基本面貌以及在《西游记》演化中的地位。该文详细评述了《朴通事谚解》引自平话的八段(实为九段)文字,并与先前发现的《永乐大典》第13139卷“送”韵“梦”条里的《魏徵梦斩泾河龙》并案考察,得出结论:“吴承恩《西游记》是从民间的话本改写而成的”,其直接的来源应该是介于“《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之间”,“比《西游记》简单,却比《西游记杂剧》复杂”的《西游记平话》^②。由于该文披露、称引了丰富而新颖的第一手资料,观点上又在鲁迅、郑振铎当年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故而在《西游记》成书研究方面具有史料和立论的双重价值。另外,刘修业关于吴承恩生平事迹的考证文章作于建国前,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公开发表(出版)^③,正式发表于1958年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吴承恩诗文集》(作为附录),而在此段时间内发生影响,故将它们视为这一时期的《西游记》研究成果,也似无不妥。

① 参见苏兴《〈西游记〉第九回问题》,载《北方论丛》1981年第4期;李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

② 参见赵景深《谈〈西游记平话〉残文》,《文汇报》1961年7月8日。

③ 参见孙楷第1947年为刘修业《吴承恩事迹交游考证》一书所作的序,见《吴承恩诗文集笺校》,刘修业辑校,刘怀玉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三、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新时期《西游记》研究的振兴

1982年10月,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分会(现江苏省作家协会)、《江海学刊》编辑部以及淮安县和连云港市人民政府^①等五单位联合发起并主办的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在连云港和淮安两地隆重召开。共有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涉及九十五个单位的一百二十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八篇。这不仅是新时期,也是建国以来甚或整个《西游记》学术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高级别盛会。

会议的一大重点是研讨吴承恩生平。纪念我国明代伟大文学家、《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正是本次会议的缘起之一。所以会议率先打破常规,组织全体代表去凭吊吴承恩墓,瞻仰吴承恩故居——射阳矸。吴承恩墓和吴承恩头骨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游记》研究的重大发现。根据刘怀玉《吴承恩墓地调查散记》和张建军《吴承恩的面貌复原》两文介绍^②:1975年1月在淮安城南二堡大队(现为二堡村)出土了吴承恩为其父吴菊翁所作的《先府宾墓志铭》,和写有“荆府纪善”四个字的半截棺材头挡板(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引起极大关注。1981年8月,在江苏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指示下,淮安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员,根据这些线索对吴承恩墓地进行了调查^③。调查确定了上述出土文物的事实和价值,并取得“一项很大的收获”——找到了吴承恩夫妇三人的三只头颅骨和一部分其他部位的骨骼。后将掘出的三具颅骨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鉴定,其中一具男性老年头骨的特征为:年龄达七八十岁,是典型的黄色人种(蒙古人种),中头型,脑量大

^① 连云港市政府委托市社科联和文联,淮安县政府委托淮安县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委员会。

^② 刘文载《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张文载《化石》1983年第1期。

^③ 吴承恩墓紧靠其父吴菊翁墓,据高空蔚《吴承恩的身后种种》:“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吴承恩死后多半葬在祖茔中父亲一侧。”高文载《新观察》1982年第23期。

约 1580 毫升,长方形的面架,高凸型的眼眶,颧弓外突,颜面平而阔,中等阔的鼻型……考核有关文献记载,这具头骨当为吴承恩。在贾兰坡先生的主持下,该所运用科技手段成功地复制出吴承恩立体半身塑像。淮安县政府旋即修建吴承恩故屋——射阳簪,安放吴承恩塑像,并在墓地原址扩辟三亩土地,修建吴承恩陵园,以供世人凭吊、瞻仰。

应该说,这是古代小说大师吴承恩的莫大幸运。《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连是否实有其人尚在怀疑,如鲁迅只推测其为“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①。曹雪芹除了一部《红楼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材料(仅存吉光片羽的两句诗),历代红学研究者大事搜寻,至今尚未有可观的收获。而吴承恩,自 1929 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原刻本(四卷)至七八十年代,不断有文物出土,直到头骨复原塑像、收建墓地。并且随着这些新发现,吴承恩研究日益趋热,评价也愈来愈高。这次会议对吴承恩《西游记》作了充分肯定,对吴承恩生平事迹进行了深入的追索和研讨,并有学者透露了两条有关评价吴承恩和《西游记》的信息:第一,黄裳在发言中说:“师陀(著名作家、学者——引者注)先生最近说《金瓶梅》可能也是吴承恩写的;他发现里面用了大量的淮北土语方言——这是一个有活力的方法……如果能证明《金瓶梅》确实也是吴承恩的作品,那么吴就更加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物。”^②其二,胡小伟在发言中提及:“钱锺书先生说过《西游记》比《红楼梦》还伟大。”^③此说在学理上未必尽然,但显露出对吴氏极端推崇的信息。现钱锺书已仙逝,所论出处无考,但胡小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与钱氏共事多年,或者钱氏在某种场合、某种环境下向其说过此类看法,也不无可能。钱先生为当代学界泰斗,洋洋大著《管锥编》,见解精深,言必有据,此论一反鲁迅、胡适等人关于《红楼梦》地位的评论^④,确有石破天惊之效。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又,建国以后,江苏兴化、大丰等地陆续出土了大批关于施耐庵的文物,包括施氏家谱、墓志,但学界对其真伪一直有不同意见,至今未成定讫。参见刘冬《施耐庵生平探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 4 期;刘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第 6 期。

②③ 参见《淮阴师专学报》编辑部《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发言摘编》,《淮阴师专学报》1982 年第 4 期。

④ 如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不可多得的……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全面研讨《西游记》,取得了许多新见解、新突破。现在能见到的、保存此类成果的文献主要有两份:一份是由连云港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辑的《研究》杂志第15期(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专辑,1982年11月10日),一份是由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84年3月)^①。现据这两份文献对会议研讨《西游记》的有关课题介绍、评述如下:

(一) 关于《西游记》的思想性。

20世纪70年代末对《西游记》思想倾向曾有过一场讨论,会议肯定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予以深入的总结。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的刘士昀就该刊刊发刘远达全面否定《西游记》的论文《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1982年第1期)作了说明:“目的在引起争论,解放思想,(编辑部)并不一定同意他的意见。”何满子、苏兴从历史、艺术批评的高度评价了《西游记》的否定精神与批判性。前者考出中外统治者嗜食小儿,“杀而剖其腹,去肠胃熟食之”的史实(见《月山丛谈》);后者考出嘉靖间抽税太监高棅“食小儿脑千余”、取小儿阳具和药的史实(见《万历野获编》),这些均印证了《西游记》对明世宗等封建帝王的批判和嘲讽。欧阳健对贯穿全书的玩世主义进行了新的认识,对胡适和鲁迅的相关观点作了全面评述,指出玩世主义不是单纯的艺术风格,而是一种严肃的处世态度,联系着作者对现实的认识(怀疑与否定),因而“具有揭露社会的黑暗腐朽的意义”。还有一些学者在会议上更为广泛、深入地论述了自己先前已提出的观点。如朱彤力主“市民说”,认为孙悟空“代表着民主的力量”,“是当时新兴市民思想在新兴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反映”。李希凡则依然坚持“主题转化”说,认为孙悟空在大闹天宫中是英雄,但最后“给套上紧箍儿实在是个悲剧,不能不引起同情”,只有“主题转化”说才能解释《西游记》前后“两截子”的问题。

^① 此外尚有一些报纸杂志刊载关于本次会议的报道和侧记。其中篇幅较长的有高空蔚《吴承恩的身后种种——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侧记》,载《新观察》1982年第23期;方胜《〈西游记〉首届学术讨论会简介》,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张泾德《溯源寻迹探“西游”——〈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侧记》,载《新华日报》1982年10月20日;《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发言摘编》(附《淮阴师专学报》编者按),载《淮阴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二）关于《西游记》的成书与版本。

关于《西游记》的成书,李时人《〈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高明阁《〈取经诗话〉阅读札记》两篇论文及发言引起了会议的普遍关注。李文是新时期国内《西游记》研究界第一次对《西游记》漫长(自唐至明)的成书历程进行全面阐述的力作^①,基本理清了从《大唐西域记》等历史记载,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最后定型于百回本长篇通俗小说《西游记》的发展线索。高文则是以个案研究为主,以《诗话》为核心,上溯下探,披露、揭示出许多《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现象,内容翔实,论证深入,也令人耳目一新。

在版本研究方面,陈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关于《西游记》“版本源流的假设”,认为杨本是“今存西游故事最早、最完整的‘古本’”,朱本则是介于杨致和本和吴承恩本之间的“怪胎”,三本的次序是杨本—朱本—吴本。此论的不同凡响处在于它重新肯定鲁迅的观点,否定久被视为定论的郑振铎的观点^②。他指出:理顺、确立三本的关系,对于《西游记》的版本、成书以及作者研究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这种意义在今后的研究中日益显露出来,三本关系成为《西游记》版本论的重要内容,积淀为《西游记》研究中的基本学术命题。

又,徐式宁、徐澄平就最近十多年来李卓吾评本的发现与出版情况作了说明,他们透露:“这个《西游记》评本有的批评很有见识,像是李卓吾的见解和口气,有的却平淡无奇,有的甚至低级庸俗。到底是否出于李手,还有待于专家们鉴定。”^③与会者对此饶有兴趣,有代表甚至呼吁尽快把它影印出来,以供研究者之需。

① 据笔者所见,徐朔方、黄永年两先生也著有同类长文:徐朔方于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考信编》收有《论〈西游记〉的成书》一文,未指明写作时间,现据《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1994)推测,其实际写作时间不会早于李文。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和版本源流》,载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古代文献集林》第二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作为《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的《前言》,由中华书局于1993年出版。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西游记》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他们(指杨本与朱本——引者注)很可能全都是本于吴承恩本《西游记》而写的。或可以说,全都是吴氏书的删本。”

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已有共识:李评本的笺评者当为叶昼。可参见本书第二章《李评本与〈西游记〉评点的成熟》一节。

（三）关于研究《西游记》的方法。

许多会议代表提出：当前《西游记》研究在方法论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文革”时期越演越烈的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方法）尚未得到彻底清洗，一些简单化、概念化图解作品的倾向时有所见。何满子将其指为“《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李希凡也说：“研究《西游记》不能忽视神魔小说的特征而用简单化方法进行分析，不能用庸俗社会学观点来图解作品中美丽的神话世界。”

《吴承恩与〈西游记〉》一书作者胡光舟在大会总结会上重提了“形象大于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命题，认为评论《西游记》应从形象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从主观意图（包括作者和研究者的主观意图）出发。这也是许多学者的一致看法，如孟繁仁指出：“目前，《西游记》研究中明显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用现在的标准，来给古代文学作品贴标签、划成分；二是用对待现实主义作品的眼光，看待这部浪漫主义作品，忽视了作品的主要倾向。”而归根结底则是忽视了它的形象体系和神魔小说的实际。萧兵则吁请重视比较研究：例如《西游记》各种体裁、版本的比较，《西游记》与民间传说、少数民族文学、外国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中国古典小说的比较等等，他以《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一文为例，说明了“比较文学之原则”：整体对应性，多重平行性和细节密合性。这一倡导受到许多代表的赞同，但他的《通考》却遭到一些质疑，“反对派”的主要代表是胡光舟和萧相恺。如萧相恺直称：“我很怀疑哈奴曼、无支祁对孙悟空有多大影响。因为这类型的故事，印度、希腊、中国、阿拉伯等都有，哪个是源，哪个是流，哪个影响哪个，上古交通不便，怎样交往……这些问题，萧兵的《通考》等几篇论文和发言都没有回答。”故而读后有无所适从之感。

在展开充分深入的讨论之后，会议还就今后的《西游记》研究提出了若干倡议和建设性意见，其中呼声比较强烈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编纂《西游记》资料汇编。随着《西游记》研究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编纂资料汇编已显得十分迫切。对数百年来丰富的《西游记》研究资料，“不要主观地加以否定，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资料都应

选择,资料越全越好,只要是有关《西游记》方面的资料,我们都要全面地编上”。关于编纂的方法,可以《红楼梦》、《水浒传》资料汇编为参照。

其二,成立《西游记》学术机构。为了推进《西游记》研究,国内国外都有必要设立经常性的学会组织,大学有条件的可以成立研究所、教研室,建设选修课。在这一点上,《西游记》与《红楼梦》、《水浒传》等存在很大差距,《红楼梦》学会,全国性、地方性的研究组织不计其数,山东甚至已经有了蒲松龄研究机构。而实际上《西游记》比《红楼梦》更加家喻户晓,一个中国人可能不知道贾宝玉、林黛玉,但却不会不知道孙悟空、猪八戒,所以有理由成立一个经常性的学术组织,领导、协调经常性的学术活动,通过大家特别是有关领导的努力,这一工作完全可以做。

其三,呼吁有关部门和淮安县政府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近二十年间,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在淮安附近发现了大量与吴承恩有关的碑刻,但当地缺乏文物意识,把它们当作石头使用或毁坏了,所以建议:“如果是农民献出明代甚至是清代前期的比较早的碑刻的话,我们政府是不是给予奖励?”奖励的力度不需很大,“只要等于那块石头的价钱就可以了”。

其四,呼吁连云港市大力建设花果山(云台山)。云台山是《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原型。对此问题,会议代表、连云港学者李洪甫已作《云台山、吴承恩与〈西游记〉》、《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故事》^①两文介绍:“江苏连云港市的云台山,海拔 625 公尺,濒临大海,耸立于我国的东大门。这里峰奇石朴,树老林深,十七世纪中叶以前,一直是浩海中的山岛。”吴承恩家乡的群众至今还在传说此山上的花果山水帘洞即是“孙猴子的老家”,云台山上七十二洞,山上的自然环境也与吴承恩《西游记》所描写的花果山水帘洞十分相似,所以“它正是《西游记》的模特儿”。可见,云台山与《西游记》有密切关系,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发、建设云台山——花果山,对于推进《西游

^① 分别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1期、《民间文学》1982年第2期。李洪甫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过同类文章,如《〈西游记〉里的花果山》(《新华日报》1979年12月5日)、《吴承恩与水帘洞》(《文汇报》1982年7月26日)。

记》(吴承恩)研究,对于树立《西游记》文化品牌,推动连云港经济建设都具有积极而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些建议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于特殊的认识水准而提出的,有的切实可行,如之后不久中州书画社即出版了由朱一玄、刘毓忱编辑的《〈西游记〉资料汇编》(1983),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更大规模的《〈西游记〉研究资料》(1990,刘荫柏编);有的则限于实际条件而难以实现:《西游记》学会组织在淮安、连云港、太原等地先后设立,但全国性的《西游记》学会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成立。有些建议具有前瞻性、科学性,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如连云港市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建设花果山,连年举办《西游记》文化节,以“西游”旅游文化兴市,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有些建议却也不免显得天真,如文物出土有其自身规律,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淮安自70年代发现吴承恩碑刻和墓穴,似乎掀起了一个文物出土的热潮,但实际上很快归于沉寂,建议加强对此类文物的保护,虽然不无意义,但终究近乎无的放矢。

无论如何,作为一次《西游记》学术会议提出这么多的建设性意见,实在是值得赞赏的,可以说这也是这次盛会的额外的收获。

作为新时期以来《西游记》领域的第一次盛会,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在学术界受到极大的关注,许多报刊全程跟踪报道会议盛况,并誉其为“一个良好的开端”,纷纷预见:在它的推动下,“《西游记》研究将不断取得新的成绩,达到新的水平”^①。从当代《西游记》学术史来看,我以为本次会议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及时总结进入新时期以来的《西游记》研究。

自朱彤早着先鞭,于1978年初在《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发表《论孙悟空》^②,《西游记》研究随之热烈展开,并发生了一场关

^① 张泾德《溯源寻迹探“西游”——〈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侧记》,《新华日报》1982年10月20日。

^② 在此以前,关涉《西游记》的文章散见于报刊,如《连云港文艺》(1977年第1期)和《江苏文艺》(1978年第1期)载有来俊华《花果山游记》,但严格意义上的《西游记》论文当以朱文为最早,笔者据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66.7—1979.12》(1982年5月版)作此判断。

于《西游记》主题性质的论争。据粗略统计,至本次会议前,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西游记》研究论文近八十篇,这个数字实际上已超过建国以后十七年间的总和,其中涌现出像《〈西游记〉里的神魔问题》(高明阁,《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西游记〉与〈罗摩衍那〉》(季羨林,《文学遗产》1981年第3期)、《〈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李时人、蔡镜浩,《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萧兵,《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这样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同时,《西游记》论坛也出现了以刘远达、丁黎、傅继俊为代表的全面否定《西游记》的学术倾向^①,在读者和学术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蓬勃、纷繁的《西游记》研究,亟须予以梳理和总结。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②学术的实践活动进入到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在理论上予以相应的清理、总结,以获取正确的指导和进一步深入的动力。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的举行,正可谓适逢其时,恰到好处。

其次,树起旗帜,聚集队伍,展示阵势与实绩。

与《红楼梦》研究具有相对稳定、专门的研究梯队相比,《西游记》研究的队伍比较松散,像刘修业、苏兴、刘怀玉这样专业的《西游记》学者尚不多见。这次会议表现出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犹如树起大旗,将队伍聚集麾下,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研究者聚合起来,展示出蔚为壮观的阵势。一百二十余人的与会代表,遍及二十二个省份,涉及文艺界、社科界、高等院校、政府机关和其他部门的九十五个单位,就其包容性和代表性来说,在学术会议中也属罕见。从年龄结构看,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洋洋大观。老一代学者宝刀不老,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学术青春;大批中年学者在改革开放、文化勃兴的大好形势下豪情满怀、斗志昂扬,学术热情十分高涨;更有一群年轻学者在学术舞台整齐亮相、崭露头角。这次会议不愧是对整个《西游记》论坛的一次大检

^① 见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丁黎《从神魔关系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学术月刊》1982年9月号;傅继俊《我对〈西游记〉的一些看法》,《文史哲》1982年第5期。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页。

阅,也是《西游记》研究的一个缩影,可谓英才辈出,群星璀璨,呈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兴旺景象。分开来说,其中的每一代学者都有着各自的时代背景和学术使命,都为《西游记》研究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合而论之,他们是连绵不息、代代相传的整体,他们有着共同的使命、责任,有着共同的前途、未来,共同把《西游记》学术史推向前进。

再次,突破禁区,奋力开拓,开创《西游记》研究的新局面。

本次会议召开,正值中共十二大不久,学习、贯彻十二大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成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代表们受到莫大鼓舞,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学术上突破禁区,勇探新路。其中突出的表现有二:一是对“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以单纯阶级分析为特征的庸俗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将新时期《西游记》研究纳入到符合学术理性法则、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二是对鲁迅、胡适等五四新文化大师进行了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不唯名人,不唯定论,敢于提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如有的学者对鲁迅的“游戏说”和胡适的“玩世主义”主题观提出了颇为尖锐的批评。再如关于悟空来源问题,有学者赞同鲁迅的国产说(民族传统说),也有学者坚持并发挥胡适的外来说,对于两种意见的论争,会议以宽容的学术态度兼收并用。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和氛围中,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成为一次在《西游记》学术史上继往开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需要指出的是,限于时代(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这次会议也存在若干缺陷。我以为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并且产生一定负面效应的问题是:会议选址在淮安和连云港(淮安是吴承恩故乡,连云港是《西游记》花果山的原型),由两地政府共同参与主办,并且将会议的主题之一定为吴承恩研究,甚至与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的活动联系在一起,除了《西游记》与吴承恩研究的联动效应之外,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吴承恩著《西游记》(吴著说)的观点。而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由鲁迅、胡适论定的这一观点其实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海内外《西游记》研究界始终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对于运用行政方式(如举行全国性会议)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行“吴著说”,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那

些坚持“非吴著说”学者的不满^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议后不久发表的章培恒的影响深远的力作《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②,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对《西游记》论坛的强烈冲击,正是对此现象的反拨和强烈的诘难。

① 笔者发现一个不无有趣的现象:在之后的《西游记》作者争辩中,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大多持“吴著说”,如何满子、苏兴、彭海、刘怀玉、陈澈、吴圣昔,都是“吴著说”的代表人物,而持“非吴著说”的学者则大多没有参加会议,如章培恒、杨秉祺、张锦池、李安纲等,这说明会议对这一问题确有很大的影响。

② 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本文直接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的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的论辩。

第八章 《西游记》成书(源流)论

一、关于《西游记》成书阶段的划分

今见百回本《西游记》并非作家个人创作,而是一部世代累积型小说巨著,经过史书记载、民间艺人演说的长期流传等阶段,最后由文人创编定型。这一论断由鲁迅、胡适和郑振铎于五四时期提出,并得到学界认同。徐朔方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成书研究中将其上升为一项小说理论——“世代累积集体创作”说,用以揭示中国早期长篇章回小说的发展规律和特征:

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他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谁也说不清现在我们所见的版本是出于谁的手笔。任何一个说书艺人都继承原有的模式或版本而有所发展。^①

此说既可有效地解释这些小说巨著丰富复杂的思想的形成,也可用作衡量某些小说观念如《三国演义》的正统说,《水浒传》的海盗说,《金瓶梅》的苦孝说,《西游记》的全真教道教本说,有助于在小说研究中去伪存真,探索深谛,因而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影响。可以说,“世代累积集体创作”说的提出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的重大成果,这一小说理论也得到了《西游记》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印证,包含着《西游记》研究的贡献。

新时期的《西游记》成书研究在遵循这一基本认识的前提下,聚焦于整个《西游记》演化过程的阶段划分以及各个阶段(标志性成果)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作用两大问题,并从多方面作广泛、深入的展开,取

^① 徐朔方《小说考信编·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得了重大突破,并有一些新发现问世。

关于成书阶段划分,多数学者采取“一网打尽”的办法,从唐时史乘(主要指辩机《大唐西域记》和慧立、彦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始,经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明之际《西游记》杂剧、明初《西游记》平话^①的演变而成大部《西游记》百回本小说,前后共五大阶段。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之后,20世纪90年代出版之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仍然采用这种方法,并以此线索论述《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李时人在《〈西游记〉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一文中说:“由历史故事发展成为《西游记》这样复杂的文学故事,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很多作家艺人都贡献过他们的聪明才智”,抽绎、划分阶段理应贯穿演化过程的所有环节^②。他还以孙悟空形象为例,具体、细致地分析了这些阶段的演化过程。

但是,这更多是揭示出中国几部世代累积型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水浒》等)演化中的普遍性,至于《西游记》成书的个案则仍然有其特殊的复杂性。黄永年认为在演化过程中,诗话本、平话本的存在及其影响毋庸置疑,唯元明两代,《西游记》杂剧不如《三国》戏、《水浒》戏发达,因而它的作用有限。他认为“戏曲和小说虽有关系却非同一系统的东西”,“何况现存的《西游记》杂剧只有明万历四十二年刊刻的杨东来评本,它是否就是天一阁藏明抄本《录鬼簿续编》中著录的明初杨暹(字景贤)所撰《西游记》,尚成问题”。他援引赵聪《中国五大小说之研究》中的观点,“怀疑它(即《西游记》杂剧)是杨东来本人根据当时已流行的百回本《西游记》所撰写,因而所演情节虽简略却和百回本无大出入”,即使元明之际有其他“西游”杂剧存在,“其故事情节看上去不会比第一阶段(即《诗话》)的说经话本有多大进展”^③。所以他实际是将《西游记》杂剧排除在《西游记》演化史之外,将《西游记》成书过程划分为史载→《诗话》→平话→百回本四大阶段。持这种看法的还有刘荫柏,他指出:“杨景贤比吴承恩约早一百多年,但他

① 对《西游记》平话的年代有不同的认识,这里姑且排在《西游记》杂剧之后。

② 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③ 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古代文献集林》第二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又见《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的《西游记》杂剧刊本问世较晚,已是吴承恩逝世三十年以后的事”,“故推测他(吴承恩)生前未见此剧本”^①。客观描述《西游记》的成书过程自然应将杂剧剔除。

还有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徐朔方在讨论《西游记》成书问题时不仅确认元明杂剧这一发展阶段,而且引入了杨本、朱本两部简本与吴承恩百回本的关系。即是说,如果两部简本果真出现在百回本之前,那么《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在明代小说创作阶段还需细分为简易“西游”小说(姑且以此称谓,鲁迅称“简单的小说”)与百回本长篇小说两个阶段,这样就不仅没有减少其中的既有环节,反而又增加出一个阶段,成为六大阶段。徐朔方对此未作明断,认为“要把所有不同版本同时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按目前条件“仍然不易做到”,而已有之参差不一的论说“只能令人困惑”^②。但笔者认为,他提出的可能性从学理和逻辑上说是完全存在的,而且后来陈新、张锦池等人的版本研究已为之提供了直接的依据,他们都认为杨本、朱本等简本都有可能早于百回本^③。

还有人试图从根本上突破由鲁迅、胡适、郑振铎当年关于《西游记》演化过程的预设,或从寻找《西游记》新史料着手,或由全新的思维路数出发,对此问题进行多方面、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提出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意见,择其要者有以下方面。

其一,关于山西队戏《唐僧西天取经》。

蔡铁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连续撰述《整合的历程:论唐僧形象的演变》、《〈西游记〉成书的关键中介》、《元明之际取经故事的流向和影响》等文,以丰富的史料事实和详尽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新阶段:山西队戏阶段。这一构思以其前所未有的理论建设意图和颖性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在成书研究中被誉为“异军突起,别树一帜”^④。

① 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② 徐朔方《论〈西游记〉的成书》,《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又见《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4页。

③ 参见陈新《〈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载《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张锦池《〈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④ 冯保善《异军突起,别树一帜——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系列评述》,见《淮阴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

1987年,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戏曲》第三辑全文刊出山西潞城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首次披露了山西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的有关材料。该刊同时刊出著名戏曲专家黄竹三等人的考述、评价文章。据他们介绍,“队戏”源出于队舞,是流行于宋元时期的民间戏曲。所谓“礼节传簿”,就是那些仪式、程序和演出内容的记录底本。现在所见的这份《礼节传簿》1985年发现于山西潞城,为崇道乡南舍村堪舆家曹占鳌、曹占标兄弟所存,故称“潞城本”。蔡铁鹰根据其中与取经故事有关或与取经故事以后演变有关的丰富内容,经过仔细、深入的分析,认为:《唐僧西天取经》队戏对《西游记》成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丰富的“西游”内容“恰恰弥补了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之前唐僧取经故事在这一时期的演变空白”,队戏“在《西游记》故事中是一个独立的构成单元,是单一的来源”,“它是《取经诗话》的演化”;并进一步提出它是取经故事由西北地区发端转入中原地区的“中介”,“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西北取经故事进入中原演变定型的途径”。他援引王静如根据1980年公布的甘肃安西榆林窟中发现唐僧取经壁画,证实西北地区晚唐至北宋时已有唐僧取经故事流传的事实,以及李时人、蔡镜浩和刘坚关于《取经诗话》与敦煌写卷为同一性质、同一方言作品的考证结论^①,指出由于它的出现,过去关于《西游记》演化的排列次序,即“唐宋著述或笔记中散见的取经故事→南宋‘说经’说话中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末明初的《西游记》杂剧→可能是明初的《西游记》平话(或称古本《西游记》)→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这一排列次序,其正确性“值得怀疑”,而必须更改为一种新的排列,那就是:“西北《取经诗话》→山西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中原《西游记》杂剧、平话→百回本《西游记》小说”。蔡铁鹰认为,“西游”故事从晚唐(一说宋元)《取经诗话》至元明杂剧尚有约二百年的漫长时代,其间不可能没有演化的痕迹,队戏的发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以上所举序列新说“打破了关于《西游记》成书的旧有序列,解释了旧有序列带来的所有疑问,理

^① 参见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载《文物》1980年第9期;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间考辨》,载《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载《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

顺了元代之前各种取经故事资料的关系”,新序列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所以他不无欣喜地宣称“《礼节传簿》(队戏《唐僧西天取经》)是近年来《西游记》成书研究中最重大的发现”^①。对此海外学者有快速呼应,日本《西游记》专家矶部彰于1991年在《中华戏曲》第十辑发表《关于〈礼节传簿〉中的〈西游记〉队舞戏》一文,指出“这些剧目不但说明在山西地区《西游记》戏曲曾于明朝万历二年盛行一时,而且作为问世于世德堂刊《西游记》(万历二十年,1592)之前的资料,填补了《西游记》形成史中万历以前部分的空白”。得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结论。这也是新时期《西游记》成书研究的最重大成果之一。

其二,又有关于《西游记》词话本阶段的探索。

较早提到词话本问题的可能是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长篇的说唱词话,明代也有,如《金瓶梅词话》、《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在散文本通行之前,它们都有夹说夹唱的词话本,可惜这些本子都失传了。”^②因为缺少可靠的版本资料,胡著未能对这些作品的词话本作具体介绍。

随着《西游记》成书以及版本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从中得到启发,又重提词话本问题。如张锦池认为推定词话本《西游记》的存在,不仅可以解释百回本(世本)的许多特殊现象,也有利于对其他异本(如朱本)的价值认定。他指出:“世本中诗赞和词话之多所以居中国六大古典小说之首,盖由于它来自词话本《西游记》;朱本卷四与前后几卷所以竟若二书,盖由于一来自平话本《西游记》,一节自世本《西游记》;词话本《西游记》和平话本《西游记》当属同源而异流,但不一定皆源于《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朱本的真正价值实在于其卷四保存了平话本《西游记》的又一残文,从而与前后几卷的风格对比中令人知道世本的祖本实为词话本《西游记》,其风貌尚存于世本,致朱本卷四与前后几卷不同一格。”^③正式提出了关于《西游记》词话本的问题。

① 参见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的关键中介——〈礼节传簿〉的再发现》,《活页文史丛刊》(1990年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②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第393页。

③ 张锦池《说朱本是晚于杨本的三缀本》,《北方论丛》1997年第4期,又见《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4页。

接着,又有程毅中、吴圣昔等人群起响应,探索《西游记》词话本问题。程毅中在论及《永乐大典》本残文“梦斩泾河龙”时说:“可能就是《朴通事谚解》所引的《西游记》平话,但也不能完全肯定,也可能另有一本《西游记》词话。”因为“世德堂本《西游记》里的许多唱词,可能是《西游记》词话留传下来的残文”。他还援引孙楷第早年所作《水浒传旧本考》关于“《水浒传》的前身应是词话无疑”的结论,推测:“如果注意到《西游记》里有那么多的唱词,那么我们不就更可以说《西游记》的前身应是词话了吗?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还将世本与朱本中两首关于唐僧出世故事的韵语进行对勘,得出结论:世本之前可能存在“两个系统的唐僧出世故事”,而其一来源正在词话本^①。这一看法对张锦池认为朱本是一部三缀本的观点进行了间接的印证。不过应注意到,程毅中并未将词话本列为一个独立的阶段,态度上有所犹豫,“我们说《西游记》的前身可能是词话,当然只是一种推测,也许它不叫词话而是宝卷之类的说唱文学”。他以为,词话与平话以及宝卷就说唱文学而言“并没绝对的界限”,平话本“也不见得就一定不能插入唱词”。吴圣昔则将词话本归入《西游记》众多佚本中来予以讨论,以为平话本以后当有“故事更为丰富的词话本”,因为“世本中确有许多体现民间文学性的文字,如为数众多的俚词和复述语之类”,并且“平话印行后至小说产生前的约二百年间,说书艺人演唱《西游》故事毫无扩充和丰富化是很难想象的”,所以他认为“存在《西游记》词话本佚本的可能性极大”^②。

综上所述,关于《西游记》成书阶段划分,以史载(如《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永乐大典》残文等)和明百回本小说五大阶段为基准,并多有学者作相应增减,而又以增加为主导趋势。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已先后提出山西队戏、词话本、明简易小说三个新的发展阶段,如将它们排列齐备,则《西游记》演化的次序为:史书记载→《取经诗话》→《唐僧西天取经》队戏→《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西游记》词话本→简易《西游记》小说→百回本长篇巨帙《西游记》。

① 程毅中、程有庆《〈西游记〉版本探索》,《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② 吴圣昔《〈西游记〉版本浅说》,《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关于以上各个阶段对后世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用问题,其看法因人而异。一般来说,史载作为源头,涉及文艺与历史(生活)的基本关系,符合“羽翼信史”的传统小说观,故而认识已充分到位。杂剧、简易小说两个阶段皆有人持异议,队戏是新发现,词话本尚处假设和推测阶段。所以这一问题的讨论似集中于《取经诗话》。关于其成书年代、刊刻书铺、刊本原貌及故事源流等问题,讨论十分热烈,争论也时有发生。而就《诗话》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作用问题,李时人、黄永年、徐朔方、张锦池等人均有精到论述。如李时人认为:“玄奘取经由历史故事向神话故事转变的完成则主要得力于唐代寺院‘俗讲’的盛行”,“现存刻于南宋时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保存下来的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诗话》的刊印,在《西游记》成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取经故事发展沉寂时代的结束,随即出现的是一个新的飞跃发展的时代”,而且是“向神魔故事发展的方向”^①。后来张兵又撰文,对此作了具有总结性的论述,指出《取经诗话》虽然谄陋,“但文学作品的各种基本要素均已具备”,“开拓了这则取经故事向神怪小说发展的方向”,因而堪称“后世《西游记》故事的开山之作”^②。当然,对《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平话的研究也比较热烈。关于以上三个阶段对后世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影响,将在后面做详细论述。

总而言之,《西游记》成书研究卓有成效,不乏新突破、新发现,是新时期《西游记》研究有活力、显业绩的重要方面。它不仅为《西游记》的文本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显示出丰富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它为《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基本命题提供了证明,有利于正确认识作品的艺术品格和美学特征;另一方面,它对揭示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轨迹、展现中华民族辉煌文化的积聚历程,从一个侧面提出了实际的根据,其意义已超出了《西游记》研究本身。

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的“祖宗”?

现在,我们按照《西游记》成书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排列次序,率先

① 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9页。

② 张兵《北宋的“说话”和话本》,《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讨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学界习惯称《诗话》或《取经诗话》)对后世百回本《西游记》小说的影响和特殊意义。古典名著《西游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神魔小说,以唐代高僧玄奘取经为本事,经过长达几近千年的演化、发展,不断融入丰富的民间文学(包括神话)成分,最后于明代中期(16世纪末叶)由文人加工改编定型。今知其最早的雏形为宋元之际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诗话》刊本发现较晚:20世纪初,王国维、罗振玉在日本看到《诗话》高山寺藏本并随即加以影印,旋为国人所知,且有学者陆续展开研究与讨论。最早论及它与《西游记》关系的当推胡适。他在《〈西游记〉考证》这篇长文中,将《诗话》与《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史书记传和百回本小说《西游记》进行综合考察,爬罗剔抉,烛隐探幽,发现《西游记》与《诗话》的关系远比其与上述两种史著的关系直接,进而指出《诗话》是唐僧经历八十一难的主要来源,“这部书确是《西游记》的祖宗”,在《西游记》演化史上,它与《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一样,同为重要环节。

胡适《〈西游记〉考证》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奠基之作,处在草创之际,筌路蓝缕,难免错舛讹误,在今天来看似有不少商榷之处;但他将《诗话》视为《西游记》的“祖宗”,的确独具慧眼,发前人之所未发,对考察《西游记》演化的实际有直接的启发。之后,对《诗话》研究渐趋深入,鲁迅、郑振铎都有精辟论述,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诗话》是《西游记》的“先声”,与胡适的看法相呼应;郑振铎也就《诗话》的有关问题与鲁迅进行过讨论。而今人李时人、张锦池两先生同名著作《西游记考论》的考辨最为翔实,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不过,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将考辨的重点放在《诗话》的成书年代、刊刻书铺、刊本原貌及故事源流方面,对其与后世百回本小说的关系尚未从实质上加以申述。最近,有学者著文指出:《取经诗话》“文学作品的各种基本要素均已具备”,“开拓了这则取经故事向神怪小说发展的方向”,堪称“后世《西游记》故事的开山之作”^①,初步涉及两者之整体关系,惜乎未能充分展开。故而关于这一论题,特别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西游记》小说成书过程中的价值和影响,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① 张兵《北宋的“说话”和话本》,《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这里,拟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依循胡适早年关于《诗话》是《西游记》“祖宗”的提示,通过对各种相关材料的对照考察,鉴别辨析,提出如下观点:

《取经诗话》是唐代玄奘取经求法一事从历史事件转变为文艺创作的标志,它根据文艺(话本)规律,驰骋想象,展开虚构,刻画艺术形象,追求审美效应,其艺术品格开始替代历史真实成为主导方面。在《西游记》漫长的演化史上,这是一次奠基性的转变,为后世“西游”故事(包括戏曲与小说)的创作开辟了方向。具体而言,从今见的《西游记》平话“永乐大典本”等残存材料,到《西游记》戏曲(以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为代表),直到百回本《西游记》小说,都是遵循着这一方向进行不断丰富、充实、调整、加工的结果。就它与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内在关系而言,在创作实践上它是先导,在作品形态上则是雏形,一言以蔽之,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最早的“祖宗”。

反言之,如果没有《取经诗话》的创作实践与成果,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唐以后,关于玄奘取经的传说累代不绝,愈演愈烈,后世以长篇章回小说进行详述具有其合乎逻辑的必然性,然而倘若没有《诗话》的导向和牵引,它无疑将与今见之《西游记》面貌迥异。猜测或许会是一部类似于《鲁宾孙漂流记》的探奇历险记,抑或是《镜花缘》一类异域见闻录。恩格斯说过:任何一个历史事变都是“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影响而产生的,即是说,任何偶然的因素都将最终影响到必然的结果^①。《取经诗话》是偶然因素,但直接影响到后世长篇章回小说的必然结果。从更大的方面讲,《取经诗话》不特影响了百回本《西游记》小说,而且还影响了我国小说史的发展方向,特别是神魔小说这一重要小说流派的发展进程,其意义尤显重大。

作为上述观点的论据支撑,我们先对《取经诗话》与史书记载、百回本《西游记》小说进行比较全面的对照,寻找出三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发掘《诗话》作为承前启后的纽带所暗含的线索(见下表)。

^①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序号	作品类别 项目	史传 (以《大慈恩寺三藏 法师传》为主)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上海古籍版影印本)	百回本《西游记》小说 (世本)
1	取经目的	解惑求法	佚	为大唐江山皇图永固
2	取经人	玄奘一人(中途偶尔 有人相送或相伴)	始行六人,后加入猴 行者为七人,实以唐 僧、猴行者两人为主	一师三徒及白马 (取经班子)
3	取经人身份、归宿	旅行家、佛学家;弘 福寺、慈恩寺主持	得道高僧;乘空上仙	御弟、钦差;飞升成佛
4	取经背景	“有诏不许”、偷越 出境	佚	奉旨取经
5	取经目的地	“誓游西方”,实为 今中国西部、阿富汗 以及印度等地	西天竺国鸡足山	灵山、灵鹫高峰
6	取经护法	石槃陀(胡人)	猴行者	孙悟空(大徒弟)
7	取经保护神	无	北方大梵天王	观音菩萨
8	取经对象	西方之精通佛学者	佛主(虚设,远在云 端)	佛祖如来
9	取经障碍	恶劣的自然条件、人 间灾祸(盗贼)	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为主,间有恶 劣的自然条件,人间 灾难
10	历难数	“百千无以备述”	树人国、火类坳、九 龙池等数难	九九八十一难
11	取经时间	十七年	单程三年,回程无考	十四年
12	经卷数	657 部	5048 卷	35 部 5048 卷
13	题材	历史事件	僧讲故事	佛道与神魔相争
14	体裁	传记	话本	神魔小说
15	结构特点	往返详叙	往详返简	三大部分拼合,主体为 蚯蚓结构
16	文采	古奥	简朴	神骏丰腴
17	写作手法	写实记叙	简单虚构	驰骋想象,大胆虚构
18	人物刻画	传主玄奘	主人公猴行者	典型人物孙悟空、猪八 戒、唐僧
19	主题	歌颂唐玄奘取经 伟绩	弘扬佛法	复杂多元主题
20	艺术特色	传记实录	神奇怪诞	再生型神话,浪漫主义

从中可以看出:

(1) 以上二十条项目大致可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取经本事,第一至第十二项;一是对取经故事的表现,第十三至二十项。前者多为事实和情节的要素,后者则涉及艺术创作的规律和特色。各项内容在史传、《取经诗话》、《西游记》小说三者基本上都具备对应关系,或者完全相同,或者有所演化,其中的联系都很明显。如第一项“取经目的”从“解惑求法”到“为大唐江山皇图永固”;第十八项“人物刻画”从传主玄奘到主人公猴行者,再到典型人物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皆有变迁的轨迹可寻。

(2) 就百回本《西游记》小说而论,它与《取经诗话》的关系最为直接。《三藏法师传》虽然被誉为“中国传记中第一部大书”^①,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但毕竟是纪实性文字,属史传范畴,后世《西游记》“借鸡生蛋”,择其唐僧取经本事和史实,但从取经目的、过程和结局诸方面都大相径庭。而《诗话》则处在以上两者的中间位置,承前启后,既有对史传的因袭、继承,又有所改造、创新,具备开启后来小说的发挥、创造功能。从史实上看,它更接近于史传(如《大唐三藏法师传》),从艺术范畴上看,则更向后世《西游记》小说靠拢。如以第七项“取经保护神”为例。作为史传作品,《大唐西域记》和《三藏法师传》中当然尚无神灵,不过唐僧笃信佛教,在危难艰险之际,即念观音菩萨或弥勒佛,《三藏法师传》卷一曰:“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又曰:“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不能复进,遂卧沙中默念观音,虽困不舍。”《诗话》将唐僧的虔诚心理形象化,据此开始出现一位保护神:北方大梵天王,他赐玄奘隐形帽、金钹锡杖、钵盂三件法宝,并叮嘱“有难之处,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当有救用”。取经途中,唐僧果然屡试不爽,仗其神力,成全宏愿。在《西游记》中,唐僧所历磨难大大增多,妖魔也不止限于旁门外道,魑魅魍魉,而且还有来自仙佛道各界,神通广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保护神也随之上升为佛教第二号人物,仅次于释迦如来的“南

^① 胡适《〈西游记〉考证》。

海普陀落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她向唐僧转达如来所赐宝物：锦襕袈裟和九环锡杖。从此以后，唐僧遭险而“免遭轮回”，遇妖而“不遭毒害”。原来的北方大梵天王则退而为天将，即托塔天王李靖化身，偶尔也协助孙悟空降服妖魔，残留着取经保护神角色的痕迹。作为小说，《西游记》当然遵循着《诗话》的线索和方向，两者关系最为密切，从取经本事情节要素到对情节故事的艺术表现，如将两者逐一对照，其情形大都如此。

也有个别例外，《西游记》反而更接近史传。比如“取经时间”，史载唐僧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私出玉门关，经新疆北道，越葱岭，出热海，到达北印度，至贞观十九（645）年返国，计十七年，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赞曰：“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扬我皇之强烈，震彼后之权豪，偃异学之高贵，拔国师之巨帙。各王拜首，胜侣摩肩，万古风猷，一人而已。”唐太宗在表彰玄奘时也明确说：“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①《诗话》则作单程三年，回程无考，如亦作三年计，则合为六年。一般来说，回程时驾轻就熟，时间还会缩短一些。小说则作十四年，更接近史传中的十七年。大约是因为小说作者嫌六年太短，不足以表现取经的艰辛和唐僧师徒不畏险难的精神（佛性），故有此改。不过，仅据此一条，也无以改变《西游记》与《诗话》更为直接、密切的整体关系。

（3）《取经诗话》已有了艺术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但还比较简单，《西游记》则驰骋神思，有意识地展开艺术虚构，并以此来丰富事实链条，编织情节，营造结构，刻画人物。在许多方面，两者前后相衔，一脉相承，有时形异神似，实质相同。如第八项“取经对象”，历史上的唐玄奘为解佛法而“誓游西方”，故而是向佛教发源地古印度之佛学名家学经取宝，尤以那烂陀寺高僧戒贤最为重要，其有姓名记录者还有其他国家僧人多名。《诗话》把这些对象进行集中概括，开始出现虚拟性人物佛主，但佛主很神秘，并不现身，止在云端，至高无上。到《西游记》则进一步全面、完整地塑造成如来佛祖的具体形象。其想象与虚构呈

^① 李世民《大唐三藏圣教序》。

递进、深入的趋势。

应该指出的是,《诗话》中的想象与虚构虽然还比较简单粗陋,有的尚与史实缠夹在一起,但却是《西游记》的先声,其本质上已属于艺术范畴,而不宜与现实等同起来。比如“取经目的地”一项:史传所称的“西方”,实指今我国西部、阿富汗以及印度等地,玄奘所到之处无非求经、讲经、论辩:“玄奘既辨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伏之。”^①可知并无固定、具体的地点。《诗话》首次将取经地具体化为“竺国鸡足山”,小说则作“灵山灵鹫峰雷音寺”。鸡足山见诸辩机《大唐西域记》^②,可见当有真实地名存在。灵鹫峰亦有其地^③。但“灵鹫峰上雷音寺”在作品中,其实是指作者理想中的佛国圣地,完全是艺术虚构的产物。灵鹫峰极言其巍峨高大,“雷(一作来)音”即为如来的声音^④。有论者考证《大唐西域记》所记鸡足山在古代摩揭陀国,但有人认为《诗话》中的鸡足山当为我国云南的鸡足山,所论差异颇大^⑤。其实,鸡足山是古印度佛教的圣地,它与鹿苑、鹤林、给园、鹫岭一样的齐名。佛教有“鸡足守衣”的传说,指迦叶尊者奉即将涅槃的佛祖之命,在鸡足山上守护金缕袈裟,以俟弥勒成佛时传付,而中国云南的鸡足山之出名,也有同样的传说,可知是古印度鸡足山迦叶守衣传说的翻版,显然是古代佛徒的戏作。所以,将鸡足山定为云南,将戏作视为史实,不免误判,玄奘跋山涉水,苦历艰辛,最后是绕道至云南取回真经,不亦滑稽抑或莫大讽刺乎。有论者指出:“因为佛教属多神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而在中国佛教又属于‘舶来品’,所以旧时中国人心中的佛教圣地,其可望而不可即者是西天佛国,其可望而可即者是名山古刹。”实际上并没有类似于基督教之耶路撒冷、伊斯兰教之麦加这样的圣地^⑥。这一观点似不合佛教实际,鸡足山与灵山显系佛教圣地,《诗话》中的鸡足山,《西游记》中的灵山皆有所本。唯小说以灵山

① 《旧唐书·玄奘传》。

② 参见辩机《大唐西域记》卷第九《摩揭陀国下》“二十、鸡足山及大迦叶故事”。

③ 参见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九“二十三、灵鹫峰及佛迹”,中华书局,2000年,第725页。

④ 此解也有佛教上的渊源,谓佛祖说法之音如雷震。庾信《陕西宏农郡五张寺经藏碑》:“法云(雲)深藏,师子雷音。”

⑤ 参见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之《论〈西游记〉的成书》中之介绍。

⑥ 张锦池《宗教光环下的尘俗治平求索》,《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灵鹫峰代替鸡足山,不仅“灵鹫”其名更比“鸡足”高贵,而且它在佛教中的地位更比鸡足山重要。因为后者与佛祖的关系还是间接的,而灵鹫山则是释迦牟尼生前的传教之所。佛祖涅槃后,教徒曾塑佛祖像于其上,且留有圣迹多处,是古代佛教徒最为向往的圣地。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吉栗拖罗矩吒山(唐言鹫峰,亦谓鹫台)……如来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广说妙法……其山顶则东西长,南北狭。临崖西陲,有砖精舍,高广奇制,东辟其户,如来在昔多居说法。今作说法之像,量等如来之声。”^①历史上,玄奘西天取经时不但亲身登临瞻仰,而且与他同时的中国取经僧法显、义净、无行都曾瞻仰这一圣地。当然,不论是《诗话》中的鸡足山,还是小说中的灵山灵鹫峰雷音寺,相对于玄奘取经的目的地而言,都是艺术虚构的产物,只不过后者更神奇精妙,绝非鸡足山之可以比拟。

(4) 尽管笔者已作了最大的努力,但上表所示必定还有遗漏与欠缺。除了笔者主观方面的原因之外,一个现实的原因是:今存《诗话》刊本有缺佚,其中第一节全佚,第八节缺前半节,其余细节、词语方面漏失之处也不在少数,这就必然会影响到其所蓄信息的完整性,从而妨碍它与史传和《西游记》的对照。如第一项“取经目的”、第四项“取经背景”,这两项内容当在《诗话》第一节中有所交代,由于第一节缺佚,故而笔者只得无奈地填上一个“佚”字。不过应予指出的是,从《诗话》全文看,尚有“玄奘取经壮大唐”(第十三节)、“我为东土众生”(第十一节)、“奉唐帝敕命,为东土众生往西天取经”(第十五节)等语,据此可推知:“取经目的”已不是单纯的“解惑求法”,而已有“为大唐为众生”之意;“取经背景”也已完全不同于“有诏不许”、偷越国境,而俨然成为受敕命出使外国的文化使者,胡适曾戏谑之为“阔留学”。前者与《西游记》“为大唐江山皇图永固”相近,后者与《西游记》“奉旨取经”相同。又如第十项“历难数”,史传称“百千无以备述”,《西游记》作九九八十一难,唯《诗话》无法统计,很难表述,因为叙深沙神故事之第八节缺前半节。深沙神出现时已皈依佛教,并化为金桥,助唐僧一行渡过深沙河,这就很难确定该事算不算一难。其余如女人国,

^① 参见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九“二十三、灵鹫峰及佛迹”,第725页。

只不过女王艳羨好意相留:“为我作个国主,也甚好一段风流事。”似也在两可之间。故而笔者只择其中比较典型的历难故事,凡举树人国遇妖术、火类坳遇白虎精、九龙池遇九头鼉龙数难。

无论如何,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相对于唐僧取经来说,这数难也似太少了些。对此,我以为:这一方面说明了《诗话》的谄陋,它还仅是“西游”故事的发轫和雏形。而从另一方面看,这数难意义甚大。首先,它将历史上玄奘所历“此等危难,百千无以备述”^①的情形拟人化了,演化为数个生动、形象的神魔故事,将历难对象由恶劣的自然条件转变为妖魔鬼怪。其次,这数难也为后世《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提供了基本类型,其中树人国一难小行者被施加妖术化为驴子推磨,猴行者又将妖人之妻幻化为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口畔”,直接启发了《西游记》中的各类相生相克的争斗变化。火类坳一难写猴行者钻入白虎精肚中,致其肚裂而亡,则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拿手好戏钻肚术如出一辙。过九龙池遇九头鼉龙时抽龙筋、拔龙须诸般故事,与《西游记》中的龙宫龙王情节显然有着内在联系。应该说,九九八十一难正是从这数难中化生出来,是受其启发,进行不断丰富、扩展的结果。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一点(指难数偏少)也不会改变《诗话》更接近《西游记》的事实,影响我们对两者整体关系的认识,甚至反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者的直接性和密切性。透过数量的表面,胡适认为它是《西游记》唐僧历难的主要来源和缩影,确乎是言之成理的。

我们认为《取经诗话》是玄奘取经求法从历史事件转变为文艺创作的标志,是《西游记》最早的雏形,它们的关系非常直接,在取得上述诸多材料的“实证”之后,还可以从文艺观念、创作原则和规律的角度加以申述,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在几近千年的“西游”故事的流传、演变中,《取经诗话》第一次将史实转化为艺术,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

众所周知,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学、科学等任何文化类型都将受到史学传统的影响。明清章回小说一开始便受到史学的哺

^① 慧立、彦棕《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育,具有浓烈的史性特征。《三国演义》“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其创作原则正是“羽翼信史而不违”^①。《水浒传》所写梁山聚义,历史上也是实有其事,故而金圣叹将其比为《史记》。《西游记》所记唐僧取经更是一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本该有强烈的历史感,但事实上作为神魔小说,其历史特征最为薄弱,胡适、鲁迅评《西游记》的特征为“有趣”、“滑稽”、“好玩”、“游戏”、“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等等,与“羽翼信史”、“正史之补”一类历史观念几乎无关。可见,从《三国演义》至《西游记》,小说观念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突破了小说与史学的单一关系,从对历史的演义发展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整体的反映,小说既可以“实录”历史,也可以超越历史,记人事,述鬼神,或言情,或释理,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可见《西游记》的出现,为后世小说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西游记》之能别开生面,突破史实的制约,其最初的因子无疑在《取经诗话》。《诗话》从内容来源上多为民间传说,取经人所历鬼子母国、女人国、沉香国等皆非真实的人间国度;目的地鸡足山虽是佛教圣地之一,却也是运用“以一当十”的象征手法,来代表取经僧在西天佛国到处漫游取经的历程;所遇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以及深沙神、火类坳白虎精、九龙池九头鼉龙皆为虚拟性人物,非神即怪,与历史无关,虽经改造虚拟,却作为民间传说世代传播^②。当然,唐僧取经本事尚在,但已明显淡化,据学者考证:关于取经的历史缘由可能较多地保留着历史的内容,它大致出现在已佚的第一节中,据全书平均字数估测,此节字数或近二百五十字,在整部作品中只占很小的比例^③。而从形式上看,《诗话》作为宋元之际说书话本,属俗讲而非讲史,它首分章节,已有艺术结构的意识;对异常丰富的传说故事进行大规模的改编、整合;其间诗、话结合,对艺术审美效应有了明确的追求,文学性大大增强。据此,王国维评论说:“(《诗话》)三卷之书,共分十七节,亦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

① 分别引自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② 关于“西游”传说,可参看李福清《古典小说与传说》之《〈西游记〉与民间传说》,中华书局,2003年。

③ 参见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有话,故得此名。”^①关于《诗话》的产生和特点,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解释说:“(取经故事)最早应该是在佛寺中作为‘讲经’内容宣讲,而且会逐步加以神化,所谓神道设教;后来就走出神坛,流向世俗社会和广大民间,并不断加以虚构,终于走向艺术化,成为说唱艺人演出的绝妙内容和热点题材。”

《诗话》偏离了历史,却贴近了艺术,比较合理地处理了事实与虚构(也即“虚实”)这一小说创作的基本命题。鲁迅曾说过:“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需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②《诗话》的创作方法正是“缀合”、“抒写”,而非“实录”,它所追求的是读者受众的快适娱乐,所以要“逼真”、传神、感人,符合艺术真实。而从《西游》文艺演变史来看,《诗话》迈出了根据文艺创作需要而进行全面虚构的第一步,从而实现了由史实到艺术这一影响深远的根本性转化。

其次,首次加入猴行者,替代唐玄奘成为作品主人公,决定了后世《西游记》神魔小说的性质。

胡适对这一点尤为看重,他指出可注意者有四:(1)他(猴行者)知道玄奘曾“生前两回取经,中路遭难”; (2)猴行者现白衣秀才相; (3)花果山是后来小说中有的,紫云洞后来改为水帘洞了; (4)“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一句应理解为“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③。基本上揭示出猴行者的特征:人、神、魔三位一体,身世奇特,神通广大,他一出场,玄奘便退居次席,由他担当主角,诚如《诗话》第二节玄奘答谢诗所说:“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贤。前途若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不过囿于其时的认识水平,胡适并未论及猴行者的出现与后世《西游记》演化为神魔小说的关系。

事实上,由于猴行者的加入并成为主人公,直接影响到作品内容和结构的变化。玄奘是得道高僧,然终为凡人,以人的思维方式感受世界,所以取经途中所见所闻不过是西方异域之道里风俗,所历险难也不外穷山恶水、荒地野林、狂风沙漠等恶劣的自然条件,毒虫猛兽的

① 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

② 鲁迅《给徐懋庸》。

③ 参见胡适《〈西游记〉考证》。

危害,以及缺粮断水、风餐露宿之累。而猴行者的出现,一举突破了真人真事的现实局限,他亦人亦猴,亦仙亦妖,他年龄有二万七千八百岁,“九度见黄河清”,早年(八百岁时)因偷吃王母蟠桃“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这样的人物必然有其自身超越常人的生活逻辑:他能腾云驾雾,变化作法,故而恶劣的自然灾难不足以成为他的对手,必须引入妖魔鬼怪;为了保证取经成功,他到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水晶宫求得护法之宝隐形帽、金钹杖、钵盂各一件,这就使作品引入了神;总之,由于取“法”乎上的原则,一般的所谓得道高僧也只是精通佛理而已,既不能长生,又无诸般神功可言,在猴行者面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何足道哉!所以取经对象必须是一位端坐云中、若即若离的至高无上的佛主。这样,神、佛、魔三者齐集,作品的内容和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完全纳入了神魔小说(雏形)的轨道,并直接开启了后世伟大的神魔小说巨著《西游记》。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西游记》的意义不仅在于促使神魔小说的繁盛,与《封神演义》、《西洋记》、《西游补》等构成中国小说的一个重要流派;更重要的是《西游记》以其匪夷所思的艺术想象、恣肆汪洋的艺术描绘,以及无与伦比、美轮美奂的宏伟结构展示出一个充满自由精神的神幻天地。作为再生型神话,《西游记》正好弥补了中国古代神话不发达,与悠久璀璨的中华文明不相匹配的局面。昔日有日人断言,中华先民居黄河流域,以农立国,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遂致史学发达而神话匮乏^①。自《西游记》出,光芒四射,犹如一颗彗星照耀人类上空,举世公认为是“与荷马的《亚特赛》(Odyssey)一样是有同样迷人的魔力的”伟大神话^②。而这种神话思维的发达,艺术情感的丰富,神魔小说流派的兴盛,追本溯源,都要感谢《取经诗话》的宝贵赐予。

再次,《取经诗话》虽然谄陋粗糙,但其中却隐伏着许多后世《西游记》发展的线索,成为玄奘取经从史实到艺术,特别是向神魔小说转换的中介。

从上表可知所列二十项内容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诗话》与小说的

① 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

②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29页。

关系。当年胡适也从形象与情节两方面揭示出这一关系。比如(列前者为《诗话》,列后者为《西游记》):(1)猴行者发展为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2)深沙神发展为沙和尚;(3)北方毗沙门天王发展为托塔天王李靖,又从中延伸出观音为保护神;(4)火类蚩白虎精是白虎岭白骨精故事的来源,其钻肚术为《西游记》反复采用;(5)猴行者偷蟠桃遭配是大闹天宫的来源;……后来的研究者还依同样的方法列举出若干条,都足以说明《西游记》是如何采纳了《诗话》的成果,遵循它的线索来进行改编、创造而成《西游记》巨帙的。这里,再补充两条以往学者尚未引起重视的材料,稍窥其间深层次关系之一斑。

第一,《取经诗话》中猴行者曾说:“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途遭难。”深沙神也说过:“项下是和尚两度被我吃你,袋得枯骨在此。”这应该是《西游记》“唐僧遭贬”的来源。今存世德堂本无唐僧出世故事,但也透露出如来二弟子金蝉童子因轻佛讲而遭贬为江流儿历难的线索。有学者认为今本《西游记》第九回叙“唐僧出世”故事者为后人妄加;或认为百回本《西游记》原有这一故事,系世本刊落,复有清人依古本补入。诸如此类,多种不同意见各言其理,相持不下。愚意《诗话》中的这一材料,以及它与《西游记》的内在关系,庶几可以作为鉴定这一问题的佐证和参考。此点胡适虽已发现,但并没有意识到它对今本《西游记》第九回问题的价值。

第二,《西游记》第九十八回叙唐僧师徒历经千山万水、九死一生之后到达灵山,迦叶、阿傩两尊者因索人事未果而授以无字真经,作者遂对佛门圣地作了一记不乏幽默的讽刺,不愧为“滑稽之雄”。然这一奇特的艺术构思究其渊源却可溯至《取经诗话》。《诗话》第十五节叙唐僧一行战胜千难险阻终于到达天竺国,其地“香烟袅袅,花果重重,百物皆新,匆匆瑞气”,一派“世间罕有的佛国气象”,唐僧禁不住喜气洋洋。不料笔锋突转,写福仙寺寺主一盆冷水浇下:“我福仙寺中,数千余年,经历万代,佛法未闻。你道请求佛法,法在何处?法在何方?你是痴人!”唐僧三年甘苦,换来的竟是一场空忙,其虔诚敬佛却被视为“痴人”。

将两者对照,其一脉相承、相接相衔的线索是十分显著的。它们都对取经人进行了最后的考验,结果唐僧(《诗话》与《西游记》)佛心

坚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分别从佛祖如来处获得三藏真经,功德圆满。而在艺术表现上也都有一波三折,开阖自如,令人有作山阴道上行,美景瞬变,应接不暇之感。这一点,学术界至今未有论及,窃以为最能体现《诗话》对后世《西游记》的牵引、启示之功,不失为一条“中介”而引导《西游记》的重要线索,值得我们重视。

三、《西游记》杂剧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作用与影响

在中国戏曲史上,明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并非一流典范之作,王国维曲学名著《宋元戏曲史》误其为元代吴昌龄作,并未对其思想、艺术作出评论,庶几可为明证;但它与后世百回本小说吴承恩《西游记》有关,六本规模的杂剧当为《西游记》小说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不过,关于《西游记》杂剧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究竟有何种影响,也即后者在多大程度上吸纳了它的成果,却一直存在不同的评价。鲁迅曾认为杨致和《西游记传》是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①,又说杨本“文词荒率,仅能成书”,故吴本小说“亦采《西游记》杂剧及《三藏取经诗话》(?)”^②。因今存《诗话》异常简略,又有缺失,故在后添有“?”表示疑问,所以实际是只强调了《西游记》杂剧的重大价值。郑振铎也称杂剧“结构很宏伟”,它所述内容虽与后来的小说“颇不相同,然已建立了他们(指杨致和、吴承恩)的骨干”^③,认为它对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影响巨大。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西游记》杂剧对百回本小说的影响“甚为微小”,因为中国戏曲以“唐僧取经”为内容的作品并不太多,又大多在吴承恩本之后,故而就戏曲与小说的相互关系来说,反而是小说一方占主导地位,小说的影响更大,戏曲“很有可能转是从小说来吸收滋养”^④。

自20世纪30年代“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残文)发现,目前学

① 此说后来鲁迅予以更正,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的《西游记》(即杨本)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③ 郑振铎《西游记杂剧》,《中国文学研究》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57页。

④ 严敦易《〈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引自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31页。

术界一般更重视在文体上与小说更为接近的《西游记》平话,郑振铎首倡平话本为《西游记》祖本说,旋即被普遍接受。如刘荫柏说:“在有关取经故事传说的各种小说、戏剧中,最接近吴承恩小说的是元人《西游记》平话,它不但是吴承恩重新加工、创作《西游记》时的祖本,也是杨景贤写《西游记》杂剧时的主要依据。”又说鲁迅先生早年推测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是以《西游记》杂剧为蓝本,加以充实,使之神骏丰腴,宏伟壮观,除了未见《永乐大典》中的《西游记》残文“梦斩泾河龙”,盖源于因袭王国维将其作者误为元初杂剧名家吴昌龄,元杂剧必然影响明小说,这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觉”^①。这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游记》杂剧对后世百回本小说有更多的影响。

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固然各有合理之处,但对《西游记》杂剧的价值,尤其是在小说《西游记》演变、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问题的评价,似也还不够全面和到位,存在一定的盲点和误解,故而有再认识的必要。杂剧与小说是两种独立又相互影响的文艺样式,并在元、明两代并为文学正宗,准确认识两者的整体关系是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前提。又,在百回本《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西游记》平话固然值得高度重视,但它至今未见全本,作为完整的事实,尚需进一步发掘、证实;倘以这一不确定、不完整的“事实”来作为否定客观存在的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的价值和影响,无论其实际情况如何,至少在学理上也还存在疑问。

据明贾仲明(一作无名氏)《录鬼簿续编》载:杨景贤,原名暹,后改名讷,号汝斋,杨景贤又名杨景言,“故元蒙古氏。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锦阵花营,悠悠乐志,与余交五十年。永乐初,与舜民一般遇宠,后卒于金陵”。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载:“永乐初,钱塘杨景言以善谜名。成祖时重语禁,召景言入直,以备顾问。”孙楷第又引周宪王《烟花梦》“钱唐杨讷为京都乐籍中使女蒋兰英作传奇而深许之”,考定他是杭州人,永乐初曾在南京出仕,罢官归杭时,汤舜民以双调“花柳乡中自在仙”告慰送别。今存天一阁抄本《录鬼簿续编》著录“杨景贤《西游记》”。举上述所

^① 参见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前言》。

引,贾仲明与他有五十年相交,对他的生卒行状文学技艺都有详细记载,故而《录鬼簿续编》称“杨景贤作《西游记》杂剧”素为世人所信。全剧即今存《杨东来批评西游记》。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将《西游记》杂剧归在元人吴昌龄名下,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胡适《〈西游记〉考证》和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皆直认吴昌龄作杂剧《西游记》,胡适甚至认为因其有六本二十四折的宏大规模,“元代已经有很丰富的《西游记》故事了”,将其视为西游故事的“第一度大结集”,而吴承恩百回本小说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第二度大结集,“最后的大结集”。这一观点曾被誉为20世纪《西游记》论坛的一大发现,但后来遭到质疑和批判^①。

那么怎么会产生这一张冠李戴的误会呢?1939年,孙楷第特作《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据他的分析,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关于唐僧赴西天取经事,宋元有戏文(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有《唐三藏》,元代有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明初则有杨景贤杂剧《西游记》。南戏《江流和尚》叙唐僧出世故事,今人钱南扬辑得佚曲三十八支,内容从陈光蕊高中状元至殷开山引军剿灭寇贼刘洪止,未及取经过程。金院本《唐三藏》今不传。此两者不可能与《西游记》杂剧混淆。吴昌龄《西天取经》清时始佚,在《万壑清音》、《北词广正谱》、《升平宝筏》、《纳书楹曲谱》等曲谱、曲著中存有多支残曲,今有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辑佚。据钟嗣成《录鬼簿》,该剧题目正名为“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所叙与《西游记》杂剧重叠较多。明初《录鬼簿续编》本有明确记载:“杨景贤《西游记》”,但抄本流传不广,又遭长期湮没。唯正嘉间的文士李开先曾亲见杨景贤《玄奘取经》(今本《西游记》)^②。但后人不察,遂将两剧混为一谈。据资料所记,其始作俑者当为万历间的勾吴蕴空居士,万历四十二年(1614),他购得一部杨景贤抄本杂剧《西游记》(未署名),便将作者误认为吴昌龄,今有明万历刻本“杨东来批评本”即题“吴昌龄撰”。该本有篇《总论》,便是这位勾吴蕴空居士的杰作。其中说:“《太和正音谱》备载元人所撰词目,有吴昌龄《东坡梦》、《辰勾月》等十七本,而《西游

① 参见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和冯沅君《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

② 参见李开先《词谑》。

记》居其一也。”又说：“昌龄尝拟作《西厢记》，已而王实甫克成，知无以胜也，遂作是编以敌之。”紧接着万历四十四年(1616)臧懋循刻《百种曲》(即《元曲选》)，虽未收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但在全书卷首引涵虚子《元曲论·群英所撰杂剧》(也即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目)中，竟称其为六本(《元曲选》不收多本长剧，如《西厢记》)，这也是明确将《西游记》混淆为《西天取经》了。《元曲选》影响巨大，从此后所有曲谱曲著皆认《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昌龄。如天启四年(1625)止云居士选《万壑清音》，再后如孟称舜选《柳枝集》、钱曾《也是园书目》、焦循《剧说》等等无一例外。近世王国维广征博引，又有新证据提出，说：“吴昌龄之《西游记》，其书至国初尚存，其著录于《也是园书目》者云四卷，见于曹寅《楝亭书目》者云六卷。明凌濛初《西厢序》云：‘吴昌龄《西游记》有六本’，则每为一卷矣。”^①胡适雄辩宏论，为吴昌龄大唱颂歌，称“吴昌龄的《西游记》曲，颇有文学的荣誉”，“这种好文字，怪不得曹楝亭那样佩服了”^②。更加以讹传讹，致使误会加深。

孙楷第分析说，之所以引起这样的误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原本不存，传说多谬”；二是“两书都演玄奘事，名称亦容易混淆”，如杨景贤杂剧以《西游记》名世，然而李开先虽亲睹，却在《词谑》中把剧名记为《玄奘取经》；那么，吴昌龄杂剧取名《西天取经》，当然“也未始不可称《西游记》”了^③。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尚古崇名的心理的影响？吴昌龄是元初人，王国维将其列入元杂剧第一期“蒙古时代”曲家，杨景贤是明初人，其时杂剧仅得元人余韵；吴昌龄是元杂剧名家，《元曲选》、《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载有名作二本《张天师断风花雪月》和《花间四友东坡梦》，历来脍炙人口，杨景贤其时声名不显，所著杂剧全部佚失。若要推崇《西游记》，自然会将它挂在吴昌龄名下。尚古崇名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虽先哲时贤，有时也很难完全避免。

杨景贤著杂剧《西游记》真相大白，完全依赖于新史料的发现。天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② 胡适《〈西游记〉考证》。

③ 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引自刘荫柏主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26页。

一阁抄本《录鬼簿》注明吴昌龄杂剧题目正名为：“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与今传《西游记》杂剧不合，可知当为二书；又天一阁抄本《录鬼簿续编》记录明杨景贤作有《西游记》，且杨亦为明杂剧大家，著有《卢时老上天台梦》、《柳耆卿诗酒玩江楼》等杂剧十八种。故而1939年孙楷第在考定本论题时说：这完全是“种种时代环境关系”使然，“这是我们读书便利（指以上新史料的发现——引者注）比前人占便宜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的智慧胜于前人。假使臧晋叔、孟子塞、钱遵王诸公生在现在，见到我们所见到的书，我相信他们一定也能知道《西游记》不是吴昌龄作的”^①。孙楷第的考证严密有力，确凿有据，一扫中外学术界数十年之误，功不可没。

关于《西游记》杂剧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作用和影响，首先可以从戏曲与小说的关系来考察。

杂剧与小说是两种关系最为密切的姐妹艺术，它们在性质上同属叙事文学，在艺术风格与表现形态上同属通俗文学，在作品传播方面又都有城市市民生活色彩和商品经济特征，特别是从发展历程看，它们同为晚出^②，且前后相衔相衍，而又皆在中国文学史上后来居上，各自构成一代文学主流，并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并为文学正宗。因而两者在故事（题材）上相互借鉴、吸收，体裁结构上相互融合、契入，审美情趣上相互渗透、补充，文化精神上相互贯通、传承。李渔称小说为“无声戏”，戏曲为有声之小说，蒋瑞藻《小说考证》也说小说与戏曲“异流同源，殊途而同归者也”^③。黄摩西更将两者视为一体：‘小说为工细白描之院本’（即戏曲——引者注），院本为设声押均（韵）之小说。”^④《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三部世代累积型长篇巨著最为充分地体现出小说与戏曲的这种亲密关系，堪称联系这两大文学门类的三大网结。

① 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引自刘荫柏主编《西游记研究资料》，第726页。

② 小说的成熟在唐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又依据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戏曲的成形在宋元之际。

③ 蒋瑞藻《小说考证·戏剧考证序》。

④ 黄人《中国文学史》，引自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1页。

从元杂剧来看,作为一代文学正宗蔚为大观,据有关资料统计,元代(包括元明之际)有名有姓的剧作家有一百多人,见于书面记载的杂剧篇目有六七百种,今人隋树森推测:“如果包括姓名不可考的(书会才人)以及数量众多的民间艺人在内,当时的杂剧作家比现在知道的当在两倍、三倍以上,而作品的数量,少说也在千种以上。”^①这些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朱权《太和正音谱》曾把杂剧分为十二大类,主要有上古神话传说、帝王开国治世、英雄奋斗成长历程、清官折狱断案、士人爱情婚姻、神仙得道羽化等等。三国纷争、梁山聚义、唐僧赴西天取经都是重大而有普遍影响的历史事件,理所当然地成了元杂剧的对象(内容),前后出现许多作品构成了所谓的“三国戏”、“水浒戏”、“西游戏”三大系列。它们在民间的广为流行,直接开启、影响着明代三大同名小说的产生。而从小说来看,明清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阶段,继承了各个时代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它紧接元代,罗贯中、施耐庵等小说家皆由元入明,深受元杂剧的淫浸、熏陶,有的本身便是剧作家,如罗贯中即著有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又据新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当为元代作品^②,更是有与元杂剧共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遗产。所谓“世代累积型”,是指经过历史记载、民间艺人讲演,最后由文人创编的过程,其中元代杂剧是它们的主要借鉴和来源,一个特殊而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概不例外,从内容到形式诸方面,皆最大程度地吸纳了元杂剧的丰富成果。

但是,结合从杂剧到小说的嬗变、演化,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西游记》杂剧还有自身的特点,这构成了它对后世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先说消极方面:今存与唐僧西游故事相关的杂剧篇目远少于“三国戏”和“水浒戏”。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可知现存杂剧“三国戏”有《关大王单刀赴会》、《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诸葛亮秋风五丈原》等二十一种,残存二种,据今人新考则多达五十多种^③。“水

①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编校说明》,中华书局,1982年。

② 参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③ 参见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4页。

游戏”篇目也相当繁夥,据查考,这些戏曲今能见到的有“黑旋风双献功”、“同乐园燕青博鱼”、“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大妇小妇还牢末”、“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梁山泊五虎大劫牢”、“梁山泊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黑旋风仗义疏财”、“豹子头和尚还俗”,共十二种,另有只存剧目不见剧文的有“折担儿武松打虎”等二十二种。而“西游戏”只在十种左右,且《元曲选》未见,《元曲选外编》收有无名氏《二郎神醉射锁魔镜》、《龙济山野猿听经》和杨景贤《西游记》^①三种,余皆佚失,或只存残文,又有一些作品在剧中间或涉及西游人物和故事,如无名氏《崔府君断冤家债主》等,但数量并不太多。究其原因,西游故事在流变过程中逐渐偏离历史事件的性质,演化为神魔故事,唐玄奘其人至宋代便被神化为“观音菩萨之化身”^②,取经途中关山阻隔、险滩难度的艰辛曲折也转化为与妖魔鬼怪的斗争。而杂剧作为舞台演出用的剧本,受舞台时空条件的限制,很难适合表演非现实、虚幻化的神魔形象和腾挪变化争斗,故而西游故事虽然在民间较为流行,雅俗共赏,但在戏剧舞台上却不繁盛,并与当时僧讲、俗讲的兴盛局面形成强烈的反差。

又,罗贯中、施耐庵为元明之际人,而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为明朝中期人,其生卒年约为1500—约1582年,历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五朝,比施罗两公晚出近二百年。其时,杂剧已经衰落,民间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为通俗小说。吴承恩其人“喜鬼神、性诙谐”,对神怪故事和“野言稗史”即通俗演义小说情有独钟。所以他对元杂剧的接受也就不如罗贯中、施耐庵直接。

由此可见,后世吴承恩在创作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时,他所依托的杂剧资源就不如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施耐庵创作《水浒传》时丰富,纵观这三部小说,其世代累积性在逐渐减弱,其艺术创造性(原创性)在逐渐增强,并终于在《金瓶梅》、《红楼梦》而转变为完全的文人独立创造。这也体现了小说发展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严敦易认为戏曲对《西游记》小说影响“甚为微小”,“吴氏的因袭和利用似乎较

① 《西游记》杂剧为明初作品,但艺术发展具有独立于政权变更的连续性,《元曲选》、《元曲选外编》都收有少量明杂剧,这里也将其统计在内。

② 赞宁《宋高僧传》。

少”,因而“我们对于小说作者吴承恩的创作才能,当可添加一些认识和钦佩”^①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再说积极方面:元杂剧“三国戏”、“水浒传”虽然剧目众多,但没有出现一部整体反映三国、水浒故事的作品,各本杂剧只是分散、局部的一个个小故事,元杂剧对小说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它们的集合效应;而元杂剧“西游记”剧目虽然较少,但杨景贤《西游记》却从整体上反映唐僧西天取经故事,它以六本二十四折的规模,从陈光蕊之官逢盗、江流儿复仇报本,到唐僧奉诏西行,直到完成取经宏业、三藏朝元,演绎了取经的全过程。回溯元初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从现存残曲看,可能也是多本,胡适推测计十出,且《纳书楹曲谱》也题作《西游记》,所以亦当为叙述整个唐僧西游故事。杨景贤《西游记》与吴昌龄《西天取经》,或许存在着内在的因循关系。

这就意味着,《西游记》杂剧对后世同名小说的影响更为集中和完整,其程度是任何一部单本“三国戏”、“水浒传”所不能比拟的。鲁迅推断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是以杨景贤杂剧为蓝本,其可能性是存在的。

众所周知,在文学史上,杂剧与小说相互移植是一种普遍现象,其前提是故事本身的独立、完整。如元杂剧《抱妆盒》被移植、改编为明代小说《百家公案》中的《断斩王御史》,后又再转而移植为戏剧《狸猫换太子》。对照《元曲选》与《三言》、《二拍》,这样的相互移植屡见不鲜,俯拾即是。《西游记》杂剧内容完整,结构宏大,演为长篇章回小说具有必然性。

郑振铎在分析《西游记》杂剧时说:“(它)结构很宏伟,而叙状则没有王实甫《西厢记》那样的细腻。《西游记》人物太多,历险亦杂,故时有匆匆的草率的写过之弊。”^②这段话从两个方面说明了《西游记》从杂剧到小说的演化特征。一是结构特征:元杂剧的结构一般为一本四折,相应于故事的起承转合,但《西游记》的结构为六本二十四折,规模之大当为杂剧之冠。这样的结构极容易改编为小说,以容纳更多的

① 严敦易《〈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引自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第731页。

② 郑振铎《西游记杂剧》,《中国文学研究》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56页。

内容。二是描写特征:杂剧的描写“匆匆草率”,除了“人物太多,历险亦杂”的原因,还在于它对斩妖除怪、腾挪变化之类实在无可奈何,难以作更多更详细的描写。

正是因为描写谄陋,导致了《西游记》杂剧艺术水准不高,不能列于杂剧的优秀之作。《西厢记》也有五本的规模,但它围绕崔张爱情中心,人物、情节都相对简单集中,其内容含量并不比别的一本四折剧本更多,王实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善于进行细腻、深入的描写,使其形象丰腴、体大思精,终于“天下夺魁”。站在小说的立场看,《西游记》杂剧规模宏大、描写草率的特点恰恰为移植、改编为小说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小说是典型的叙事文学样式,最大的长处在于可以从容不迫地叙述故事、描写情感、铺设环境、塑造人物,正可以弥补杂剧这方面的不足。事实上,后世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正是从神魔争斗、腾挪变化这一薄弱环节入手,进行大规模的充实、丰富,由杂剧中女儿国、火焰山等少数几个故事发展为九九八十一难,从而使全书神骏丰腴,逸趣横生。如果说,《西厢记》是从简单的小说唐元稹《会真记》移植、扩充为戏剧名著;那么,吴承恩《西游记》则是将一本普通的元明杂剧演变、发展为伟大的小说巨著。两者都真实地反映出小说与戏曲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亲密关系。

其次,考究《西游记》杂剧的情节内容,可看出它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作用和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应该说,在认清戏曲与小说的整体关系后,再具体对照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和吴承恩百回本小说,那么,前者对于后者的作用问题就显而易见了。

其一,基本树立起后世小说的结构框架。

杨景贤《西游记》杂剧规模庞大,结构完整。清焦循《剧说》卷四说:“元人吴昌龄(实为杨景贤——引者注)《西游》词与俗传《西游记》小说小异。”对此语的理解,胡适以为两者在内容上略同,“小异就是无大异”^①;郑振铎则认为两者在“所述的事实”上“颇不相同”,“然已建立”起后世小说(包括杨致和本与吴承恩本)的“骨干”,即已树立起基

^① 参见胡适《〈西游记〉考证》。

本的结构框架。愚意胡说虽无大错,但以郑说更为恰当。所谓“小异”是指结构。

《西游记》杂剧六本二十四折结构如下:

第一本:题目:湛露尧蓂一叶新,宝筵祥霭丽仙宸,三元同降天王节,万国均瞻化日春。正名:贼刘洪杀秀士,老和尚救江流,观音佛说因果,陈玄奘大报仇。四折为:之官逢盗,逼母弃儿,江流认亲,擒贼雪仇。

第二本:题目:绛坛宝日丽璇霄,淑景当空午篆高,三殿尽如灵宝界,诸天齐降紫宸朝。正名:唐三藏登路途,村姑儿逞鬻顽,木叉送火龙马,华光下宝德关。四折为:诏钱西行,村姑演说,木叉售马,华光署保。

第三本:题目:羲驭流光泰宇清,宝筵初启百花明,云中缥缈黄金相,日下瞻依白玉京。正名:李天王捉妖怪,孙行者会师徒,沙和尚拜三藏,鬼子母救爱奴。四折为:神佛降孙,收孙演咒,行者除妖,鬼母皈依。

第四本:题目:玉宇澄空卷绛绡,紫云声里奏咸韶,认将北斗回金柄,魔利天中走一遭。正名:朱太公告官司,裴海棠遇妖怪,三藏托孙悟空,二郎收猪八戒。四折为:妖猪幻惑,海棠传耗,导女还裴,细犬禽猪。

第五本:题目:万里韶光应节来,三天宝篆彻明开,分明龙女擎珠出,疑是仙人带月回。正名:女人国遭险难,采药仙说艰难,孙行者借扇子,唐僧过火焰山。四折为:女王逼配,迷路问仙,铁扇凶威,水部灭火。

第六本:题目:万里香风下九天,仙真鹤驭尽翩翩,一诚上达祇园地,永保皇图亿万年。正名:胡麻婆问心宇,孙行者答空禅,灵鹫山广聚会,唐三藏大朝元。四折为:贫婆心印,参佛取经,送归东土,三藏朝元。

显而易见,杂剧与小说的内容是有“大异”的,而结构却已基本定型。杂剧由唐僧出世,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徒事迹,取经缘由及过程,三藏参佛朝元四大单元组成,其中唐僧出世占一本,悟空闹天宫、收沙僧占一本,朱(猪)八戒占一本,取经缘由占一本,三藏参佛朝元占一本,取经过程中斩妖除怪故事占一本。后世小说也有四大结构单元:一、孙行者闹三界记;二、唐僧出身记;三、唐太宗入冥记;四、唐三藏西游记^①。两者结构上基本可以呼应,唯前后次序与规模有所调整,小说为了突出主角孙悟空,把孙传放在篇首位置。又,结构中的内

^① 明本《西游记》(百回本)无唐僧出事故事,李时人等认为系世德堂本刊落。

涵有所变动,如取经缘由杂剧作“京师大旱,结坛场祈雨”,三藏奉旨西天取经;小说则改为唐太宗入冥、忏悔,作水陆大会、度亡道场,引起三藏赴佛国求取大乘真经。但都不改变结构上的规定。

而最重要的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主体是取经过程,从第十三回“陷虎穴金星解厄”初出长安到第九十九回“九九数完魔划尽”遭受九九八十一难,共占八十七回,其间四十一个除妖故事大多是吴承恩的独立创作。但归根结底依赖于杂剧预留的空间,其理由前文已有详论,这里不再赘述。

不过,这四十一个故事八十一难八十七回文字既为全书主体,它本身的结构则俨然上升为整部《西游记》的结构。郑振铎把它命名为“蚯蚓式结构”,即“《西游记》的组织实是像一条蚯蚓似的,每节皆可独立,即斫去其一节一环,仍可以生存”^①。这是吴承恩的天才创造。在此之前,我国古典小篇小说已有《三国演义》的网式结构,《水浒传》的链式结构。所谓网式结构,便是经纬相织,纵横交错;所谓链式结构,便是环环相扣,陈陈相因,最后首尾相接成链;加上《西游记》的“蚯蚓式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方式始为齐备丰富。这不能不说是吴承恩为我国小说艺术作出的重大贡献。追本溯源,当然还在于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在结构上的牵引。

其二,《西游记》主要人物全面定型。

在杂剧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是主角,沙和尚、白龙马是配角,前者各有一本文字描写他们的出身、事迹和性格,后者的描写分散于各本之中。这一组人物(俗称取经班子)的全面定型实始于杂剧。前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尚无猪八戒的影子,沙僧也只见雏形,他化为金桥,帮助唐僧渡过深沙河,但并没有成为唐僧的徒弟,参与取经,其情形正类似于其他除怪故事。在后世百回本小说成书过程中,人物越来越庞杂,天庭龙宫地藏,仙岛魔窟妖洞,人物纷至沓来;故事越来越丰富,自然界与妖魔鬼怪、道教与佛教、仙境与人间,故事层出不穷。但取经班子始终相对稳定,唐僧是统帅,行者是先锋,八戒挑担,沙僧牵马,白马去时驮圣僧回时载佛经,贯穿作品始终。其余人物皆跑龙套,穿场而过,所加故事也

^①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不过系一组组插曲,成为整个“蚯蚓结构”中的一小节。假设吴承恩再写二十回文字,再添置十个降妖故事,相信作品还是一般格局,还是这样的取经班子,唐僧外柔内刚,行者心高气傲,八戒狡黠烂漫,沙僧诚实忠厚的性格特征也不会有大的改变。由此可见,杂剧的影响是何等深远,它对百回本小说成书的作用又是何等巨大。

除此之外,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作为《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保留了丰富的原始资料,成为今日《西游记》版本校勘中的一大依据。如唐僧出世故事是鉴别明、清版本的主要依据,意义重大。又如世德堂本第八十二回,地涌夫人吟诗:“蓝桥水涨难成事,祆庙烟沉嘉会空。”其中“祆庙”二字李卓吾评本作“佛庙”。查《西游记》杂剧第五本十七折有“莫不是淹蓝桥、烧祆庙的腌神将”句,故知世德堂本原系因袭循元人典故,李评本因不察而误改,孰是孰非遂有明判。研究显示,这一类情况所在多有,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的价值,故而对之亟须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最后尚需补充两点:(1)曾有人指出,杨景贤比吴承恩约早一百年,但“杨东来批评本”《西游记》杂剧问世较晚,大约在吴逝世后三十年,吴承恩是否看过此剧抄本不得而知。笔者以为:今见“杨东来批评本”并非该剧初刻,其问世时间有大幅提前的可能。又,百回本《西游记》小说作为世代累积型作品,其作者(指参与创编者)不一定只限于吴承恩一人。在这百年间,他们(包括吴承恩)必受元杂剧之影响。据此,此说不足以否定本论题之成立。

(2)目前学术界多以平话本为《西游记》小说的祖本。因为平话与小说在文体上最为接近。又,《永乐大典》所载《西游记》残文“梦斩泾河龙”,内容和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基本相同。而古代朝鲜汉语读本《朴通事谚解》所载“车迟国斗圣”的梗概,又与《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十分相似。笔者认为:《西游记》平话或许存在,但所见只有数则残文、片断,远非全貌^①。而百回本小说在成书过程中具有多个源头,接受了包括元杂剧、话本在内的多方面影响,是积淀了

^① 参见下文《对〈西游记〉平话的再认识》一节之详论。

以往全部丰富的西游故事的最后形态。故而即使平话本果为《西游记》之祖本,也仍然不否认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影响,其价值依然值得重视。

四、对《西游记》平话的再认识

《西游记》平话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第三个标志性成果,代表着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相对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在新时期研究中甚为薄弱。这主要源于其自身情况的特殊复杂性:一方面,它作为客观存在的平话事实已被确定,在今见谚解本(残文)中明确称《唐三藏西游记》为“平话”;另一方面,由于其全本基本佚去,目前仅见《永乐大典》和《朴通事谚解》所录两段残文“魏徵梦斩泾河龙”和“车迟国斗圣”^①,所以其基本面貌模糊不清。除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60年代赵景深分别对这两个片断作过初步评述外,对这一《西游记》古本似乎一直未展开专门的研究,一些文学史或小说史著作往往采取一笔带过的方法,或含糊其词,或语焉不详,甚或以讹传讹。对此,笔者以为《西游记》论坛亟须关注并展开行之有效的研究。以下例证或可见出目前认识的肤浅,以及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其一,2000年新世纪伊始,学界曾公布一项“新发现”。有消息称在明《永乐大典》中发现了《西游记》(平话)的残文^②,诧为奇事。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著作《〈西游记〉的演化》时已有所披露:1930年北平图书馆善本室度藏的传抄本《永乐大典》中,其13139卷“送”字韵“梦”字条下,录有一则长达千余字的“魏徵梦斩泾河龙”,引书标题径作《西游记》,并摘录了这则《西游记》平话(残文)的全文。经有关专家指认,发布这一消息的《图书馆建设》杂志不久刊出署名文章,澄清事实,称“《永乐大典》中发现《西游记》不是新闻”^③。如果稍

① 或以为三段,即以20世纪30年代于宁夏发现的《销释真空宝卷》所刊“唐僧西天去取经”一节为《西游记》平话片断。聊备一说。又,据张锦池推测,朱鼎臣《西游释厄传》卷四所载唐僧出世故事实为平话本《西游记》的又一则残文。

② 参见张忠辉《〈永乐大典〉中发现〈西游记〉》,《图书馆建设》2000年第1期。

③ 参见郎蓓《〈永乐大典〉中发现〈西游记〉不是新闻》,《图书馆建设》2000年第6期。

有对《西游记》平话的了解,就不至于闹出这样失之肤浅的笑话。

其二,60年代初期赵景深著文《谈〈西游记平话〉残文》,对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平话^①故事“车迟国斗圣”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辨析,对于后人进一步认识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但其中称“谚解本断片中还有八条相关注”明显有误:现已有学者指出“《谚解》介绍《西游记平话》的注释只有七条,且其中只有两条较详”^②;又有学者指出:“《朴通事谚解》中所叙及的有关《西游记》平话的具体故事,其实只有一节‘车迟国斗圣’的简扼梗概,但是文中有九条注文,却颇为广泛地介绍了该平话的主要故事情节。”^③所言注释条数均与赵文有偏差。笔者经过逐条核对,可确定实为九条,其九条注释的内容依次为:①三藏师傅(父)、②西天取经、③刁蹶、④证果金身、⑤唐三藏西游记、⑥孙行者、⑦烧金子道人、⑧揭地、⑨二郎。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自赵文以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和小说史著作皆沿袭赵说误为八条,对文学史撰写有重大突破的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亦依然称“古代朝鲜的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还有八条注文,述及取经故事的有关情节,与今传百回本《西游记》互有异同”^④。

当然,就目前条件要对《西游记》平话的相关问题作出准确而深入的揭示确乎还有困难,在平话全本或更多的片断发现之前,这种困难将一直存在。然而如果能将迄今为止(以新时期为主)散见于学者们各类《西游记》著述中的有关看法汇集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去芜存菁,求同存异,则颇有助于对《西游记》平话的进一步认识。笔者经过一番爬罗梳理,抽绎、归纳出几个问题,现予胪列评述如下:

(一) 关于今见两则残文是否出于同本平话。

“梦斩泾河龙”今见于明《永乐大典》,“车迟国斗圣”保存于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按一般的理解,《永乐大典》与《谚解》没有任何关系,又《谚解》经过高丽人改写,已改变了“平话”的原

① 关于平话本目前或称为《西游记平话》,或写作《西游记》平话,考虑到《朴通事谚解》实际所称是《唐三藏西游记》,平话只是它的文体,故笔者采用“《西游记》平话”这种写法。

② 李正民、宋俊玲《关于〈西游记平话〉的几点考辨》,《晋阳学刊》1997年第3期。

③ 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④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1页。

始面貌,所以两则残文是否出于同本平话就成了问题。目前有三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黄永年在为《西游证道书》校点本所撰、旨在“介绍《西游记》的成书经过,特别是百回本出现后多种版本之间的渊源递嬗”的长篇《前言》中提出:两者出于同一本平话,“是同一个东西”。其理由为:《朴通事谚解》是朝鲜肃宗三年(清康熙十六年,1677)刊行的汉语教科书,系用崔世珍的《朴通事》和《朴通事集览》即《老朴集览》合编而成。《朴通事》中有步虚和尚在燕京永宁寺说法的记载,可推定其成书当稍后于元顺帝至正七年;《老朴集览》中有“永乐中于北平肇建北京为行在所,正统中以北京为京师”之语——这就与“永乐”、“北京”等特定的时间、地点发生了联系,这样,《永乐大典》和《朴通事谚解》所录的两则《西游记》残文属同一平话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①。第二种意见以蔡铁鹰、李时人为代表,认为两则残文都属于平话体,但并非出于同一本平话。蔡铁鹰说:“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永乐大典》和《朴通事谚解》保存的《西游记》片断属于同一作品。不过因其形态相近,习惯上将其称为《西游记平话》。”李时人也说:“从各个方面考察,虽不能证明这两者同出于一个本子,但同属‘平话’还是可以确定的。”^②还有第三种看法持犹豫不定的态度,发端于胡士莹写于60年代而出版于新时期之初的《话本小说概论》,他在全文引述这两则平话残文后说:“《朴通事谚解》所根据的《唐三藏西游记》,和《永乐大典》所引的《西游记》或许是一个本子。不过《朴通事谚解》所引的是经过朝鲜人改写的,因而文字风格就不一致。”^③结论颇为踌躇婉转。

这三种意见各有一定的道理。肯定者立足于两者之间的联系,不过黄永年提供的证据似乎不够直接,且不免是个孤证。否定者则基于目前所有的材料(即“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忽视了今后或有可能出现新证据的趋势,故其论断它们不是同一平话似乎为时过早。相对而

① 据黄永年称,这一理由来自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的考证。参见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② 蔡铁鹰《整合的历程:论唐僧形象的演变——兼及中国小说演变过程的理论意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李时人《〈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的形象渊源》,《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9页。

③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第300页。

言,第三种看法比较稳妥,既看到两者相同的平话文体,也照应其文字上的不同风格。笔者以为:联系宋元间平话发达的实际,它们或有可能类似于《三国志平话》与《至元新刻全相三分事略》的关系。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在日本天理图书馆发现的《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内容基本相同,唯早于《平话》刊刻,且内容更为简略罢了^①。与此仿佛,《永乐大典》本与谚解本应属于同一系统的两个刊本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仅止于推测臆断而已。

(二) 关于《西游记》平话出现的时间(年代)。

最早论述《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平话(残文)的郑振铎推测比较笼统:元代中叶。但《平话》出现的时间直接影响着《西游记》演化历史的格局,特别是它与《诗话》、《杂剧》等阶段在这一整体格局中的排列次序,理应予以仔细辨析和确认。

众所周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系宋代“说经”话本^②,现有人考证“它可能在晚唐、五代就已成书,实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③,其远早于平话本是无疑的。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今存杨东来批评本,刊刻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又,杨景贤为元末明初间人,其所作杂剧不会早于元末。所以推定平话本的时间,其关键主要在于它与《西游记》杂剧孰前孰后的问题。如果“梦斩泾河龙”与“车迟国斗圣”两段残文不属于同一个平话,那么问题将变得十分复杂;如果推定为同一部平话,或者存在较多的讨论余地。

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赵景深在《谈〈西游记平话〉残文》中说:“《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之间,应该有一种作品,比《西游记》简单,却比《西游记杂剧》复杂。”这就是说《西游记》杂剧在前,《西游记》平话在后。李时人说得最为明确:“这部平话的成书是《杂剧》以后的事情,它可能刊于元末,是西天取经故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标志。”^④另一种意见与之相反。胡士莹认为《西游记》平话是“元末明初以前

① 参见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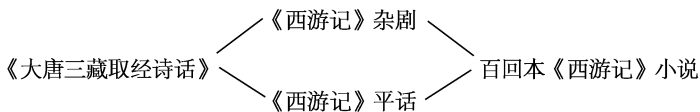
② 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胡士莹《话本小说史》、陈汝衡《宋代说书史》皆持此说。

③ 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④ 李时人《〈西游记〉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9页。

的产物”，其写作时代“当在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之后，元末明初杨讷《西游记杂剧》之前”^①。石钟扬甚至将它提至元前期杂剧名家吴昌龄之前，他指出：“《西游记》平话，如是元末明初之作，其理当可与《三国志演义》比美，而从现存残文窥及它不但远不及《三国志演义》，甚至尚比吴昌龄所作《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幼稚，而仅仅可与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所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携手，因而它只能是元初作品。”^②

辨析这两种意见，实际上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西游记》杂剧作为一个发展阶段，从元前期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今佚）到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有长达近百年的时间跨度，产生于元明间的《平话》或有可能处于两者之间，即胡士莹所谓处在吴昌龄之后杨景贤之前。又，考虑到《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永乐五年（1047），《朴通事谚解》刊刻于清初康熙年间，其间多有称引元后期著作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其序言写于1366年），所引《西游记》平话“也应是元代后期、最迟也是明代初年的作品”^③。据此笔者以为平话大约与杨景贤杂剧同时，这样，自唐宋以来世代累积的西游故事从话本与戏曲两种民间文艺的不同流向，对后世百回本《西游记》都实施了影响。应该说，这比较符合话本、戏曲与章回小说三者的基本关系。关于《诗话》、杂剧、平话、百回本《西游记》小说的排列次序应该为：



（三）关于《西游记》平话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最经典、至今也最有影响的论述当推郑振铎：

这样，《西游记》的源流，是颇可以明了的了。最早的一部今曰《西游记》的祖本，无疑的是《永乐大典》本，吴承恩《西游记》给这“古本”以更伟大、更光荣的改造。^④

①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303页。

② 石钟扬《虞集〈西游记序〉考略》，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2辑，1988年，第75页。

③ 参见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④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这一论断不仅明确指认了《西游记》的“祖本”,同时也提出了平话本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影响这一论题,其后有许多学者遵其线索作出了诸种论述。如胡士莹指出:《朴通事谚解》所引平话“把这个古本《西游记》取经部分的轮廓都写出来了”,“吴承恩《西游记》中的重要情节,在这里大体上都有”^①。刘荫柏说得更为明确:“最接近吴承恩小说的是元人《西游记平话》,它不但是吴承恩重新加工、创作《西游记》时的祖本,也是杨景贤写《西游记》杂剧时的主要依据。”^②李时人也认为“关于西天取经主体故事,《平话》的发展最大”,他还指出平话的最大贡献在于强化了孙行者的形象重心,“随着取经路上破魔斗法情节的增加,《平话》中的孙行者的活动大大增加”了^③。可以说,孙悟空成为《西游》作品中的真正主人公当是从平话本开始的。蔡铁鹰将平话与《西游记》相关(相对应)的情节内容作了周详的对照,充分说明了两者的渊源关系,从中可清晰地看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现对其稍事修改列表于下,以清眉目:

书名 内容	《西游记》平话	吴承恩《西游记》
闹天宫 部分	悟空身世(猴精)	悟空身世,学艺(石猴)
	偷蟠桃,偷老君灵药,偷王母绣衣	偷蟠桃、仙丹,反天宫
	天兵失利,二郎神捉大圣	神兵征讨,受封大圣,被二郎神活捉
	被压花果山	斗法失败,被压五行山
太宗入冥 部分	魏徵梦斩泾河龙	(皆同左)
	(当有)太宗入冥,玄奘设会说法	
取经 部分	当有收悟空、八戒、沙僧及有关龙王事	两界山收悟空,鹰愁涧收龙马、收八戒、收沙僧
	师陀国、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棘钩洞、火焰山、薄屎洞、女人国、车迟国	黑风山遇熊精、黄风怪、乌鸡国狮子怪、红孩儿、女人国、火焰山、稀柿峒、蜘蛛精、多目怪、比丘国、地涌夫人
	参见如来,取经东回	参见如来,取经东回

①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302页。

② 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前言》。

③ 李时人《〈西游记〉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9页。

在蔡铁鹰对此表说明中可注意者有二:(1)吴作《西游记》前面大半部分与平话大致相似,基本上是在平话的基础上扩大而成,但至八十三回以后,平话提供的材料告罄,吴承恩便独立创作了十五回九个故事。(2)吴承恩写作《西游记》没有突破平话提供的情节轮廓,特别是“太宗入冥”部分,与平话几无差异,其后续故事与前面部分相契无隙,唯以文采秀丽、言谈幽默、神韵丰腴而见长^①。对此,笔者还要补充第三点,所谓“祖本”的内涵、外延与“影响”完全不同,分属两个论题:祖本指向版本流变,而影响包括《西游记》的全部源流问题,包括版本嬗递,其中尤以故事(情节)的相互沿袭流变最为重要。上表所列要旨即在展示平话与后世百回本小说在情节上的流变轨迹。

新近出版之萧欣桥、刘福元所著《话本小说史》对这一论题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释。据该书所述,《西游记》平话对后世百回本《西游记》小说的影响有以下四个方面:(1)《西游记》中的许多“非常特殊”的人名、仙名、佛名、妖名、地名、国名皆为平话本首创;(2)《西游记》小说的许多故事内容和情节细节,“直接或间接地袭用于《西游记》平话”,或由调整、充实、改编而成;(3)平话与百回本皆为小说体裁,在阐述故事的方法和技巧上有更多的联系和“共通之美”;(4)《西游记》全书由三大板块(大闹天宫、太宗入冥、西天取经)组合的立体结构在平话本中已“初露端倪,大体确立”。据此,该著就平话本对后世百回本小说影响,概括如下:

《西游记》平话的出现和刊行,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玄奘古印度求法由历史故事向文艺创作的标志,在“西游”故事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意义是开拓和确立了文艺创作的方向;那么,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的成果,便是《西游记》平话。它为小说《西游记》的成功改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说得具体一些,《西游记》平话即使不是《西游记》小说加工改编时所直接使用的底本,也肯定存在着某种间接的祖源关系,即小说《西游记》是以某种《西游记》古本或《西游记》词话本为底本,而该《西游记》古本

^① 参见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249页。

或《西游记》词话则以《西游记》平话为底本演变而成。^①

纵观这些评论,都强调了《西游记》平话在《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重大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从整个《西游记》源流来看,结合它与《诗话》、杂剧在《西游记》演变格局中的排列次序,似乎也还存在一些疑问。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平话本遭长期湮没,目前仅见两段残文,其中“魏徵梦斩泾河龙”一千二百字,“车迟国斗圣”不足四千字,两者相加也只占全本的十分之一(参考宋元时代《全相平话五种》,推断其全本字数当在五万字左右)。我们掌握的原始资料实在还很贫乏,目前所作的一些评述,事实上还包含有许多推测臆断的成分。其中有些论断是根据现有的诸多线索、结合文学发展的规律演绎而出,有的则不免缺少直接、有力的证据。比如以平话本为《西游记》的祖本,“杨景贤写作《西游记》杂剧时的主要依据”,就值得商榷。自80年代开始,陈新撰写了系列论文,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②。从小说发展的规律来看,平话固然最有可能成为后世同类章回长篇小说的直接源头,如《三国志平话》之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但也并非一概如此,比如《武王伐纣书》(平话)之于《封神演义》,后者虽源于前者,但它的故事格局和叙述方式,却非直接承袭平话,而更接近于余邵鱼所作的《列国传》^③。至于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的蓝本,据笔者管见,更有可能是元前期杂剧名家吴昌龄的西游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其最终佚失,本来就与两者夹缠有关^④。《西游记》作为世代累积型著作,理应具有多个源头,其直接的影响来自于民间说书(俗讲)话本和戏曲(杂剧)两个不同的流向。现在,杨讷(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全本(六本二十四折)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俱在,唯《西游记》平话逸佚,故而要对其作出全面、深入的认识,确乎还任重道远。

① 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

② 可参看陈新《〈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整理后记》(《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卷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重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地位和价值》(《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③ 可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744页。

④ 参见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

第九章 《西游记》作者与版本论

一、旷日持久的《西游记》作者之争

由于《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作品,所以其“作者”与通常理解似应有所不同,特指在漫长的民间文学基础上将“西游”故事改编为百回本小说巨著的某一文人。而实际上在整个演化过程中,不排除大量民间艺人的参与创造。

《西游记》作者问题十分复杂。当年郑振铎曾表示疑惑:“《西游记》是创作的呢?还是将旧本放大的?”即是说,《西游记》作者的地位,“到底是一位曹雪芹呢?还是一位罗贯中?”^①即使把作者限定在百回本的最后改定者,问题仍然很复杂。从历史上看,其作者归属(署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今见明版以世本为代表的三种“华阳洞天主人校”本皆不署作者姓名,世本陈元之《序》中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又说:“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虽然提供了一丝线索,但没有具体坐实何人所作。稍晚的李评本卷首载有《题辞》、《凡例》,且有大量评点文字,然均不涉作者,甚至没有任何可以推测作者的蛛丝马迹,可见也不知《西游记》作者其人。这种状况延续至清初,《西游记》作者佚名大约在近百年间。这是第一个阶段。造成作者佚名的原因,大抵一为当时小说地位低下,二或许是作品有所指称^②,《西游记》

^①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② 参见苏兴《〈西游记〉对明世宗的隐寓批判和嘲讽》,《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作者才不愿或不便署上自己的真名。

清初康熙年间,汪澹漪笺评本《西游证道书》首倡作者为元初道士邱处机(邱本作丘,因避孔子讳改)。其卷首置有假托元代大文豪虞集《西游记原序》,中云:“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浹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而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汪氏还在《原序》后置《邱长春真君传》和《玄奘取经事迹》两文,三者相互印证,致使后人深信不疑,复经此前后陶宗仪、毛奇龄等人渲染,“邱作说”从此风行于世。当然,其时也有人表示怀疑,如纪昀发现《西游记》中多涉明制(如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而断其“为明人依托无疑”^①;钱大昕考出《长春真人西游记》是别一部关于西域道里风俗的地理书,遂讥讽“邱作说”为“郢书燕说”^②;另有人提出了一些新的作者姓名,如桂馥《晚学集》提出为元人许白云,陈文述《西泠仙咏自序》认为《西游记》“所言多与《性命圭旨》相合”,作者当为“作《圭旨》之史真人弟子”。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引起大的反响,“邱作说”遂成主流,此后的各种清刊本皆沿袭此说,甚至有直署“邱真君著”,或书名作“《邱真人西游记》”者。伴随“邱作说”,《西游记》证道说亦由此发端。这是第二个阶段。

五四时期,鲁迅、胡适和董作宾等人根据清人提供的线索,多方搜寻史料(如天启《淮安府志》、《山阳志遗》、《茶余客话》等),经过综合考证,反复论辩,先是批驳了“邱作说”这一“不根之谈”,剥去长期以来被邱处机“冒名顶替”占据的著作权,最后论定《西游记》为淮安儒生吴承恩所作。30年代又有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进行不断引证、申述,从此,“吴著说”几成学界共识,以后刊行的《西游记》作者均署为吴承恩。这是第三个阶段。当然,针对“吴著说”的不同意见也时断时续,在国内先后有颠公《〈西游记〉为明人吴承恩所作之异说》、

① 参见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五“如是我闻”。

② 钱大昕《长春真人西游记跋》,《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

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俞平伯《驳〈跋销释真空宝卷〉》、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西游记研究资料》等,国外有日本学者小川环树《〈西游记〉里吴承恩的改作》、太田辰夫《〈朴通事彦解〉所引〈西游记〉考》、《〈西游记〉杂考》等或表示怀疑,或提出异议,只是其影响尚不足以动摇、颠覆“吴著说”的主流地位。

进入新时期,在《西游记》作者问题上纷争骤起,且经久不息。先是海外学者(如港台地区的张易克、陈志滨、陈敦甫,英国杜德桥,日本太田辰夫、田中严、矶部彰、中野美代子,美国余国藩等)在不同场合不断地对吴承恩著《西游记》一说发表了许多不同意见,终于在1983年以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①一文为标志,对“吴著说”提出全面质疑。其主要观点为:“明清的各种《西游记》刊本没有一部署明此书是吴承恩所作;天启《淮安府志》虽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但并未说明《西游记》是通俗小说,而且,天启《淮安府志》的编者是否会著录一部通俗小说也是问题;复参以《千顷堂书目》,吴作《西游记》当是游记性质的作品,大概是记述其为荆府纪善时的游踪的;书中的方言,情况复杂,根据现有的材料,只能说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是百回本以前的本子就有的,百回本倒是增加了一些吴语方言,因此,它不但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倒反而显示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吴语方言区的人;至于其他几条欲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旁证,似也都不能成立,有的甚至可用为非吴承恩作的旁证。”

章文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西游记》论坛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许多学者奋起响应,并迅速形成反对与赞成两种泾渭分明的学术观点。几乎在第一时间里,在同一刊物,苏兴发表长篇商榷文章《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②,与之展开争锋相对的论争。他逐条回驳了章文的质疑,最后总结为:“天启《淮安府志》的《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指百回本小说;明刻《西游记》虽未署作者名,却由陈元之的《序》透露出作者是‘八公之徒’,与吴承恩身份合;其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是吴承恩友人李春芳,证明作者是吴承

① 该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② 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恩。”他强调“这几点论证是根本性的”，章文并未动摇。接着，除了章培恒先后在《复旦学报》和《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再谈”、“三谈”该论题文章之外，又有杨秉祺《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所作》^①，陈君谋《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②，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③，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④，从不同方面赞同、声援章培恒的观点；“反对派”中激烈者则为谢巍、彭海、蔡铁鹰，谢巍在《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连续发表文章，与章培恒展开激烈论争，并对吴承恩著作权进行有力的辩护。据粗略统计，参与这场论争的学者先后达数十人之多，其中发表重要论文的有黄霖、张锦池、蔡铁鹰、刘怀玉、张乘健、杨子坚、李安纲、彭海、吴圣昔、陈君谋、刘振农、宋谋瑒、廉旭等人。

这一次论争与以往关于《西游记》作者署名的三个阶段相比，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论争双方势均力敌，从1983年章文引发至今，几乎贯穿整个新时期，犹如潮涨潮落，纷争不息，目前仍处于相持不下的胶着状态，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其间的论争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80年代主要是苏兴、谢巍与章培恒之间的争论，90年代则主要由李安纲与许多“吴著说”拥护者展开深入的论辩。在过去，即有过论辩，但总体上呈一边倒之势。如清初“邱作说”势盛，虽有钱大昕、纪昀等著名学者提出异议，但根本不足以对其有任何动摇。五四时期，鲁迅、胡适以其新文化旗手的影响，复加精深的考辨工夫，“吴著说”几成“铁论”，“邱作说”溃不成军，反对意见几乎杳无声息。这一次论争，无论是持“吴著说”，还是“非吴著说”，甚而“邱作说”，大凡参与讨论者都怀有严肃的学术态度，重事实，善分析，恪守学理和学术规范，不唯名家，不拘成说，将自己的观点申述得十分充分；不过，由于论题的复杂性，双方虽主观上试欲以理服人，而效果上非但不能“服人”，反而遭至对方更激烈的反对的情况也时有所见。旷日持久、愈演愈烈，而又相

① 载《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

② 载《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③ 载《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④ 载《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持胶着,终成《西游记》论坛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第二,随着论争的深入展开,关于作者问题的探索由过去的单一认定逐渐向多元推断转化。这是新时期作者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在以往,说《西游记》作者非吴即邱,以单一认定为特点,涉及面也不广,大抵不出邱处机、吴承恩两人,而在新时期特别是现阶段,除了坚持“吴著说”以及重提“邱作说”之外,还有多种情况并存:第一种情况是对吴承恩持怀疑态度。如章培恒,作为争论的发起者,其文立足于对原始史料的审视,且都针对“吴著说”赖以立论的关键问题,极富学术性,极富冲击力,但究其宗旨却止在怀疑,着重于对“吴著说”提出质疑,并不急于下判断、作结论,只是询问在吴承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或是更合适的人选存在(其观点如上,这里不再赘述)。第二种情况是坚决否定吴承恩,正如鲁迅、胡适当年坚决否定邱处机一样。这可以李安纲为代表,他在《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等文中径直以为吴承恩“冒名顶替”,“绝对不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其理由主要是:(1)创作《西游记》这样的皇皇巨著,需“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才,又复若干年点窜”,吴承恩一生忙于科举做官,“没有写作《西游记》的时间”;(2)他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演金丹大道之作,“吴承恩是一位儒生,没有接触过玄门释宗,没有学过佛修过道,家中没有佛道之书,更不要说读过《道藏》了”,所以没有这样的才能;(3)吴承恩现存有诗文集,还有大量亲友写的纪念文字,“但都没有提供什么关于《西游记》的线索”,他不可能在别人不知不觉中写成这部巨著^①。这些理由乍看言之凿凿,其势滔滔,比之章培恒当年提出的问题要尖锐、深入得多,但仔细推究却总觉没有章文审慎严密、合乎逻辑,其所论并非铁证,正如有论者指出,即使是写道教小说,也未尝一定要添置《道藏》;创作文艺作品也完全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难道非得像如今一些浮躁浅薄的作家那样大肆“炒作”?至于时间,更是一个弹性概念,立志刻苦就有时间,否则再长的寿命也是白驹过隙,蜉蝣历世,“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岁月蹉跎,悲守穷庐”。如此一来,“新论”顿成空论,

^① 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以致被认为“谬误”,招致了不少批评。如刘振农针对李安纲关于吴承恩诗文集“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西游记》的线索”,“观其一生,他的朋友、亲戚和晚生,都不曾知道他写过什么《西游记》白话小说”,因而不是作者的推论,提出尖锐的诘难:“如果吴承恩不能在不知不觉状态中完成,那么别人何以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呢?李君认为《西游记》是某位宗教高人为了阐明金丹大道而进行的‘教旨文学化’的努力,但当时宣传金丹大道既非反动言论,该本著作又不在禁书之列,署上名字只能增加对信徒的号召力,何以这位高人还要深藏密隐,等待后人来发掘他的大名呢?”^①这一诘难使李安纲面临这样一个悖论:如果《西游记》作者一定要满足被人知道的条件,那么实际上就取消了《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因为在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之前,人们确实不知道有谁写过《西游记》;反过来说,如果当时果真有人知道是谁写作了《西游记》,比如在最早的世德堂本上署上他的大名,就像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直书“后学罗贯中编次”一样,那么,还需要我们今天来饶舌不休?

还有第三种情况则是试图绕开邱、吴纠缠,另辟蹊径,寻找新作者。这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种类型是将作者定为“华阳洞天主人”。明本《西游记》虽然皆不署作者姓名,但世本、杨闽斋本和唐僧本都题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在编、校职责不分的古代,这位“华阳洞天主人”极有可能正是《西游记》的作者。如沈伯俊认为“从古代小说题署的惯例来看”,也有将作者题为“校阅”、“校正”的实例,故世本题“华阳洞天主人校”,“确实存在即‘华阳洞天主人著’的可能性”^②。关于华阳洞天主人的身份,则众说纷纭:陈君谋、张锦池认为是陈元之(陈君谋《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载《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张锦池《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载《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孟宝林、沈承庆沿袭苏兴的看法,认为是李春芳(孟宝林《华阳洞天主人与吴承恩》,载《西游记研究》第2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1988年;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孙

① 刘振农《再论〈西游记〉的作者与性质——兼评当前〈西游记〉研究中的一种“新说”》,《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② 沈伯俊《〈西游记〉作者补论》,《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国中则指认为刘渊然(《〈西游记〉作者初探》,《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当然也还有论者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就是淮安儒生吴承恩(刘怀玉《世德堂本〈西游记〉所署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吴承恩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第二种类型则是根据已有的线索探寻全新人选。鉴于“吴著说”与“非吴著说”一时难下定论,一些学者呼吁另辟蹊径,“重新考虑《西游记》的作者问题”,“不要再纠缠于究竟是不是吴承恩的问题,而是应当努力寻找出吴承恩之外的真正的作者”^①。如孙国中虽然指认华阳洞天主人即《西游记》作者,但提出了一个新人选:明代高道、明仁宗赐号“长春真人”的刘渊然。李安纲从清人陈文述《西泠仙咏自序》中“世传《西游记》则邱祖门下史真人弟子所为,所言多与《性命圭旨》相合”等语中引申出来,对所谓“史真人弟子”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推测。认为两书在思想上完全一致:《性命圭旨》是道家经典,《西游记》则是金丹大道的“文学化”,所以“二书的作者可能是一个人”,并在稍后随即提出二书作者均为唐新庵。他辨析、论证说:“据震初子余永宁常吉的《刻性命圭旨缘起》云:‘里有吴思鸣氏,得《性命圭旨》于新安唐太史家。盖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也。藏之有年,一日出示丰干居士。居士见而悦之……因相与公诸同志,欲与一言为引。’……署曰‘万历乙卯’,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可见,是书出自唐太史家,由吴思鸣与丰干居士共同刊行……思鸣即之鹤,唐太史即唐新庵,为吴第舅氏……我们倒倾向于唐氏所作。他曾为太史,深通儒学星占、星历阴阳,在仙风大炽的嘉靖时代钻研佛、道,亦为易事;而且那么多的丹经梵典,也只有在朝廷的书库中才能读到。其著述的时间,可能是在家时。因为在朝时,亲眼所睹、亲耳所闻过因劝讽皇帝禁止方术外道而被杖死严惩的事例,所以会在朝廷为官时收集资料和构想,居家时再整理编撰成书。由于心有余悸,不敢署名,而托为尹真人之弟子所著。这事吴思鸣肯定是知道的,书是他从舅家拿出来的,为什么不早早付梓,而要‘藏之有年’呢?很简单,书的主旨在于移风易俗,有碍

^① 参见沈伯俊《应当重新考虑〈西游记〉的作者问题》,黄霖《应当努力寻找出〈西游记〉的真正作者》,均见于胥惠民等撰《2000年〈西游记〉与神魔小说研讨会综述》,《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3期。

当政,必须等到适当的时候,所以在万历四十三年才将它拿出示人。”^①称引史料颇为翔实、新鲜,推论也比较合理、严密,但我们注意到其立论在所谓“金丹大旨”之上。最近又有胡义成连续著文,据宋代邱处机的再传弟子长春观观主卢志清所撰碑文推断《西游记》的祖本《西游记》平话出于全真教创始人邱处机麾下华山道人史志经之手。而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居于江苏茅山乾元观的全真道龙门派道士闫希言(闫蓬头)则是今本《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②。《西游记》名花有主,且“花落道士家”,其立论方法与李安纲如出一辙。

在这些提出的新人选中,有较大影响和有说服力的或许是黄永年提出的鲁藩或藩府宾客说。他在《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一文以及《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中,根据世本陈元之《序》中关于《西游记》作者与明代藩王府有关的线索,结合明人周弘祖目录著作《古今书刻》山东鲁府刻有《西游记》的记载,首次推测《西游记》出于山东鲁府,作者当为鲁藩王或鲁藩府宾客。他根据明代周弘祖《古今书刻》的有关记载,指出:“《西游记》百回原本的初刻本是山东鲁王府刊刻的藩府本,刊刻的年代在嘉靖十一年刊刻陈序本之前,可以姑且定它为嘉靖初年。”^③联系世本陈元之《序》中所说《西游记》或出藩王府的话,他推断作者当与山东鲁王府有关。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阐释的是黄霖,他经过多方考证,断定这个“鲁王”便是“嘉靖二十八年才去世的鲁端王朱观”,而不是他的儿子恭王朱颐坦”^④。后来黄霖又在新疆乌鲁木齐《西游记》研讨会上重申这一观点:“根据有关《西游记》的最早的书志《古今书刻》的著录、最早的提及作者问题的实际情况,《西游记》可能是出于某鲁王或其幕僚。”^⑤不过,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因为他毕竟是

① 李安纲《〈性命主旨〉与〈西游记〉》,《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可参见《〈性命主旨〉是〈西游记〉的文话原型》,《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② 参见胡义成系列论文:《花落道士家——论今本〈西游记〉的最后定稿者》,《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今本〈西游记〉姓闫说》,《抚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全真道士闫希言师徒是今本〈西游记〉定稿人》,《昌吉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③ 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④ 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⑤ 见胥惠民等撰《2000年〈西游记〉与神魔小说研讨会综述》,《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3期。

在—项孤证上立论,《古今书刻》上终究只录有“西游记”三个字,而且此后明清两代也从未有人提及此“西游记”与演绎唐僧取经的百回本《西游记》小说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邱处机虽然不是《西游记》的作者,但他创立的全真教却与《西游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详见柳存仁《全真教与小说西游记》^①)。所以当代亦还有人重提“邱作说”的,如金有景写有《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南通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南都学坛》1989年第4期),认为论《西游记》作者应分清祖本和今本,其“祖本的确有‘证道’或‘修金丹,炼气功’等等主旨”,“还具体地反映了邱处机所属的全真派的观点”,因而“邱作说”不能完全否定,“祖本《西游记》的作者非常有可能是邱处机”^②。这一看法集中地体现出一部分学者坚持、维护“邱作说”的决心和为“邱作说”翻案的意图。

吴圣昔(燮)新近连续发表两篇长文《究竟谁是造物主——〈西游记〉作者问题综考辨证录》和《版本论中论作者》^③。前者旨在对延续近二十年的作者之争作理性总结和综合考辨;后者则试图探索新的途径,以“打破《西游记》作者之争拉锯战僵局”,改变胶着状态。吴圣昔首先将目前现状概括为:“吴著说尚未被推倒,非吴著说远未能成立,但吴著说也还成不了定论”。吴圣昔一贯主张“吴著说”,笔者以为他这样说,一方面已实际上表明自1983年章文发表以来,“非吴著说”日益壮大,已积聚起强大的理论力量,并在一定程度开始动摇“吴著说”的阵脚;另一方面,吴氏并未放弃“吴著说”,由于《西游记》是一部经过几近千年的漫长演化的世代累积型巨著,作者问题“实在太复杂”,“是一项系统工程”,“笼统地总体地称某人是《西游记》作者,显然不符实际”,“即使把所谓作者严格约束在将《西游记》从民间文学作品改编为百回本的文人是谁的范围内,似乎也极为困难”,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原本是哪一部,它的底本即所谓平

① 载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5—9期。又收入《中国古典小说论坛》(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② 金有景《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南通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

③ 分别载《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西游记文化》2003年第1—2期(未完)。

话、词话又是哪一种,什么样子”。即以百回本而言,“以往所提出的包括吴承恩在内的诸作者所改编的本子,其实并不统一,相反却差别甚大”。这样,关于《西游记》作者,就很难得出确定性的对象,其结果便只能是“陷入渺无结果的拉锯战”。基于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将作者问题“与研究《西游记》源流演变紧密结合起来,与研究《西游记》成书和版本史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从版本的系统研究中找坐标”。他的具体设想是:“从成书史和版本史上选定一部或两部重要者为对象,具体地共同地目标一致地来探讨它或它俩的作者为谁,也许这倒能成为突破口,有效地推进作者之争的发展。”

当然,这一论述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假设层面,也尚未有实绩体现,其立论的价值也还当接受研究实践的检验,但无疑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在《西游记》作者研究方面,也显示出某些新动向。至于《西游记》作者这一论争的最终结果,窃以为仍需假以时日,拭目以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其胶着状态必将有所突破。

二、异军突起的《西游记》版本研究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西游”作品(故事)并相互沿袭、演化;而在百回本《西游记》于明代问世后,雅俗共赏,风靡于世,于是竞相翻刻梓行,从而形成了复杂的版本系统。《西游记》版本研究从广义上包括这两个方面,而狭义上说则特指以万历二十年(1592)世德堂百回本小说(世本)为核心,在其前后出现并与其发生密切关系的版本现象。这里所论主要系指后者,取狭义而又稍有扩展。

新时期《西游记》版本研究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淮安、连云港两地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陈新提交的论文《〈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引起与会学者极大反响,而后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发表了一组版本文章,举其主要者有陈新《重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地位和价值》(《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黄肃秋《〈西游记〉补注》(《国际政治学院学报》1983年创刊号)、苏兴《杨志和〈西游记〉摭谈》(《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刘荫柏《〈西游记〉明清两代出版史考》(《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李

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以及杜德桥《〈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选辑》)^①。以此为契机,《西游记》版本研究有如异军突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应该说,新时期版本研究起点颇高。五四时期,鲁迅、胡适囿于《西游记》版本资料匮乏,较之作者、成书,在版本方面的研究尚显薄弱。稍后,郑振铎、孙楷第、赵万里、董康、傅芸子、王古鲁、刘修业等学者遍寻海内外异本,收获颇丰。至30年代,已先后发现明清两代《西游记》版本达十三种之多,于是先有孙楷第胪列出各种版本目录(提要),后有郑振铎按其逻辑线索排定所有版本演化的次序,并对其中的各类版本现象诸如刊刻书铺、时间、序跋以及版式、纸张、装帧等作深入的考论,提出了关于《西游记》版本研究的一系列基本命题。新时期版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展开并多有开拓,并围绕某些关键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论争。现将几个意义突出的版本问题研究作初步评述。

(一)《西游记》祖本问题。

本论题所涉问题颇多且大,究其源皆在鲁迅、胡适和郑振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一百回《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②《西游记传》之后”,“《西游记》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直认杨本为《西游记》“祖本”;胡适则以为阳(杨)本“是一个妄人硬删吴承恩本编成的节本,决不是吴本以前的古本”,并对鲁迅的观点提出了驳难,并力主《取经诗话》为《西游记》的祖本(胡称“祖宗”);郑振铎根据多种新发现的明版《西游记》,特别是《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残文),认为吴本是“将旧本加以放大”的“改作小说”,有“旧本”也即祖本存在,不过这个祖本不是杨本而是《永乐大典》本古本《西游记》。郑说反响较大,并得到鲁迅的肯定,他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

① 英国学者杜德桥的这篇文章原载香港《新亚学报》1964年第6卷第2期,系与澳大利亚华人学者柳存仁《〈西游记〉的明刻本》(《新亚学报》1962年第5卷第2期)一文的商榷文章,于这一时期引入。

② 据陈新考证,《西游记传》实为四十回。后人误为四十一回,盖为清代翻刻本将第三回中“功完道作佛和仙”一段韵语间一句“屏去邪欲得清凉”最后三字重复而致。“嘉庆本的杨本夺漏了重复的‘得清凉’三字,而且界末的一句恰好转行,由于韵文比正文低一格,恰好与回目的位置略等,翻刻本很可能因此致误。”《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卷末之《西游记传整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译本序》中说:“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的《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此后,《西游记》论坛多持这一观点。

陈新版本研究的初衷是质疑郑说,重新肯定鲁说。他根据各本刊刻时间、文本内容和文辞(方言)的特点,并结合版本和出版的“通则”,指出:“郑振铎得出吴承恩根据的是《永乐大典》本,朱本和杨本‘全都是吴氏书的删本’的结论,未免失诸草率”,“鲁迅先生对《西游记》的论断至今尚有生命力”。其结论是:杨本、朱本皆早于世本,因而“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性质应该重新估计”,“朱本的第一至第七卷,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初稿”,“杨致和本《西游记传》为今存西游故事最早最完整的‘古本’”^①。此说引起巨大反响,学术界对其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予以充分的肯定,但其对《西游记》祖本的认定却遭到多方质疑。学者们纷纷撰文商榷并提出了一些关于《西游记》祖本的新意见。如陈君谋断认为朱本(《百回本〈西游记〉的前驱》,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朱德慈也认为“吴本有可能承袭了朱本”(《〈西游记〉三种版本的新检讨》,载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1辑,1986年),不过此说滥觞于海外学者柳存仁60年代所写的《〈西游记〉的明刻本》^②。王辉斌先后撰《〈西游记〉祖本新探》、《再论〈西游记〉的祖本为〈西游释厄传〉》(分别载《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1997年第1期),认为《西游记》祖本当为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古本。还有人提出是《西游原旨》的白文(金有景《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载《南都学刊》1989年第4期)。程毅中、张锦池则主张从平话本或词话本中认定祖本,程毅中指出:“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百回本《西游记》,中间有过许多种西游故事的古本小说”,它们都有可能成为祖本^③。张锦池指出:“世本的祖本当是种与《西游记》平话同源而异流的词话本《西游记》;杨本是世本的顺次删

① 陈新《〈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93页。

② 柳存仁在这篇文章中说:“不只是《西游记传》删割《释厄传》而袭取其大部分的文字,百回本《西游记》对《释厄传》及《西游记传》实际上也都有所承袭”,“百回本《西游记》必定是《释厄传》和《西游记传》以后的产物,这是无可置疑的。”载《新亚学报》1962年第5卷第2期,又收入作者《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③ 程毅中、程有庆《〈西游记〉版本探索》,《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节缩写本;朱本是世本、平话本、杨本的顺次删节三缀本。”^①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吴圣昔,他认为把祖本定在某一个版本“却未免过于武断”,因为“从较早的永乐本、谚解本发展到较晚的吴本、朱本、杨本,这中间很可能还有另外标志着一个特定阶段的一部或一部以上的《西游记》新本在社会上流传。”^②此类意见一时纷呈,且相互间争执又起,不过,论争也有所共识:《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作品,故而世本必有祖本存在,对祖本的确认有利于《西游记》认识的深化;而存异求同的结果是逐渐将论争的焦点集中在杨本与朱本两种明刻简本在《西游记》演化中的真实面貌和历史地位,并使论争发生转移,从祖本演为世本与朱本、杨本两部简本的关系。

(二) 世本与杨本、朱本的关系。

这一问题涉及《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但其版本意义十分突出:很明显其中隐伏着《西游记》版本演进的真实面貌,且事关《西游记》演化的宏旨。五四时期诸大家皆以繁本在前简本在后(唯鲁迅后来才改持此看法),倘若对此种观点果有新认识,那么许多问题的看法(结论)都须有所调整,甚或整部《西游记》演化史就要面临重写的挑战。具体而论,其一,仍有一部分论者坚持郑振铎的看法但又有新的发展、深化或补充。如李时人认为:“杨、朱两本都曾经独立删略吴氏书,不过朱本又抄了杨本”,其排列为吴本(世本)→杨本→朱本^③。他特别考辨了朱本杨本的刊刻年代,指出“朱本《西游释厄传》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删节本”^④，“杨致和编《西游记传》刊于朱鼎臣《西游释厄传》以前,但在百回本《西游记》之后”^⑤。黄永年《重论〈西游记〉的简本》(1987年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也认为两种简本“是百回本的删节改写本”,但“朱本因袭杨本”。张锦池《〈西游记〉版本源流考论》则又有不同的表述:“杨本乃硬删世本编写而成的节本”,“朱本是晚于杨本的三缀本”——“乃据世本、杨本以及早于世本的一

① 张锦池《西游记考论·前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② 吴圣昔《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第275页。

③ 李时人《吴本、杨本、朱本〈西游记〉关系考辨》,载淮安1986年刊《西游记研究》第1辑。

④ 李时人《明刊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

⑤ 李时人《〈西游记〉版本叙略》,载《西游记考论》。

种平话本删节编写”。其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意见,其代表者除早期陈新将三者排列为:杨本→吴本→朱本,后来又有朱德慈提出“朱本在前,杨本拼凑吴本、朱本”的观点,三本顺序是朱本→吴本→杨本,其具体表述为:“朱鼎臣起先依照某种本子(大约是《西游记》平话之类的)进行改写,开始比较从容,大约从得龙马开始,就愈来愈匆忙了;吴承恩在创作过程中参照了朱本,并做了增删润色的工夫,对后二十四回则在其基础上广泛吸取其他有关取经故事的素材,进行再创作;杨本的前面一部分是参照吴本有秩序的节缩,后来可能限于篇幅或时间或其他原因,便与简略的朱本后三卷相连接,同时参照着吴本,使其更完善”^①。又,沈承庆《话说吴承恩》排列为杨本→朱本→世本,不仅把两部简本全列在繁本之前,尤可注意的是:他援引数学上之“排列组合法”,认为三种本子像红、黄、绿三色交通灯一样,“只能排成六种不同的序列,而不会另有其他”,并对曾经有过或可能有的排列悉数胪列齐备,试图将问题数理化、简单化^②。但旋即被一些争论的事实所迅速否定,因为这三种繁本和简本有可能同源而异流,也有可能各自从之前的另一部或多部《西游记》古本(如永乐本、谚解本)中衍化而出,这样就绝对要比所谓的“六种不同的序列”复杂得多。此外,还有一种看法:张颖、陈速在《〈西游记〉演化新说》一文中指出:三本分属繁本、简本系统,不仅朱本、杨本两本简本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而且两本与繁本世本之间也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其中作为繁本的世本的演化过程为:祖本(《朴通事彥解》所辑《唐三藏西游记》)→《西游释厄传》或《西游前记》→世本(删节本);朱本、杨本属简本系统,其嬗变过程为:繁本《西游释厄传》或《西游前记》或某一古本《西游记》→朱本、杨本(朱、杨二本各有所本,相互间无删节、改写关系)^③。

如作仔细探究,各类观点所论颇广,但其核心却在第九回即“唐僧小传”。今见明刻百回本《西游记》均无完整的唐僧出世故事,只在各处行文中零星提及,而简本朱本篇幅虽为百回本的七分之一,却反而

① 朱德慈《〈西游记〉三种版本的新检讨》,《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1986年。

② 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③ 参见陈澈《近几年来〈西游记〉研究综述》,《文史哲》1987年第3期。

载有这一故事。联系清代通行本自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开始不仅备载这一故事,而且独立成篇,成为唐僧取经的“序幕”,这就关系到明清版本的演变,关系到繁、简版本系统的关系,关系到朱本在明代版本中的价值和地位这些重大问题。对此,郑振铎、孙楷第均有猜测:吴本或许原有,或出于某一原因为世本刊落,但其真相未可知,故而态度谨慎。现在学术界大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试图证实上述猜测,认为《西游记》原本就有唐僧出世故事而为世本刊落。李时人依据民间传说、杂剧、百回本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论,认为“朱鼎臣编《西游释厄传》时所依据的原本很有可能有单独叙述唐僧出世的章节”^①。此前黄肃秋曾力主此说,并从世本中钩辑出十处内证,肯定“‘陈光蕊、江流儿一节’故事在吴承恩《西游记》中是存在的”^②。此后又有侯会提出一种新的假设:“《西游记》八十一难中的‘乌鸡国’故事,很可能不是小说的‘原装’内容,而是在吴承恩之后、由另外的作者拟写插入的。”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在于弥补删去唐僧故事的空缺,以保持作品结构和篇幅的平衡。而这位好事者正是今见世德堂刊本中所署第九、十、十九、二十等四卷文字的“梓行”者“荣寿堂”。可见,唐僧出世故事必为世本刊落无疑^③。这一假设颇有新意但旋即遭到质疑^④。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世本原无这一故事,通行本是系汪澹漪据朱本卷四改写而成。如苏兴认为原本流传的西游故事“确实有单独的江流和尚(唐僧出世)等情节”,但吴承恩“由于《西游记》主题要求及中心人物的改换,不得不忍痛割爱”了。所以吴本“原本就没有单独的唐僧出世故事章节”^⑤。蔡铁鹰著有《〈西游记〉“附录”考》一文,对其中来龙去脉有较详细考证和推断。所谓“附录”,即指唐僧出世故事,盖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西游记》为恢复明本(世本)原貌,重新将这则故事(清通行本列为第九回)抽出,并作为《附录》插于第八、九回之间。他

① 李时人《〈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

② 黄肃秋《论〈西游记〉的第九回问题》,《〈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③ 参见侯会《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

④ 参见吴圣昔《〈西游记〉乌鸡国故事“增插”说辨证》,《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

⑤ 苏兴《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问题》,《北方论丛》1981年第4期。

指出:“就吴承恩《西游记》的情节结构而论”,这显然是“一个游离的陈光蕊故事”,因而“没有任何包容‘附录’的可能”,其结论为:“‘附录’不是吴承恩原作”,“‘附录’亦非《西游记》原有的内容”,而系后人的“伪作”^①。应该说,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版本事实基础,各有其合理性,学术界就此问题所展开的历次论争^②,有助于加深对《西游记》祖本问题及繁简各本之关系的认识。

(三) 关于世本是否即是“吴氏书”初刻本及九十九回本问题。

对今见世德堂本是否为百回本《西游记》初刻本这一问题的认识本来是较为一致的,因为世本陈元之《序》明确说:“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且是书“旧有《叙》,余读一过”。可知世本绝非“吴氏书”初刻。据笔者所知,就此问题论述最详者当推黄永年。他根据明代刻书常识和规律,以及陈《序》提供的线索,考出明百回本初刻为嘉靖初年刊刻的鲁府本;陈元之《序》所署“壬辰夏端四日”当为嘉靖十一年(1532),而非万历二十年(1592),且并非专为世德堂本而作,是“唐光禄购到这个初刻重新刻制,才成为带有陈《序》的百回原本”,陈序本系据鲁王府初刻本的重刻本。这样,世本实际上已是陈序本的翻刻本^③。但由于该初刻本事实上湮没不传,除了陈元之、唐光禄等当事人没有人见过,所以学术界也是疑信参半,对所谓的“旧序本”表述不一。除郑振铎称“吴氏书”,并为一些学者沿袭(如李时人)之外,张锦池常称为“世本及其旧本”(《西游记考论》),吴圣昔则以“世本与前世本”特示区别(《论〈西游记〉的“前世本”》,《临沂师专学报》1997年第5期)。

但也有人认为世本是否是初刻本在目前条件下其实很难作出判定,因为陈《序》是孤证(孤证不信)。有的则干脆提出截然不同的意见,认为“旧本”、“前世本”之类只是前人制造的“幽灵”,其实一概不

① 参见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之《旁生枝节的“江流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② 如李时人与苏兴的论争,文见苏兴《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问题》(《北方论丛》1981年第4期)、李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侯会与吴圣昔的论争,文见侯会《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吴圣昔《〈西游记〉乌鸡国故事“增插”说辨证》(《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

③ 参见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存在,世本就是百回本《西游记》的初刻本。对此沈承庆表述得最为畅达淋漓:“‘这个书’(即唐光禄购入‘奇之’的所谓吴氏书——引者注)是书稿,非印本,甚至不是‘传抄本’(也不足奇),已明确指出,无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为谁(即或就是吴承恩也罢),世德堂万历二十年刊本也是其第一刻。此前,世上只有杨氏《西游记》、朱氏《释厄传》(此外,影响不大的杂牌‘西游’,亦或有之,但早归粪土),除此,读者面前是眼空无物的。若说那时有个‘吴氏书’,想它还走在六道轮回中。”^①这种太过绝对化的意见遭到了较为猛烈的批评,其主要代表是李安纲《也谈〈西游记〉的版本次第——评沈承庆〈话说吴承恩〉中的版本论述》,指出他“忽视或者排斥”了世本以前还有全真道本一类旧本存在的“事实”^②。但需承认,它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旧有的思维定势,堪称版本研究的“新思维”、新动向。问题的实质在于:唐光禄所购之书,即所谓“旧序本”、“旧本”、“吴氏书”、“前世本”者究竟是抄本、传抄本,还是刻本?如果是抄本、传抄本,那么世本理所当然是初刻本;如果是刻本,那么,经“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的世本便必然是翻刻本,而绝非初刻本。惜乎据目前资料尚不能作明确的判断。但问题的提出,有利于《西游记》版本研究的深入。

与此相关的是所谓九十九回本问题。吴圣昔撰文《〈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宁波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将陈《序》所述与明盛于斯《休庵影语》所载资料联系起来,首次提出九十九回本问题。盛于斯在与周如山交谈时,周说:“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休庵影语》中还有旁证,那就是盛于斯幼时所读百回本第六十四回“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与今本相异,“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吴圣昔据此认为:“周府抄本就是吴承恩在荆王府改编成的九十九回传抄本之一,周王府本的刻本就是指的唐光禄刊刻之世本”,其意义在于作为世本的前身,周府抄本结束了《西游记》漫长演化中的民间文学阶段,而走上了文人编

① 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② 参见李安纲《也谈〈西游记〉的版本次第——评沈承庆〈话说吴承恩〉中的版本论述》,《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创的阶段。从这时起,《西游记》理应署上吴承恩的名字^①。

之后李安纲也殊途同归地论述到九十九回本问题。他指出研究版本问题的许多学者“都忽视或者排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德堂百回本前还有一个真正的表现全真道教义的百回本(或曰九十九回本)”。而“九十九回本,正合乎道教的九九八十一、九九重阳之数,而世德堂本的‘秩其卷目’,看来是将九十九回扩大而成为一百回”。这个全真道百回本包罗万象,集道教教义之大成,它“诞生于平话《西游记》之后,借用了以前所有关于西游取经的故事、杂剧、小说,包括陈光蕊江流和尚故事、唐僧取经故事、齐天大圣故事、二郎神、哪吒故事等,依照道教全真道经典《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宋代石杏林《还源篇》八十一章、《易经十二卦》为文化原型,创造了一部伟大的文化小说《西游记》”^②。这“全真道本”前人已有提及^③,只是响应者少,反对者众。李安纲重提“全真道本”,其新意在于将它与九十九回本联系起来,相互印证了各自存在的真实性。这个九十九回本的存在,一方面为他揭示《西游记》宗教文化价值提供了新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对世本真实面貌的揭示。

我们注意到:九十九回本固然可以作为世本原本的一个假设,但它实际上只是一个《西游记》佚本。这就引申出《西游记》版本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西游记》佚本的探寻。

这一工作实肇始于郑振铎、孙楷第。郑振铎对平话本的考论、孙楷第对《西游释厄传》的考辨正是致力于《西游记》佚本的探寻。《西游记》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版本产生,也不断有一些版本佚去,产生了众多的佚本。曹炳建、齐慧远在2004年江苏淮安吴承恩诞辰五百周年暨《西游记》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将复杂的版本系统划分为三类:现存版本,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学者推断之版本。其中后两类多为佚本。并列出《西游记》佚本十一种:

① 参见吴圣昔《究竟谁是造物主——〈西游记〉作者问题综考辨证录》,《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李安纲《也谈〈西游记〉的版本次第——评沈承庆〈话说吴承恩〉中的版本论述》,《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③ 参见柳存仁《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5—9期。又收入氏著《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 平话本《西游记》。

(2) 唐光禄购本。此即学者所谓“旧序本”、“前世本”者。

(3) 《西游释厄传》。世本第一回回前诗云：“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人文本《西游记》注“释厄传”为“较早的《西游记》传本之一”。尤应指明的是，该本非朱鼎臣本，唯两本同名而已^①。

(4) 周邸本。即九十九回本。

(5) 鲁府本。明人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上记载山东鲁府刻有《西游记》。

(6) 登州府本。明人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上记载山东登州府刻有《西游记》。

(7) 大略堂古本《西游记》。语出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第九回回评：“后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备载陈光蕊赴官遇难始末，然后畅然无憾。”

(8) 蔡金注《西游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清刘一明《西游原旨序》中“其后蔡金之辈，亦遵其说而附和解注之”一语列出。

(9) 许白云《西游记》。清人桂馥《晚学集》卷五“书圣教序后”条曰：“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

(10) 邱处机本。《西游证道书》卷首所载虞集《原序》曰：“此国初邱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

(11) 史真人本。清人平步清《小栖霞说稗西游记》转述陈文述《西泠仙咏自序》曰：“世传《西游记》，则邱祖门下史真人所为，所言多与《性命圭旨》相合，或即作《圭旨》之史真人从而演其说也。”

综合新时期佚本研究，可知它们情况不一，其作为佚本曾经存在的可能性和价值也大相径庭。其中虞集《原序》已证实为汪澹漪伪托，故“邱处机本”已失去附丽；“蔡金注《西游记》”当为《孙目》误列；“蔡金”实系蔡元放、金圣叹二人——蔡元放托名金圣叹重评《西游证道书》；“大略堂古本《西游记》”以《西游证道书》笺评者汪澹漪借古以自

^① 孙楷第曾指出：“考《西游记》第一回引首诗有云：‘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此诗通行本有之，明本亦有之。此或吴承恩《西游记》本名有《西游释厄传》，或吴承恩《西游记》自《西游释厄传》出，今难质言。”见《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9页。

重的可能性为大,殊不足信。又,《西游释厄传》或以为即“吴氏书”本身(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或即朱本、杨本两种明刻简本,这样,它或者与其他佚本重叠,或者为现存版本,亦不应以佚本目之。而“平话本《西游记》”虽全书已佚失,然至今已发现三个片段:其一为《永乐大典》卷13139“送”字“梦”韵所录“魏徵梦斩泾河龙”,其二为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彥解》所录“车迟国斗圣”,其三为《销释真空宝卷》所录“唐僧西天去取经”,虽然还没有证据确定以上三段残文是否出于同一版本,但既有残文存世,平话本便也已不是完全的佚本。据以上分析,真正意义上的佚本实为唐光禄购本、周邸本、鲁府本、登州府本、许白云《西游记》和史真人本等六种。当然不排除还有别的佚本存在的可能性。

对佚本的研究与《西游记》作者、源流、祖本以及作品主题等基本问题都有莫大关联。对它们的价值,《西游记》论坛有不同认识。据笔者所知,除许多学者遵循郑振铎、孙楷第的意见,看重唐光禄购本和平话本《西游记》(如果一定将其算作佚本的话)外,黄永年还特别重视鲁府本,吴圣昔特别重视九十九回本,李安纲特别重视史真人(全真道本)本。他们在各自的论著中,运用佚本提供的信息来有效地解决作者、源流、祖本以及作品主题等其他问题。

纵观新时期《西游记》版本研究,起点颇高,成绩不俗,但留下的疑问也不少。比如祖本谜底究竟为何,世本的旧本的真面目怎样,三部繁、简本的次序到底如何排列才趋合理,《西游记》是否还有其他佚本,虽然讨论较多,但完满或最终解决它们尚需时日。还有,清代通行本《西游证道书》缘何而来,其后世流变轨迹如何,《新说》本是出于世本,还是李评本,对这些问题则研究甚少。所以,《西游记》的版本研究尚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

第十章 《西游记》文本解读

一、新时期《西游记》主题观的变迁

韦勒克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个方面。认为两者“各有侧重,各有确定的研究对象”,但作为整体相互渗透、交融,而研究的“焦点”是作品本身,外部研究的目的是完成“对文学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①。可见,文学研究的中心在于“内部研究”,即对文本的解读。

新时期《西游记》研究从文本(如主题)解读开端,最早的一篇论文是朱彤发表于《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上的《论孙悟空》,重新阐释、评价了作品主题的性质。随着成书、版本、作者等方面(外部)研究的全面展开,对作品自身的内部研究也渐趋深入。文本解读围绕主题、人物、情节等小说要素展开,尤以对作品主题的探究、阐释最为热烈、持久,对孙悟空等人物和西天取经等情节的研究实际上被纳入到主题研究之中,成为主题解读的手段和途径。笔者以为,新时期主题研究大致可以20世纪90年代前期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中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学者们较多地因袭着以往的研究论题、思路和方法,主要集中于对作品主题(性质)的重新认识。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流行阶级论主题观,诸如“主题矛盾”说、“孙悟空投降”论等还有较大的影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辨证和清理。如李希凡重申了他60年代提出的“主题转化”说,认为作品结构的“两截子”是客观事实,只有“转化”说才能将

^① 转引自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

它们“缀合”起来,“使它们完全融合成一体”:前七回大闹天宫反映了孙悟空“战斗的叛逆性内容”,以后的取经故事则将主题“转到人民的征服困难”的理想方面,主题前后发生了转移。他还具体分析了产生这一主题“转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现实使然;一方面源于吴承恩自身“不可解决的思想矛盾”,“我们决不能超历史地苛责古代作家的局限性”^①。平心而论,这种“转化”说比诸各种阶级论更显合理性,不过仍然不能令人信服。高明阁指出:“转化”说不符合作品神魔之争的实际,更不符合西游故事演化的实际,“‘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主题不同,作者对神魔的态度也不同,这裂痕是没法弥补得完好的。”他认为这是在西游故事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将“不同主题的段子”“捏合”的结果,我们应该尊重这个事实,因为“现在我们所能做的,除了从作品形成的过程中,说明这是前代作家们的无心过失之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②胡光舟则对“转化”说进行了积极的修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主题统一”说。他也认为《西游记》有双重主题,但不是转化,而是统一,他说:“大闹天宫的主题应当是:它用神话故事形式,投影式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民的反抗斗争,赞颂了反封建正统、反皇权尊严的反抗思想和叛逆性格”;而取经故事的主题则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积极进取、克服困难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摧毁一切邪恶势力及征服大自然的愿望和信心。”所以,他将“主题统一”说表述为:“我们不妨说《西游记》有双重主题。大闹天宫重在表现对传统势力的反抗;取经故事重在表现对理想光明的追求。它们不但没有矛盾,却很好地统一在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这两个故事所共同具有的正义性之中,统一在孙悟空这个中国人民所热爱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之中。”^③

另一方面,关于主题的研究,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始出现了力图挣脱庸俗社会学方法的束缚,打破单一的阶级论主题观,使对主题的认识逐渐回归到文学研究的轨道的迹象。堪为新时期《西游

① 李希凡《〈西游记〉与社会现实》,《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

② 高明阁《〈西游记〉里的神魔问题》,《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

③ 参见胡光舟《对〈西游记〉主题思想的再认识》,《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吴承恩和〈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记》研究开端的朱彤《论孙悟空》一文,一开始即显现出摆脱阶级论主题观旧套、独辟蹊径的意向。朱文既不同意“主题矛盾”说和“孙悟空投降”论,也不赞成“主题转化”和“主题统一”说,而是结合当时思想界对中国历史分期和社会形态,特别是关于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讨论,提出了“歌颂市民”说^①。他对吴承恩所处的时代特征进行考察,指出:“吴承恩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资产阶级前身——新兴市民社会势力在社会生活中可是崭露头角,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复杂化。中国社会面临着新旧交替的历史大转变的时期。”据此,他对“歌颂市民”说作了具体的阐述:“吴承恩表现了要求变革的时代精神,反映了新兴市民社会势力的政治思想要求。孙悟空形象就是新兴市民社会势力的政治思想面貌,在文学上以理想化的浪漫主义形式的表现。”孙悟空“思想性格中的矛盾,他的命运前后的变化”,都可以从这一时代现实中得到解释^②。

受这一思想的启发,学人们见仁见智,解放思想,提出了许多不同的主题观,其研究视野有所扩展,研究水平也有大幅提高。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西游记》论坛曾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主题观(包括作品性质、思想倾向)有:朱式平的“安天医国”说(《试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第6期;《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再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载《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罗东升的“诛奸尚贤”说(《论试〈西游记〉的思想倾向》,《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朱继琢的“反映人民斗争”说(《也谈〈西游记〉的思想倾向——与罗东生同志商榷》,《华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苗壮的“西天取经主体”说(《从孙悟空看〈西游记〉的思想倾向》,《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胡光舟的“歌颂反抗、光明与正义”说(《对〈西游记〉主题思想的再认识》,《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以及高明阁的“主题裂痕”说(《〈西游记〉里的神魔问题》,《文学

① 其时的小说研究显然受到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或启发,如欧阳健、萧相恺提出了《水浒传》主题的“市民说”,认为《水浒传》是一部由市民作家创作、在城市流传、“表现市民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基本上是以绿林豪侠为主体的小说”。见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梁山泊聚义性质辨》,载《钟山文艺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水浒〉“为市民写心”说》,《群众论坛》1980年第1期。

② 参见朱彤《论孙悟空》,《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论吴承恩的思想》,《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2期。

遗产》1981年第2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还出现过一次全面否定《西游记》的思潮,就主题研究而言,可以称为“主题反动”说。1982年,刘远达、傅继俊、丁黎相继著文,或以为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或以为是鼓吹投降的“叛徒文学”,对《西游记》进行全面批判^①,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震动。三人的观点又以刘远达最为集中。其中心观点是:“《西游记》是艺术化的‘心学’,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其目的是宣扬王阳明的“心学”,通过“塑造孙悟空这样一个‘犯上作乱’的形象来修心”,为“犯上作乱”的起义农民“树立一个‘改邪归正’的榜样”^②。这些观点随即遭到《西游记》论坛的强烈批评,有些文章还将其视为“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的流习予以谴责^③。刊发刘文的《思想战线》杂志专门集中刊出商榷文章,试图消除刘文的“影响”;云南大学中文系还举行了研讨会,强调《西游记》不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以对刘文的观点进行“清算”^④。对此,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否定主义思潮在学术研究中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对文学的评价从来不局限于肯定、赞扬一途。其他几部古典小说名著也都曾有全盘否定或是批判的现象,如建国初期曾喊出过“打倒《三国演义》”的口号,“文革”时期批《水浒》运动轰轰烈烈,对《金瓶梅》、《红楼梦》的否定则出现在更早的晚清,其“罪名”是诲淫。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类观点还一直存在。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新时期《西游记》研究的起始阶段,出现这一类否定论意见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是这次对《西游记》的否定思潮,激活了新时期的主题研究,因而显示着独特的价值,不宜将其与极“左”思潮等同起来,予以全盘否定。当然,这种全面、彻底否定《西游记》的看法较多地继承着以往阶级论主题观影响,带有某些庸

① 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丁黎《从神魔关系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学术月刊》1982年第9期;傅继俊《我对〈西游记〉的一些看法》,《文史哲》1982年第5期。

② 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

③ 参见何思玉《一个并不虔诚的佛教徒——谈孙悟空的形象并与刘远达同志商榷》,《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彭荣生《关于〈西游记〉的思想倾向——与刘远达同志商榷》,《思想战线》1982年第5期;刘士昀《也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兼评研究〈西游记〉的方法》,《思想战线》1985年第5期。

④ 参见《文汇报》1982年7月26日所载曾明《〈西游记〉不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云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会讨论综述》。

俗社会学研究的倾向,无疑也是事实。

不难发现,以上这些主题观无论是肯定《西游记》,还是否定《西游记》,虽然立场不一,结论纷殊,但明显存在着一个局限:或在套用现成的文艺理论(如主题的阶级性、人民性之类),或在简单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结论(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且无一例外地是从政治角度来抽绎《西游记》的主题,都带有贴标签、图解其政治内涵而不及其余的缺陷。正是这一局限性引起了学界的不满,何满子最早发表不满足意见,呼吁主题研究亟须突破和深入。他先著文《把艺术从社会学的框子里解放出来——谈神魔小说〈西游记〉的社会内容》^①,历数《西游记》主题中“硬划成分”、“强派角色”的种种弊端,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后又于1982年10月第一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上强调指出,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应紧密结合神魔小说的性质,而不应贴标签、划阶级,因为“也许吴承恩根本无意将孙悟空当作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孙悟空的改邪归正因此也不意味着阶级战士的屈服投降。也许孙悟空的被降伏象征着邪不胜正的抽象哲理”。他要求对《西游记》的主题作哲理性方面的深层次开掘^②。

以此为契机,《西游记》主题研究有意识地开拓新路,打破单一的政治性主题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流向。一种流向是从鲁迅、胡适的著作中寻求启发,站在新的时代精神立场,以突破禁区、解放思想为目的,重提“游戏”说^③,许多学者认为“游戏”说至今并未过时,《西游记》之不朽价值即在于作为“游戏笔墨的艺术结晶”,“我们要深入探讨《西游记》的思想艺术成就,当然也离不开对作品游戏笔墨特征的分析”^④。另一种流向是开始探寻作品的哲理性内涵,把主题归结为人生哲理。这最早可以金紫千为代表,他指出《西游记》的作者无意于写宗教小说,也无意于写政治小说,而是旨在“告诉人们一条哲理:人的思想只有归于正道,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孙悟空经历了从“追求”

① 何满子此文作于1982年初,后发表于《社会科学》1982年第11期。

② 何满子《〈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收入《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③ 建国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贬低胡适的倾向。受此影响,在《西游记》论坛,鲁迅关于《西游记》“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的论断也遭到忽视。

④ 吴圣昔《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第23页。

到“挫折”再到“成功”的过程,他的历史,“是一条完整的人生道路”,“是一部很典型的精神发展史”,所以,“《西游记》形象地、曲折地写出了这条人生道路,同时,又生动地表现了这条人生哲理”^①。

“游戏”说有较为悠久的理论渊源^②,内涵也比较明确。而由于哲理性则是一个大概念,联系着人生的意义、价值、前途、命运等人类学本体论问题,内涵十分广泛,所以这一“哲理性流向”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和特定的指向。除了金紫千称为“收放心”、“求放心”——孔孟儒学修身养性的人格理想外^③,孟繁仁称“人生哲理”^④,陈民牛在《游戏妙笔,理想寄托》一文中将主题概括为“理想性”——对人生理想的追求^⑤,钟婴在其论文和专著中提出了“表现理想英雄”说^⑥,曾广文也提出了“歌颂理想英雄孙悟空”说^⑦,之后方胜进一步总结为“富有哲理意味的理想之歌”说^⑧,李欣复在《也谈〈西游记〉的审美价值》一文中归结为“专心致志、一以贯之”的求学精神^⑨,王燕萍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孙悟空的“成长史”、“创业史”^⑩,张锦池则在《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化与〈西游记〉的主题》一文中提出《西游记》的“核心问题”是培养、选拔、使用人才^⑪,吕晴飞在《〈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中提出了“歌颂个性解放”说^⑫,姜云在《〈西游记〉:一部以象征主义为主要特色的作品》一文中提出了“探索人生道路”说^⑬。

① 金紫千《也谈〈西游记〉的主题》,《文史哲》1984年第2期。

② “游戏”说在五卅之际由鲁迅集中论述,但理论渊源可追溯至明代叶昼李评本评语,近代也有冥飞等人倡导“游戏”说。作为新时期的《西游记》主题观最早是吴圣昔在1986年普陀山第二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参见吴圣昔《西游新解·后记》。

③ 金紫千曾在《也谈〈西游记〉的主题》中说:“(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这是‘收放心’的结果,这是‘求放心’的胜利。”《文史哲》1984年第2期。

④ 孟繁仁《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游记〉》,《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0日。

⑤ 陈民牛《游戏妙笔,理想寄托》,《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

⑥ 参见钟婴《西游记新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⑦ 曾广文《世间岂无英雄:〈西游记〉主题思想新探》,《成都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⑧ 方胜《一曲富有哲理意味的理想之歌——〈西游记〉主题新论》,江苏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1988年。

⑨ 李欣复《也谈〈西游记〉的审美价值》,《文史哲》1983年第4期。

⑩ 王燕萍《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广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⑪ 张锦池《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化与〈西游记〉的主题》,《学术交流》1987年第5期。

⑫ 吕晴飞《〈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⑬ 姜云《〈西游记〉:一部以象征主义为主要特色的作品》,《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

当然,在以上两种流向之外,政治性主题观也仍然存在,如高明阁一如既往地重申“主题裂痕”说^①,周中明提出了“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说^②,王齐洲提出了“正统与正义”说^③。大约是受其时流行的西方文论无主题理论的影响,《西游记》论坛也有学者持此种观点,例如林岗就坚持《西游记》“无自觉主题”或“模糊主题”的看法^④。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学术空前繁荣,《西游记》论坛已无任何禁区,主题研究又成热点,呈现多元、纵深、万马奔腾的局面。先后出现了王国光的“密码”说^⑤,诸葛志的“将功赎罪”说^⑥,刘勇强、李安纲的“心路历程”说^⑦,田同旭的“情理相争”说^⑧,方克强、杨义的“神话母题”说^⑨,克珠群佩、王意如的“崇佛(禅宗)”说^⑩,竺洪波的“追求哲理和审美意义上的自由”说^⑪,康金生的“宣扬佛法及其政治作用”说^⑫,黄霖的“弘扬人的自由和人性”说^⑬,以及李安纲的“金丹大道”说。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王国光“密码”说、诸葛志“将功赎罪”说、田同旭“情理相争”说、李安纲“金丹大道”说、黄霖“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善”说。现分别评析如下。

王国光是一位业余研究者,但对《西游记》情有独钟,孜孜矻矻三十载,写成专著《西游记别论》,他提出:吴承恩采取“复意双关、内外两像”的写作方法,使得《西游记》成为“一份世界上篇幅最长的密

① 高明阁《〈西游记〉里的神魔问题》,《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

② 参见周中明《关于〈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安徽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 王齐洲《孙悟空与神魔世界》,《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

④ 参见林岗《〈西游记〉研究一议》,《光明日报》1984年5月29日。

⑤ 王国光《西游记别论》,学林出版社,1990年。

⑥ 诸葛志《〈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⑦ 刘勇强《〈西游记〉:奇特的精神漫游》,《文史知识》1991年第4期,李安纲:《心路历程:〈西游记〉主题新论》,《晋阳学刊》1993年第5期。

⑧ 田同旭《〈西游记〉是部情理小说——〈西游记〉主题新记》,《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⑨ 方克强《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文艺争鸣》1990年第3期;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⑩ 克珠群佩、王意如《论〈西游记〉的崇佛倾向》,《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1—2期。

⑪ 竺洪波《自由:〈西游记〉主题新说》,《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⑫ 康金声《〈西游记〉的文化信息与主题思想》,《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⑬ 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对于自我价值和人性美的追求——关于〈西游记〉的主要精神》,《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码”,其内涵是“三藏经”,即作者的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丹术思想,并对其中的十三个主要故事进行重点探究,分别以宦官专权误国、特务(东西两厂)横行、皇亲特权、唯道独尊、“文豹隐雾”(指假隐士)等明代最为显著的社会现象对应坐实,试图对这份“密码”进行有效的揭秘。他借鉴“红学”索隐派的路数,运用征引、诠释、训诂等传统治学方法,提出了许多别出心裁的见解。如断言驼罗庄蛇妖故事系讽贬明朝宦官为祸“酷矣”。其理由是:(1)作品言蛇妖“未归人道,阴气还重”,其解释为“古人以男为阳女为阴”,“称男子没有性生活能力的叫‘不知人道’”。(2)故事发生地“七绝山稀柿衞”(“柿”亦作“屎”),王氏注道:“‘绝’字的一种含义即没有子孙后代”;又“‘七绝’的内容,即益寿、多阴、无鸟巢、无虫、霜叶可观、嘉实、枝叶肥大,其中也含隐喻阉宦的内容”;且“柿”、“屎”和“寺”音通,“而古代称阉宦为‘寺人’”。(3)蛇妖的武器是“两条信”(即软柄长枪),其实是蛇的开叉的舌头,古人称宦官“一簣两舌、妄言谬语”,又时常陪伴皇帝左右,“最易以唇枪舌剑屠戮生灵”^①。这样的解释虽不可能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但确实言出有据,且极富文化渊源,有力地印证了“密码”说,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的基本内容曾于1980年先行在新加坡中文期刊《石叻》连载,题名为《〈西游记〉漫谈》,当时即引起轰动,编者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惊人发现”^②。1990年4月20日,上海古典文学研究会、学林出版社、浙江省建德县文联借座上海第一师范学校(今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联合举办了《西游记别论》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三十余人,就《西游记》成书背景、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结构特点诸论题,以及王国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热烈的研讨。《文汇报》、《新民晚报》等上海媒体先后作了报道、评述,遂使“密码”说成为新时期《西游记》主题研究中一个较有影响的论点。

“将功赎罪”说在20世纪70年代已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神学学

① 参见王国光《西游记别论》之“驼罗庄”一节。

② 转引自李韩林《西游记别论·跋》。

者余国藩首倡^①,90年代后大陆学者诸葛志在《〈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续篇》(《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等论文中进行了反复论述,加以完善发展,并从神学理论中驳离出来。诸葛氏指出:“《西游记》的主题,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它是一部描写‘将功赎罪’悲剧的小说。”具体而言,唐僧为不听如来说法的罪过赎罪,孙悟空为大闹天宫的弥天大罪赎罪,猪八戒为调戏嫦娥的流氓行径赎罪,沙和尚为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琉璃盏的罪过赎罪,小龙马为纵火烧了西海龙宫的一颗夜明珠的罪过赎罪。由此,作者将作品的内容概括为:“在这个神话世界里,《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用唐僧五圣各自的罪过开场,以克服神佛妖魔所设下的种种凶难作赎罪的代价,通过五圣‘犯罪—赎罪—上西天’的苦难历程,表现出东土大唐人生作恶犯罪的方方面面和人们一旦有了罪恶感就自强不息地执著于赎罪的被动入世精神。”他声称:我们只要抓住这个由五条经线贯穿的主题,“《西游记》的故事分析起来就可以头头是道,而数百年来学人众说纷纭的这桩公案,大概可以大白于天下”^②。

田同旭将《西游记》与明代中后期追求个性解放的心学思想和“以情反理”的文学思潮结合起来,提出《西游记》“第一次把明代社会新思潮引入小说创作”,是一部“以情理斗争为宗旨”、“反映情理主题的先驱之作”。他认为作品中其情理对立的主要代表是猪八戒、孙悟空与唐僧——猪八戒是弘扬人欲的凯歌,孙悟空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斗战胜佛”的封号象征了情欲反抗天理的最后胜利,而唐僧形象(软弱、迂腐)的意义则在于“实际上宣告了程朱理学的破产”^③。

笔者以为“情理相争”说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西游记》主题观,而且还在于对孙悟空、猪八戒和唐僧等主要人物有了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认识。如田同旭在《〈西游记〉是部情理小说》一文中评论猪八戒:

① 参见余国藩《英雄诗——〈西游记〉的另一个观察》,《中国时报》(台北)1973年12月13、14日。

② 诸葛志《〈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

③ 田同旭《〈西游记〉是部情理小说——〈西游记〉主题新论》,《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猪八戒原是统率八万天河神兵的天蓬元帅。坚守天河,他应当有个任务,防止牛郎织女私自相会;而他自己却偏偏在蟠桃会后逞酒调戏嫦娥被打下凡界。猪八戒是放纵性欲而受到天理惩罚的。然而,尽管他受到如此惩罚,下界后仍然欲心不灭,第一件事就是和云栈洞卵二姐共度巫山云雨,又招亲高老庄坦腹东床。即使做了和尚,仍然六根不净,西天一路,每遇女子,不论是人是妖,“便眼不转睛,淫心紊乱,色胆纵横”,“看到好处,忍不住口嘴流涎,心头撞鹿,一时间骨麻筋软,便好似雪狮子向火,不觉的都化去了。”一直到快成正果,在西天佛界遇到嫦娥,还忍不住跳到空中和霓裳仙子调情一番。可见,天理佛法,都难以扼杀猪八戒的情欲。

又如评论孙悟空:

孙悟空是个由一块石头造化出来的自然之子。作为猴子,他极端好动,永不安生;作为人,他“一生受不得气”;作为神,他不愿受任何束缚。一句话,孙悟空追求的是个性解放,任情随欲。在程朱理学统治的天罗地网中,孙悟空庄严地宣布,他的本性不可扼杀,人的情欲不可战胜。不受阎王束缚,不受天宫束缚,不受唐僧束缚,不受菩萨束缚,不受妖怪束缚,不受佛祖束缚,可谓其主导性格;而且,不论谁束缚他,他就反抗谁,反抗成为孙悟空性格的本质。

作为《西游记》人物论,这些新颖、深刻的论述标志着这一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而将这些人物放进明代特有的历史背景,开辟情理相争的独特视角,是其直接和根本的动因。尤可注意者,他将猪八戒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甚至置于孙悟空之上。

黄霖的“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善”说,是世纪之交《西游记》论坛十分醒目的主题观。1998年,他在《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一文中指出:前人关于《西游记》“游戏之中暗传密谛”(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总批》)的哲理性寓意应予“承认”,这种哲理明显就是“被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也即是说作家(《西游记》的写定者)“主观上想通过塑造孙悟空的形象来宣扬‘明心见性’,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实际上由于心学本身在发展中蕴含着

张扬个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倾向,而它“又和西游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积淀的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相结合”,所以在《西游记》的具体描写中,它“表现的精神明显地向着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善倾斜”,孙悟空这一恣意“放心”的“大圣”,终于成为一个“饱和着作者的理想和时代精神”,“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征”^①。后来,黄霖又著述《对于自我价值和人性美的追求》一文,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主题观,并明确将其表述为:“(《西游记》)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精神,就是在游戏之中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社会对于自我价值和人性美的肯定和追求的思潮。”^②

在新时期《西游记》主题研究中,值得引起重视的还有李安纲的“金丹大道”说。李安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涉足《西游记》论坛,起步甚晚,但气势猛、力度大,以宗教文化研究的特点和成绩为世人瞩目。对李安纲的宗教文化研究后文当有论述,这里仅就“金丹大道”说这一主题观略说几句。他依循清初汪澹漪证道说,却比汪氏有近乎极端的发展。从90年代初发表《美猴王探源》、《美猴王与易卦》、《心路历程:〈西游记〉主题新论》等论文^③中提出“心路历程”说,实际上已经有了“金丹大道”说的要素,因为他将“修心成佛”的心路历程归结为“修炼金丹大道”,初步完成了《西游记》佛教故事的道教化。1995年,李氏连续推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西游记〉主题是修心证道》两篇力作^④,并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专著《苦海与极乐——〈西游记〉奥义》,正式确立“金丹大道”说。随后,他又一鼓作气写出了《〈还源篇〉是唐僧八十一难原型》(《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论〈西游记〉诗词韵文的金丹学主旨》(《晋阳学刊》1996年第3期)、《〈性命圭旨〉是〈西游记〉的文化原型》(《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等重要论文,全面阐述了他的“金丹大道”说主题观,对《西游记》论坛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① 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② 黄霖《关于自我价值和人性美的追求——关于〈西游记〉的主要精神》,《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③ 分别载《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晋阳学刊》1993年第5期。

④ 分别载《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编辑之友》1995年第4期。

在李安纲“金丹大道”说的影响下^①,有许多学者从宗教方面来阐释《西游记》的主题。其中从道教来透视《西游记》的,其观点多与李安纲接近,有的原本即与李安纲相呼应。这一派的代表作有王圣乙《四众五行合三藏——谈五行学说在〈西游记〉中的体现》(《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张乘健《略论〈西游记〉与道教》(《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陈金宽《〈西游记〉宗教修行内景探微》(《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刘直《漫谈〈西游记〉文笔的道教情趣》(《中国道教》1998年第2期)、孙国中《〈西游记〉作者及其创意初探》(《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苟波《试谈〈西游记〉的道教内涵》(《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4期)、郭健《〈西游记〉中“真经”的内丹学含义》(《中国道教》2001年第5期)等等。还有一些学者或从佛教,或从儒教,或从儒道互补,或从三教合一等方面来揭示《西游记》的主题,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论文,但从总体影响上看皆不及道教方面巨大。

纵观新时期《西游记》主题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发端,至90年代多元、深入、全方位地展开,各派新说蜂起,各领风骚,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有力地推动了整个《西游记》研究。然而问题亦多,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困惑始终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么多主题观交相辉映,精彩纷呈,但始终未见一个真正能够涵盖、贯穿《西游记》整体,富有统率性、针对性和宏观性主题观的最终确立。如果说“谈禅”、“证道”一类明清旧论穿凿附会,偏离《西游记》实际甚远;五六十年代政治性、阶级论主题观也存在意识形态性过火、过强,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常的文艺批评轨道;那么,新时期涌现出的主题观的弊端则在于太过零碎,总显其偏执一辞,从早期的“安天医国”、“诛奸尚贤”、“歌颂市民”、“人生哲理”诸说,到后起之“密码”、“赎罪”、“情理”、“心路历程”种种主题观,莫不如此。一个新的主题观的提出,其意义似乎只是量的递增,而没有质的提升,所以每每流行一阵之后便偃旗息鼓。从这一点上说,应该承认,以李安纲为代表的宗教性主题观具备一以贯之的特点,其影响也颇为持久。但诚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游记》本质上是艺术,不是宗教,这一派的研究隐含着将《西游记》视为

^① 这种影响有直接、间接之别,大小不等,这里不作探究。

宗教文本、异化其艺术本体的危险,从另一个方面违背了作品的实际。客观地说,把《西游记》的主题界定为“金丹大道”,实际上是将这部名著的丰富思想消解了,其思维路数与汪澹漪、陈士斌辈如出一辙。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反思。我以为:一方面,像《西游记》这样一部“说不尽”的皇皇巨著,因其内容繁富、意蕴深远,择其一枝一脉,便足可探幽发微,甚或歪打也能正着。所以,任何社会条件、时代精神的变迁导致认识水平的变化,诸如视角的转轨、方法论的更新等等,都可能催生出新的主题观。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也可说是文艺批评的规律。另一方面,《西游记》是千古奇书,探求主题绝非易事。主题指的是作品的中心思想、主要精神、主导情感,但这种思想、精神和情感蕴藏在丰富的形象之中,并非一目了然,能随意抽象出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也许正体现了《西游记》这部“天书”的特殊性,是我们揭示其主题的一个必要阶段,这些众多的主题观固然显示着量的递增,但量的递增实际上已在酝酿、引导着质的提升。而且,这种主题的难解性正仿佛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人们进行孜孜之不倦的探究,使之有理由、有勇气不拘成见,另辟蹊径,作新的思索,直至最终揭开这个“海内一大闷葫芦”^①。

二、《西游记》的文化阐释

新时期《西游记》文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化阐释。它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主题研究同步,甚或两者融为一体,因为主题研究离不开作品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承载,特别是后起之种种主题观其实质也无不是对作品的一种文化阐释。《西游记》主题观的演进说到底反映着文化研究的进程。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剧,国内外文化交流全面展开,思想与学术研究焕然勃兴,许多西方观念和方法蜂拥流入,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发端,萨特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尧斯的接受美学、荣格的神话原型批评、韦勒克的新批评、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等,几乎西方所有的

^①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

学术流派和文论都逐一得到介绍和借鉴,从而引发了一场研究方法的巨大裂变,1983、1984年甚至被誉为“方法年”。借助这些形形色色的研究方法,在《西游记》论坛,以阐释作品文化蕴涵为宗旨的文化研究也开展起来,并日益与传统的主题研究相剥离,从而构成一个相对集中而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一文化研究热潮,从80年代云起,至90年代达到鼎盛,至今方兴未艾,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新时期《西游记》学术史。

首先呈现文化研究流向并对《西游记》文化阐释作出突出成绩的当推神话原型批评。由于《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神魔小说,从艺术精神上与远古神话有着天然的联系,文化研究由神话原型批评发端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从神话研究的广义上讲,那么这一类型的文化阐释由来已久。鲁迅、胡适时已开始从中西神话传统来探求孙悟空的原型依据(来源)。80年代初期在《〈西游记〉里的神魔问题》(《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季羨林《〈西游记〉与〈罗摩衍那〉》(《文学遗产》1981年第3期)、陈漱《论〈西游记〉中神佛与妖魔的对立》(《文史哲》1981年第5期)等重要论文中,也已有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因子。不过,如果将它视为现代西方特有的文学观念和学术方法,那么神话原型批评有其特殊的规定。荣格的解释最有普遍性,他认为原型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是一切心理反应的普遍一致的先验性形式,也即“由各种遗传力量形成的一定的心理倾向”;而保存着人类丰富原型资源的文化载体便是神话,他说:“原始意象或者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这形象是魔鬼,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过程),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①弗莱则从神话中归纳出四种基本原型:诞生、死亡、胜利、毁灭,并分别用春、秋、夏、冬四季作为象征性指代^②。在《西游记》文化阐释中,这种神话原型批评意识在萧兵和蔡铁鹰的系列论文中开始凸显出来。他们自觉地借用文化人类学特别是神话原型批评的概念和方法,对《西游记》的神话本体进行全方位审视,声称要“还原”作品的本来面目,揭示其潜在的“原逻辑”。萧兵认为《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一类神魔小说的最大特征是其作为再生

①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37、120页。

② 参见王宁等编《弗莱研究:东方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1页。

态神话,以神话思维的形式表现中国古代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天真解释”^①。蔡铁鹰则广泛搜集中国远古神话、民族图腾、祖先传统和民间曲艺来探寻孙悟空的原型来源,以及取经故事盛于中原而成于西域的奥秘,揭示出《西游记》(主要是孙悟空)的“文化归属”、文化内涵和成书之谜^②。他们的研究堪称神话原型批评的第一波热浪。

在《西游记》神话原型批评的演进中,一些西方文论研究者起到了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影响突出的是方克强。1990年初,他根据正在写作的专著《文化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将其中的一章《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先行发表于《文艺争鸣》杂志,第一次全面分析了《西游记》的原型意义,并归纳出“儿童犯错→严酷考验→成年命名”这一文化原型模式。他指出:如从神话原型批评的立场来看,取经事业是“秉承神意和被迫的”,“从根本上是神佛的事业”,作品遵循的是非常规的艺术思维逻辑,是“一种有悖常理的荒诞逻辑”,“所谓‘正义’与‘邪恶’不过是游戏的玩法和规则”,因而得到的理解可能与传统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作品的核心是一个远古成年礼的原型模式。其具体论述如下:

《西游记》的取经故事正是基于这一原型。这就是说,它的情节框架与远古的成年礼仪式有着同构关系,两者在深层意蕴方面是重合的。成年礼仪式的安排和主持者是代表部落社会的老人或头人,取经的暗中操纵者是佛社会的象征如来,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考验人的毅力和让人懂得服从;前者的参加者已进入成年年龄而心理上乃是不成熟的儿童,后者中的唐僧师徒则都犯过儿童性错误而显示了心智上的不成熟;前者以入社会者被纳进成人社会而告结束,后者以唐僧师徒成佛而宣告他们成人资格的获取和加入佛社会;前者必须经过种种仪式性的严酷考验,后者则有八十一难,九九之数,即意味着难之极限和严酷性,又透露出既定

① 参见萧兵《〈西游记〉——文化开放的象征:兼论泛西域猿猴传统》(《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2期)、《〈封神演义〉的拟史诗性及其生成》(《明清小说研究》1982年第2期)、《盗火英雄:夸父与普罗米修斯》(《活页文史丛刊》)、《楚辞与神话:西王母以猿猴为图腾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等。

② 参见蔡铁鹰《猴行者与古羌人的氏族图腾及祖先传说:孙悟空形象探源之四》(《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元明之际取经故事系统的流向和影响——孙悟空形象探源之三》(《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1期)等文。

的仪式化倾向;前者往往有狩猎技能的训练,后者则是征魔方法的传授,而许多妖魔又恰恰以动物成精的形态出现;前者中的考验让人体验到死亡情绪却不会真正致死,后者则每每离死亡只有半步,便由神佛出面帮助,以死亡威胁与体验为限;前者具有由人生的儿童阶段而至成年阶段的象征性质,后者也体现了从心理不成熟过渡到成熟的再生意味。因此,取经情节与成人礼仪式都贯通着儿童→考验→成人这一基本的原型结构。^①

这段论述将《西游记》与远古成年礼的原始意象(原型)对照得十分详细,并从原罪、受难(赎罪)和解脱等环节证实了“儿童犯错→严酷考验→成年命名”这一文化原型模式。不仅完成了一次神话原型批评的个案解剖,而且以其所阐释的广泛的文化内涵引人关注,为后来的神话原型批评提供了范例。纵观以后的许多同类研究,其共同点是:以荣格、弗莱、弗雷泽等人的原型理论为依据,将《西游记》视为神话本体(或再生型),阐释其中的文化内涵和远古原型意义。

应该说,就《西游记》神话文化阐释而言,集大成之作非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一文莫属。这篇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于1995年第一期隆重推出的长文无可争议地代表着《西游记》神话原型批评的最高成就。全文由四大部分组成:(1)“三教归心”的精神纽结和超宗教自由心态;(2)个性神群体及其精神哲学隐喻;(3)神魔观念重扬及其拓展的幻想空间;(4)神秘数字和神奇情节相结合的结构体系。它首先考察了神话与小说的关系,认为神话是小说的多种源头之一,小说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和宗教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舍弃了“神魔小说”的概念,而重新将《西游记》界定为“神话小说”,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神话文化”。作者说:

“神话文化”是一个比原始神话信仰更宽泛的概念,它考虑到中国神话以及神话元素的驳杂、散落和在民间信仰中的广泛渗透性、历代文字记录的零碎性,明显地具有与西方史诗神话不同的形态、命运和发展历程。在早期的《山海经》时代,它粘附着山川

^① 方克强《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文艺争鸣》1990年第3期。又见《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63页。

地域的因缘,具有与史诗神话迥异的非情节的、而是片断的,非英雄主义的、而是多义性的形态,具有更为充分的初民性和原始美。其后它又受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贬抑,散落于志怪书和民俗传说之中,并在宗教潮流的裹挟下,参与建构神谱。谁又能够想到在我国近古的“三教归心”的潮流中,它又涉取了千年宗教发展的智慧而超越具体宗教的迷执,以超宗教的自由心态焕发出宏伟绮丽的神话想象力,并以《西游记》代表了我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①

如此对中国神话文化的鉴别和界定,实际上体现了对《西游记》神话特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既认识到它与原始神话的本质区别,也充分注意到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在此基础上,杨义进一步指出,《西游记》是运用神话思维创造出来的,通篇充满“神话隐喻”,作为中国神话的大器晚成之作,其超越远古神话,“堪称独步的地方,是在个性神话中增加了‘哲理—心理’的复调。它发掘着个性深层的精神意蕴,借神话故事思考着人的主体,思考着人的心性,思考着人的信仰、意志和生命力。即是说,它寻找着人的精神历程的神话原型,使神话成了精神哲学(或心学)的隐喻”。所以,《西游记》的意义“代表着我国神话文化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型”,它“以小说的形式把我国神话文化的形态面貌从根本上改变了”,它是一部我国“神话文化的伟大杰构”^②。注重神话本体研究,并将其纳入中国神话传统,肯定其神话文化的历史内涵,这对于《西游记》文本不啻具有返璞归真、拨乱反正的意义。

其次,与神话原型批评密切相关,并为新时期《西游记》文本研究带来新气象的是童话学研究。

运用童话学视角审视《西游记》,体现出这部奇书得天独厚的学术品质。相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其他古典小说名著,童话学视角实在是《西游记》研究所特有的,因为它拓宽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领域。把《西游记》视为一部童话作品,可能源于胡适,他不仅称其为“神话小说”(这是我们熟知的),也称其为“童话小说”,他在评价《西游记》前七回大闹天宫故事时曾将之与英

①② 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国卡罗尔的童话经典《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并举：“（《西游记》）正如英文的《阿梨思梦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虽然含有很有意味的哲学，仍旧是一部极滑稽的童话小说。（此书已由我的朋友赵元任先生译出，由商务出版）。现在有许多人研究儿童文学，我很郑重的向他们推荐这七回天宫革命失败英雄《齐天大圣传》。”^①袁圣时于1948年作《〈西游记〉研究》（刊《台湾文化》1948年第3卷第1、2期）时明确说：“今观《西游记》纵恣谐谑，独逞胸臆，其调诃之所及，至于仙佛同仁，神魔一体，其他神话小说中固未见有此种格调也，故吾曰，谓之为世界的一部绝大童话小说，宁非尤宜。”^②他认可了胡适的论断。

新时期有一批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家基于《西游记》为历代儿童所喜爱的事实，站在童话美学的力场，力主《西游记》为童话作品，或认为《西游记》具有童话特质和童话价值。任大星最早撰文以其为“伟大的中国童话”^③，吴其南和金燕玉的两部《中国童话史》都列有专章作重点论述，其中吴著称《西游记》是“一部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准童话”^④，金著则誉之为“瑰丽璀璨的长篇童话”^⑤。竺洪波虽“并不主张把《西游记》一类作品完全当作儿童文学（童话），但也不否认《西游记》与儿童文学的密切关系，更认为从儿童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游记》是完全必要的”，并作《游戏与自由：〈西游记〉评述》一文，对《西游记》的儿童文学特征进行了具体论述^⑥。其中金燕玉的研究引起《西游记》研究界的注意，其同一内容的论文被收入《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一场关于神话与童话的论辩揭开了《西游记》童话学研究的序幕。1984年，白盾发表《论〈西游记〉的童话特征》一文，他根据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的论断指出：“希腊民族是有别于‘早熟的儿童’和‘粗野的儿童’的‘正常的儿童’，是‘人性开展得最美好的幼年时期’。因而，

① 胡适《〈西游记〉考证》。

② 转引自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66页。

③ 任大星《从儿童模仿孙悟空想起的》，《东海》1980年第6期。

④ 吴其南《中国童话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第91页。

⑤ 金燕玉《中国童话史》，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

⑥ 参见竺洪波《智慧的觉醒》，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

他们创造的神话和史诗‘所产生的魅力’,正来自那些使人‘感到愉快’的‘儿童的天真’。”认为“神话就先天地带有童话的基因,因为它们均在不同方式上反映出‘儿童的天真’”。而《西游记》最大的特征在于“神话与童话的交融”^①。白文随即遭到质疑。汪瑰曼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马克思以“儿童的天真”论述古希腊神话只是一种比喻,而不该作“实在的、刻板的理解”,《西游记》固然具有神话与童话交融的特征,“但这种交融不是由于神话先天带有的童话因素的隔代遗传,而是因为《西游记》本身就不是神话,而是作者的创作,是神话、历史和传说的故事糅合”。所以,“吴承恩不可能新创神话,只能以神话、历史和传说为原料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童话式的小说”。这一观点在陶思炎、李欣复等人的文章中也得到了认同。

在明确肯定《西游记》为童话作品之后,汪文重点论述了童话与远古原始神话的“本质区别”:

神话出自原始人的幼稚认识,是对自然和现实的不自觉的加工,神话的作者以为自然和现实本该如此,事实如此;童话出于后世人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是对社会现实的自觉的加工。神话表现对神祇的敬畏,在本质上是严肃的,只是认识的幼稚;童话从儿童的眼光看世界,具有童心童趣。神话中有神格中枢,其中的神具有灵性,童话中则为人格中枢,其中的真人且不说,即便是丑小鸭、野天鹅、坚定的锡兵等非人的事物,实际上也是人的物化形式,或者说是物的人格化,具有人性。神话中幻想是自然力的象征,童话中幻想是人世的譬喻。因此,要阐明《西游记》中神话与童话的交融就必须说明小说中这两种不同的本质的互相渗透。神话和童话二者都用幻想形式,但幻想的性质不同,不把握两种幻想形式的质的差异就不能算是把握了神话和童话的本质区别,也就不能阐明小说中哪些幻想属于神话因素,哪些幻想属于童话因素,以及二者的交融。^②

从以上引述的文字可以看出两点:(1)这场争辩其实质是围绕神话与童话的认识,也可以看作《西游记》是神话小说抑或人魔小说之争

① 白盾《论〈西游记〉的童话特征》,《光明日报》1984年5月8日。

② 汪瑰曼《也谈〈西游记〉中神话和童话的交融》,《光明日报》1984年6月26日。

的进一步延伸。(2) 双方虽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断有不同的认识,但一致认为《西游记》是一部“童话式的小说”,或“具有童话的若干特征”,并且公认《西游记》的永恒魅力正源于“儿童的天真”,“神话与童话的融合”。客观地说,前一问题涉及原始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关系,两者确有区别,也确有联系。《西游记》无疑是自觉的艺术思维的结晶,但作为世代累积型作品,也无疑保存着华夏民族远古神话的丰富资源,所以很难说它一定不是神话小说;不过,也很难说一定是神话小说,故而事实上不可能有定论。这场论辩的意义在于第二个问题:为《西游记》文本阐释开辟了童话学研究这一新的视角和领域。

新时期《西游记》童话学研究在林庚的专著《西游记漫话》中得到充分体现。我将它选择为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作,是因为:第一,它的作者林庚是一位“五四”以来著名诗人和学者,天性烂漫、充满童真,其论著无论是《唐诗综论》、《诗人李白》、《中国文学简史》,还是《西游记漫话》,极富艺术感悟和理性深度,在我国当代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第二,它以专著形式出现,论述比较丰富、集中,其中有两章《童心说》、《童话的天真世界》涉及本命题。第三,它的童话学研究最为自觉,也最为明确,最富成果。

第一点姑且不论。先说第三点。林庚在该书《后记》中劈头说:“《西游记》是一部富于童话性的小说,童话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都是不可多得的,而我本人又历来喜欢童话,甚至于与童话相关的各种动画片,我至今对它们仍然兴味不减,所以也就格外偏爱《西游记》。十年动乱期间,夜读《西游记》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①可见其童话学研究,一方面系诗人气质使然,另一方面也与特殊的社会条件相关,是充分自觉与明确的。需要补充的是,他的这一学术趋向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见端倪,他曾力主神话性、童话性与当时流行的“农民起义”说相颉颃^②。

至于其研究的成果,最突出的有两条。第一条是深入地阐述了

① 林庚《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40页。以下引文皆出该书。

② 参见林庚《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文艺报》1956年第13期,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之《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1958年。

《西游记》的童话精神与明代中后期的文学思潮“童心说”的关系。林庚指出：

在正统的重压之下与虚伪的风气中，追求那一颗赤子之心的放任天真，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放诞，这正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在现实社会中，李贽等人贯彻“童心说”的精神，最终而不免于人生的失败，可是，童心作为一种理想，又可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这就是《西游记》中天真烂漫的童话精神的由来，是孙悟空自由不羁、超越一切束缚的精神状态的一个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游记》正是体现了明代中后期激进文人精神解放的浪漫追求。

在分析孙悟空形象时，他又指出：

它（《西游记》）以儿童的天真烂漫的情趣讲述着动物世界的奇异故事以及它所赋予孙悟空的活泼好动、富于想象和轻独游戏的乐观性格，都正暗含着当时社会思潮中寻求精神解放与回到心灵原初状态的普遍向往。《西游记》中的童话精神与李贽的“童心说”，分别在文学与哲学的不同领域中体现了这共同的向往。

这些论述从《西游记》的文化背景中精辟地揭示出童话精神的必然性，也为《西游记》童话学研究找到了历史、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理论依据。

第二点在于比较全面、具体和深入地论述了《西游记》童话精神的实质和内涵。林庚指出正是童话精神使《西游记》与远古神话和一切成人小说相区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名著：它从“儿童的眼光”看世界，以“儿童的模仿的天性与天真的想象”作为反映和评判的“心理依据”，并且保证“将全部的兴趣投入到一个动物世界”。他认为这直接赋予了作品乐观、快乐的精神情调，“因为童年并不知道什么真正的悲哀，它陶醉在不断生长着的快乐中，为面向无限的发展所鼓舞”，“而童年的世界又是自由的、未定型的，显示着无限发展的潜力与可能性”，从而享受着“无尽的快乐”。他还重点解剖了孙悟空的形象，以为其“活泼充沛的想象与自由不羁的性格”，“从来都有那样好的兴致，那样乐观的心情”，只有在童话精神的观照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正是孙悟空的完美形象构成了《西游记》童话精神和童话

逻辑的集中体现。

再次,审美文化研究构成了新时期《西游记》文化阐释的一大重点。艺术是审美创造,《西游记》是这种审美创造的结晶,从这一意义上说,对《西游记》的艺术审美研究贯穿整个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并且从来不会或缺。但我这里讲的审美文化研究并非指单纯的艺术分析,而是将《西游记》作为完整的审美对象,一个特定时代审美实践和审美文化的历史积淀,运用美学学科的原理和方法论,从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审美关系上,从艺术现实和理论透视的结合上来审察、阐释《西游记》无比丰厚的审美文化内涵——作为人类审美领域的不断展开,它凝结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等不同的审美形态;作为在人类审美历史中的文化积淀,它表现为崇高、和谐、悲剧、喜剧、荒诞、审丑等不同的审美文化类型;而从这两个系列的整合中,则呈现为一定历史时代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时尚(潮流)等等——这些恰恰是对《西游记》审美文化的真正认定和确证。

在新时期《西游记》研究中最早透露出这一审美文化趋向的是李欣复发表于《文史哲》1983年第4期上的《也谈〈西游记〉的审美认识价值》一文。当时,《西游记》论坛热衷于对主题性质的讨论,并且较多地纠缠于政治性(阶级性)主题观,还明显带有某些极“左”思潮的束缚。为此,何满子率先发表《把艺术从社会学的框子里解放出来》、《〈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等文章,呼吁《西游记》研究应打破庸俗社会学的“框子”。李欣复则从另一个方面,从审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对此现象作出积极的反拨,他指出:

统观各家意见,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是都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直接间接地反映着现实世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反映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生活。我认为,文艺虽然归根结蒂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审美意识,有不同于一般社会意识的独特个性和表现方式。而且,由于这一特点,每一部成功的作品,作家在反映生活、表现自己认识的过程中,又都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着极其不同的方法,因而不能用统一的模子去剖析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①

^① 李欣复《也谈〈西游记〉的审美认识价值》,《文史哲》1983年第4期。

他明确肯定“作品的主要人物和主题思想是其主要审美认识价值所在”，吴承恩的伟大之处不仅“在文艺史上创造了一部杰出作品”，而且“还为检验各种文艺和美学理论科学的真理性树立了一种主要的标尺”^①。

在新时期《西游记》审美文化研究中，在笔者看来，其第一篇力作是姜云的《〈西游记〉：一部以象征意义为主要特色的作品》一文。该文首先对在传统的研究中用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来评价《西游记》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因为它“并不能全面概括和反映它的总体艺术特色”。接着指出《西游记》最大的美学特征是象征主义，“用借此喻彼、假象见义的方法，巧妙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和对现实的批判”，整部《西游记》“是一种象外之境，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它表面写的是这件事，实际却暗示另一件事”，因而具有“暗示性、借喻性、象征性”的美学意蕴^②。

姜文的价值是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整合为象征主义，摆脱了政治性主题观的束缚，明确提出了哲理性主题观，更加贴近了《西游记》的审美实际，并且以其周详的审美分析和成果推动了新时期审美文化研究。至1998年，刘耿大在长期审美研究的基础上，推出其“十年磨一剑”的专著《西游记迷境探幽》（学林出版社，1998年），全面评述了《西游记》的审美文化特征和价值。本书上篇以浪漫主义精神立纲，重点论述《西游记》的神话性和喜剧性及其幽默风格，下篇具体展开审美研究，涉及均衡美、变化美、联系美、侧重美、音韵美等多重审美文化类型，内容十分丰富。本书堪称新时期《西游记》文本研究中审美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郭豫适高度评价了刘氏的审美文化研究，称其“努力以《西游记》文本为依据，认真踏实地对它的审美意蕴和修辞艺术进行分析、研究……深入研究和阐发这部优秀古典小说的审美经验、审美价值及其意义”^③。

可见，新时期的《西游记》审美文化研究，呈现着空前热烈、持久的

① 李欣复《也谈〈西游记〉的审美认识价值》，《文史哲》1983年第4期。

② 姜云《〈西游记〉：一部以象征主义为主要特色的作品》，《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

③ 郭豫适《评刘耿大对〈西游记〉审美意蕴和修辞艺术的研究》，《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局面,不仅论文数量庞大,而且还推出了像刘耿大《西游记迷境探幽》这样以审美研究为专题的长篇论著,而且在阐释审美文化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现将这一研究与《西游记》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之对应关系列表于下,以展示该研究的基本情状和实绩。

序号	审美文化形态、类型	审美文化研究代表作举隅	审美文化阐释
1	自然美	欧阳健《四方民物俱昭融》,《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对人与自然美好关系的向往
2	社会美	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对自我价值和人性美的追求
3	艺术美	方牧《〈西游记〉的主题、诗美及其他》,《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1期	《西游记》诗情照耀
4	崇高	竺洪波《论唐僧的精神》,《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为求真经九死一生而无悔的牺牲(崇高)精神
5	和谐(自由)	李安纲《孙悟空是人类心灵最完美的象征》,《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	对自由精神的礼赞
6	悲剧	刘洛《孙悟空的悲剧和吴承恩的悲剧》,《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	孙悟空反抗天庭失败的悲剧性及其根源
7	喜剧	朱其铠《论〈西游记〉的滑稽诙谐》,《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	《西游记》的喜剧风格、滑稽趣味
8	荒诞	陈冬季《变形、荒诞与象征》,《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2期	荒诞作为审美类型的艺术再现
9	幽默	柳宏雷《论〈西游记〉的幽默艺术风格》,《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例证《西游记》种种幽默
10	丑(审丑)	苏兴《〈西游记〉对明世宗的隐寓批判和嘲讽》,《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帝王昏庸、社会丑陋

作几点说明:其一,《西游记》是明清之际特定时代审美文化的集中体现,蕴含的审美意识无比丰厚,是包含了所谓“天道、地道、人道、神道”在内的“大美学”,审美文化研究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带有整体性的观照,对几乎所有的美学形态、类型和范畴都有涉及,现站在同一层面(也是第一层面)上列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三种基本形态和崇高、和谐(自由)、悲剧、喜剧、荒诞、幽默和审丑七种基本的审美文化类型,使得新时期《西游记》审美文化研究从整体上一目了然。其二,尽管这十大美学范畴处在同一层面,但由于其自身历史内涵的巨大差异,研究者审美视界的偏差,使得研究这些审美范畴的力度并不一致。据笔者初步统计,其中对社会美、艺术美、喜剧和幽默的透视最为集中,关于《西游记》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论文皆百篇计,而对自然美、崇高、和谐等审美范畴的关注相对薄弱,尤其是关于自然美,除却一般地涉及作品的地理背景或自然风光,如果从“自然人化”的审美理念来分析、阐释其中的美学意义,则颇为鲜见,就笔者所计,大约只有欧阳健《四方民物俱昭融——论〈西游记〉对人与自然美好关系的向往》一文较为纯粹。可见,从审美文化形态、类型、范畴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一研究尚不够平衡,一方面存在着过多过滥、高密度低层次重复的弊端,而另一方面则尚存在某些缺失,值得继续进一步发展。其三,应该承认,除个别项目,表中所列的代表作并非是最典型的,也绝不是唯一的,新时期审美文化研究是太丰富了,正如古人说读史“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矣”^①。面对新时期《西游记》审美文化研究的浩瀚文字,笔者也不过是为了说明问题取一瓢饮,信手拈来,“各充其量”而已,其目的是窥一斑而见全豹。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李安纲的宗教文化学研究无疑是新时期《西游记》文化阐释中的一类特殊现象。对其在《西游记》论坛产生的诸多积极和负面效应,都极有必要作尽可能客观、公正的评述。

由于《西游记》的情节本事是唐僧西天取经——一件真实的历史宗教故事,与儒释道三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②,所以从最早的世本

^①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② 目前学术界对儒教是否为宗教存在不同意见,可参见郭豫适《论儒教是否为宗教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的关系》,《半砖园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陈元之《序》开始即可见宗教研究的印记。五四时期,胡适、鲁迅一方面努力清洗明清时期诸种来自宗教的误解,如谈禅、证道之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围绕宗教内容来阐述《西游记》的思想价值。新时期《西游记》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安纲涉足《西游记》研究前后曾出现了大批阐释作品宗教文化的论文,举其要者有朱彤《论〈西游记〉的宗教批判》(《北方论坛》1982年第5期)、姚政《巫术·神话·宗教——〈西游记〉中反映的宗教观念》(《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袁世硕《宗教故事题材包孕了嘲谑宗教的内容——简议〈西游记〉的特点》(《文科月刊》1985年第4期)、张乘健《论〈西游记〉的宗教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吴承学《〈西游记〉的三教合一和佛道轩轻》(《汕头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徐振贵《试论道教对明代神魔小说的影响》(《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张锦池《宗教光环下的尘俗治平求索:论世本〈西游记〉的文化特征》(《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宋珂君《超越者的光辉——论〈西游记〉中的仙佛形象及其佛教渊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等等,在徐朔方、黄永年、苏兴、郭豫适、孙逊、李时人等人的著述中也有大量评判其宗教内容的文字。但是,李安纲的宗教文化研究与这些研究完全不同:前者从根本上说还属于一般性的思想批评(或谓社会、历史批评),从属于文艺批评的范畴;李安纲则已超越了文艺批评的界线,开始把《西游记》视为一个宗教文本。在90年代中期开始之后的十年间,他一以贯之地执著于《西游记》宗教文化研究,已出版《苦海与极乐——〈西游记〉奥义》等专著,并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还主编了两期《西游记文化学刊》,主持出版《西游记新评新校》。更为可贵者,他还分别在山西和北京主持召开了四届《西游记》文化学术研讨会,可谓数管齐下,多方出击,全面开花,在《西游记》论坛掀起了一阵旋风。李安纲的研究特点是:旗帜鲜明地宣称《西游记》是演绎金丹大道之作,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学术体系——从作者论来说,其作者“绝对不是(儒生)吴承恩”,而是道门中人;从版本论来说,《西游记》的前身应为明人周如山曾提及的“真正表现全真道教义”的九十九回本;从文本意义来说,《西游记》的文化原型是《性命圭旨》,其八十一难的来源是宋代石泰的《还

源篇》，它是一部“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自觉载体”^①。这些论点虽然尚存诸多商榷之处，如论“吴承恩绝对不是《西游记》作者”似嫌“绝对”，其整个体系亦遭致诸多批评，但应该承认，除却其中的一些谬误，作为《西游记》研究的一种类型，其成绩也是有目共睹，不可全盘抹杀。《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世界日报》等权威报刊曾多次转载其论文，介绍其学术成就，甚至誉其为学界“奇人”^②。在笔者看来，李安纲一派阵势壮观，并与一些海外学者遥相呼应，其论有“惊世骇俗”的效应，在《西游记》论坛引起的震动可以与80年代章培恒质疑吴承恩著作权所引起的震动等量齐观，其现象本身就是新时期思想解放，学术勃兴，《西游记》研究繁荣、兴旺的表现。对于李安纲文化研究中某些严重而又显而易见的偏颇和失误，笔者将在下文作专门的论述。

除此之外，新时期文本研究（文化阐释）还从叙事学、旅游学、法学、人体生命科学、气功、未来学、科学理性思维等方面展开过讨论，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论文，有力地推动了《西游记》文本研究朝多元、纵深方向发展。

三、《西游记》八十一难与《还源篇》未必侔合

——对李安纲《西游记》文化研究的一点批评

在当下《西游记》论坛，有山西学者李安纲力倡宗教文化研究，并突出道教的丹术思想，他不仅撰写论文，出版专著，还以自己的见解对《西游记》进行了“新评新校”，从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新见”主要包括：《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载体，其精髓是古代生命科学；道教典籍《性命圭旨》是《西游记》的文化原型；石泰《还源篇》是唐僧所历八十一难的原型；淮安儒生吴承恩不是《西游

① 参见李安纲系列论文：《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也谈〈西游记〉的版本次第》（《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性命圭旨〉是〈西游记〉的文化原型》（《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还源篇〉是唐僧八十一难原型》（《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载体》（《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② 高华平、杨方岗《〈西游记〉文化自觉载体透视——李安纲教授〈西游记〉研究述评》，《运城高专学报》1996年第3期。

记》的作者。笔者以为这些论点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平心而论,其中不乏精深的思考和可贵的真知,诚然远非“对明清陈说的翻版”一语可以概括。

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纵观李氏的著述,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当之论,抑或明显的谬误。这些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一处“硬伤”:魏徵的“徵”字在1953年以后始有简化字“征”,怎么可以析成“魏征(徵)二字,谓委身为鬼去征伐”呢^①?窃以为这虽是一个文史方面的细节问题,无关理论宏旨,但其中尚可透示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那就是:为了将《西游记》纳入道家思想的轨道,李氏不惜削足适履,对作品进行随意解释和附会。我们注意到,由于他对道教的研究有十年之功,对《性命圭旨》和《还源篇》确有不少心得,又因文艺作品“形象大于思想”的特性,所以就《西游记》中一般性形象和情节而言,这种具有道家意向的解释,大抵尚能做到自圆其说,尽管有时甚感牵强,兜的圈子也未免过大;但如果涉及史实——包括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他的解释就很容易露出破绽,于是新见遂成谬误。不唯“魏征”如此,对陈光蕊、殷开山的解释也是如此。他在印证《还源篇》第一章时说:“陈萼字光蕊,陈从耳东,是东方为木,所以名萼。”“光蕊老家在海州,海字从水每(母)为金,为铅;赴任到江州,江字从水工,为汞;而且任即任脉为阴,他由海州到江州就是以铅投汞。”“殷开山丞相,即阴开山。山为艮,卦象为(☶),被开破的山即是坤(☷)。坤为阴,为土,为母,所以开山姓殷谐阴;土为万物根本,又能调和万物,丹道中离不开土,故而称‘丞相’;并且生有一女名温娇。”^②这样的解释如孤立地看,即将它当作纯粹的文学虚构的形象和情节,似也无不可(当然,严格地说也有牵强处,如每与母在本义上并不相通。《说文》:“每,草盛上出也,从中,母声。”其意符为中,犹言茂盛,母只是起标音的作用),而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目前也成常识:陈光蕊、江流儿故事是“淮海一带的民间传说”,与史载玄奘西行求法分

① 参见宋谋场《是奥义发明,还是老调重弹?——评李安纲教授的〈西游记〉研究》,《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② 参见李安纲《〈还源篇〉是唐僧八十一难原型》,《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苦海与极乐》,东方出版社,1995年。

属不同的两个故事系统,由吴承恩(或别的人选)吸纳、整合后写进小说《西游记》,且徐渭《南词叙录》记载着南戏剧目《陈光蕊江流和尚》,“虽然剧本佚去,但据题目和钱南扬先生《宋元戏文辑佚》所辑残曲推测,所谈大概就是陈光蕊被害、江流和尚救父的故事”^①。它在出现并流行时,根本与小说《西游记》没有任何联系,其作者也并非道门中人,所以“陈光蕊”、“殷开山”的道家意义,什么“以铅投汞”啦,“姓殷谐阴”啦,显然不是其故事本身先验具有,而是由李安纲后天赋予的。

对李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将唐僧八十一难与石泰《还源篇》八十一章逐一挂钩,以为《还源篇》正是唐僧西游历难的原型。有论者从《西游记》版本论角度来透视其“真理性和稳定性”,指出:“李安纲先生还来不及对《西游记》复杂的版本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便贸然作出论断”,“又没有展开必要的论证,拿出必要的论据”,所以其结论“经不起版本的实际检验,差错迭出”,“特别是像唐僧取经八十一难以《还源篇》的八十一首诗为原型之类的论断,使人不免生谬悠荒唐之感”^②。

这实际上涉及《西游记》研究的一项准则:怎样从文本(版本)实际出发,以意逆志,尽可能使论断符合作者和作品的原初本意,并且,即使是有意识的“文化误读”,也须尊重公共交流的大众认知。

据目前资料,《西游记》最早的版本当推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鲁迅等学者猜测之前尚有更为远古的祖本存在,而在世本以后,《西游记》还在不断流变,一直延续至清代。这样就构成了复杂的版本系统,明本与清本、全本与简本、原本与笺评本等等这些不同版本关系相互夹缠,它们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便不可能整齐统一。同时,这样的版本事实也足以说明《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累积型巨著,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逐渐吸纳了不同时代的思想内容,所以作品三教九流内容驳杂,主题十分繁富,实际上很难找到某一部特定的书(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佛道典籍)来作为《西游记》的文化原型。

试从两个方面对李氏的论断作具体检测:

① 参见李时人《〈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

② 参见吴圣昔《评李安纲〈西游记〉论的版本基础》,《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先说第一条。《西游记》版本繁复,各本第九十九回难簿上对八十一难的排列有较大出入,早期世本的排列杂乱无章,完全与正文所叙不合;李评本作了全面调整,始与正文所叙基本吻合。清代记叙八十一难最为齐备的《新说西游记》的难簿依李评本排列,而众所周知,今人文本系以世本为底本并参考《新说西游记》等六种版本校勘而成,查其难簿主要按新说本排列,所以次序与明版世本完全不同。比如今人文本第七十三难为“失落兵器”,明世本则为“灭法国难行”,人文本第五十二难为“棘林吟咏”,世本则为“取宝救僧”;反过来世本第七十三难“灭法国难行”在人文本为第七十难,第五十二难“取宝救僧”在人文本则列为第五十一难。其错落一至于此。这与作品的结构有关。当年郑振铎曾将八十一难按其除魔故事本身的逻辑归并为四十一个故事,并由此将作品的结构命名为“蚯蚓结构”,其特征是“《西游记》的组织实是像一条蚯蚓似的,每节皆可独立,即斫去其一节一环,仍可以生存”^①。可见各本难簿次序不同并不影响唐僧历难求经的大旨。然而石泰的《还源篇》却不一样,作为唐宋内丹道经典,所叙者是一整套完备的炼丹理论,必须循序渐进,在步骤上来不得半点差池。更何况李安纲以世本(人文本)为依据,将唐僧八十一难与《还源篇》八十一篇逐条相联,并对两者进行相互印证,但殊不知不仅作为早期版本的世本相对谄陋和混乱,而且目前所见的人文本的历难次序系按清本排列,这就使得两者挂钩失却了充足的依据,其阐释、印证缺少了准星。如《还源篇》第一篇旨在“阴阳结太元”,而《西游记》第一难是“金蝉遭贬”,所言为“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摩(‘苦受摩’人文本改作‘变苦度’),降生世俗遭罗网”,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只好用什么“陈光蕊与满堂娇夫妻交媾”来比拟“阴阳结太元”。又如《还源篇》第八十一篇旨在“九九阳数足”,而《西游记》第八十一回却是“通天河遇鼋”。原来作者为了追求余波骤起之艺术效果,故意在唐僧四人顺利抵达灵山后,借观音凭空再生一难,令失信于老鼋的唐僧再受坠河之灾,所以两者根本无法联通。八十一难中唯首尾两难最具确定性,即如此不符,中间各难更为复杂多变,若要硬性将它

①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与《还源篇》一一相对,其难度可想而知,其穿凿牵强亦殊难避免。

再说第二条。《西游记》由世代累积而成,吸纳了自唐代以来几近千年间不同时代的种种故事,有些“难”汲取自百回本成书之前的笔记轶事和民间传说,有的甚至要早于两宋之际石泰作《还源篇》。要让这些历难故事成为类似《西游记》那样的“自觉中国传统文化(道家)载体”,并且形成完整的炼丹方法和次序,简直是天方夜谭。请看对李世民入冥故事的阐释。李安纲认为《西游记》的最大奥秘是生命科学,“是一部关于生命的小说”,全书“围绕着人类的身体而展开”,李世民是真正的主人公,唐僧一行四人加白龙马“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臣民”,是一枝一脉而已。其中如从五行讲,“悟空是火,唐僧为水,八戒为木,白龙为金,沙僧为土”;如从五脏讲,“火为心,水为肾,木为肝,金为肺,土为脾”,但它们都要接受“人”即李世民的统领。悟空大闹天宫、地狱、龙宫,“其实是李世民的心在大闹李世民的首、尾、腹三界体系”。“太宗入冥”的直接原因是孙悟空大闹三界,因为“心猿放逸,因而有第八回的金精西流,遂使‘我佛造经传极乐’。金精西流,遂使金蝉遭贬而东来;乾坤交媾之后,形成东离(☲)西坎(☵)的格局,进入后天,李世民遂有生死之灾”。

又是五行五脏,又是炼丹还源,什么“心猿放逸”,什么“金精西流”,其言炎炎,辨则辨矣。只不过,稍通中国小说史的人即知道,“太宗入冥”故事见之于敦煌变文和唐人笔记小说,其时石泰安在?孙悟空也还不见影子,何来“心猿放逸”大闹三界,太宗入冥怎么可能与孙猴子有关,又怎么可能与宋代才出现的《还源篇》扯上关系,所以这一段洋洋洒洒的文字只能是李安纲的一厢情愿,一味在无的放矢地放空枪空炮而已。

应该说,以上批评是有相当针对性的。但我们注意到,它还只在问题的显在层次展开,李氏在论述中的文史“硬伤”也罢,有悖版本实际也罢,都是从《西游记》与《还源篇》的相互关系上作检视。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还源篇》本身来作进一步考察,特别是结合唐宋内丹道的发展实际来鉴定“《还源篇》是唐僧八十一难原型”这一命题的真理性和可信度。

李安纲说：“《还源篇》有八十一章，《西游记》则有八十一难。”“《西游记》八十一难就是依照这八十一章绝句亦步亦趋地演绎而来”，“即《西游记》的结构模式，正是以石泰的《还源篇》为原型，而且这是丹道学上的规律”。

石泰，字得之，号杏林，又号翠玄子，以号杏林行世，常州人，生卒年不详^①。北宋内丹派大师张伯端嫡传弟子。为传师之道，作《还源篇》八十一章。他在此书《自序》中曾说到其师传授金丹大道以及作《还源篇》缘起：“昔年于驿中遇先师紫阳张真人，以简易之语，不过半句，其证验之效，只在片时，知仙之可学，私自生喜。及其金液交结，圣胎圆成。泰故作《还源篇》八十一章；五言绝句，以授晚学，早悟真詮。莫待老来铅虚汞少，急须猛省，寻师访道，修炼金丹，同成仙阶，变化飞升。”又在《还源篇后序》承引《悟真篇》“赫赫金丹一日成，不在三年九转行”之句，表明与张伯端的师承关系。其真实性可从张伯端《悟真篇·后序》得到印证：往昔张伯端在成都遇仙人得道，“成都真人”授其丹诀时曾警告他不许妄授他人，唯“异日有与汝解纆脱锁者，当宜授之”。这位“解纆脱锁者”便是石泰。后张伯端果因事受流配之刑，路遇石泰，石泰为他疏通官吏，免其罪（解纆脱锁），伯端遂传法给石泰。后世道家典籍如《紫阳真人悟真直指详说三乘秘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都有详细记载。

问题是作为最著名的唐宋内丹派经典张伯端《悟真篇》，内有律诗八十一首，《西江月》等词一十二首，歌颂诗曲杂言合三十二首，共计一百二十五首，体大思精，全面创立了内丹学说。这样，据此可对李氏的相关命题提出以下质疑。

第一，在道家内丹派，金丹修炼的实质是炼阴化阳，目的是要成就纯阳之体，故称其祖师吕洞宾为纯阳真人。而九九八十一，乃纯阳九九之数，故道家著作多有八十一之数以象征炼丹极境。如《悟真篇》有律诗八十一首，石泰《还源篇》有绝句八十一首，萧元瑞《金丹大成集》也有绝句八十一首。再往前溯，道教始祖老子《道德经》就是八十一章。而佛教也尚九九八十一之数，所谓佛门中九九归真。如释道安

^① 据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杏林）寿一百三十八，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尸解。”可推知其生卒年为1020—1158，虽不免妄诞，聊备一说。

《阿毗昙经序》中释“九断”，谓人处三界中，受欲、色、无色三界困惑，每界分三地，每地含九品，凡九九八十一品（惑），惟佛陀能“断灭烦恼而致解脱”^①。八十一品惑就是人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所以《西游记》中观音说“圣僧受过八十难，还少一难，不得完成此数”。可见李氏以《还源篇》和《西游记》唐僧历难各有八十一之数便将两者逐一挂钩，理由并不充足，或许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罢了。

第二，张伯端是唐宋内丹道宗师，其《悟真篇》是道教史上的不朽名篇，与《周易参同契》、《黄庭经》、《阴符经》并列为内丹道核心经典。石泰《还源篇》不过是“寻师证道”，拾其牙慧，其地位不如前者显赫，其影响不如前者深远。所以《西游记》如以金丹大道为统要，依循某一与九九八十一之数相契的道家经典“亦步亦趋地演绎而成”，那么这一经典必定是《悟真篇》，而不是《还源篇》。如果《西游记》的作者不取法彪炳史册的张伯端《悟真篇》而去关注石泰的二手货，那么他的道法修为就真值得怀疑了，断然不可能是一个精通金丹学、生命学、易经八卦、阴阳五行的全真人士了。事实上，从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开始，清代各种道家评本皆多以《悟真篇》注《西游》，而鲜见《还源篇》。然则，将《悟真篇》代替《还源篇》作为八十一难的原型就行吗？也还没有那么简单。《悟真篇》所叙丹法可概括为金丹、金液还丹和九转金液大还丹三步骤，涉及其中全部篇什，比如《西江月》十二首，据张伯端解释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夫火之功有十二，并沐浴共十有二月”，“以应周天之岁律也”，象征着内丹修炼必须经历十二个月，方可大功告成^②。唐僧八十一难果以它为原型，怎么可以只择取其中的八十一首律诗，而舍弃其余呢？李氏在《参同契》、《悟真篇》之外发掘出《还源篇》、《性命圭旨》等其他道教经典，所论比诸汪澹漪辈更为深入，这是他的新知，但也面临着这样两难的尴尬。

除此之外，当我们透示内丹道自身的发展线索，那么就会发现，将石泰《还源篇》归结为唐僧八十一难的原型，还隐含着更为严重的矛盾。

原来内丹道由晚唐时钟离权、吕洞宾开创，而后分南北两派传承，

① 参见任继愈编《佛教经籍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4页。

② 翁葆光《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序》。

北宗的丹法称为北派丹法,南宗的丹法称为南派丹法。南派传法世系为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世称南五祖,在钟、吕至张伯端之间尚有过渡人物即传法给张伯端的成都真人刘海蟾;北派传法世系为王喆(重阳)→邱处机等七子→尹志平,这就是著名的全真教。王喆创教起即奉钟、吕为始祖,为与张伯端的南派相区别,后世全真教以东华帝君(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北五祖。到元时,因元太祖迎召邱处机,长春“颇凭藉世权以张其教”^①,致使北派鼎盛独尊,南派的白玉蟾及其弟子以共宗钟、吕及刘海蟾为由自称全真,遂成南北两派合流局面。然而北派对此态度比较暧昧,对南派难免有所轻视。王喆(1113—1169)晚于张伯端(983—1082)约一百年,理应受《悟真篇》影响,但王处一(全真七子之一)《全真》诗曰:“我师弘道立全真,始遇纯阳得秘文。”有意标榜直接继承着吕祖的道统。又据《清和真人北游语录》载,尹志平曾对张伯端发表看法:“李长老(金元时道士)同是遇真得道,所留教言,甚若与平叔(张伯端字)不同。人谓李老不言命术,平叔不言性宗。性命本非二,此理甚明,但难以言形容;必得明达之人则可传。故云:‘有人来问道,须对达人传。’又曰:‘可传不可授。’”^②将张伯端与无名道士并举,且对其命术有所指责,其中有不恭之意是显而易见的。

从清初汪澹漪开始,《西游记》作者被冠为内丹道北祖邱处机。此说经五四时期鲁迅、胡适考证推翻,其为世人信服的主要依据是发现了《长春真人西游记》系全真李志常记其师邱处机西行事及西域道里风俗,与《西游记》小说实为两书,现存《道藏》中。但李安纲不以为然,他说:“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把《西游记》的著作权给了邱处机,绝不是因为他或者他的弟子写了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旅游记,而是因为《西游记》的内容就是表现全真道龙门派邱处机等人的教理思想。”^③意思是说,即使邱处机写过同名游记作品,也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否认他写过小说《西游记》。当然,他在这里并没有直认邱处机是

① 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观堂集林》卷十六。

② 转引于柳存仁《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6期。

③ 阎凤梧、李安纲《明清〈西游记〉文化思想研究概述》,《西安交通大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西游记》作者,但他明确表明《西游记》作者是与《性命圭旨》的作者“是一个人”,“是一个对全真道的教义修养极深、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而《性命圭旨》“系丘祖门下史(尹)真人弟子所为”^①。将两者互证,可知《西游记》作者当为尹志平或尹志平弟子。

联系内丹道自身的发展,尹真人及其弟子属北派,尹志平则还是全真教第三代掌教,如果他们果为《西游记》作者,又果真意欲在作品中“亦步亦趋”地演绎金丹大道,那么所本经书必定应该为北派丹法,特别是王喆的《重阳授丹二十四诀》、《重阳立教十五论》和邱处机《大丹直指》,尹志平的《北游语录》也有可能;而断然不可能是南派丹法张伯端的《悟真篇》,尤其不屑去演绎等而下之的石泰《还源篇》,要知道尹志平曾明确有过对张伯端的不敬之辞。如果诚如李氏判断,《还源篇》是《西游记》唐僧所历八十一难的原型,后者系按前者“亦步亦趋地演绎而来”,那么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西游记》的作者不是邱处机或弟子或再传弟子,而是内丹道张伯端、石泰一系中人物;(2)作者果为尹真人门人,但此人定当非得邱祖或尹真人真传,甚或为背师之徒。这第一条明显不合李氏初衷,第二条又不见诸道藏史料记载,故两条皆大不利于李氏,从而使这一命题暴露出严重的矛盾。

李安纲的《西游记》文化研究之所以存在一些不当之论,甚或谬误,我以为除了对问题本身的理解发生了某些偏差外,他的整个理论前提也存在着疑问和缺陷。请看他的以下表述:

文以载道是古代语言文学大师进行创作的不祧法则。……《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个精通佛道儒三教、易经八卦、阴阳五行、中医经络、金丹大道的知识分子,所以他要表现和承载的“道”即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代表传统文化顶峰的应该是全真道的经典之作《性命双修万神圭旨》,而《西游记》正是对这部集传统文化之大成者的文学形象演绎。……《西游记》是世界文学史上唯一的一部自觉的东方传统文化载体。^②

^① 阎凤梧、李安纲《明清〈西游记〉文化思想研究概述》,《西安交大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② 李安纲《〈性命圭旨〉是〈西游记〉的文化原型》,《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这就是他《西游记》宗教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检视这段文字,再结合他的其他有关论述,可以概括成三个要点:(1)《西游记》是一部文化宝典,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2)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道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丹术思想;(3)《性命圭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顶峰,它是《西游记》的文化原型。

这第一点完全正确,不仅揭示出《西游记》作为文化载体的一大功能,也符合作品博大精深的特征,然将它说成是“世界文学史上唯一的一部自觉的文化载体”云云虽过绝对(言过其实),但可忽而不计。这第二点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和流向的理解,认识上已出现偏差;第三点把《性命圭旨》视为传统文化的顶峰,则明显失误,纯属没有依据的主观臆断。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儒道互补。究其关系,一般的理解是以儒统道、以道释儒,也即是说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儒家,而非道家。以经学和史学为载体的儒学思想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道家(道教)当然也有深远的影响,但在整体上、在自上而下的普遍认知上远不及儒家。李氏曾不断地指责从吴承恩到“好事者”华阳洞天主人,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现代《西游记》研究者“没有修过道”,“不懂周易八卦、阴阳五行、金丹大道、禅悟心性”,姑且不论指责得合理与否,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道家思想所及有限,鲁迅、胡适尚不通道术(不能或不屑),遑论他者。诚然,五四时期曾有过批儒的思潮,“打倒孔家店”一度成为时代强音,但其源不在道家的侵入和冲击,由道家来替而代之,而是出于中国社会发展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需要,是思想和学术现代化的需要,是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需要,而并非旨在废弃儒家文化典籍,割断文化传承。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郭沫若等五四新文化大师,都是有意识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增强战斗力,如鲁迅就尖锐地批评复古派阉割孔孟精髓、摸索儒学皮毛的浅陋。总之,他们是“深受儒学濡染,却不为儒学所囿”,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所以“五四”之后,紧接着便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儒学”的兴起,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新儒学”代表人物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儒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明确指出:“民族的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

归根结底“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①。在中国思想文化方面,新儒学至今方兴未艾,因而在中国社会进程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过去有人主张独尊儒术,将道家视为旁门左道是错误的,但若矫枉过正,将道家摆于儒家之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也同样不尽正确。

至于将宋元全真道托名尹志平所撰的《性命圭旨》当作中国传统文化“顶峰”、“集大成者”,则是走得更远了,无论如何也是轻率悠谬之论。查阅中国道教史,道家典籍汗牛充栋,究其大者,前有《太平经》、《周易参同契》,后有《悟真篇》、《太上感应篇》,更不用说那开山劈源、永传宇内的不朽巨著《道德经》和《南华真经》,怎么也轮不到由《性命圭旨》来独执道家的牛耳。我们真难想象,李安纲对道家经籍竟会有这般看法,这般评价。他将《性命圭旨》认作《西游记》的文化原型,以为唯有抬高《性命圭旨》的地位才能抬高《西游记》的文化价值。事实上恰恰相反,《西游记》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又岂止是一部《性命圭旨》所能够包容,小小的一部道书,衬不住这皇皇大著,经不住这“不能承受之重”。正如有学者批评的那样,李氏的论断是以“树杈支撑,沙砾为基础”,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样的理论前提决定了李氏的文化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宗教阐释。诚然,《西游记》蕴含着宗教内容,但绝不是宗教典籍,也绝不是对宗教的“形象演绎”。李氏试图用许多道家典籍来充塞《西游记》,一会儿说《性命圭旨》是《西游记》的文化原型,一会儿又说《西游记》的精髓是生命科学,一会儿说《大丹直指》是孙悟空求道的依据,一会儿又说《还源篇》是唐僧八十一难的原型,实在是在将《西游记》大卸八块,阉割了原本丰富完整的思想。在我们看来,唐僧取经是《西游记》的情节主干,孙悟空是作品的主人公,正是他们体现着作品的丰富思想,如果说有原型的话,他们的原型就是作品的原型,也应该是统一的,不该如此庞杂、散乱,其逻辑也不该如此紊乱、多变。

李氏的阐释过程充满想象、富有灵气,但又不免流于轻率和随意。对作品的形象作随意生发,对道教教义作随意分析,而又随意地将两

^①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参见方立天、李锦全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总序》。

者捏合在一起。由于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做得比较成功,李氏受到了舆论的一些好评,甚至一度被誉为“河东奇人”,学界新星^①。这就更强化了这种随意性阐释的趋向,于是一路随心所欲地解释下来,犹如天马行空一般。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解释:陈光蕊“在太宗朝中状元,即是‘太元’”,他娶满堂娇为妻就是“阴阳结太元”。显而易见,这不是严谨的治学方法,结论也是荒唐的。如果论证不需符合逻辑,那么有什么结论不能得出?请看不才仿其法拈出一则:《西游记》第一回记石卵因受天真地秀,见风化猴。石卵者,石也;天地交感在八卦中为泰(䷊)卦,泰也。所以寓“石泰”,石泰者,《还源篇》之所为作也。学问若此,不亦太过容易,又与旧时江湖相术拆字算命何异!

应该指出的是,李氏在对《西游记》进行随意阐释时是主观自觉的,其屡试不爽的法宝就是将作品道教化,使其为己所用,将文本原意纳入自己预设的轨道。那些原本与道教有关的内容自然不在话下,被轻而易举地纳入到自己的主观预设,但那些与儒、佛相关而与道教无关或相悖的内容呢?“道教化”就成了解决问题的一大利器。比如九九八十一难,作品说得很清楚,是“佛门九九归真”,但李氏说这是“道教化了的佛门”,连观音也是道教化的,“九九归真”就是“九九纯阳足”,“要成仙证道,讲的是火候”。又比如《西游记》具有心学思想,来源于儒家和禅学,这从世本评点发轫,到李评本乃至清代各种笺评本,都是共识,而李氏解释为:心的形状与桃之形状相似,而桃子是仙果,“桃林长于仙山,也是心山”,于是心学也被道教化了。在李氏的著述中,这一类“道教化”文字所在多有,不一而足。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西游记》可以如此随意地“道教化”,那么怎样来对待曾经出现过的陈士斌(尤侗)的佛教化、张书绅的儒教化,以及一个时期里庸俗社会学统治下的“革命化”?《西游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古典名著——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典,果真能容得来自各方面的“化”——恣意无忌的化解、阉割么!

^① 高华平、杨方岗《〈西游记〉文化自觉载体透视——李安纲教授〈西游记〉研究述评》,《运城高专学报》1996年第3期。

余论 关于构建“《西游》学”的一点感想

翻过了一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的最后一页,意味着完成了一次对于围绕伟大名著《西游记》而展开的理性智慧及其理论果实的匆匆巡礼。对我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充满期待而又兴奋不已的精神漫游和学术之旅。在欣喜慰藉之余,我还想对构建“《西游》学”的问题发表一点感想。

关于建立“《西游》学”,在《西游记》论坛已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也一直在我的心际萦绕。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西游》学”这一概念最先由杨俊在1986年浙江普陀山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上提出,随后他又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①。渐为学人所知。其时笔者也有感于《西游记》研究的蓬勃发展,曾写下一篇小文《“西游学”正在兴起》^②,恰好与杨俊遥相呼应。不过,应该承认,许多年过去了,这一工作似乎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是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分歧和障碍:许多学者对此持怀疑、反对的态度。记得2003年4月21日,北大教授陈平原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与中文系青年教师座谈时,我曾当面向他请教有关“《西游》学”的问题。他的意见很明确:《西游》、《水浒》、《三国》等单部小说的研究都不宜以“学”称之。他的精见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可见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据我所知,它大约是受了钱锺书反对“以一人一书而为学”的影响。钱锺书曾说过:

① 如《一个富有未来意识的“西游学”正在形成》,《社会科学报》1990年12月20日;《“西游学”的兴起:未来学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内的运用》,《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其间又有钟扬在《安庆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发展《“神魔”、“神话”二说之起伏消长》一文,论及“《西游》学”问题。

② 载《文汇报读书周报》1991年5月18日。

词章中一书而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伧坐伧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①

对此，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钱锺书是学界泰斗，他的意见被广泛尊重和接受是自然和必然的。但也须作具体分析，至于有关学术的问题也未必要定于一尊。我从这段话中看到：（1）钱氏反对“以一人一书而为学”是专指“词章”（即文艺），经学和考据不在此例；（2）在诗文、小说中他又承认“《选》学”和“《红》学”。可见，他反对“以一人一书而为学”其实并不绝对，而自宋元以来流行的重经学、轻文艺的看法在今天看来也未必尽然。又，钱氏仙逝后，鉴于他在文学和学术诸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学界（特别是由钱氏传人倡导、牵头）已建立起一门显学——“钱学”呢！所以，学术的发展也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钱氏反对“以一人一书而为学”的观点当为一家之言，而没有必要以此作为今日学科建设的标尺。现在，“钱学”的风行似乎也从一个侧面消解了它的普遍性和权威性。

第二，在学术上，各个具体的学科门类实际上分处在不同的学科层次，它们并非具有等量齐观的位置。我们所理解的“《西游》学”说到底只是一个关于《西游记》的专门性学科，它的内容和任务在于：“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西游记》，力求系统化、全面地研究、发掘出这一古典名著的真正价值，从而科学地加以继承、发展、创新。”^②当然，作为新颖学科，它还要吸纳历史学、民俗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内容，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横跨多学科的边缘科学”。“《西游》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它依次从属于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小说学等不同层次的学科^③，具体说，它只是小说学的一个分支

① 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全梁文》卷论《文选》。

② 参见杨俊《西游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 这里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不同于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制定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指南》所规定的学科设置。

学科而已。它同其他任何学科(包括它所从属的和平行的)都有互动互补的作用,而不会发生相互抵牾和销蚀。所以,我们不宜用更高级的学科形态的标准(如中国古代文学)去要求它体系的规模、内容积淀的厚度以及学术研究所达到的高度,而应该允许、尊重它在自身相对封闭、完整的学术轨道上运行、发展。坦率地说,一旦以具有四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学为衡量的标尺,那么又有几个学科经受得起它的淘洗、筛选?甚至连至今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学)学科都值得怀疑。所以各级学科都有自身成立、发展的理由,它们之间或者相安无事,或者相互促进,又都于学术的繁荣有利而无害。那种以为“《西游》学”,以及“《三国》学”、“《水浒》学”等分枝学科的建立将会打乱学科体系,袭扰学术秩序的观点未免杞人忧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游》学”具有相当充实的学科基础。因为《西游记》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伟大名著,其研究又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层递累积,至五四时期已出现所谓“《西游》学”的雏形。新时期以来,《西游记》研究又有了多方面长足的发展。学术成果不断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专门性学科。这是学科建设的规律。前面钱锺书提到的《易》学、许学、《选》学、《红》学莫不如此。而对于《西游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具有自觉的学科意识,遵循现代学科规范,无论如何是完全必要的。应该说,“《西游》学”至今已渐成气候,构建“《西游》学”适逢其时。在2003年开封《西游记》文化研讨会上,“建立《西游》学”的倡议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甚至成为会议的宗旨之一^①。而《西游记》学术史研究的展开,更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当然,作为新生事物,“《西游》学”还须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然而其良好的发展态势、远大的学术前景是毋庸置疑的。据此,我以为在以多元、开放为特征的时代精神和学术条件下,“《西游》学”理应健康地生长、壮大,而不应停滞不前,尤其不应该遭到因人为的窒息而“流产”的命运。19世纪中期,面对“世界文学”的形成,大文豪歌德曾不无兴奋地宣称:“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张开怀抱迎接它的

^① 参见曹炳建、张大新《〈西游记〉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到来,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迎接”、“促使”“《西游》学”的到来,这不正是我们全体《西游记》研究者和广大爱好者的共同心声!

^① 参见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13页。

主要征引和参考书目

一、《西游记》文本及评点本

1. 《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与《古本小说丛刊》(中华书局,1987—1991年)所收《西游记》(影印本)九种: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德堂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评本)

《新镌全像西游记》(杨闽斋本)

《新镌出像古本西游证道书》(汪澹漪笺评本)

《西游真诠》(陈士斌笺评本)

《新说西游记》(张书绅笺评本)

《唐三藏出身全传》(阳至和《西游记传》)

《西游原旨》(刘一明笺评本)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2. 新校整理排印本《西游记》七种:

世德堂本《西游记》(郭豫适前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徐朔方前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汪澹漪评本《西游证道书》(黄永年前言本),中华书局,1993年

陈士斌评本《西游真诠》(沈习康前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

张书绅评本《新说西游记》(李汉秋序本),黄山书社,1992年

朱鼎臣本《西游释厄传》(陈新整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杨致和本《西游记传》(陈新整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二、史料文献

《旧唐书》、《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

《宋史》，中华书局，1977 年

《元史》，中华书局，1965 年

《明史》，中华书局，1979 年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9 年

《宋高僧传》，（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7 年

《大唐西域记》，（唐）玄奘、辩机撰，中华书局，2000 年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慧立、彦惊撰，中华书局，1983 年

《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高亨注，中华书局，1984 年

《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

《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

《礼记译解》，王文锦译解，中华书局，2001 年

《老子校释》，朱谦之撰，中华书局，1984

《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1983

《春秋繁露》，（西汉）董仲舒撰，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编缩印本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中华书局，1963 年

《文心雕龙今译》，（梁）刘勰撰，周振甫译，中华书局，1986 年

《四书章句集注》，（宋）朱熹撰，中华书局，1983 年

《皇极经世》，（宋）邵雍撰，元和惠氏百岁堂藏旧抄本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孙楷第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孙楷第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年

《中国善本书提要》，王重民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中国小说史料》，孔另境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小说考证》，蒋瑞藻编，江竹虚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柳存仁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年

《小说见闻录》，戴不凡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

《访书见闻录》，路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王利器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朱一玄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

《明清小说资料选编》，朱一玄编，齐鲁书社，1990 年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黄霖、韩同文选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丁锡根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

《戏曲小说丛考》，叶德均著，中华书局，1979 年

《〈西游记〉资料汇编》，朱一玄、刘毓忱编，中州书画社，1983 年

《西游记研究资料》，刘荫柏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吴承恩诗文集笺校》，（明）吴承恩著，刘修业辑校，刘怀玉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沈起炜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年

《道园学古录》，（元）虞集著，四部丛刊本

《王文成公全书》，（明）王阳明著，《四库全书》本

《西湖游览志余》，（明）田汝成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撰，中华书局，1959 年

《焚书》，（明）李贽撰，中华书局，1961 年

《五杂俎》，（明）谢肇淛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

《黄宗羲全集》，（明）黄宗羲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日知录》，（明）顾炎武著，岳麓书社，1994 年

《金圣叹全集》，（清）金圣叹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

三、研究论著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东方出版社，1996 年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
- 《小说旧闻钞》，鲁迅校录，齐鲁书社，1997 年
- 《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胡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 《白话文学史》，胡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中国文学研究》，郑振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
- 《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著，作家出版社，1954 年
-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著，北京出版社，1999 年
- 《沧州集》，孙楷第著，中华书局，1965 年
- 《沧州后集》，孙楷第著，中华书局，1985 年
- 《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刘修业著，作家出版社，1958 年
- 《中国小说论集》，赵景深著，上海永祥印书馆，1950 年
- 《小说闲谈四种》，阿英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年
-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
- 《中国小说史》，徐君慧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齐裕焜著，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 年
- 《小说史：理论与实践》，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
- 《明代小说史》，齐裕焜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
- 《明代小说史》，陈大康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
- 《清代小说史》，张俊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
- 《中国小说学通论》，宁宗一等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年
- 《中国小说美学》，叶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
- 《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王先霭、周伟民著，花城出版社，1988 年
- 《中国小说研究史》，黄霖等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中国文学评点史》，孙琴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
- 《中国小说评点研究》，谭帆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 《话本小说概论》，胡士莹著，中华书局，1980 年
- 《小说考信编》，徐朔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半砖园文集》，郭豫适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年

《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尚学锋等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

《献疑集》，章培恒著，岳麓书社，1993 年

《曲论探胜》，齐森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

《戏文概论》，钱南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杨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中国小说源流论》，石昌渝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年

《明清小说论稿》，孙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陈大康著，湖南出版社，1993 年

《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胡从经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年

《禁毁小说大观》，萧相恺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

《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程华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1 年

《中国古代小说通论综解》，田同旭、王增斌著，中国文联出版公
司，1999 年

《浅俗之下的厚重——小说·宗教·文化》，陈洪著，南开大学出
版社，2001 年

《明清小说思潮》，董国炎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历代刻书考述》，李致忠著，巴蜀书社，1989 年

《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肖东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吴承恩与〈西游记〉》，胡光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西游记〉及明清小说研究》，苏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西游记别论》，王国光著，学林出版社，1990 年

《西游记考论》，李时人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年

《西游新解》，吴圣昔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年

《西游记漫话》，林庚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

《西游记考论》，张锦池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

《〈西游记〉成书研究》，蔡铁鹰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1 年

《西游记考证》，马旷源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西游记迷境探幽》，刘耿大著，学林出版社，1998 年

《苦海与极乐》，李安纲著，东方出版社，1995 年

《吴承恩论稿》，刘怀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西游新论》，杨俊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西游记：彻悟人生》，陈文新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年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 年

《名家解读〈西游记〉》，陆钦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

《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朱一玄、刘毓忱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年

《水浒资料汇编》，马蹄疾编，中华书局，1980 年

《金瓶梅资料汇编》，黄霖编，中华书局，1987 年

《红楼梦资料汇编》，一粟编，中华书局，1964 年

《〈红楼梦〉研究小史稿》，郭豫适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年

《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主编，人民出版社，1964 年

《中国宗教通史》，牟钟鉴、张践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8 年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中华文化史》，冯天瑜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晚明思想史论》，嵇文甫著，东方出版社，1996 年

《中国思想史》，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明清文化史散论》，冯天瑜著，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年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聚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年

《中国学史》，孙国刚、乔治忠等著，东方出版中心，2002 年

《中国学术史流变》，冯天瑜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陈伯海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7 年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余英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

《跨进新世纪的历程——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朱德发著，明天出版社，2000年

《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董乃斌等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中国经学史》，〔日〕本田成之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佛藏与道藏》，罗伟国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西方哲学史》，全增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

《现代西方美学史》，朱立元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

《美学》，〔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79年

《原始思维》，〔法〕列维-布留尔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

《真理与方法》，〔德〕伽达默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中国美学史大纲》，叶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国当代美学》，张涵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谈艺录》，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

《文心雕龙讲疏》，王元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路新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陈居渊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

《清初易学》，汪学群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

《儒学与现代新儒家》，卢升法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解》，姜广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宗教，一种文化现象》，马德邻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方立天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禅宗与中国文化》，葛兆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道经总论》，朱越利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 《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陈少峰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
- 《唐宋内丹道教》，张广保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
- 《周易参同契研究》，萧汉明、郭东生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马克思著，人民出版社，1979 年
-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 《中国文学精神》，郭延礼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年
- 《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郭延礼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
- 《朱熹及其哲学》，杨天石著，中华书局，1982 年
- 《李贽评传》，张建业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
- 《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陈来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 《顾亭林学谱》，谢国桢著，商务印书馆，1957 年
- 《黄宗羲评传》，徐定宝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 《王船山传论》，邓潭洲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王晓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年
- 《胡适传》，白吉庵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陈独秀传》，唐宝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 《一代才华——郑振铎传》，陈福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 《中国白话小说史》，〔美〕韩南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年
- 《古代文学评论史》，〔日〕青木正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
-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黄鸣奋著，学林出版社，1997 年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日〕冈田武彦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万历十五年》,〔美〕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美〕浦安迪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美〕夏志清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澳〕柳存仁著,《明报月刊》1985年第5—7期;又收入《中国古典小说论坛》(台湾香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和风堂文集》,〔澳〕柳存仁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古典小说与传说》,〔俄〕李福清著,中华书局,2003年

《〈西游记〉的秘密》,〔日〕中野美代子著,中华书局,2002年

《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美〕王靖宇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enlarged, Chicago, 1970

R. G. Collingwood, *An Essay on Metaphysics*, A Gateway Edition, 1972

Liu Cunren, *Wu Chengen: His Life and Career*, T'oung Pao', 1967

附录 现代《西游记》研究论文要目索引

蒋瑞藻《西游记》，《东方杂志》8卷1期，宣统三年（1911年）2月25日《小说考证》中涉及

柳东一蟹《西游记》，《小说月报》4卷1期，民国二年（1913年）8月25日《小说丛考》中涉及

颠公《〈西游记〉为明人吴承恩所作之异说》，《文艺杂志》民国三年（1914年）第4期

蒋瑞藻《西游记》，《东方杂志》14卷1期，民国六年（1917年）1月15日

显鉴《〈西游记〉辨讹》，《地学杂志》12卷4期，民国十年（1921年）4月

汪原放《古本〈西游记〉校读后记》，《亚东图书馆馆刊》民国十年（1921年）12月

胡适《西游记序》，《亚东图书馆馆刊》民国十年（1921年）12月

陈独秀《〈西游记〉新叙》，《西游记》（亚东图书馆1921年）

佚名《〈西游记〉辨讹》，《海潮音》3卷7期，民国十一年（1922年）9月

胡适《〈西游记〉考证》，《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6期，民国十一年（1922年）

戈宝权译《周树人氏谈——关于猪八戒》，原载1923年藤原镰兄编辑日文《北京周报》第四十七期新年特号上，摘自1979年2月文物出版社《鲁迅研究资料》（三）

赵景深《〈西游记〉民族文学的价值》，《民国日报·觉悟》民国十二年（1923年）7月5日

浩川《供研究〈西游记〉者参考》，《民国日报·觉悟》民国十二年

(1923 年)9 月 25 日

胡适《〈西游记〉的八十一难》,《学文学刊》1 卷 3 期,民国十二年

(1923 年)

胡适《读吴承恩〈射阳文存〉》,《猛进》4 期,民国十三年(1924 年)

胡适《〈西游记〉考证》,写于 1923 年,收入作者著《胡适文存》

(四),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4 年 11 月初版,又载《读书杂志》民国二十年(1931 年)第 7 期

董作宾《读〈西游记考证〉》,写于 1923 年,收入《胡适文存》(四),又载《读书杂志》民国二十年(1931 年)第 7 期

徐旭生《〈西游记〉作者的思想》,《太平洋》4 卷 9 号(1924 年)12 月

傅惜华《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之研究》,《南金》民国十六年(1927 年)1 号

汾《评〈西游记〉与〈封神〉》,《新晨报》民国十八年(1929 年)1 月 1 日

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民国十九年(1930 年)二本二分册,收入作者《金明馆丛稿二编》

鲁迅《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中学生》月刊,民国十九年(1930 年)12 号

叶启勋《吴射阳先生存稿》,《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6 卷 2 期,民国十九年(1930 年)10 月

燕人《孙行者与胡适之》,《新北方月刊》1 卷 1 期,民国二十年(1931 年)1 月

李振芳《孙行者闹天宫故事之演变》,《民鸣》3 卷 2 期,民国二十年(1931 年)2 月

胡适《跋〈销释真空宝卷〉》,《北平图书馆馆刊》5 卷 3 期,民国二十年(1931 年)5 月 6 日

胡适《跋〈四游记〉本的〈西游记传〉》,《北平图书馆馆刊》5 卷 3 期,民国二十年(1931 年)5 月 6 日

俞平伯《驳〈跋销释真空宝卷〉》,《文学》创刊号,民国二十二年

(1933 年)7 月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文学》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1 卷 4 号,收入作者《佝偻集》和《中国文学研究》

赵景深《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文学》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5 卷 1 号

宋扶风《说部中四大奇书述略》,《民大中国文学系丛刊》1 卷 1 期,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1 月

芳洲《〈西游记〉的刺》,《太白》半月刊,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1 卷 9 期

宋崇孝《本书作者吴承恩传》,《西游记》,世界书局 1934 年 12 月初版

阿丁《〈西游记〉的内容及其比较》,《天地人》半月刊 7 期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6 月

赵景深《〈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中国学生》2 卷 1—4 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1 月,后收入作者《小说闲话》,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北新书局版,《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60 年

叶德均《无支祁传说考》,《逸经》33、34 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7 月 5、20 日

赵景深《〈四游记〉杂识》,收入作者著《小说闲话》,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北新书局版

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写于 1939 年 6 月,《辅仁学志》8 卷 1 期,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收入作者《沧州集》卷四,中华书局,1965 年

许郭立诚《小乘经典与中国小说戏曲》,《艺文杂志》第 2 卷第 9 期,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9 月 1 日

台静农《关于〈西游记〉江流本事》,《文史杂志》1 卷 6 期,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6 月 16 日

袁圣时《〈西游记〉研究》,《台湾文化》3 卷 1、2 期,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1、2 月

冯汉镛《孙悟空与猪八戒的来源》,《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4 月 21 日

庄一拂《目莲戏与〈西游记〉》，《通俗文学》第77期，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26日

汪浚《吴承恩与〈西游记〉》，载郑振铎编《文艺复兴》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8月“中国文学研究号”（下）

张默生《谈〈西游记〉》，《西南文艺》1953年第8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张天翼《〈西游记〉札记》，《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魏建功《略论〈西游记〉的结构形式和语言工具的成就》，《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8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方白《谈猪八戒》，《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8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严敦易《〈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8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高熙曾《〈西游记〉里的道教和道士》，《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8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黄肃秋《论〈西游记〉的第九回问题》，《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8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黄肃秋《〈西游记〉的校订和注释工作》，《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8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张左《关于〈西游记〉的版本》，《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8期

方白《谈〈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大公报》1954年9月4日

朱猛《〈西游记〉》，《文艺报》1954年第15期

刘樱村《〈西游记〉的现实性》，《文艺学习》1955年第5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萧歌、竟华《〈西游记〉读后的一些体会》，《光明日报》1955年3月13日，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曾凡巨《谈孙悟空》，《河北日报》1955年5月15日

董每戡《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的诡计》，《作品》1955年5月

张侠生《〈水浒传〉、〈西游记〉和武侠小说有什么区别？》，《文艺学

习》1955年第6期

冯沅君《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文史哲》1955年7月号

沈玉成、李厚基《读〈西游记〉札记》，《光明日报》1955年10月23日，文学遗产专栏第76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彭海《〈西游记〉中对佛教的批判》，《光明日报》1955年10月30日，文学遗产专栏第77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李大春《谈〈西游记〉的几点心得》，《解放军文艺》1956年第1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胡念贻《〈西游记〉是怎样的一部小说》，《读书月报》1956年第1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霍松林《略谈〈西游记〉》，收入作者《诗的形象及其他》，长江文艺出版社；又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沈仁康《〈西游记〉试论》，《新建设》1956年第2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童思高《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西南文艺》1956年第2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秦勳《有关〈西游记〉的一个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5月6日，文学遗产专栏第103期，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林庚《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文艺报》1956年第13期，收入《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傅正谷《评〈西游记试论〉》，《光明日报》1956年7月29日，文学遗产专栏第115期，收入《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杜滢《怎样理解〈西游记〉的意义》，《青岛日报》1956年10月10日

胡念贻《谈〈西游记〉中的神魔》，《文学研究集刊》（第3册），收入作者《中国古典文学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邓潭洲《吴承恩的〈西游记〉》，写于1956年9月，收入《中国古典

文学论稿》，邓潭洲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李祐《论〈西游记〉》，《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57 年第 2 期，收入《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

张默生《〈西游记〉研究》，《四川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57 年第 1、3 期

佚名《〈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写的碑文在浙江发现》，《光明日报》1957 年 3 月 26 日

洛阳第一高中语文组《〈西游记〉的“大闹天宫”》，《语文教学通讯》（合并版）1957 年第 3、4 期

吴晓铃《〈西游记〉和〈罗摩延书〉》，《文学研究》1958 年第 1 期

布谷《悟空姓车不姓孙》，《新民晚报》1958 年 5 月 2 日

刘修业《吴承恩年谱》、《吴承恩著述考》、《吴承恩论著杂事考》，皆收入作者《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作家出版社，1958 年；又收入《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

刘修业《吴承恩交游考》，收入作者《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作家出版社，1958 年

上官红《玄奘法师二三事》，《天津日报》1958 年 11 月 16 日

李希凡《漫谈〈西游记〉的主题和孙悟空的形象》，《人民文学》1959 年第 7 期，收入作者《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年

陈鸣钟《〈西游记〉中的金光寺》，《光明日报》1959 年 12 月 13 日

李希凡《猪八戒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新港》1959 年第 12 期，收入作者《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年

山鹰《孙悟空并非光棍汉》，《新民晚报》1960 年 2 月 19 日

吴方《猪八戒的世界观》，《辽宁日报》1960 年 3 月 17 日

佚名《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优秀神话剧——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东海》1960 年第 16 期

李希凡《谈〈西游记〉浪漫精神的时代特色》，《光明日报》1961 年 1 月 1 日，文学遗产专栏第 345 期，收入作者《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年

俞平伯《校订〈西游记·胖姑〉折书后》,《戏剧报》1961年第1、2期

林放《孙悟空的神通》,《新民晚报》1961年2月5日

南开大学中文系《西游记》研究小组《论〈西游记〉的浪漫主义》,《光明日报》1961年5月12日,文学遗产专栏第350、351期

袁世硕《漫谈孙悟空和〈西游记〉的时代特色》,《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

劲草《人生果的幻想和现实》,《北京晚报》1961年6月14日

必胜等《孙悟空的性格是怎样的?》,《羊城晚报》1961年6月20日

赵景深《谈〈西游记平话〉残文》,《文汇报》1961年7月8日

佚名《伟大的学者、旅行家、翻译家玄奘》,《中国青年报》1961年7月30日

向达《唐三藏取经》,《北京日报》1961年8月24日

兰雯《唐三藏在尼泊尔》,《新民晚报》1961年10月3日

王树村《吴承恩咏杨柳青诗》,《天津晚报》1961年11月5日

苏兴《〈西游记〉的地方色彩》,《江海学刊》1961年第11期

马克《奇妙的神话世界——谈动画片〈大闹天宫〉》,《人民日报》1962年5月31日

紫荆《吴承恩》,《雨花》1962年第5期

张习孔《玄奘取经》,《工人日报》1962年7月13日

戈弩《取得“真经”首在一个“诚”》,《北京日报》1962年10月16日

王顾明《改编〈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体会》,《光明日报》1962年10月16日

苏兴《关于〈西游记〉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62年增刊(10辑)

李国生《关于〈西游记〉中“难”的性质的分析》,《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钟凤《〈西游记〉的地方色彩》,《天津晚报》1963年3月17日

陈毓黻《从“过火焰山”看吴承恩对情节的处理》,《光明日报》

1963年5月12日

毛瓜《孙悟空为什么用金箍棒》,《天津晚报》1963年6月16日

陈留《吴承恩〈禹鼎志〉的下落》,《新民晚报》1963年12月11日

刘大、张碧波《〈西游记〉〈聊斋志异〉中宗教迷信、神仙鬼怪思想的批判》,《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4年第2期

杨柳岸《齐天大圣的“家谱”》,《羊城晚报》1964年7月5日

佚名《省图书馆发现一部明刻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河南日报》1964年12月8日

陈推之《〈西游记〉小议》,《光明日报》1965年12月19日

殷光熹《关于孙悟空反抗的性质和目的》,《光明日报》1966年4月17日

何志云《读〈西游记〉随笔》,《图书评论》1972年第8期

顾岱祖《〈西游记〉评价》,《北京大学学报》试刊,1973年第1期

侯定乾《白骨精“斋僧”小议》,《开封师院学报》1975年第2期

南波《吴承恩撰书的〈先府宾墓志铭〉在淮安出土》,《语文战线》

1976年第1期

周启成《今日欢呼孙大圣——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语文战线》1976年第1期

章启迪《关于“火眼金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教学笔记》,《语文战线》1976年第3期

来俊华《花果山游记》,《连云港文艺》1977年第1期,此文又载《江苏文艺》1978年第1期

朱彤《论孙悟空》,《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

李洪甫《云台山、吴承恩与〈西游记〉》,《徐州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亦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1期

邢治平《孙悟空形象剖析》,《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

霍旭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讲析》,《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

赵明政《孙悟空是“新兴市民”的典型形象吗?——与朱彤同志商榷》,《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

埏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艺术性》,《四川师院学报》1978年

第3期;此文又载《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徐州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

简茂森《孙悟空形象的阶级属性》,《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

郝世峰《孙悟空形象谈略》,《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4、5期合刊

刘烈茂《论孙悟空》,《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朱式平《试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第6期

顾岱祖《〈三打白骨精〉分析》,《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佚名《美籍华裔教授余国藩翻译〈西游记〉》,香港《开卷》创刊号1978年11月;又《编译参考》1979年第2期

殷彤《孙悟空形象与〈西游记〉的思想内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1集,1979年1月

苗壮《从孙悟空看〈西游记〉的思想倾向》,《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苏兴《追踪〈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南行考察报告》,《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

罗东升《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佚名《浙江发现吴承恩书写的两块碑文》,《人民日报》1979年2月6日

陈宏遂《浅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孙悟空艺术形象的塑造》,《教学与进修》1979年第2期

朱彤《论吴承恩的思想》,《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2期

严云受《孙悟空形象分析的几个问题》,《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

章里《吴承恩写的扇面》,《文物》1979年第3期

黄福根、谢文柏《十年沉碑 重放光彩——长兴县展出吴承恩书写的两块碑文》,《光明日报》1979年3月21日

高子《采拓吴承恩书写的碑文散记》,《书法》1979年第4期

徐应佩、周溶泉《评〈西游记〉》,《书评》1979年第4期

刘毓忱、杨志杰《试论猪八戒的形象塑造》,《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叶德均《无支祁传说考》,《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5月

黄福根、谢文伯《长兴县所藏赵孟頫、吴承恩书写的碑刻》,《文物》1979年第5期

赵仲邑《悟空可能不姓孙》,《随笔丛刊》第1集,1979年6月

袁珂《中国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西游记〉部分)》,《文艺论丛》,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7辑

季羨林《〈罗摩衍那〉浅论》,《外国文学评论》(第1辑),1979年9月

郁博文《瓷枕与〈西游记〉》,《光明日报》1979年10月8日

苏兴《追访吴承恩的踪迹》,《随笔丛刊》第3集,1979年10月

夏星南《吴承恩所写碑文》,《新华日报》1979年12月5日

李洪甫《〈西游记〉里的花果山》,《新华日报》1979年12月5日

苏兴《吴承恩〈西游记〉典型人物论》,《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吉林师大学报编辑部编,1979年12月

胡光舟《对〈西游记〉主题思想的再认识》,《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

朱继琢《也谈〈西游记〉的思想倾向——与罗东升同志商榷》,《华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娄书武、于蕴生《也谈〈西游记〉注释中的问题》,《淮阴师专学报》1980年第1期

罗宪敏《“大闹天宫”新探》,《郴州师专学报》1980年第1期

陈澈《吴承恩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求是学刊》1980年第2期

夏星南《吴承恩在长兴县书写的两块碑文》,《吉林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

张传藻、颜景常《从唐玄奘和孙悟空的籍贯看淮海民间传说对〈西游记〉的影响》,《淮阴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

蓼南《国内发现明刊李卓吾评〈西游记〉》,《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

苏兴《西游记琐谈》,《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

陈漱《试论〈西游记〉前七回的思想倾向》,《北方论丛》1980年第3期

王丽娜《〈西游记〉外文译本概述》,《文献》1980年第4辑

任大星《从儿童喜欢模仿孙悟空想起的》,《东海》1980年第6期

夏振亚《孙悟空的故乡》,《文汇报》1980年6月28日

张成才《谈〈西游记〉中的一种对偶句》,《青海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高明阁《〈西游记〉里的神魔问题》,《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

古丁《明刻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简介》,《今昔谈》1981年第2期

孙红芮《孙悟空是进口货吗?》,《广州日报》1981年2月22日

蒋文野、丁乃迟《吴承恩的一篇佚文——〈淮安路医学教授古逸先生潘公讳思诚传〉》,《群众论坛》1981年第2期

〔澳大利亚〕柳存仁《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又收入《明清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顾农《鲁迅与胡适关于〈西游记〉的通信及争论》,《晋阳学刊》1981年3期

蔡国梁《孙悟空的血统》,《学林漫录》(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

李泽厚《“浪漫洪流”(〈西游记〉部分)》,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3月

季羨林《〈西游记〉与〈罗摩衍那〉——读书札记》,《文学遗产》1981年第3期

谭家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故事探源》,《文学遗产》1981年第3期

苏兴《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问题》,《北方论丛》1981年第4期

朱采狄《谈谈孙悟空与印度猴王的亲缘关系》,《文化娱乐》1981年第4期

余德余《浅谈〈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绍兴师专学报》1981年第4期

赵国华《关于〈罗摩衍那〉的中国文献及其价值》,《社会科学战

线》1981年第4期

曹仕邦《〈西游记〉若干情节的本源三探》，《集粹》1981年第5期

徐宗才《儿童文学园地开新花——介绍改写本〈西游记〉》，《人民日报》1981年5月26日

陈澈《论〈西游记〉中神佛与妖魔的对立》，《文史哲》1981年第5期

柳和城《〈西游记〉作者之谜的揭晓》，《书林》1981年第5期

罗宪敏《人物安排与故事情节——从“三调芭蕉扇”谈故事情节的构成》，《名作欣赏》1981年第5期

严敦易《谈谈〈西游记〉的一些问题》，《文献》1981年8辑

向明《孙悟空不是印度侨民——与朱采狄同志商榷》，《文化娱乐》1981年第8期

刘毓忱《关于孙悟空“国籍”问题的争论和辨析》，《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8期

江山《吴承恩》，《湖南日报》1981年9月6日

刘蕙孙《〈西游记〉的历史背景》，《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1981年9月

储大泓《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主旨》，收入《读〈中国小说史略〉札记》，储大泓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0月

冯立三《评〈真假美猴王〉》，《光明日报》1981年12月10日

秦九凤《喜笑悲歌气傲然——访吴承恩“射阳”遗址》，《文学报》1981年12月31日

陈汝衡《说苑珍闻（〈西游记〉部分）》，陈汝衡《说苑珍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

刘泽球等《吴承恩和〈西游记〉的创作》，《江苏教育》1981年第12期

蒋松源《漫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艺术手法》，《语文教学通讯》1982年第1期

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

刘怀玉《新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几块墓志铭考略》，《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苏兴《读〈新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几块墓志铭考略〉》,《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徐沁君《跋吴承恩书〈甲午秋宿金山寺〉诗》,《扬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

裴树海《论〈西游记〉的神奇性》,《雷州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姜威等《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故事》,《民间文学》1982年第2期

蓼南《谈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今昔谈》1982年第2期

洛珠加措作,曲将才让译《〈罗摩衍那〉在藏族地区的流行和发展》,《青海日报》1982年2月14日

李时人《〈西游记〉版本考》,《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张春树《阶级分析与道德分析——关于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标准问题(〈西游记〉部分)》,《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2期

蔡铁鹰《〈西游记〉“附录”考》,《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刘荫柏《〈西游记〉与西游戏》,《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陈民牛《吴承恩与淮安》,《新华日报》1982年3月28日

何思玉《一个并不虔诚的佛教徒——谈孙悟空的形象并和刘远达同志商榷》,《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

李遵义《历史上的玄奘和小说中的唐僧》,《历史知识》1982年第3期

钟扬《略谈吴承恩的文艺思想》,《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

王永生《鲁迅论〈西游记〉》,《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于植元《论〈后西游〉——〈后西游〉校后记》,《大连师专学报》1982年第3期

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佚名《首届〈西游记〉小说讨论会发言摘编》,《淮阴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扬江柱《猪八戒与孙悟空——谈小说中“灵与肉”的对偶形象》,《芳草》1982年第4期

刘守华《〈大唐西域记〉的民间文学价值》,《民间文艺》集刊(第2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4月

曾明《〈西游记〉不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云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会讨论综述》，《思想战线》1982年第4期

潘寿全《三段法——〈西游记〉的重要表现手法》，《学术论坛》1982年第4期

胡金望《试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变》，《艺谭》1982年第4期

苏兴《吴承恩考辨三题》，《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

徐应佩、周溶泉、吴功正《线索错综 对比鲜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艺术性》，《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赏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

朱彤《论〈西游记〉的宗教批判》，《北方论坛》1982年第5期

萧兵《无支祁哈努曼孙悟空通考》，《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赵明政《也谈〈西游记〉中神佛与妖魔的关系——兼答陈漱同志》，《文史哲》1982年第5期

傅继俊《我对〈西游记〉的一些看法》，《文史哲》1982年第5期

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

刘士昀《也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兼评研究〈西游记〉的方法》，《思想战线》1982年第5期

彭荣生《关于〈西游记〉的思想倾向——与刘远达同志商榷》，《思想战线》1982年第5期

旷源《闲话猪八戒》，《山茶》1982年第5期

季羨林《印度文学在中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5月

季羨林《〈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5月

季羨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5月

周中明《应该怎样看待孙悟空》，《文史哲》1982年第6期

苏兴《〈西游记〉和女儿国》，《江海学刊》1982年第6期

赵国华《〈罗摩衍那〉和中国之关系的研究综述》，《思想战线》1982年第6期

袁宾《〈西游记〉韵文用韵考》，《江西文艺界》1982年第7期

袁珂《西游记研究》，《神话论文集》，袁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7月

李洪甫《吴承恩与水帘洞》，《文汇报》1982年7月26日

王季深《“酌奇而不失其真”——从〈西游记〉谈到〈格列佛游记〉》，《新民晚报》1982年9月13日

丁黎《从神魔关系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学术月刊》1982年第9期

梦是飞《吴承恩的故居》，《新华日报》1982年10月10日

佚名《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在我省举行》，《新华日报》1982年10月17日

张泾德《溯源寻迹探“西游”——〈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侧记》，《新华日报》1982年10月20日

李寿琦《吴承恩头骨在淮安发现同时出土了有关吴承恩其他文物》，《文汇报》1982年10月26日

文明迅《吴承恩三次到北京》，《北京晚报》1982年10月28日

秦九凤《访吴承恩故居》，《文汇报》1982年11月3日

佚名《改进电视系列片〈西游记〉——夏衍致函吴冷西提出四点意见》，《新民晚报》1982年11月5日

佚名《谁是取经第一人》，《广西日报》1982年11月6日

朱国瑾、王正龙《吴承恩故居小记》，《人民日报》1982年11月7日

刘烈茂《引人深思的〈西游记〉》，《羊城晚报》1982年11月15日

《孙大圣题字一张》，《新民晚报》1982年11月25日

何满子《把艺术从社会学的框子里解放出来——谈神魔小说〈西游记〉的社会内容》，《社会科学》1982年11期

李洪甫《吴承恩与〈西游记〉中的水帘洞》，《光明日报》1982年12月1日

肖江《〈西游记〉否定了神，肯定了人》，《文汇报》1982年12月20日

曹晋杰等《关于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民间传说》，《民间文学》

1982 年第 12 期

高国藩、陈民牛《谈谈淮安的吴承恩传说》，《民间文学》1982 年第 12 期

徐士荣《水帘洞前显身手 花果山中称猴王——〈美猴王〉试析》，《语文学习》1982 年第 12 期

高空蔚《吴承恩的身后种种——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侧记》，《新观察》1982 年第 23 期

黄肃秋《〈西游记〉补注》，《国际政治学院学报》1983 年创刊号

袁鹰《淮安四记·射阳及其他》，《时代的报告》1983 年第 1 期

陈新《重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地位和价值》，《江海学刊》1983 年第 1 期

邓平、式宁《失而复得倍觉亲——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简介》，《江海学刊》1983 年第 1 期

吴圣昔《〈西游记〉艺术风格初探》，《江海学刊》1983 年第 1 期

李希凡《〈西游记〉与社会现实》，《江海学刊》1983 年第 1 期

何满子《〈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江海学刊》1983 年第 1 期

刘怀玉《吴承恩与淮安》，《江海学刊》1983 年第 1 期

王玉仁《试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主观思想倾向》，《抚顺师专学报》1983 年第 1 期

夏星南《吴承恩在长兴》，《嘉兴师专学报》1983 年第 1 期

寇养厚《建国以来〈西游记〉的讨论问题综述》，《文史哲》1983 年第 1 期

王开扬《〈西游记〉方言词注释问题》，《淮阴师专学报》1983 年第 1 期

戈静《〈美猴王〉赏读》，《语文战线》1983 年第 1 期

陈辽《〈西游记〉究竟是怎样一部小说——兼评对〈西游记〉的几种误解》，《安徽大学学报》1983 年第 1 期

李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中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 年第 1 期

梓玉《猪八戒的来历》，《文化娱乐》1983 年第 2 期

陈新《一部值得重视的〈西游记〉刻本》,《书林》1983年第2期

朱国瑾等《神话世界非神,化解却人间万斛愁——访吴承恩故居》,《旅行家》1983年第2期

周中明《关于〈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与丁黎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

周中明《必须进一步肃清极左思潮的流毒——从对〈西游记〉的评论谈起》,《艺谭》1983年第2期

任守春《也谈〈西游记〉的主题》,《中州学刊》1983年第2期

王永生《从〈西游记〉的社会反映看它的艺术特色》,《扬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

苏兴《杨志和〈西游记〉摭谈》,《文学遗产》增刊1983年第2期

潘寿全《精当、增减一人废全篇——〈西游记〉情节人物设置的艺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李洪甫《云台山、吴承恩与〈西游记〉补证》,《徐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

久平《矶部彰对〈西游记〉的研究》,《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

孙大公《从〈浮士德〉和〈西游记〉看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河池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

萧相恺《为有源头活水来——〈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探源》,《贵州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

舒展《想起了猪八戒》,《人民日报》1983年3月11日

刘荫柏《〈西游记〉明清两代出版史考》,《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

蔡毅《关于吴承恩生平及〈西游记〉研究中的不同意见》,《文学研究动态》1983年第3期

许灏《吴承恩〈西游记〉管窥》,《北方论丛》1983年第3期

周慎钦《〈西游记〉注释订补》,《淮阴师专学报》1983年第3期

花元斋《〈西游记〉注释淮安方言疑误偶见》,《淮阴师专学报》1983年第3期

陈午楼《〈西游记〉方言词语释例》,《中国语文通讯》1983年第3期

刘怀玉《跋吴承恩〈云湖画菊跋〉》，《中华文史论丛》1983 年第 3 辑

寇养厚《〈西游记〉的文心之微与意见方法——学习鲁迅关于〈西游记〉的论述》，《广西师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

刘荫柏《〈西游记〉的激进思想和局限》，《齐鲁学刊》1983 年第 4 期

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 年第 4 期

李欣复《也谈〈西游记〉的审美认识价值》，《文史哲》1983 年第 4 期

徐子芳《初访射阳——吴承恩故居与家世琐记》，《羊城晚报》1983 年 4 月 30 日

姚咏萼《吴承恩〈西游记〉童话与写实》，《团结报》1983 年 5 月 21 日

巴人《〈西游记〉论》，《晋阳学刊》1983 年第 5 期

孟繁仁《谈〈西游记〉的几个问题》，《理论研究》1983 年第 5 期

姚政《〈西游记〉札记》，《理论研究》1983 年第 5 期

白坚《关于吴承恩和朱曰藩的赠答诗——与苏兴同志商榷》，《理论研究》1983 年第 5 期

〔苏〕萨兹金《〈罗摩衍那〉在蒙古》，《蒙古学资料与情报》第 2 辑，1983 年 6 月

霍松林《吴承恩与神魔小说〈西游记〉》，《陕西教育》1983 年第 6 期

吴野《斗战胜佛礼赞》，《龙门阵》1983 年第 6 期

殷鼎《〈西游记〉与英语世界》，《人民日报》1983 年 7 月 13 日

佚名《〈西游记〉英译本全部出齐》，《文学报》1983 年 7 月 28 日

李明才《苏东坡写〈西游记〉》，《采风报》1983 年 8 月 1 日

陈达农等《〈西游记〉彩线（民间艺术介绍）》，《采风报》1983 年 8 月 16 日

林良《关于〈后西游记〉》，《光明日报》1983 年 9 月 20 日

殷陆君《〈西游记〉西渐记》，《读书》1983 年第 10 期

孙雁行《美猴王的老家》,《北京日报》1983年11月1日

甘德福《火焰山从何来》,《新民晚报》1983年11月7日

朱文泉《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文汇报》1983年11月26日

黄小南《吴承恩墓是怎样被发现的——一块枢板为专家揭谜提供依据》,《新民晚报》1983年11月27日

佚名《“孙悟空”飞到尼日利亚》,《报刊文摘》1983年12月18日

傅憎亨《孙悟空的返祖与倒掉了的雷峰塔——“最真的诗是最假的诗”末议》,《芒种》1983年第12期

罗东升《〈西游记〉主题思想浅论》,《古典文学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

龚维英《猪八戒艺术形象的渊源》,《文学遗产》增刊1983年第15辑

刘洪石等《三元大帝的传说和〈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民间文艺集刊》(4)

杜德桥《〈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刘荫柏《〈西游记〉成因考》,《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增刊

钟婴《说沙僧》,《杭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

邓振辉《捏合的故事,统一的主题——对〈西游记〉主题的管见》,《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霍有明《略论〈西游记〉的讽刺艺术》,《理论研究》1984年第1期

邢治平《孙悟空“受招安”说质疑》,《殷都学刊》1984年第1期

李忠昌《两部〈西游记〉比较谈》,《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1期

张德伦《大圣·行者·佛——漫论孙悟空》,《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李云飞《吴承恩仕长兴考》,《嘉兴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苏]C·尼科里斯卡娅作,姜筱绿译《〈西游记〉的时间空间结构》,《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向维汁《〈西游记〉在欧美》,《四川日报》1984年2月25日

贾志梁《猪八戒的形象令人难忘》,《解放日报》1984年2月28日

钟扬《论吴承恩》,《安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杨桂森《从〈西游记〉的神权系统和宗教之争看它的现实主义倾向》,《天津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

金紫千《也谈〈西游记〉的主题》,《文史哲》1984年第2期

李时人《〈西游记〉闹天宫故事形成考辨》,《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吴圣昔《呆子形象面面观——猪八戒剖析》,《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

周炜《寓庄于谐 妙趣横生——〈西游记〉语言管窥》,《安徽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增刊

陈毓黻《吴承恩〈西游记〉成于晚年说新证》,《光明日报》1984年3月27日

赵明政《〈西游记〉思想倾向琐议——兼谈评价〈西游记〉的方法》,《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苏兴《〈西游记〉对明世宗的隐喻批判和嘲讽》,《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欧阳健《〈西游记〉的玩世主义》,《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吴圣昔《论〈西游记〉的美学价值和宗教观念的关系》,《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朱其铠《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再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刘毓忱《论〈西游记〉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刘烈茂《论〈西游记〉的幻想艺术》,《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

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省古籍出版社，1984 年

郑云波《风云诡神与物游——略论〈西游记〉奇特的艺术构思》，《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省古籍出版社，1984 年

金燕玉《〈西游记〉和童话》，《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省古籍出版社，1984 年

高明阁《〈取经诗话〉阅读札记》，《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

李时人《〈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

陈新《〈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

陈澈《吴承恩的“荆府记善之补”和〈西游记〉的写作刊刻》，《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

刘怀玉《吴承恩墓地调查散记》，《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

刘耿大《近几年的〈西游记〉研究综述》，《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

王丽娜《〈西游记〉在国外》，《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

潘寿余《梦的艺术与〈西游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白坚《从〈射阳先生存稿〉看吴承恩的思想》,《盐城师专学报》1984年3期

韩文志《试论〈西游记〉神魔斗争的性质》,《沈阳教育学院学刊》1984年第3期

黄永年《今本〈西游记〉袭用〈封神演义〉说辩证》,《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

刘荫柏《〈续西游记〉作者推考》,《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周中明《〈西游记〉艺术特色三题》,《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许虔东《吴承恩长兴为官思想新探》,《内蒙乌盟师专文科教学》1984年第3期

巴人《印度神话对〈西游记〉的影响》,《晋阳学刊》1984年第3期

刘毓忱《孙悟空形象的演化——再评“化身论”》,《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

佚名《吴承恩墓发现始末》,《文荟》1984年第3期

刘荫柏《孙悟空人物考》,《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李正民《吴承恩〈禹鼎志序〉中的“老洪”是谁?》,《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吴圣昔《谐中寓庄 情趣盎然——论〈西游记〉艺术辩证法》,《广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3—4期

郑逸梅《名医谈〈西游记〉》,《解放日报》1984年4月8日

吴昊《取经路上是与非》,《解放日报》1984年4月15日

周中明《论〈西游记〉的政治思想倾向》,《安徽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尼日利亚发现“孙悟空”》,《新民晚报》1984年5月5日

白盾《论〈西游记〉的童话特征》,《光明日报》1984年5月8日

刘士昀《论〈西游记〉中的沙僧形象》,《思想战线》1984年第5期

汪瑰曼《也谈〈西游记〉中神话和童话的交融》,《光明日报》1984年6月26日

周寅宾《谈〈西游记〉的诙谐色彩》,《光明日报》1984年7月17日

王齐洲《孙悟空与神魔世界》,《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

龚维英《孙悟空与夏启》,《学术月刊》1984 年第 7 期

陶思炎《〈西游记〉是神话和童话的交融吗?——也谈〈西游记〉的构成原料》,《光明日报》1984 年 8 月 7 日

章皆淳《从孙悟空的道路看〈西游记〉的主题》,《南通师专学报》1984 年总第 8 期

李欣复《〈西游记〉的文心体裁特征》,《光明日报》1984 年 9 月 11 日

兰木南《三种唐僧》,《人民日报》1984 年 10 月 11 日

张兵《〈西游记〉的作者是谁?》,《文汇报》1984 年 11 月 2 日

孟繁仁《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游记〉》,《光明日报》1984 年 11 月 20 日

王景臣《华沙出版〈西游记〉》,《新民晚报》1984 年 12 月 8 日

王永生《〈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浅论》,《文艺论丛》(20)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

陈新《华阳洞天主人其人》,《文献》1984 年

东方启《孙悟空》,《新观察》1984 年第 18 期

李蔚《王静如教授发现现存最早的唐僧取经壁画》,《光明日报》1985 年 1 月 13 日

滕英《今日的花果山水帘洞》,《文汇报》1985 年 1 月 27 日

蔡国梁《陈士斌对〈西游记〉人物和情节结构的批评》,《文献》1985 年第 1 期

宁宗一《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国建设》1985 年第 1 期

佚名《〈西游记〉译本》,《集粹》1985 年第 1 期

孙逊《〈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形象塑造的艺术经验》,《文学评论》1985 年第 1 期

邓伟《〈西游记〉和神魔小说》,《春风丛刊》1985 年第 1 期

江慰庐《〈西游记〉中的“西梁女国”考略》,《西藏研究》1985 年第 1 期

刘维俊《〈西游记〉的形成及其思想意义》,《河北大学学报》1985 年第 1 期

顾农《鲁迅研究〈西游记〉的三部分参考书》,《淮阴教育学院学

报》1985 年第 1 期

王燕萍《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广西师大学报》1985 年第 1 期

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5 年第 1 期

孟繁仁《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游记〉》,《艺术文摘》1985 年第 1 期

熔铸《台湾学者郑明娸对〈西游记〉的探讨》,《中外文学研究参考》1985 年第 1 期

曹晋杰等《试论吴承恩的生活印迹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盐城师专学报》1985 年第 1 期

谭行《〈西游记〉初探》,《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1 期

杨桂森、贾锡信《孙悟空的国籍》,《河北大学学报》1985 年第 1 期

华叶《孙悟空“模特儿”是什么?》,《文汇报》1985 年 2 月 25 日

李克臣《猪八戒与福斯塔夫——兼论猪八戒形象的典型意义》,《丹东师专学报》1985 年第 2 期

江巨荣《〈西游记〉与明代写实》,《电大教学》语文版,1985 年第 2 期

张宝坤《孙悟空形象的艺术魅力》,《电大教学》语文版,1985 年第 2 期

杨秉琪《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作》,《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 年第 2 期

杨俊《猪八戒形象新说》,《云南社会科学》1985 年第 2 期

陈澈《再谈〈西游记〉中的神魔对立》,《文史哲》1985 年第 2 期

李谷鸣《〈西游记〉中佛道之争探源——兼评“三教合一”说》,《安徽教院学报》1985 年第 2 期

周中明《“齐天大圣”的由来和发展——孙悟空与白申公两个人物形象比较》,《艺谭》1985 年第 3 期

张菊玲等《新近发现的古彝文〈西游记〉》,《民族文学研究》1985 年第 3 期

降边嘉措《〈罗摩衍那〉在我国藏族地区的流传及其对藏族文化的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3 期

彭海等《吴承恩写定百回本〈西游记〉的语言标志》,《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3期

刘国辉《〈西游记〉唐僧管窥》,《电大文科园地》1985年第3期

曾广文《世间岂谓无英雄——〈西游记〉主题思想新探》,《成都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靳今《吴承恩曾当过河阴知县——河南荥阳县发现吴承恩撰写的碑文》,《许昌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

张锦池《究竟是主张制约“童心”、还是鼓吹放纵“童心”——〈红楼梦〉与〈西游记〉人性观的比较研究》,《北方论丛》1985年第4期

周寅宾《〈西游记〉俳谐色彩》,《文科月刊》1985年第4期

姜超《论猪八戒》,《语文学习》(内蒙古师大)1985年第4期

司马津辉《〈巨人传〉与〈西游记〉比较初探》,《常德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杨桂森《〈西游记〉远绍——论吴承恩的点金术》,《天津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辑

方胜《关于〈西游记〉祖本问题的不同意见》,《语文导报》1985年第4期

袁世硕《宗教故事题材包孕了嘲谑宗教的内容——简议〈西游记〉的特点》,《文科月刊》1985年第4期

卞斋《〈西游记〉在国外》,《文科月刊》1985年第4期

佚名《苏出版〈猴王孙悟空〉》,《新民晚报》1985年5月30日

林零《一九八四年〈西游记〉研究概观》,《语文导报》1985年第5期

陈美林《〈后西游记〉的思想艺术及其他》,《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澳大利亚〕柳存仁《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此文原载《明报月刊》(港)1985年第5—9期;又载《中国古典小说论坛》(《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特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程弘《略谈〈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光明日报》1985年6月14日

黄桢翔《〈西游记〉中的药名诗》,《今晚报》1985年6月19日

柳和城《胡适与〈西游记〉》,《解放日报》1985年6月25日

周尝棕《〈猪八戒〉的遐想》,《文学》1985年第6期

刘士昀《论猪八戒》,《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

高洪钧《〈西游补〉作者是谁》,《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

李时人《明刊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

苏兴《试论〈后西游记〉》,《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

张南泉《〈后西游记〉的思想和艺术》,《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

王民求《〈后西游记〉的社会意义》,《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

姚政《巫术·神话·宗教——〈西游记〉中所反映的宗教观念》,《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8月

张建军《吴承恩胸像的科学复原》,《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8月

吴圣昔《以奇取胜 师心独见——论〈西游记〉的传奇性》,《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8月

〔日〕小川环树著,胡天民译《〈西游记〉的原本及其改作》,《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8月

方胜《〈西游记〉〈封神演义〉“因袭”说证实》,《光明日报》1985年8月27日

朱迎平《孙悟空形象原型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

李朝群《〈格萨尔王传〉与〈西游记〉》,《西藏日报》1985年10月8日

徐伟达等《吴承恩跋朱曰藩书诗歌字卷》,《文物》1985年第10期

陈漱《〈西游记〉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新考》,《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吴圣昔《启示深邃 耐于寻味——论〈西游记〉的哲理性》,《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姚政《〈西游记〉本事摭录》,《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

蔡国梁《陈批〈西游记〉零拾》,《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

吴彦《火焰山小考》,《新民晚报》1986年1月3日

姜超《贾宝玉与孙悟空》,《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1辑

欧阳健《河阴知县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章培恒《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复旦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张宏梁等《吴承恩〈西游记〉与泰山》,《泰安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王守泉《〈西游原旨〉成书年代及版本源流考(附〈西游原旨〉资料补订)》,《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苏兴《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板刻》,《文献》1986年第1期

赵国华《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上)——〈西游记〉与印度文学比较研究之一》,《南亚研究》1986年第1期

陈蒲清《中国十七世纪的〈天路历程〉——〈后西游记〉》,《湖南教育学院学刊》1986年第2期

王恺《〈西游记〉小说语词补释》,《淮阴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此文又载《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1986年10月

史双元《孙悟空原型又一说》,《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此文又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8期、《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

朱彤《雄奇恢诡,寓真于诞——“大闹天宫”论析》,《名作欣赏》1986年第2期

钟婴《论〈西游记〉的思想与主题》,《文史哲》1986年第2期

刘蕤《“八公”和〈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3期

韦航《〈西游原旨〉并非新发现》,《书林》1986年第3期

萧小红《〈西游记〉的审美特征》,《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6年

第3期

李谷鸣《〈西游记〉中孙悟空原型新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1986年第3期

孙逊《〈西游补〉寓意试探》，《阜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

苏兴《介绍、简评国外及我国台湾学术界对〈西游记〉作者问题的论述》，《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张静二《海外学者看〈西游记〉（台湾学术论摘）》，《福建论坛》

1986年第3期，此文原载《中外文学》1985年第14卷第5期

吴圣昔《拙中藏巧，别具一格——论〈西游记〉的结构艺术》，《殷都学刊》1986年第3期

刘怀玉《〈西游记〉中的淮安方言》，《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4月

苏兴《〈西游记〉的四圣试禅心事》，《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4月

姚政《〈鼎镌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自身所揭示的几个问题》，《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4月

陈新《再论〈西游记〉的版本源流》，《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4月

杨俊《猪八戒形象的喜剧性》，《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4月

刘怀玉《光耀海邑——吴承恩二十八年盐城之行考》，《盐城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

熊笃《论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兼说〈朴通事谚解〉中所引〈西游记平话〉非元代产物》，《重庆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

陈应祥《植根在民间——孙悟空形象的系统思考》，《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赵国华《论中国的献人供妖与义士除害型故事——〈西游记〉与印度文学比较研究之二》，《南亚研究》1986年第4期

王齐洲《孙悟空与唐僧》，《荆州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

方胜《单一性、哲理性、积极性——〈西游记〉主题论辩》，《宁波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

倪长康《关于孙悟空形象的艺术渊源问题争论的回顾》,《上海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

陈君谋《百回本〈西游记〉的前驱——评朱鼎臣〈西游释厄传〉》,《上海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

刘毓忱《巧妙编织故事,生动塑造人物——〈西游记〉“三调芭蕉扇”的艺术特色》,《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5期

钟婴《谈〈西游记〉与〈后西游记〉中的牛魔王家族》,《明清小说论丛》第4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

陈邵群《试论两个神猴的渊源关系——印度神猴哈努曼与中国神猴孙悟空的比较》,《暨南学报》1986年6期

姜云《〈西游记〉:一部以象征主义为主要特色的作品》,《文学遗产》1986年6期

刘怀玉《吴承恩作〈西游记〉二证》,《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6期

叶延滨《试论猪八戒》,《人民文学》1986年6期

李希凡《“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谈〈西游记〉的现实性》,《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

方胜《谈谈〈西游记〉主题的基本性质》,《光明日报》1986年10月21日

李谷鸣《〈西游记〉“三教合一”说质疑》,《〈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袁珂《试论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国神话史〉的一小节》,《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萧兵《二郎神故事的外来因数——〈从神话到小说〉断片》,《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吴圣昔《拟容取心,神形皆具》,《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曲辰《〈故事新编〉与吴承恩》,《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林同《葫芦不屑依样描——论〈西游记〉与〈聊斋〉的想象》,《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后又载《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增刊

王明发《简论〈西游记〉前七回》，《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马济中《〈西游记〉第八十一难“生硬”、“累赘”说考辨》，《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刘修业《关于吴承恩的生平及〈花草新编〉三则》，《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苏兴《〈西游记〉孙悟空对妖精要自称“外公”问题》，《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再研究——与章培恒同志商榷》，《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张宏梁等《吴承恩出仕荆府记善考略》，《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陈民牛《略谈吴承恩的诗词》，《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慕闲《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争论》，《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李时人《吴本、杨本、朱本〈西游记〉关系考辨》，《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朱德慈《〈西游记〉三种版本的新检讨》，《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蔡铁鹰等《〈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简说》，《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天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批评汇辑》，《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新加坡大学〕柳存仁《〈封神〉与吴承恩〈西游记〉之先后》，《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沧州客《研究吴承恩的专家刘修业先生》，《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6年10月

应霁民《挣脱政治图解式的束缚，〈西游记〉研究重提胡适论点》，《浙江日报》1986年11月29日

佚名《〈西游记〉研究冲破“紧箍咒”》，《文汇报》1986年12月

6 日

孙芝生《探讨〈西游记〉与〈封神演义〉的关系》,《古典文学知识》

1987 年第 1 期

颜景常《从饮食习俗看〈西游记〉的淮海色彩》,《淮阴师专学报》

1987 年第 1 期

方胜《〈西游记〉祖本问题新论》,《贵州文史丛刊》1987 年第 1 期

朱其铠《论〈西游记〉的滑稽诙谐》,《山东师大学报》1987 年第

1 期

宋万华《论〈红楼梦〉与〈西游记〉抉微》,《鞍山师专学报》1987 年

第 2 期

周中明《论吴承恩〈西游记〉对〈取经诗话〉的继承和发展》,《安徽

大学学报》1987 年第 2 期

刘孔伏《吴承恩获贡入京时间辨正》,《广州师院学报》1987 年第

2 期

吴圣昔《涉笔成趣 妙在自然——论〈西游记〉的诙谐性》,《文学

遗产》1987 年第 3 期

冷铨清《〈西游记〉的主旋律和创作方法》,《求是学刊》1987 年第

3 期

钟扬《谢肇淛“〈西游记〉评论”考辨》,《贵州文史丛刊》1987 年第

3 期

钟婴《论〈西游记〉与宗教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第

3 期

冯杨《〈西游记〉主题思想新探》,《思想战线》1987 年第 3 期

陈漱《近几年来〈西游记〉研究综述》,《文史哲》1987 年第 3 期

袁荻涌《〈西游记〉与印度史诗和佛经文献》,《阅读与写作》1987

年第 3 期

蔡铁鹰《〈西游记〉本事杂考(八则)》,《淮阴师专学报》1987 年第

3 期

钟扬《“神魔”、“神话”二说之起伏消长——“西游学”史片面观》,

《安庆师院学报》1987 年第 3 期

杜崇新《三个异国形象的共同点——孙悟空、浮士德、堂吉诃德之

比较》，《沈阳师院学报》1987 年第 4 期

刘耿大《论〈西游记〉的浪漫主义精神——兼谈“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的统一性》，《青海师大学报》1987 年第 4 期

刘荫柏《〈西游记〉与明清宝卷》，《文献》1987 年第 4 期

杨子坚《吴承恩著〈西游记〉详证》，《南京大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

楼含松《论〈西游记〉的深层结构》，《杭州大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第 17 卷

杨俊《论〈西游记〉的民族文学性》，《云南社会科学》1987 年第 4 期

吴圣昔《关于〈西游记〉主题讨论的几种意见》，《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 1987 年第 4 期

张锦池《论〈西游记〉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独创性》，《文学遗产》1987 年第 5 期

张锦池《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化与〈西游记〉的主题》，《学术交流》1987 年第 5 期

张锦池《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 年第 5 期

钟扬《试揭〈西游记〉大旨“求放心”说之谜》，《明清小说研究》第 5 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年 6 月

〔苏〕罗加乔夫著，李勤摘译《〈西游记〉的若干艺术特点》，《明清小说研究》第 5 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年 6 月

方胜《嘻笑怒骂 皆成文章——论〈西游记〉的讽刺性》，《明清小说研究》第 6 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年 12 月

刘怀玉《吴承恩生平二事考》，《明清小说研究》第 6 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年 12 月

陈辽《〈西游记〉系儒佛道思想互补之作》，《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 1 期

放牧《〈西游记〉的主题、诗美及其他——射阳山人答笔者问》，《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 1 期

刘荫柏《〈西游记〉与佛教》，《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 1 期

于洪笙、胡小伟《理想的斗士——孙悟空与堂吉诃德之比较》，

《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 1 期

龚维英《〈西游记〉系仙话小说述论》,《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 2 期

陈应祥《孙悟空形象的系统思考》,《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 3 期

佚名《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 3 期

颜景常《〈西游记〉诗歌韵类和作者问题》,《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 3 期

陈惠琴《善取善创 别开生面——〈西游记〉续书略论》,《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 3 期

朱瑞政《“西天”在什么地方》,《北京晚报》1989 年 1 月 7 日

南矩荣《〈西游记〉“以真反理”三维观》,《固原师专学报》1989 年第 1 期

吴昌大《〈西游记〉中见到的“者”字》,《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

陶鸿飞《漫话〈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创作》,《文史知识》1989 年第 1 期

胡书义《隔代异国的孪生兄弟:桑丘与猪八戒形象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89 年第 1 期

朱英荣《谈猪八戒形象的起源》,《社会科学战线》1989 年第 1 期

柴葵珍《优美的荒诞,清醒的空幻:〈西游补〉初探》,《湖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 年第 1 期

郝浚《四十年来〈西游记〉研究状况简评》,《文史知识》1989 年第 1 期

田荣《第三届全国〈西游记〉研讨会概述》,《文史知识》1989 年第 1 期

张强《论三国故事对〈西游记〉的影响》,《明清小说研究》1989 年第 1 期

高洪钧《〈西游补〉作者是谁之再辩》,《明清小说研究》1989 年第 1 期

中国未来研究会《关于开展〈西游记〉的理性思维研究》,《明清小

说研究》1989年第1期

吴承学《〈西游记〉的三教合一和佛道轩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9年第2期

汪远平《在不断探索中获取新的发现：〈三国〉、〈水浒〉、〈西游记〉和〈红楼梦〉研究近况综述》，《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2期

萧兵《〈西游记〉——文化开放的象征：兼论泛西域猿猴传统》，《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2期

李铁营《〈西游记〉中的蕲春景物》，《历史大观园》1989年第2期

钟扬《〈西游记〉作者新证》，《安庆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

陈冬季《变形、荒诞与象征——论“荒诞”小说〈西游补〉的美学特征》，《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2期

萧兵《〈封神演义〉的拟史诗性及其生成》，《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2期

刘志增《西游记宫奇幻多姿，遨游其间，乐哉快哉》，《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3月1日

刘征《悟〈西游记〉的“貂尾”》，《人民日报》1989年3月7日

张锦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说话”家数考论：兼谈宋人“说话”分类问题》，《学术交流》1989年第3期

蔡铁鹰《整合的历程——论唐僧形象的演变：兼及中国小说演变过程的理论意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蔡铁鹰《孙悟空来源诸说质疑：孙悟空形象探源之一》，《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3期

李晓阳《孙悟空不是“舶来品”》，《西部学坛》1989年第3期

孙未艾《孙悟空试论》，《成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3期

《蕲俗·孙大圣·〈西游记〉》，《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3期

傅承洲《〈西游补〉作者董斯张考》，《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

蔡铁鹰《〈取经诗话〉的成书及故事系统：孙悟空形象探源》，《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

陈辽《谈〈西游记〉作者年代——〈西游记〉研究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

刘洛《孙悟空的悲剧与吴承恩的悲剧:〈西游记〉札记》,《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

姚政《〈西游记〉与云南民歌》,《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

吴心见《不妨让悟空坐头把交椅》,《四川日报》1989年4月25日

金有景《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南都学坛》1989年第4期

吴九成等《“宝贝”——昨天留给今天的思考:〈西游记〉武器观概论》,《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

张强《一个相映成趣的艺术典型:猪八戒与桑丘之比较》,《淮阴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蔡铁鹰《猴行者与佛教秘典中的猴形神将:孙悟空形象探源之六》,《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4期

萧兵《再论〈封神演义〉与拟史诗性——兼论中国式史诗发育不全的原因》,《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4期

《“猪八戒”原型小考》,《四川日报》1989年5月3日

苏兴《怎样读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古典文学知识》1989年第5期

吴圣昔《戏墨寓至理 幻笔抒奇思:论〈西游记〉的总体特征》,《江海学刊》1989年第5期

邓韶玉《开拓〈西游记〉研究新蹊径: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评述》,《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

邓建设《孙悟空为何服唐僧》,《湖北日报》1989年6月8日

徐振贵《试论道教对明代神魔小说的影响》,《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

张稔穰、刘连庚《佛、道影响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

董国炎《吴承恩的得失悲欢》,《古典文学知识》1989年第6期

尹恭弘《〈西游记〉中的沙僧形象》,《古典文学知识》1989年第6期

周寅宾《〈西游补〉体现的意识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6期

刘耿大《论〈西游记〉的滑稽美:猪八戒滑稽形象探析》,《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庆成、茂高《〈西游记〉超前意识讨论会在淮安举行》,《扬子晚报》1989年7月16日

侯光复《取经路上的凡夫俗子:猪八戒》,《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

丁驾龙《用未来学观点研究〈西游记〉:全国〈西游记〉超前意识未来观学术讨论会在江苏召开》,《文学报》1989年8月17日

佚名《开展超前意识未来观研究 发掘理性思维的精髓:杨俊提出——在社会科学领域探索〈西游记〉的科学价值》,《社会科学报》1989年9月21日

蔡铁鹰《吴承恩“荆府记善”之任与〈西游记〉》,《江汉论坛》1989年第10期

夏敏《〈西游记〉象征意义新解》,《学术动态》1989年第11期

梅季《〈西游记〉词语补释》,《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1期

陈民牛《论吴承恩从政治国的哲学思想》,《宜宾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

陈君谋《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熊秉尧《关于〈西游记〉祖本问题的思考》,《内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年第1期

苏兴《现存世德堂本〈西游记〉是否即熊云滨重刻本的探讨》,《文献》1990年第1期

张锦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求是学刊》1990年第1期

宋培效、刘宝琴《白璧微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的后半部不如前半部原因简析》,《承德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

徐传武《试谈〈西游记〉的五行说思想》,《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霍现俊《论元杂剧和〈西游记〉的诙谐色彩》,《河北师范学院学

报》1990 年第 1 期

陆一飞《徘徊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对孙悟空形象的模糊性思索》，《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 年第 1 期

钱炜《中西古典小说僧侣形象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0 年第 1 期

魏崇新《猪八戒形象新解：〈西游记〉新论之一》，《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 年第 1 期

刘柏奎《中西人生之路的立交桥：〈西游记〉理性思维探索》，《明清小说研究》1990 年第 1 期

邓韶玉《开拓〈西游记〉研究新蹊径——评〈西游记研究资料〉》，《明清小说研究》1990 年第 1 期

杨俊《〈西游记〉不亚于〈红楼梦〉：谈该书研究 40 年》，《社会科学报》1990 年 2 月 8 日

赵伯英《一部伟著的雏形——杨志和〈西游记传〉述评》，《盐城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 年第 2 期

熊发恕《〈西游记杂剧〉作者及时代考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

舟子《〈西游记〉与泰山地名》，《地名知识》1990 年第 2 期

〔美〕任友梅《元杂剧中的喜剧成分：〈西游记〉杂剧中的唐三藏和孙悟空》，《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 年第 2 期

陈漱《吴承恩作〈西游记〉的内证》，《北方论丛》1990 年第 2 期

吴圣昔《欲解疑团，新增疑团——评金有景〈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南通师专学报》1990 年第 2 期

〔日〕金文京著，陈月娥等译《关羽的儿子与孙悟空》，《中国文学研究》1990 年第 2 期

罗宪敏《孙悟空形象的美感效应》，《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1990 年第 2 期

黄健《哈努曼与孙悟空——历史渊源、性格对比、宗教差异》，《国外文学》1990 年第 2 期

姚立江《金色猪与河伯——也谈猪八戒形象的原型》，《文史知识》1990 年第 2 期

文启宇《调和人际关系的典型:谈〈西游记〉中的沙僧形象》,《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吴调公《排云破雾探〈西游〉——读吴圣昔〈西游新解〉》,《学海》1990年第2期

石麟《略论〈西游记〉续书三种——〈续西游记〉〈西游补〉〈后西游记〉考略》,《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2期

花三科《人的颂歌:〈西游记〉管窥一得》,《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王兴亚《〈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考辨》,《文史杂志》1990年第3期

吴圣昔《以文为戏,意味深长——孙行者三调芭蕉扇》,《名作欣赏》1990年第3期

吴全韬《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对哈奴曼说与密教大神说的思考与否定》,《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杨俊《孙悟空形象新探》,《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蔡铁鹰《猴行者与古羌人的氏族图腾及祖先传说:孙悟空形象探源之四》,《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方克强《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文艺争鸣》1990年第3期

黄倬成《明代小说史上的三个李春芳》,《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

刘怀玉《淮河水神与〈西游记〉》,《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

蔡铁鹰《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的思考和辩证》,《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

徐保卫《吴承恩:作家的诞生》,《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

吕晴飞《〈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赵伯英《吴本〈西游记〉的又一镜》,《盐城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年第4期

吴圣昔《〈西游记〉陈〈序〉称“旧有序”是指虞集〈序〉吗?》,《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吴圣昔《邱处机写过〈西游记〉吗?——虞集〈西游记序〉真伪辨之一》,《复旦学报》1990年第4期

张锦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年代考》,《学术交流》1990年第4期

唐韵《〈西游记〉中的“把”》,《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王临惠《简论〈西游记〉中的动词重叠式》,《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朱邦国《柳暗花明又一村:读〈西游新解〉》,《淮阴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方抒《磨光刮垢探〈西游〉》,《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5月2日;又《新华文摘》1990年第7期转载

袁立春《神秘莫测的“女儿国”》,《历史大观园》1990年第5期

刘诗坪《〈西游记〉作者的公案》,《历史大观园》1990年第6期

萧锦龙《从孙悟空、猪八戒与堂吉诃德、桑丘看中西民族文化心态》,《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周寅宾《论孙悟空的宗教意识》,《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6期

鲁充《〈西游记〉研究的可喜收获:读〈西游新解〉》,《社科信息》1990年第7期

王达津《〈大唐西域记〉与〈西游记〉》,《今晚报》1990年8月21日

王行《二郎神的第三只眼》,《今晚报》1990年9月5日

王达津《〈大唐西域记〉与唐传奇》,《今晚报》1990年9月20日

王达津《再谈〈大唐西域记〉与唐传奇》,《今晚报》1990年9月22日

刘修业《吴承恩生平述略》,《文史知识》1990年第9期

杨桂森《孙悟空、贾宝玉都出身于石头》,《今晚报》1990年12月8日

杨俊《一门富有未来意识的〈西游〉学正在形成》,《社会科学报》1990年12月20日

廉旭《〈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质疑》,《苏州大学学报》1991

年第1期

吴圣昔《评〈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南都学坛》

1991年第1期

黄笙闻《从目连戏到〈西游记〉的人物演变》，《新疆艺术》1991年

第1期

刘勇强《论〈西游记〉对观音形象的重塑》，《民间文学论坛》1991

年第1期

张强《〈西游记〉第二十七回本事推考》，《淮阴教育学院学报》

1991年第1期

吴圣昔《〈西游记〉是科学巨著说辩证》，《淮阴教育学院学报》

1991年第1期

吴华宝《钱塘君和孙悟空形象渊源简论》，《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1991年第1期

石平《读〈西游记〉及明清小说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第1期

杨俊《人类未来的预见者——〈西游记〉理性思维新论》，《明清小

说研究》1991年第1期

蔡铁鹰《元明之际取经故事系统的流向和影响——孙悟空形象探

源之三》，《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1期

郑伯成《湖北蕲春“孙大圣”形象刍议》，《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

第1期

王星琦《恣情纵笔任横行：〈西游补〉读札》，《明清小说研究》1991

年第1期

张锦池《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兼说世德堂本的思想性质与

杨本和朱本及〈吴承恩诗文集〉的不同（上）》，《北方论丛》1991年第

1期

张锦池《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兼说世德堂本的思想性质与

杨本和朱本及〈吴承恩诗文集〉的不同（下）》，《北方论丛》1991年第

2期

诸葛志《〈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

第2期

贺学君《〈西游记〉三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陈澈《鲁迅与胡适〈西游记〉研究比较》,《北方论丛》1991年第2期

杨俊《“西游学”的兴起:未来学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内的运用》,《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吴圣昔《〈西游记〉阳本是吴本“雏形”吗?》,《盐城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1年第2期

蔡铁鹰《西北万里行,艰难欣喜两心知:谈我〈西游记〉成书史研究的形成》,《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1年第2期

赵伯英《杨志和〈西游记传〉的思考》,《盐城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1年第2期

力量《〈西游记〉中的“得”字句》,《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1年第2期

傅修延《〈西游记〉叙述语法:从事件到表层叙述结构》,《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马旷源《论孙悟空的神话演变:〈西游记〉考证之三》,《楚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1年第2期

蔡铁鹰《猴行者与麝香之路上〈罗摩衍那〉的传播:孙悟空形象探源之五》,《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1年第2期

冯保善《异军突起,别树一帜:蔡铁鹰“〈西游记〉成书史研究”系列评述》,《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1年第2期

朱恒夫《目连变文、目连戏与唐僧取经故事关系初探》,《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

李建国《〈西游记〉艺术形象的多重组合》,《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

吴圣昔《回目对读的发现和启示——〈西游记〉版本研究之一》,《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

杨俊《两个吴承恩》,《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3月30日

吴圣昔《陈元之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吴圣昔《〈西游证道书〉“原序”是虞集所撰吗》,《明清小说研究》

1991 年第 3 期

于丁《〈西游记〉人物谈及其他》,《苏州大学学报》1991 年第 3 期

胡绪伟《董说和他的〈西游补〉》,《荆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1 年第 3 期

苏兴《一部〈西游记〉研究的新著:评吴圣昔〈西游新解〉》,《江海学刊》1991 年第 3 期

马焯荣《明清小说里的三教合流》,《明清小说研究》1991 年第 3 期

章立《如来佛形象和〈西游记〉主题》,《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1 年第 4 期

刘勇强《〈西游记〉:奇特的精神漫游》,《文史知识》1991 年第 4 期

刘耿大《略论〈西游记〉中的讽刺》,《五邑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

践各《论孙悟空形象的心态描写》,《明清小说研究》1991 年第 4 期

竺洪波《“西游学”正在兴起》,《文汇报》1991 年 5 月 18 日

卢甲文《〈西游记〉注释订误》,《中州学刊》1991 年第 5 期

含松、方抒《吴圣昔的〈西游记〉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 年 6 月 25 日

竺又军《〈西游记〉与浪漫主义:评〈西游新解〉》,《书讯报》1991 年 8 月 5 日

李希凡《“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谈〈西游记〉的现实性》,载《文史知识》编辑部编《漫话明清小说》,中华书局,1991 年 7 月

周雪荣《吴承恩的手迹》,《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 年 8 月 15 日

佚名《传奇—哲理—诙谐:吴圣昔提出多维探讨〈西游记〉》,《社会科学报》1991 年 10 月 3 日

吴圣昔《论游戏之作〈西游记〉的价值观》,《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0 月

邢治平、曹炳建《〈西游记〉祖本新探》,《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

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郑伯成《湖北蕲春“孙大圣”形象刍议》,《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陈民牛《游戏笔墨 理想寄托:论〈西游记〉主题的理想性》,《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吴承学《〈西游记〉的三教合一和佛道轩轻》,《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张弦生《从〈歧路灯〉看〈西游记〉:略谈〈西游记〉对清代社会的影响》,《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蔡铁鹰《猴行者——文化撞击中的图腾复苏:论西北文化对孙悟空形象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吴冶《一部宏伟的幽默小说:试析〈西游记〉的喜剧美学特色》,《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刘金保、姬歆民《佛教传入对〈西游记〉艺术形象的影响:兼驳〈西游记〉研究中的“舶来说”》,《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刘建芬《明清小说理论家对〈西游记〉的评价》,《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姬歆民《从历史人物玄奘与〈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体察吴承恩“净土”思想的幻灭》,《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刘怀玉《世德堂本〈西游记〉所署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张宏超《第三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综述》,《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霍雨佳《〈西游记〉主题及其他》,《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钟婴《〈西游记〉社会背景发覆》,《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陈漱《〈西游记〉成书于晚年说再证》,《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

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苏兴《西游故事别见录》,《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胥惠民、苏育生《大闹天宫故事和〈西游记〉结构》,《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彭力一《〈西游记〉的理趣》,《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郝延霖《〈西游记〉中孙悟空与神魔的矛盾及其意义》,《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冯文楼《取经:一个多重互补的定义结构——关于〈西游记〉思想蕴涵的解读》,《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

诸葛志《孙悟空大闹天宫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谭旻《文化走向上的〈西游记〉》,《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朱其铠《论〈西游记〉的戏谑和超越》,《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

郑伯成《吴承恩〈夏日〉诗写于蕲州》,《江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杨载武《〈西游记〉韵文的用韵》,《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美]安东尼著,赵鑫虎译《〈西游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学前提》,《西部学坛》1992年第2期

顾青《汪象旭和〈西游证道书〉》,《古典文学知识》1992年第2期

林蔚文《论福建的猴神崇拜:兼论其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关系》,《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2期

徐朔方《论〈西游记〉的成书》,《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

苏兴《〈西游记〉第七回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

李伟实《喜读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2期

汪泛舟《〈西游记〉源流别考——以敦煌文学为例》,《思想战线》

1992 年第 2 期

江健《谈谈〈西游记〉的谚语》,《淮阴教育学院学报》1992 年第 3 期

王庆芳《论〈西游记〉的人生哲理启迪》,《孝感师专学报》1992 年第 3 期

张强《试论〈西游记〉的结构艺术》,《淮阴教育学院学报》1992 年第 3 期

贾富德《试论〈西游记〉的现实批判精神》,《菏泽师专学报》1992 年第 3 期

刘小微、周全国《〈西游记〉的超前意识未来观》,《潜科学》1992 年第 3 期

李安纲《美猴王探源》,《山西大学学报》1992 年第 3 期

夏兴仁《〈西游记〉中反映的长生不老是永恒社会意识》,《明清小说研究》1992 年第 3 期

吴圣昔《“大略堂〈释厄传〉古本”之谜试解》,《明清小说研究》1992 年第 3 期

王希杰《读〈西游记漫话〉》,《明清小说研究》1992 年第 3 期

吴圣昔《世德堂本〈西游记〉的夹批及其版本意义》,《淮阴师专学报》1992 年第 4 期

王齐洲《〈西游记〉与宋明理学》,《天津社会科学》1992 年第 4 期

陈洪《牛魔王佛门渊源考证》,《南开大学学报》1992 年第 5 期

陈文新《对〈西游记〉研究中的浪漫主义理论提出质疑:评〈西游新解〉》,《书刊导报》1992 年 6 月 19 日

李晓阳《美猴王的嬗变》,《丽水师专学报》1993 年第 1 期

竺洪波《论唐僧的精神》,《明清小说研究》1993 年第 1 期

李金泉《〈西游记〉唐僧出身故事再探讨》,《明清小说研究》1993 年第 1 期

姚政《〈西游记〉方言词的一词异写》,《明清小说研究》1993 年第 1 期

朱恒夫《目连戏中的孙悟空故事叙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 年第 1 期

温存超《哪吒形象的原型分析》,《河池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刘宏伟《试论孙悟空的重生问题:兼论〈西游记〉的主题》,《枣庄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伍伟民《道士眼中的〈西游记〉》,《上海道教》1993年第1期

钟扬《孙悟空释名》,《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蒋见之《神魔小说与道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1期

陈洪《从须菩提看〈西游记〉的创作思路》,《文学遗产》1993年第1期

杨俊《试论〈西游记〉与“心学”》,《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李德身《略论〈西游记〉写“变”的旨趣》,《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郑智勇《〈后西游记〉与潮人》,《韩山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官福贤《〈西游记〉与〈格列佛游记〉怪诞风格之比较》,《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杨俊才《奇人奇想的孙悟空:〈西游记〉前七回研究兼与“造反说”商榷》,《丽水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刘宏彬《关于孙悟空原型的符号美学思索》,《中州学刊》1993年第2期

朱邦国《两部殊途同归的小说:〈西游记〉、〈金瓶梅〉主旨新探》,《淮阴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钟扬《天才的选择:吴承恩文学道路新探》,《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周可良《明尊暗贬神道佛,中兴佛教成大道:〈西游记〉主题辨析》,《大庆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

毛忠贤《从〈射阳先生存稿〉看〈西游记〉的创作思想》,《宜春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李安纲《美猴王与易卦》,《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李晓阳《美猴王的嬗变》,《西部学坛》1993年第3期

张涌《悟空“下海”之悟》,《探索》1993年第3期

刘耿大《独辟蹊径治〈西游〉:读李时人先生近著〈西游记考论〉》,《社会科学学刊》1993年第3期

刘兴汉《新校〈西游记〉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 年第 3 期

宋常立《“忘怀得失,独存鉴赏”:论动物性因素在〈西游记〉神魔形象构成中的审美作用》,《安庆师院学报》1993 年第 3 期

张训《〈西游记〉和海州方言》,《明清小说研究》1993 年第 3 期

孟宪爱《明清小说短话两则:孙悟空与高昂》,《明清小说研究》1993 年第 3 期

[美]安东尼著,赵鑫虎译《论〈西游记〉的原本和原作者》,《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3 年第 3 期

卢甲文《〈四游记〉注释勘误》,《南都学坛》1993 年第 3 期

张颖、陈速《从〈济颠语录〉到〈三会龙华普度收圆演义〉:描写佛菩萨题材章回说部的一个发展轮廓》,《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

刘荫柏、张淑珍《杨景贤与〈西游记〉杂剧论考》,《河北师院学报》1993 年第 4 期

竺洪波《〈西游记〉四题》,《宁波师院学报》1993 年第 4 期

任蒙《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西游记〉的双重价值》,《江汉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

张秉健《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辩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 年第 4 期

徐江《董说〈西游补〉考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 年第 4 期

诸葛志《〈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续篇》,《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

马旷源《西游记考证(三题)》,《楚雄师专学报》1993 年第 4 期

王辉斌《〈西游记〉祖本新探》,《宁夏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

胡小林、刘宏伟《试论〈西游记〉中神话与现实的矛盾》,《齐鲁学刊》1993 年第 5 期

姜淮超《谐趣横生的人物关系处理:从孙悟空捉弄猪八戒说起》,《阅读与写作》1993 年第 5 期,又载《语文学刊》1993 年第 7 期

李安纲《心路历程:〈西游记〉主题新论》,《晋阳学刊》1993 年第

5 期

童德彦《〈西游记〉成书于蕲春》，《书刊导报》1993 年 6 月 11 日，又载《新华文摘》1993 年第 8 期

阚小琴《〈西游记〉主题管见》，《内蒙古电大学刊》1993 年第 6 期

邹少雄《人类超我意识的集中体现：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学术交流》1993 年第 6 期

赵秀亭《猴王姓孙的来历》，《语文月刊》1993 年第 6 期

李德身《略论〈西游记〉写“变”的旨趣》，《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3 年第 6 期

徐朔方《评〈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文学遗产》1993 年第 6 期

杨俊《关于〈西游记〉研究的几个问题》，《社科信息》1993 年第 6 期

朱靖宇《“一口钟”不是钟》，《文史钩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年

朱靖宇《“弼马瘟”和“避马瘟”》，《文史钩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年

朱靖宇《〈西游记〉源泉一掬》，《文史钩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年

朱迎平《孙悟空形象原型研究综述》，《古典文学研究动态》中华书局，1993 年

郝浚《四十年来〈西游记〉研究状况简评》，《古典文学研究动态》中华书局，1993 年

江津《西游记研究》，《社会科学大系·文学、艺术、语言卷（1949—1989）》，蒋孔阳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美〕浦安迪《〈西游记〉：“空”的超越》，《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年

夏同宗《吴承恩外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佚名《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又载《书摘》1994 年第 4 期

刘勇强《牛魔王家族》，《书摘》1994 年第 1 期

姚政《似曾相识——谈〈西游记〉诗词》，《明清小说研究》1994 年

第1期

王辉斌《〈西游记〉题旨探秘》,《荆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陈荣林、周应堂《一个求生存的典型形象:关于〈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的探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田同旭《〈西游记〉是部情理小说:〈西游记〉主题新说》,《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王恺《〈西游记〉校注匡补》,《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秦红梅《试论猪八戒的交际艺术》,《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薛克翘《〈西游记〉中的密教影响》,《南亚研究》1994年第2期

龚维英《明清小说与灵石崇拜》,《合肥教院学报》1994年第2期

洪显周、周琦《〈三国演义〉〈西游记〉与云台山文化》,《东南文化》1994年第2期

陈闽《福建与〈西游记〉漫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吴南滨《〈西游记〉土地神形象的民俗考察》,《民俗研究》1994年第3期

马忠《灵山无钱非灵山,如来少贿欠如来:〈西游记〉第九十八回赏析》,《名作欣赏》1994年第3期

刘振农《“大闹天宫”非吴承恩创作考——〈西游记〉成书过程新探之一》,《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花三科《佛表道里儒骨髓:〈西游记〉管窥再得》,《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柳宏雷《论〈西游记〉的幽默艺术风格》,《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宁稼雨《〈西游记〉主人公形象原型精神》,《南开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贾三强《禅门心法——也谈〈西游记〉的主题》,《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4期

李安纲《〈西游记〉学发展源流论略》,《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4期

含松、方抒《不为浮云遮望眼：吴圣昔的〈西游记〉研究》，《宁波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

张训《〈西游记〉和〈红楼梦〉之比较》，《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薛克翘《〈西域记〉与〈西游记〉》，《南亚研究》1994年第4期

高思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李润强《〈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与〈西游记〉：谈敦煌变文和古代神话小说的渊源关系》，《社科纵横》1994年第4期

朱恒夫《吴承恩〈西游记〉与傩歌“唐仟”之关系》，《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4期

王平《从二郎神形象略窥〈西游记〉创作心态》，《求是学刊》1994年第4期

苏兴、苏铁戈、苏壮戈《论味潜斋石印本〈新说西游记图像〉：附论〈古本小说集成〉本〈新说西游记〉》，《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刘耿大《论〈西游记〉的哲理性》，《绥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4期

王辉斌《〈西游记〉祖本新探》，《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李靖国《英雄的悲剧、悲剧的英雄：孙悟空悲剧形象再探》，《名作欣赏》1994年第5期

朱一玄《神魔的魅力：〈西游记〉及其他神魔小说序》，《文教资料》1994年第6期

王平《〈四游记〉与民间信仰：兼论神魔小说的文化心理依据》，《文史哲》1994年第6期

〔日〕丰后宏记《胡和沙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猴行者像形成》，《学林》1994年第20期

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吴圣昔《〈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刘振农《两部神魔小说成书先后考：〈西游记〉成书过程新探之

二》,《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 年第 1 期

克珠群佩、王意如《论〈西游记〉的崇佛倾向》,《宗教学研究》1995 年第 1—2 期

吴圣昔《李评本二探:〈西游记〉版本秘录之一》,《明清小说研究》1995 年第 2 期

吴圣昔《〈证道书〉白文是〈西游记〉祖本吗?——与王辉斌〈西游记〉祖本新探商榷》,《宁夏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

夏敏《沙僧形象与西域文化》,《明清小说研究》1995 年第 2 期

石麟《心猿意马的放纵与收束:〈西游记〉主体新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 年第 2 期

吴圣昔《〈西游证道书〉杂考二题》,《文教资料》1995 年第 2 期

王志尧、仝海天《论〈西游记〉的主旨》,《南都学坛》1995 年第 2 期

彭荆风《有新意的考证:评马旷源〈西游记考证〉》,《楚雄师专学报》1995 年第 2 期

刘锋焘《一个虔诚执著的追求者形象:孙悟空形象新说》,《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5 年第 2 期

李安纲《唐三藏探源》,《晋阳学刊》1995 年第 3 期

吴圣昔《世本陈〈序〉的信息价值和疑歧透视》,《明清小说研究》1995 年第 3 期

程淑华《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函授教育》1995 年第 3 期

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山西大学学报》1995 年第 3 期

王毅、朱德慈《〈西游记〉中的淮安方言》,《明清小说研究》1995 年 3 期

杨俊《“华阳洞天主人”与〈西游记〉》,《明清小说研究》1995 年 3 期

刘松涛《〈西游记〉神魔形象论》,《许昌师专学报》1995 年第 3 期

李安纲《〈西游记〉主题是修心证道》,《编辑之友》1995 年 4 期

李安纲《〈西游记〉主旨辨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 年第 4 期

张成立《〈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任过新野知县:兼述〈西游记〉中的新野方言》,《南都学坛》1995年第4期

吴圣昔《〈西游记〉世本三题》,《古籍整理研究举例》1995年第5期

张锦池《论唐僧形象的演化》,《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

王显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西游记〉主题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张锦池《阿Q的远祖:猪八戒漫论》,《北方论丛》1995年第6期

干树德《二郎神信仰的嬗变》,《文史知识》1995年第6期

张成立《吴承恩在河南新野做过知县:兼述〈西游记〉与新野习俗方言》,《中州今古》1995年第6期

郑伯成《〈西游记〉与蕲春》,《理论月刊》1995年第7期

刘金《为孙悟空寻根——读马旷源的〈西游记考证〉》,《太原日报》1995年11月16日

孙德喜《试论〈西游记〉的主题结构》,《绥化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王辉斌《再论〈西游记〉的祖本为〈西游释厄传〉:对吴圣昔〈商榷〉一文的质疑》,《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宋克夫《吴承恩与明代的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王希杰《〈西游记〉内外读》,《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1期

李伟实《〈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平话》,《文史知识》1996年第2期

李安纲《〈还原篇〉是唐僧八十一难原型》,《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金家兴《“身外身法”及其联想:〈西游记〉中的变本研究举一》,《孝感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

竺洪波《自由:〈西游记〉主题新论》,《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刘桢《目连与小说〈西游记〉之孙悟空》,《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3期

李安纲《论〈西游记〉诗词韵文的金丹学主旨》,《晋阳学刊》1996年第3期

龚维英《神魔巨著〈封神演义〉:兼论〈封神〉为何不能和〈水浒〉、〈西游记〉鼎足而三》,《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郭子冉《论孙悟空典型形象的寓意:试解〈西游记〉创作原旨之谜》,《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张锦池《论沙和尚形象的演化》,《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

吴圣昔《评〈再论西游记的祖本是西游释厄传〉》,《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彭荆风《有新意的考证:评马旷源〈西游记考证〉》,《边疆文学》1996年第3期

吴圣昔《〈西游记〉札丛(1)》,《文教资料》1996年第3期

张晓《孙悟空的人格与明代中后期人文主义思潮》,《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3期

李安纲《为什么石猴进水帘洞要称美猴王》,《山西日报》(周末版)1996年4月5日

蒋松源《民族精神的英雄颂歌:孙悟空英雄气质辨析》,《高等函授学报》1996年第4期

吴圣昔《〈西游记〉论坛的新收获:读〈西游记考论〉》,《楚雄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侯会《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

曹炳建《〈西游记平话〉成书年代补正》,《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李安纲《〈性命圭旨〉是〈西游记〉的文化原型》,《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高思嘉《谈〈西游记〉中成语、俗语的运用与儒家传统》,《文史杂志》1996年第4期

吴圣昔《〈西游记〉札丛(2)》,《文教资料》1996年第5期

曹炳建《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与民族精神》,《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何峰《耐人寻味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堂吉诃德〉与〈西游记〉之比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张锦池《宗教光环下的尘俗治平求索:论世本〈西游记〉的文化特征》,《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郭明志《西游: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的精神漫游——〈西游记〉寓意浅释》,《北方论丛》1996年第6期

李安纲《〈西游记〉之谜并不谜——答郑文先生〈原本不谜解而益谜〉》,《山西日报》1996年9月13日

吴圣昔《万水千山:〈西游记〉研究的现状和走向》,《社会科学报》1996年第9期

李安纲《〈西游记〉的文化原型》,《山西发展导报》1996年11月

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文史知识》1996年第11期

[美]魏爱莲《黄周星与〈西游证道书〉的新资料》,《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开明出版社,1996年

金声《〈西游记〉的文化信息与主题思想》,《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刘丽珈《苦难现实中的辉煌理想——别论〈西游记〉中的“女儿国”》,《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1期

吴圣昔《〈西游释厄传〉综考辩证录:兼谈王辉斌的“西游释厄传”论》,《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王辉斌《关于〈西游记〉祖本的再探讨:吴圣昔〈评〉文驳论》,《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刘振农《再论〈西游记〉的作者与性质:兼评当前〈西游记〉研究中的一种“新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扎拉嘎《阿日那与他的蒙译本〈西游记〉》,《内蒙古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阎凤梧《〈西游记〉文化研究简述:在〈西游记〉文化首届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运城高专学报》1997年第1期

郭明志《论〈西游记〉续书》,《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1期

张锦池《说朱本是晚于世本和杨本的三缀本:〈西游记〉版本源流考论之二》,《北方论坛》1997年第1期

慕槐《〈西游记〉里的国际关系准则》,《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

吴圣昔《〈西游记〉三题》,《文教资料》1997年第1期

[美]安东尼著,赵鑫虎译《〈西游记〉的宗教主题和讽喻技巧考辨》,《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潘富恩《谈阳明心学与〈西游记〉的心路历程》,《运城高专学报》1997年第1期

陈洪《〈西游记〉的宗教文字版本问题》,《运城高专学报》1997年第1期

冯巧英《论〈西游记〉的心性说主题》,《运城高专学报》1997年第1期

邹洪民、高万云《简说“复加”修辞格——以〈西游记〉为例》,《修辞学习》1997年第1期

王齐洲《〈西游记〉的风格与乐文化的转型》,《运城高专学报》1997年第2期

吴圣昔《〈西游证道书〉撰者考辨》,《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

张锦池《论猪八戒的血统问题》,《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

孙美堂《名教对自然的胜利:〈西游记〉寓意新解》,《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又载《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

阎凤梧、李安纲《明清〈西游记〉文化思想研究概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郭明志《开心一笑,独存赏鉴:〈西游记〉艺术探微》,《学术交流》1997年第2期

郭明志《刀圭与〈西游记〉人物的别名代称》,《求是学刊》1997年第2期

郭明志《论〈西游记〉续书》,《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2期

宋谋场《是奥义发明,还是老调重弹?——评李安纲教授的〈西游记〉研究》,《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李新灿《人类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光辉典范:孙悟空形象新论》,《咸宁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侯会《〈西游记〉“世补本”补说》,《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

蔡铁鹰《〈西游记〉作者确为吴承恩辨》,《晋阳学刊》1997 年第 2 期

孙德喜《〈西游记〉:神圣的解构》,《淮阴师专学报》1997 年第 2 期

张绪道《也论〈西游记〉》,《宗教学研究》1997 年第 2 期

李建东《〈西游记〉的佛教思想》,《河南社会科学》1997 年第 2 期

朱益民《浅析〈西游记〉的幽默》,《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 2 期

唐松波《设象比喻,形神皆妙:〈西游记〉语言与艺术形象初探》,《运城学院学报》1997 年第 2 期

冯秀梅《浅析〈西游记〉中师徒的人格分离》,《心理世界》1997 年第 2 期

刘振农《〈封神演义〉成书年代考实:兼及〈西游记〉成书的一个侧面》,《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

周克良《争自由平等为己任,要自主自宰是目的——〈西游记〉孙悟空辨诬》,《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 年第 3 期

孟繁仁《〈西游记〉故事与西夏人的童话》,《运城学院学报》1997 年第 3 期

王增斌《机心灭处诸魔伏,自证菩提大觉林——禅学的心界神话〈续西游记〉》,《运城学院学报》1997 年第 3 期

程毅中、程有庆《〈西游记〉版本探索》,《文学遗产》1997 年第 3 期

李润强《敦煌变文与〈西游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 年第 3 期

孔刃非《〈西游记〉人物形象塑造的心理学成因》,《明清小说研究》1997 年第 3 期

李正民、宋俊玲《关于〈西游记平话〉的几点考辨》,《晋阳学刊》1997 年第 3 期

康金声《〈西游记〉的文化信息与主题要旨》,《山西大学学报》1997 年第 3 期

李依《杜德桥与文学所学者共话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文学遗产》1997 年第 3 期

张永红、张红艳《胡适古典小说考证中的目录学方法论要》,《古

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 年第 3 期

〔日〕中钵雅量著,李倩译《〈西游记〉的成书(上)》,《通俗文学评论》1997 年第 3 期

〔日〕中钵雅量著,李倩译《〈西游记〉的成书(下)》,《通俗文学评论》1997 年第 4 期

吴圣昔《〈西游记〉西海龙王大名之失(外一题)》,《明清小说研究》1997 年第 4 期

周利生《从泰州学派看吴承恩的创作思想》,《云南学术探索》1997 年第 4 期

王圣乙《四众五行合三藏——谈五行学说在〈西游记〉的体现》,《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 年第 4 期

潘恩东《〈西游记〉“长生之妙道”探微》,《现代养生》1997 年第 4 期

李新灿《〈西游记〉〈堂吉诃德〉之比较》,《咸宁师专学报》1997 年第 4 期

马旷源《〈西游记〉研究两题》,《楚雄师专学报》1997 年第 4 期

张锦池《说朱本是晚于世本和杨本的三缀本——〈西游记〉版本源流考论之二》,《北方论丛》1997 年第 4 期

吴圣昔《论〈西游记〉的“前世本”》,《临沂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7 年第 5 期

耿浩《〈西游记〉里的药名诗》,《家庭中医药》1997 年第 5 期

高润宏《〈西游记〉中植物多》,《植物杂志》1997 年第 6 期

刘叔伦《〈巴黎圣母院〉与〈西游记〉浪漫主义特色之比较》,《中山大学学报》1997 年第 6 期

程毅中《〈西游记考论〉序》,《北方论丛》1997 年第 6 期

张承健《略论〈西游记〉与道教》,《河南大学学报》1997 年第 6 期

骆正《“西游戏”和〈西游记〉》,《中国京剧》1997 年第 6 期

郑起宏《名曰取经,实为独坐修心——〈西游记〉主旨异说》,《青年思想家》1997 年第 6 期

吴圣昔《我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社会科学报》1997 年 8 月 28 日

秦建平《〈西游记〉与档案》，《北京档案》1997年第9期

郭豫适《评刘耿大对〈西游记〉审美意蕴和修辞艺术的研究》，《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姜明《治世之尊，用世之能：〈西游记〉中佛祖形象探析》，《楚雄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孙华先《〈西游记〉取经故事中的重复现象》，《南京晓庄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张庆东《〈西游记〉钩玄》，《气功》1998年第1期

梁归智《自由的隐喻：〈西游记〉的一种解读》，《河东学刊》1998年第1期

杨俊《〈西游记〉与“心学”新论》，《河东学刊》1998年第1期

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冯巧英《〈西游记〉艺术手法新探》，《河东学刊》1998年第2期

宋子俊《论〈西游记〉幽默诙谐的美学风格及其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河东学刊》1998年第2期

邢志平《〈西游记〉思想内容浅析》，《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巴元芳《佛门普度众生的赞歌——〈西游记〉主题浅析》，《甘肃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张庆东《〈西游记〉钩玄之二》，《气功》1998年第2期

欧阳健《从〈观世音应验记〉到〈西游记〉——从一个方面看神怪小说与宗教的关系》，《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邢治平《〈西游记〉宗教修行内景探微》，《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邢治平《〈西游记〉思想内容浅探》，《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吴圣昔《〈西游记〉小话三则》，《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2期

张乘健《略说〈西游记〉与道教》，《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2期

夏敏《牛魔王：初民心灵世界的回光返照》，《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2期

单良《试论〈西游记〉中沙僧形象的塑造》,《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日〕中野美代子著,王江、李安纲译《孙悟空金与火:对门的炼丹术》,《河东学刊》1998年第3期

吴文南《〈格列佛游记〉和〈西游记〉之比较》,《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杨子江《试论〈西游记〉中的市民文化精神》,《通俗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王海洋、何旺生《放言何必非游戏:〈西游记〉诙谐情景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王力《文学的归真——对〈西游记〉、〈浮士德〉的随想》,《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4期

靳青万《从谐音指义看〈西游记〉的反皇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李春青《在文本与历史之间:重读〈西游记〉》,《学习与探索》1998年6期

李成辉、龙利花《谈〈西游记〉的象征意义》,《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增刊

徐子方《〈西游记〉艺术层次论》,《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

苏兴《〈西游记〉中孙悟空对妖精自称“外公”试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1期

李安纲《为什么说吴承恩不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

杨俊《一部人生的悲喜剧——〈西游记〉文化心态透视》,《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

李安纲《论孙悟空形象塑造》,《雁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张永军《“白骨精”寓意浅析》,《名作欣赏》1999年2期

吴圣昔《〈西游记〉乌鸡国故事“增插”说辩证》,《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

竺洪波《理性之光:〈西游记〉的科学精神和未来意识》,《明清小

说研究》1999 年第 2 期

林冠夫《须菩提、孙悟空与唐三藏——读〈西游记〉札记》，《华侨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林鸿雁等《〈西游记〉与明律》，《文史哲》1999 年第 2 期

李洪武《〈西游记〉与禅宗》，《佛教文化》1999 年第 2 期

吴圣昔《评李安纲〈西游记〉论的版本基础》，《山西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林伟玲《试论〈西游记〉的妇女观》，《五邑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曹祖平《〈西游记〉原型解读》，《唐都学刊》1999 年第 2 期

王永场《〈西游记〉的逗乐语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

李安纲《〈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载体》，《湖北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

白灵阶《浅析〈西游记〉中的女妖精》，《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 年第 3 期

林冠夫《红孩儿·善财童子·齐天大圣——读〈西游记〉札记之二》，《华侨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

兰拉成《论〈西游记〉前七回与西天取经故事之关系》，《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 3 期

郭子冉《论魔怪问题：试解〈西游记〉创作原旨之谜》，《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3 期

苏兴《〈升平宝筏〉与〈西游记〉散论》，《洛阳师专学报》1999 年第 3 期

李舜华《孙悟空形象生成的文化追寻》，《海南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

刘宏彬《关于〈西游记〉艺术符号解码的三种主要方式》，《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 年第 3 期

陈新《关于吴承恩〈西游记〉祖本问题——兼与吴圣昔先生商榷》，《文献资料》1999 年第 4 期

贾三强《禅门心法——也谈〈西游记〉的主题》，《咸阳师范专科学

校学报》1999 年第 4 期

王红《〈西游记解说〉补证》，《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 4 期

李安纲《〈西游记〉学发展源流论略》，《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 4 期

孙国中《〈西游记〉作者及其创意初探》，《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 4 期

马臻荣《〈西游记词典〉寻疵》，《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 4 期

佚名《方立天教授谈〈西游记〉》，《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 4 期

马力《文化选择与生命格局：论孙悟空形象的文化内涵》，《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4 期

朱恒夫《〈西游记〉——艺术化了的心学》，《东南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

萧相恺《〈西游记〉宗教文化的随意性》，《明清小说研究》1999 年第 4 期

宁稼雨《〈西游记〉主人公形象的原型精神》，《南开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

苟波《试论〈西游记〉的道教内涵》，《宗教学研究》1999 年第 4 期

张广庆《〈西游记〉佛教文化阐释》，《济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 年第 4 期

周郢《〈西游记〉与泰山文化》，《山东矿业学院学报》1999 年第 4 期

张强《新时期〈西游记〉研究回顾》，《古典文学知识》1999 年第 4 期

陈辽《谈〈西游记〉故事的演变》，《古典文学知识》1999 年第 4 期

李忠明《从“西天取经故事”到〈西游记〉》，《古典文学知识》1999 年第 4 期

朱恒夫《〈西游记〉·目连故事·江淮傩歌》，《古典文学知识》1999 年第 4 期

吴圣昔《〈西游记〉版本浅说》，《古典文学知识》1999 年第 4 期

李舜华《〈西游记〉作者问题的回顾与反思》,《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李金松《〈西游记〉与医学文化》,《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萧兵《〈西游记〉的喜剧性》,《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沈新林《猪首人身的成功典型:猪八戒形象谈片》,《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欧阳健《四方民物俱照融:论〈西游记〉对人与自然美好关系的向往》,《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周中明《扣人心弦,发人深省:论孙悟空“大闹天宫”赏析》,《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金望、志军《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三打白骨精”赏析》,《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刘水云《柔情绵如水,法性冷似冰:〈西游记〉第五十回赏析》,《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萧相恺《孙悟空形象的文化哲学意义》,《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汪长林《迂疏漫浪茆寂身,滑稽雄文千秋名:〈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崔蕴华《〈西游记〉——浪漫主义的人生历程》,《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黄霖《对于自我价值和人性美的追求:关于〈西游记〉的主要精神》,《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王丽娜《〈西游记〉在海外》,《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曹炳建《“醇儒”人格的反思与批判:唐僧新论》,《中州学刊》1999年第4期

佚名《全国第二届〈西游记〉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5期

李安纲《从唐僧取经壁画看〈西游记〉故事的演变》,《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5期

柴剑虹《〈西游记〉与敦煌学》,《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5期,又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杨国学《简论〈西游记〉养生思想的哲学基础》，《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5期

李宇林《简论〈西游记〉的人物形象塑造技法》，《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5期

苏兴、苏铁戈整理《标点本〈续西游记〉读校随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5期

乔力《三棱镜：说〈西游记〉旨趣的隐现多元》，《东岳论丛》1999年第6期

周亮《论〈西游记〉中的性别歧视》，《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6期

姚昌炳《〈西游记〉的现代解读》，《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李舜华《关于〈西游记〉作者的追问及其文化现象问题》，《学术论丛》1999年6期

丛晓眉《〈西游记〉的文化透视——评〈苦海与极乐〉》，《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第11期

李舜华《西游学小史》，《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1期

王青山等《杂剧〈西游记〉与小说〈西游记〉关于“唐僧出世故事比较研究”》，《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李宇林《〈西游记〉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刍议》，《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赵大军《从怀疑到确证——〈西游记〉的版本完整性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1期

毛志勇《女儿国的两个系统：兼论吴承恩与李汝珍的女性审美观》，《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

单继刚《〈西游记〉中的儒释道观》，《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

赵梅英《〈西游记〉思想性的再认识》，《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

杨明义《〈西游记〉中“被”“把”合用句略考》，《汉语学习》2000年第1期

杨国学《〈西游记〉养生思想内儒外佛术道的特点》,《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

朱迪光《今本〈西游记〉的“密谛”:佛耶?道耶?儒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孙国中《〈西游记〉作者及其创意初探》,《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

田根胜《〈西游记〉的文化底蕴》,《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崔小敬《石头的天路历程与尘世历劫——〈西游记〉与〈红楼梦〉石头原型的文化阐释》,《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

吴圣昔《〈西游记〉源流版本问题之我见——致陈新先生》,《文献资料》2000年第2期

李安纲《〈西游记〉作者不懂佛学么?》,《晋阳学刊》2000年第2期

宋克夫《主体意识的弘扬与人格的自我完善——孙悟空形象塑造新论》,《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吴圣昔《论〈西游记〉鲁本和周本信息的异同性》,《上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龚际平《〈西游记〉元批评发微》,《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2期

吴圣昔《〈西游记〉鲁府本揭秘——兼谈登州府本之真相》,《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2期

李安纲《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唐都学刊》2000年第2期

李安纲《〈西游记〉作者的权益不容侵犯——〈西游记〉电视剧续集失误谈》,《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

陈金枝《九十年代〈西游记〉研究综述》,《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又载《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熊可书《也谈〈西游记〉作者对佛教的态度》,《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

周中明《〈西游记〉小说与话本果真基本相同吗?》,《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3期

李舜华《喜耶,悲耶——孙悟空的心路历程》,《明清小说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周继圣《〈西游记〉主要人物的言语个性化问题刍论》，《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

王桂宏《关于〈西游记〉所包含宗教思想成分的探源》，《广西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

张燕、胡义成《〈西游记〉作者：扑朔迷离道士影》，《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

吴圣昔《“祖本”探讨的演变与错位：〈西游记〉版本问题世纪回眸之一》，《中华文化论坛》2000 年第 3 期

赖燕波《论〈西游记〉的尊佛贬道倾向》，《杭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 年第 3 期

姜岳斌《〈神曲〉与〈西游记〉中天堂观念的比较》，《外国文学研究》2000 年第 3 期

李舜华《关于〈西游记〉作者的追寻及其文化现象问题》，《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4 期

刘真《“西游”故事的历史演变》，《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4 期

王晓阳《〈西游记〉与三教合流观》，《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4 期

杨国学《河西走廊三处取经图画与〈西游记〉故事演变的关系》，《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李安纲《〈西游记〉与佛教文化》，《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4 期

宋珂君《超越者的光辉——论〈西游记〉中的仙佛形象及其佛教渊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皋于厚《神魔小说的世俗化倾向与入世情结》，《学海》2000 年第 4 期

郭云《祇用文章供一笑——论〈西游记〉的玩世精神》，《咸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5 期

李安纲《孙悟空与混世魔王》，《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 年第 5 期

毛晓阳《第三届全国〈西游记〉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

李安纲《〈西游记〉的文化研究应该突围而出》，《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

李国成《“孙悟空”的原型是山西娄烦人》，《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

刘戈《孙悟空生命历程的精神启示》，《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

方立天《〈西游记〉与佛教文化》，《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

曹炳建《天界佛国入世情怀：〈西游记〉儒家思想论略》，《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

蔡铁鹰《读懂〈西游记〉》，《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

胡胜《明清神魔小说创作思想试论》，《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马翼《杂剧〈西游记〉思想内容的时代特色》，《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海客《北京沈承庆多年研究〈西游记〉，提出——〈西游记〉作者为李春芳》，《文汇报》2001年1月13日

张燕、胡义成《〈西游记〉作者和主旨再探》，《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李宇林《试论〈西游记〉的自然环境描写及其文化意蕴》，《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黄小丽《试析〈西游记〉的地名文化特色》，《中国地名》2001年第1期

郭兴良《〈西游记〉幻化描写的文化意味》，《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康金声《近年来〈西游记〉研究的成绩与问题》，《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杨扬《〈西游记〉文体特征的再认识》，《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年第 1 期

朱迪光《司法描写与〈西游记〉的风格及其写定者》,《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 年第 1 期

姜飞《〈怀念狼〉与〈西游记〉》,《宜宾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年第 1 期

谈啸《大悲精神:审美和证道的双重境界——试析〈西游记〉魔难结局模式》,《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1 期

张晓康《〈西游记〉之意象》,《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1 期

王筠《〈西游记〉八十一难结构剖析》,《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年第 1 期

王为民《对于〈西游记〉的一种阐释:〈西游补〉与〈西游记〉之关系》,《明清小说研究》2001 年第 1 期

袁宾《〈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与方言基础》,《明清小说研究》2001 年第 1 期

李舜华《东方与西方:异域视野中的〈西游记〉》,《学术交流》2001 年第 1 期

胡义成、张燕《追加〈西游记〉作者文——〈西游记〉作者和主旨再谈》,《大连学院学报》2001 年第 1 期

邓福舜《孙悟空形象与石崇拜》,《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1 期

张松辉《〈西游记〉与邱长春西游》,《中华文化论坛》2001 年第 2 期

凤录生《道教与志怪传奇小说的渊源关系》,《唐都学刊》2001 年第 2 期

阎凤梧《应当重读〈西游记〉》,《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2 期

李安纲《〈西游记〉与全真教文化》,《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2 期

康金声《〈西游记〉中诗词的使用》,《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2 期

胡义成、张燕《〈西游〉作者：扑朔迷离道士影》，《阴山学刊》2001年第3期

俞士玲《佛教发展与西游故事之流衍》，《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何良昊《〈西游补〉的谦与傲》，《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潘天桥《猪八戒的性格世界初探》，《阅读与写作》2001年第3期

杨子彦《孙悟空形象演变与人的社会化》，《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3期

张世宏《谈小说〈西游记〉的两点结构失误》，《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又载《江淮论坛》2001年第5期

杨志彦《孙悟空形象演变与人的社会化》，《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

张小龙《个体生命意识的激荡：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看〈西游记〉的创作动机》，《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

刘辰莹《〈西游记〉中三教地位辨析》，《华侨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国文《心路迢迢——简析班扬的〈天路历程〉兼与〈西游记〉对比》，《昌潍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毛晓阳《修心与修命：〈西游记〉“心性修持观”与王曦“性命合一论”比较》，《福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李安纲《也谈〈西游记〉的版本次第——评沈承庆先生〈话说吴承恩〉中的版本论述》，《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朱迪光《民间信仰的影响与〈西游记〉故事的定型》，《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

程栋《〈西游记〉主题“仅此一家，不需分店”吗——与李安纲诸人商榷》，《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

裘寅《西游记中“小白龙”形象研究》，《语文月刊》2001年第4期

蔡铁鹰《再看〈西游记〉：吴承恩眼中的现实社会》，《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郭健《〈西游记〉“真经”与道教〈真经歌〉》，《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4期

敦玉林《〈西游记〉及其作者与盱眙》，《明清小说研究》2001 年第 4 期

刘振伟《“取经人”与吴承恩——关于〈西游记〉作者心态的探讨》，《昌吉学院学报》2001 年第 4 期

李安纲《孙悟空是人类心灵最完美的象征》，《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4 期

王建荣、杜敏《浅谈孙悟空形象对儿童的教育意义》，《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4 期

施发笔《论〈西游记〉中表示被动的“被”和“吃”》，《新疆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

黄海兵《谈“猪八戒”形象的文化意蕴》，《龙岩师专学报》2001 年第 4 期

王增斌、李衍明《〈续西游记〉主题探奥》，《山西大学学报》2001 年第 5 期

李安纲《易学结构在〈西游记〉中的应用》，《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5 期

诸蓓娟《两种文学传统 两种叙事视角——以〈西游记〉和〈堂吉珂德〉为例》，《台州学院学报》2001 年第 5 期

郭健《〈西游记〉中“真经”的内丹学含义》，《中国道教》2001 年第 5 期

方本新、张宁《〈西游记〉的游戏笔法与人物形象艺术》，《淮北煤师院学报》2001 年第 5 期

陈娟《孙悟空与猪八戒：狂与欲》，《高等函授学报》2001 年第 5 期

孙安《〈西游记〉同词异体方言例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6 期

淮茗《西天路上的凡夫俗子——猪八戒悲剧新说》，《名作欣赏》2001 年第 6 期

吴圣昔《〈西游记〉作者诸说追踪和述录》，《古典文学知识》2001 年第 6 期

李小荣《〈西游记〉〈心经〉关系之略论》，《贵州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

王齐洲《〈西游记〉与〈心经〉》,《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

王振宇《〈西游记〉与精神分析学说》,《文汇报》2001年9月24日

楚永桥《〈西游记〉中的紧箍儿和紧箍儿咒》,《光明日报》2001年10月31日

钱伯城《〈西游记〉简说》,《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1月24日

李洪武《〈西游记〉与〈心经〉》,《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蔡相宗、李荣昌《从佛教唯识宗看〈西游记〉人物形象塑造》,《佛教文化》2002年第1期

贾根龙《孙悟空:符号化形象及其所指变迁》,《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龙国庆《丑中孕美,借幻传真:猪八戒形象新探》,《零陵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

张又《猪八戒贪色缘由考》,《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兰拉城《〈西游记〉取经故事的生命意蕴》,《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苏兴、苏铁戈《〈西游记〉谈枝四题》,《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邱文龙《西游神猴的东西方诠释:从民间文学到比较文学》,《南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竺洪波《论〈西游证道书〉的艺术修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王宝利、唐韵《〈西游记〉单音节动词重叠式VV与V—V的差异》,《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黄永年《说〈西游记〉中欠照应的漏洞》,《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2期

梅新林、崔小敬《〈西游记〉百年研究:回视与超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2期

刘宏《〈西游记〉文本意蕴新解》,《韶关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廖向东《士大夫文化精神的指向:〈西游记〉“三教合一”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李安纲《怪诗并不怪,只为未读懂:评沈承庆先生〈西游记〉作者李春芳说》,《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

马翼《杂剧〈西游记〉的作者、著录及流传》,《韶关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李忠明《〈西游记〉“游戏”背后的深层内涵》,《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

蔡相宗、李荣昌《一体真如转落尘,含和四相复修身:〈西游记〉人物形象塑造的唯识论解读》,《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吴圣昔、吴惟《〈西游记〉版本研究的共同坐标:试以“词话本—前世本—世本”三者关系为基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许勤《简论〈西游记〉的现实性》,《池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徐军华《2002年〈西游记〉与神魔小说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零陵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谷李军《另眼相看弼马温》,《文史知识》2002年第2期

萧兵《人参果的文化考析:兼论其与灵芝、人参、小人国及生命数、摇钱树、圣诞树的关系》,《民族艺术》2002年第2期

胡义成《〈西游记〉首要作者是元明两代全真教徒》,《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宋珂君《〈西游记〉中的芸芸众生及其佛教文化渊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竺洪波《自由:〈西游记〉的主题》,《中文自学指导》2002年第3期

王心剑《从〈西游记〉人物设计上看主旨》,《西安石油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杨德柱《猪八戒形象简论》,《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李萍《唐僧师徒人物造型得失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王新建《须菩提祖师与〈西游记〉结构义理探究》,《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杨国学《丝绸之路〈西游记〉故事情节原型辨析》,《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3期

张又《猪八戒贪色之缘由考辨》，《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3期

张蕊青《幻笔寓世相 戏笔寄奇趣——试论〈西游记〉的审美创新》，《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3期

胥惠民、董晔、刘春燕《2002年〈西游记〉与神魔小说研讨会综述》，《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3期

李小荣《沙僧形象溯源》，《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佚名《第四届〈西游记〉与中华道教养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8月12日在北京举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刘志生《〈西游记〉中的选择疑问句》，《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钟雯《孙悟空形象原型研究与石槃陀》，《光明日报》2002年4月27日

李连生《〈西游记〉鬼子母与九字母》，《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4期

张广庆《〈西游记〉主题研究解析》，《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杨子华《〈西游记〉与杭州的亲缘关系》，《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曹炳建《仙界道门的荣幸与尴尬：〈西游记〉道教思想论略》，《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杨扬《〈西游记〉形象和现代审美文化》，《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吴圣昔《〈西游记〉词话本问题追踪和串述》，《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4期

张强、周业菊《新时期孙悟空原型研究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吴圣昔《究竟谁是造物主——〈西游记〉作者问题综考辩证录》，《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沈伯俊《〈西游记〉作者补论》，《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葛维钧《〈西游记〉孙悟空故事的印度渊源》，《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叶建军《精变:〈聊斋志异〉与〈西游记〉的比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关茜《永恒的“圆”——从〈西游记〉和〈伤逝〉看中国小说的圆形叙事》,《黄山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李红茹《〈西游记〉陈评李评本中的“虚实论”研究》,《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胡义成《今本〈西游记〉是明代全真道士闫蓬头师徒撰定》,《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胡义成《论明代江苏茅山龙门道士闫希言师徒师是今本〈西游记〉定稿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巴雅尔图《蒙古文〈西游记〉漫谈》,《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胡世厚《毛泽东与〈西游记〉》,《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曹炳建《回眸〈西游记〉作者研究及我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杨江平、李新灿《孙悟空形象的思想内蕴和启示》,《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胡义成《再论邱处机麾下道士作〈西游记〉祖稿》,《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6期

郭健《〈西游记〉与“金丹大道”——关于〈西游记〉主题的几个关键词问题辨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宋珂君《指归宗教的英雄气息与自由精神——〈西游记〉的主题倾向及其佛教文化渊源辨析之一》,《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美]刘晓廉著,咸增强译《心路历程:〈后西游记〉的根本寓意》,《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6期

胡义成《从作者看〈西游记〉为道教文化奇葩》,《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赵心宪、聂树平《孙悟空形象的悲剧性本质问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杨俊《“西游学”的崛起、知识与经济〈西游记〉研究》,《运城高等

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第 6 期

宋培宪《毛泽东评述〈西游记〉略论》，《丹东师专学报》2003 年第 1 期

张岚岚《宗教的外衣、游戏的笔法、时代的反映：重读〈西游记〉》，《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 年 1 期

胡义成《邱处机与〈西游记〉的关联难以刈断》，《河池师专学报》2003 年第 1 期

张大新《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之再认识》，《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杨海波《论〈西游记〉中的艺术辩证法》，《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张旗《唐僧取经与仙界秩序——重读〈西游记〉》，《华夏文化》2003 年第 1 期

胡义成《花落道家：论今本〈西游记〉的最后定稿者》，《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 年第 1 期

李安纲《关于〈西游记〉研究的几个问题：在第四届〈西游记〉国际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发言》，《运城学院院报》2003 年第 1 期

刘凤《从紧箍咒看形象的悲剧性》，《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龙奇《〈西游记〉里香火多》，《河南消防》2003 年第 1 期

王瑞明《大智闲闲 真机默默——〈西游记〉作者心灵探索之一》，《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郑铁生等《2002 年〈西游记〉与神魔小说研讨会发言摘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李树民《嵌在语言链条上的幽默：〈西游记〉命名艺术》，《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 年第 1 期

杨国学《丝绸之路〈西游记〉部分事情节原型辨析》，《河西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赵雨《孙悟空形象原型及其宗教精神考释》，《运城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曹炳建《封建时代普通民众的人格写照——〈西游记〉沙僧形象

新论》，《明清小说研究》2003 年第 1 期

李智瑛《由〈西游记〉小窥中国佛道信仰的兼容性》，《上海工艺美术》2003 年第 1 期

李洪甫《吴承恩的〈西游记〉成书与连云港花果山》，《淮海工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蔡永明《论吴承恩〈西游记〉小说及其成书之前的取经故事》，《淮海工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余箴《论猪八戒——〈西游记〉人物评析》，《黄山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李忠明《〈西游记〉“游戏”背后的深沉内涵》，《明清小说研究》2002 年第 2 期

孟繁仁《〈西游记〉与山西》，《明清小说研究》2003 年第 2 期

吴圣昔《〈西游记〉佚本知多少》，《古典文学知识》2003 年第 2 期

田干生《〈西游补〉作者之谜》，《文史杂志》2003 年第 2 期

李胜《〈西游记〉〈红楼梦〉中“石头”的文化隐喻》，《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关学智《〈西游记〉与西方流浪汉小说之比较》，《丹东师专学报》2003 年第 2 期

胡义成《〈西游记〉定稿人与全真教关系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胡义成《论今本〈西游记〉定稿者即明代闫希言师徒》，《南京邮电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阿华《〈西游记〉新校注本出版》，《四川文物》2003 年第 2 期

马丽云《浅谈〈西游记〉幽默诙谐的创作风格》，《青海教育》2003 年第 2 期

李安纲《〈西游记〉的真谛——在 2002 年全国明清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运城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李志梅《〈西游记〉中的唐僧——一个“鸡肋”人物的再剖析》，《运城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西游记〉是“六才子书”之一吗》，《咬文嚼字》2003 年第 2 期

曾中辉《论〈西游记〉的用人理念及其结果》，《东莞理工学院学

报》2003 年第 2 期

唐林轩《不可忽视的因素——试论食物在〈西游记〉中的作用》，《萍乡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 年第 2 期

胡义成《〈西游记〉最终定稿人之我见》，《成都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武影《情陶山水 意幕渔樵——谈〈西游记〉诗词中的羡隐乐逸思想》，《南都学坛》2003 年第 3 期

张强《从神话到小说——兼论〈西游记〉的神话品质》，《明清小说研究》2003 年第 3 期

张安祖《〈西游记〉语词考释二则》，《明清小说研究》2003 年第 3 期

吴光正《西游故事系统中的色欲考验》，《明清小说研究》2003 年第 3 期

赵宇浩《宋江、孙悟空人格理想中的人文主义——兼论〈水浒〉〈西游记〉的人文主义创作思想》，《秦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杨赟《论〈西游记〉中孙悟空哭泣的多重意义》，《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崔小敬、梅新林《〈西游记〉文献学百年巡视》，《运城学院学报》2003 年 3 期

宋珂君《阴暗心理的象征：〈西游记〉中的妖魔及其佛教文化寓意》，《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3 年 3 期

王前程《从性爱描写看〈西游记〉的世俗化倾向》，《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山述兰、刘志生《〈西游记〉中的是非问句》，《成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 年第 3 期

袁世硕《清代〈西游记〉道家评本评本解读》，《文史哲》2003 年第 4 期

黄慧敏《佛、道在〈西游记〉中的地位——试述〈西游记〉的宗教意识》，《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

王卫国《〈西游记〉读者接受主题举隅》，《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报》2003 年第 4 期

吴淑玲《〈西游记〉的自由意识》，《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李安纲《关于〈西游记〉的七大发现——在淮安 2002 年吴承恩〈西游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运城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

云峰《论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对吴承恩〈西游记〉小说成书之影响》，《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泥牛《〈西游记〉诸多精怪之来历》，《明清小说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吴言生《〈西游记〉佛经篇目及“多心经”称谓考辨》，《世界宗教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吕特《雅俗共赏：〈西游记〉的美学追求》，《湖北社会科学报》2003 年第 4 期

张晓康《再论〈西游记〉的湘方言》，《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陈文新、余来明《〈西游记〉与神魔小说审美规范的确立》，《东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

王海梅《〈西游记〉与观音信仰》，《雍坊学院学报》2003 年第 5 期

宋珂君《批判现实与游戏人生——〈西游记〉的主题倾向及其佛教文化渊源辨析之二》，《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5 期

杜贵晨《〈西游记〉的“倚数”意图及其与邵雍之关系：〈西游记〉数理批评之一》，《东岳论丛》2003 年第 5 期

王海《〈西游记〉创作心理动因探源》，《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5 期

王新建《从〈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及结构看其主旨》，《人文杂志》2003 年第 5 期

张晓康《荆府纪善，花萼社与〈西游记〉》，《鄱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3 年第 5 期

关四平《开拓西游学新领域，探寻其中深隐意蕴——评中野美代子〈西游记的秘密（外二种）〉》，《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3 年第 6 期

龙国庆《沛然一气贯奇书——略论〈西游记〉主旨的统一性》，《零

陵学院学报》2003 年第 6 期

陈宏、陈洪《论〈西游记〉与全真教之缘》，《文学遗产》2003 年第 6 期

李洪武《论“孙悟空”名字的佛教内涵》，《运城学院学报》2003 年第 6 期

田同旭《论孙悟空何以常打败仗》，《运城学院学报》2003 年第 6 期

王新建《〈西游记〉主旨探微》，《学术交流》2003 年第 7 期

宋培宪《毛泽东对〈西游记〉的研究与品评》，《运城学院学报》2003 年 11 期

李桂奎《论〈西游记〉取经队伍的哲理构成与角色意蕴》，《学术交流》2003 年第 12 期

王齐洲《论明人对〈西游记〉的再认识》，《社会科学研究》2004 年第 1 期

江少英《自由的人格——析〈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人格形象之一》，《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4 年第 1 期

胡小伟《从〈至元辨伪录〉到〈西游记〉》，《河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曹炳建《〈西游记〉中所见佛教经目考》，《河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苗怀明《二十世纪〈西游记〉文献研究述略》，《学术交流》2004 年第 1 期

张祝平《〈西游记〉的海洋情结》，《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杨子华《从“耍子儿”谈〈西游记〉中的杭州方言》，《运城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张启成《孙悟空形象原型探源》，《文史杂志》2004 年第 1 期

陈文新、韩霄《〈西游记〉与神魔小说风格类型之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孙书磊《经典的解构：从〈西游记〉到〈西游补〉、〈大话西游〉》，《淮海工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伍林光《美德与奴性的结合——浅析〈西游记〉中沙僧形象》，《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陈惠琴《孙悟空形象的国家观解读》，《明清小说研究》2004 年第 1 期

张大新《〈西游记〉创作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之再认识》，《明清小说研究》2004 年第 1 期

曹炳建、张彩丽《〈西游记〉朱、杨二本关系论》，《明清小说研究》2004 年第 1 期

〔韩国〕金敏镐《〈西游记〉在韩国》，《明清小说研究》2004 年第 1 期

李安纲《美猴王与中国文化传统：在运城学院的演讲报告（节录）》，《运城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薄其松《孙悟空艺术形象浅析》，《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 年第 1 期

黄毅、许建平《百年〈西游记〉作者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云南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

赵永生《历代驰名第一妖与斗战胜佛：论孙悟空的性格发展》，《哈尔滨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曹炳建、张大新《〈西游记〉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4 年第 2 期

成晓辉《〈西游记〉的佛教故事》，《社会科学家》2004 年第 2 期

陈宏《〈二郎宝卷〉与小说〈西游记〉关系考》，《甘肃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

郭健《建国以来〈西游记〉主题研究述评》，《江淮论坛》2004 年第 2 期

韩洪举《世界神话宝库中的双壁——〈西游记〉与〈希腊古典神话〉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

陈卫华《关于〈西游记〉中遭厄女性的贞操问题》，《昌吉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王海梅《〈西游记〉中的般若空观》，《山东电大学报》2004 年第 2 期

陈宏《孙悟空别称之宗教性内涵初探》，《南开学报》2004 年第 2 期

张晓康《论〈西游记〉中的“名实论”思维体系》，《淮海工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易翔宇《心化“西游”——论明代阳明心学在〈西游记〉中的投影》，《五邑大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

薛梅、宋克夫《吴承恩著〈西游记〉新证》，《明清小说研究》2004 年第 2 期

胡义成《全真教徒苦撰〈西游〉四百年》，《池州师专学报》2004 年第 2 期

毛小雨《〈西游记〉杂剧研究》，《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钟扬《〈二郎搜山图歌〉与〈西游记〉》，《明清小说研究》2004 年第 2 期

张红霞《女性“缺席”的判决——论〈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明清小说研究》2004 年第 2 期

蔡铁鹰《唐僧取经故事生成于西域之求证》，《明清小说研究》2004 年第 2 期

李鲁祥《给英雄一个理由，让他回去——〈西游记〉的叙事艺术》，《山东大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

王国伟《反叛、反讽、反衬——简析〈西游记〉中女妖形象》，《理论学刊》2004 年第 3 期

乐云《论〈西游记〉的叙事结构》，《武汉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

李赴军《佛光幻影中世俗女性的映像——〈西游记〉女性形象解读》，《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吴新化《论〈西游记〉神佛故事中的儒家伦常意识》，《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李鲁祥《艰难的自我超越——〈西游记〉的寓意》，《运城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王娟侠《试论中国古代神话对〈西游记〉形象塑造的影响》，《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

张淑华《从〈西游记〉看男权文化中的女性形象》，《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兰拉成《〈西游记〉“三教合一”思想分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崔玉卿《五台山与〈西游记〉》，《五台山研究》2004年第3期

李满花《从〈西游记〉看当时文人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湖北广播电视大学》2004年第3期

胡莲玉《〈西游记〉主题接受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

徐峙《那一代人的怕和爱——从〈西游记〉的悖论世界到吴承恩的精神家园》，《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

周小兵《〈西游记〉宗教描写的艺术转换》，《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唐林轩《猪八戒的贪物情结》，《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

赵旭、孙雪娇《白龙马形象的演变》，《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王前程《〈西游记〉的情欲观及其文化价值》，《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4期

张松叶《猪八戒艺术形象的审美价值及佛学寓意》，《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刘廷乾《〈西游记〉“以人为本”的主题新探》，《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张乘建《〈哈姆雷特〉与〈西游记〉里的乌鸡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白军芳、于唯德《〈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中两类人物的双重审美标准》，《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徐乃为《论〈西游记〉在创作学上的范式意义》，《淮海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谈凤霞《论儿童视角观照下的〈西游记〉美学——兼与西方幻想小说〈哈里·波特〉比照》，《淮海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吴圣燮《杨闽斋〈新镌全像西游记传〉版本研考(上)》,《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4期

冯文楼《两种人性整合思路的比较——以〈西游记〉为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4期

竺洪波《郑振铎对〈西游记〉新史料的发现与认识》,《中文自学指导》2004年第4期

彭新竹《说“白龙马”》,《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4年第4期

武影《论〈西游记〉的人才观》,《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王前程《游戏形式中的精神突围——〈西游记〉对封建正统文化的消解》,《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崔理明《〈西游记〉中的道教修炼观》,《中国道教》2004年第5期

赵志成《〈西游记〉寓意的人学解读》,《渤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顾洁诚《〈西游记〉作者之我见》,《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第5期

成晓辉《论〈西游记〉的佛学意蕴》,《求索》2004年第6期

杨国学、朱瑜章《玄奘取经与〈西游记〉“遗迹”现象透视》,《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李宇林《从〈西游记〉的人物形象塑造看吴承恩的人才观》,《运城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冯寿农《勒内·吉拉尔神话观评析——兼论〈西游记〉的替罪羊机制》,《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宁荣生《〈西游记〉:精神分析之旅》,《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于华《〈西游记〉神话人物形象戏说》,《阅读与写作》2004年第9期

骆志方《简论〈西游记〉创作与“天人合一”思想的渊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0期

曹炳建《多重文化意义下的探索与追求——〈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新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

胡胜《试论百回本〈西游记〉的艺术形象创新——以孙悟空与猪

八戒形象的艺术演进为例》，《广州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2 期

竺洪波《鲁迅、胡适与〈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论之一》，《明清小说研究》2005 年第 1 期

夏敏《沙僧、大流沙与西域宗教的想象》，《明清小说研究》2005 年第 1 期

彭建华、朱世业《从唐太宗游地府和三打白骨精说起——论〈西游记〉中的生死》，《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黄宇玲《〈西游记〉长生术解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张顺《以谪世为中心的〈西游记〉结构》，《广西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005 年第 1 期

杜贵晨《〈西游记〉数理机制论要——从神秘数字出发的文学批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李德身《〈西游记〉的多变性描写及其主旨》，《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年第 1 期

竺洪波《〈西游记〉杂剧对〈西游记〉小说影响的再认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刘建军《〈西游记〉：一部对精神现象理解的杰作》，《中文自学指导》2005 年第 1 期

杨国学《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咒探源》，《运城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张祝平《〈西游记〉对佛教四大部洲方位的改造》，《南通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曹炳建《〈西游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淮海工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田艺健、郑芸《金箍棒与紧箍咒：论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一种对〈西游记〉的政治学解读》，《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杜贵晨《〈西游记〉“悟空”论：〈西游记〉数理批评之四》，《南都学坛》2005 年第 1 期

杜贵晨《说“如意金箍棒”》，《明清小说研究》2005 年第 2 期

曹炳建《〈礼节传簿〉所载“西游”戏曲考——兼与蔡铁鹰等先生

商榷》，《明清小说研究》2005 年第 2 期

郭健《〈西游记〉为何不能是“证道书”》，《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石松《人类的本能恶欲和向善追求——〈指环王〉与〈西游记〉的哲学思想比较》，《杭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2005 年第 2 期

张英《〈西游记〉对“二郎”原型的改造与重塑》，《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成晓辉《试论〈西游记〉的佛学主题》，《社会科学家》2005 年第 2 期

孙苏、孙未艾《生存意识的戏谑化书写——〈西游记〉一解》，《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年第 2 期

项欲荣《〈夷坚志〉与小说〈西游记〉——也论孙悟空的原型》，《复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刘雨过《简论〈西游记〉中的“童心”》，《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徐青云《试论〈西游记〉中的讽刺艺术》，《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罗宏梅、周冰《从“猴”到“人”的悖论——浅谈〈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异化悲剧》，《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张晓康《略论〈西游记〉中“美猴王”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淮海工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赵雨《〈西游记〉与明代民间宗教的社会意识》，《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杜贵晨《唐僧的紫金钵盂》，《光明日报》2005 年 3 月 25 日

范晓丽《一个瑰丽雄奇的“神话”世界——谈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对〈西游记〉的影响》，《语文学刊》2005 年第 3 期

高娟、顾鹄《谈〈西游记〉中的商业气息》，《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

兰拉成《“以意逆志”：从儒道佛对〈西游记〉渗透臆测其成书过程》，《江淮论坛》2005 年第 3 期

薛梅《〈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之幻》，《运城学院学报》2005 年

第3期

文艺《从照妖镜到玄理之镜:〈西游补〉意旨浅析》,《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竺洪波《新时期〈西游记〉研究述评》,《人文论丛》(2004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蔡铁鹰《李安纲“〈西游记〉文化研究”之学术质疑》,《晋阳学刊》2005年第4期

胡健《不朽的童心 审美的游戏——为〈西游记〉进上一解》,《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续论《藏传密教与〈西游记〉——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张宗子《万镜楼中的方梦三世:读〈西游记〉札记》,《万象》2005年第6期

宋慧然《〈西游记〉以假乱真模式的艺术价值及其成因》,《现代语文》(理论研究版)2005年第7期

孙苏《解读〈西游记〉的“钥匙”》,《名作欣赏》2005年第15期

说明:本索引主要根据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和中国学术期刊网相关资料,以及郑明嫔(台湾)《〈西游记〉论著目录》、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论文索引》和刘耿大、王丽娜《〈西游记〉研究论著目录》汇总而成,特致谢意。

后 记

2002年初春,我有幸忝列恩师齐森华先生门下,在职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而在此之前,我像一个漫无目标、踽踽独行的“散兵”,在学界游弋了一段时间。所以,在今天终于完成这篇学位论文的时候,我首先要由衷地感谢我所供职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正是它把我推上了一个新的学习阶段,汇入到更高层次的学术轨道,并在财力和时间上都给予了充分的保障。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三年负笈生活在倏忽间过去,但回顾自己走过的艰辛历程,仿佛又是那样的漫长。在这些日子里,兴奋、焦虑、彷徨、困惑,各种情绪时时袭扰着我,它们最终又似乎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目标,那就是累。从选题、论证直到马拉松式的撰写过程,苦思冥想,殚精竭虑,那是神累;为搜寻材料,不断地往返于书店和图书馆,疲于奔命,冬日顶风冒雨,夏时汗流浹背,那是身累;频繁地修书通电,向各地同好求教解惑,每感自己学识浅薄而汗颜不止,则是心累。加上我还承担着一份属于本职的教学工作,不免杂务缠身,经常难以集中精神,进入良好的状态,所以写作进度一直如挤牙膏或打点滴一般,时断时续,甚感郁闷不畅。在这种情况下,致使本文多有构架上的局促拘谨和文气上的滞呆不顺之处,也就不言而喻了。

钱锺书先生曾把莘莘学子读书著述比喻为“叫驴推磨”。诚哉斯言。我就是边“叫”边“推”坚持着走过来。值得庆幸的是,上述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在几声叫唤声中过去。然则,还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体会将注定终生难忘。比如清代朴学大师戴震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过去曾客串于小说美学、儿童文学美学等多个研究领域,也写下一点文字,对此似乎没有什么感受,自然是浅尝辄止、“无知者无畏”的缘故。通过这次著述《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

算是真切地尝到了这“学之三难”的滋味。学问之道贵乎独立思考,献疑解惑,“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对此真髓我诚然还仅得皮毛,但总算是明确了努力的方向,也可说是“非谓能之,心向往之”了。这或许是我完成这篇论文后的意外收获。

恩师齐森华先生对我的学习、写作都给予了悉心指导和督促,大至论文的选题、构思,细如遣词、行文,先生都时时劳神费心。没有他的点拨、指谬和严加鞭策,我是断断乎不能完成这篇学位论文的。感激之情,又岂是这里可以言表!郭豫适、陈大康、谭帆三位先生是我们这一届博士生的授业导师,他们不但给我们开设专业课程,而且也一直关心着我的写作。郭先生曾鼓励我树立自信,大胆抒发自己的真见,敢于批评《西游记》研究中某些错误观点和不良学风。陈先生教导我“夯实基础”,要从学科的基础工作做起,善于怀疑和质疑陈说,以开阔思路,提高境界。谭先生则告诫我要“摸清家底”,盘点本论题已有的全部成果,以做到胸有全竹。他们的这些教诲,使我得益匪浅,我的写作因此而有了着力的依托和方向。在这里我向他们三位师长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同事和同门师兄们,他们是曹炳建、蔡铁鹰、关四平、张蕊青、魏文哲、曹萌、胡胜、方克强、归青、陈璧耀、王意如、车文明、朱惠国、程华平、徐国华诸位先生。我不能忘记,是他们给予我各种方式的真诚、无私和有效的帮助。因此,令我至今激动不已的是,在我完成了论文的同时,还收获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珍贵友谊。

最后要记述的是,在我攻读学位、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明清小说研究》、《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中华文化论坛》、《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和《中文》等多家学术刊物刊发了我的相关论文,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对于它们的知遇和提携之恩,我将永远怀有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由于学识浅陋,加之时间仓促,自感论文中尚有许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不足不当诸如挂一漏万、鲁鱼豕亥之处所在多有,甚或理论上的错失、谬误定不在少数,祈请方家教诲指正。

竺洪波

2005年4月3日于华东师大

补 记

拙作《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于 2005 年 3 月,至同年 11 月经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审批列入“第八批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历时八个月。除《后记》所叙外,尚有一些情况补记如下:

论文写成后,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黄霖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李时人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杜贵晨教授分别予以审阅。蒙他们的错爱,拙作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特别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应必诚先生,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写出了长达两千字的评阅书(粘贴在表格后面),其中除了热情的勉励,还提出了许多较为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年前亲聆师尊教诲的情景,心里升腾起一种重归母校、重归师门的温馨。

在 2005 年 5 月举行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由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黄霖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李时人教授以及本校郭豫适教授、陈大康教授、谭帆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对拙作作出了“优秀博士论文”的评价,并对其进一步的修改提出了富有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主席章培恒先生在最后总结评论时说:“本论文有公开出版的价值和必要。”这样的评价使我在万分感佩之余受到了莫大的鼓舞。答辩结束不久即正式申报本年度“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的出版资助项目。

最后,我要感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的诸位专家、评委,正是他们所作的评审结论(全程匿名),使拙作有了快速出版的机会;感谢该委员会办公室的范小平女士在评审期间所作的种种指导与帮助;感谢本校赵山林教授向上海市相关学术与评审机构所作的郑重的推荐;感谢华东师大社科处诸位同仁所作的卓有成

效的工作;感谢恩师齐森华先生拨冗赐序。另外,我的研究生刘保庆为我排列、整理了《附录 现代〈西游记〉学术论文要目索引》,陈薇代为翻译了本书的英文摘要,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宋文涛先生在出版过程中承担了大量艰辛繁难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竺洪波

2005 年 11 月于上海市灵山路桃林小区寓所